

知年东

毛新宇
著

三兄弟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官方微信

ISBN 978-7-02-012204-2



9 787020 122042 >

定价：66.00 元

知年东 三兄弟

毛新宇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三兄弟 / 毛新宇著.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02-012204-2

I. ①毛… II. ①毛… III. ①毛泽东 (1893—1976) —生平事迹
②毛泽民 (1896—1943) —生平事迹 ③毛泽覃 (1905—1935) —生平事迹
IV. ① A752 ②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5817 号

责任编辑 孔令燕 陈 亮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校对 刘晓强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80 千字
开 本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16
印 张 31.25 插页 11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204-2
定 价 6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 010-65233595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图为1919年毛泽东(右一)与弟弟毛泽民(左二)、毛泽覃(左一)和母亲文素勤合影

知早东 三兄弟



1919年11月,毛泽东(右一)与父亲毛顺生(左二)、堂伯父毛福生(右二)、弟弟毛泽覃在长沙合影



.....
1924年，杨开慧与长子毛岸英（右一）、次子毛岸青合影

知早东三兄弟



.....
1926 年春，毛泽覃在广州与妻子周文楠（右一）、
岳母周陈轩合影



1936 年，毛泽东与贺子珍在陕北保安

知早东三兄弟



.....
1942年，毛泽民、朱旦华夫妇和儿子毛远新在新疆合影



1950 年，毛岸英半身像

知早东三兄弟



.....

1959年，邵华（左）陪刘思齐去朝鲜为
毛岸英扫墓



1974 年，毛岸青和儿子毛新宇在一起

知平东三兄弟



与许世友爷爷的枪一般高。毛新宇年幼时



毛新宇在天安门广场怀念爷爷（1976年）

知平东三兄弟



.....
1977年，毛岸青（二排左三）、邵华（二排左二）、
杨开智（二排左一）、毛新宇（前排）等在韶山
毛泽东纪念馆留影



参观毛主席故居留念 / 1984年

.....
 1984年，毛岸青（前排左七）、邵华（前排左六）、
 刘思齐（前排右四）、毛新宇（前排右三）等访
 问韶山留影

知平东三兄弟



.....
1991 年，邵华（前排右三）、刘思齐（前排左三）、
毛新宇（后排右二）等访问韶山，在毛泽东故居
塘边留影



2005年，邵华与孙子毛东东等在韶山毛泽东故居塘边留影。左起：刘滨、毛东东、蔡振霞、邵华

知早东 三兄弟



2010年4月1日，毛新宇（前排左四）、刘滨（前排右四）、毛岸平（后排左三）等在毛泽东广场留影

前 言 回韶山 / 001

目 录

第一章 起始：韶山毛家 / 011

毛顺生夫妇 / 012

童年生活 / 020

为求学走出乡关 / 028

短暂的行伍生涯 / 031

一师学子 / 034

组织赴法留学 / 043

驱张运动与马克思主义者 / 047

第二章 抉择：弃家革命 / 053

正月初八家庭会议 / 054

一师附小毛庶务 / 060

参加中共一大 / 064

毛家人积极入党 / 068

第三章 潮涌：湖南工农运动 / 075

安源的斗争 / 076

工人消费合作社 / 081

水口山一记响锣 / 088

农民问题：中国革命的关键点 / 091

韶山党支部 / 099

考察湖南农民运动 / 107

第四章 辗转：大革命风雨 / 115

打开革命书报发行的局面 / 116

寻找中国革命的出路 / 123

团圆在武汉 / 128

三兄弟

知不足

秋收起义前夕的几件事	/ 134
走自己的路，向山区进军	/ 139
白色恐怖下做出版	/ 142
毛泽建的牺牲	/ 147
杨开慧之死	/ 151
“三毛”流浪记	/ 156

第五章 星火：南方苏维埃 / 167

三湾改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	/ 168
落脚井冈山：从茅坪到茨坪	/ 172
红色信使到井冈	/ 179
第一次肃反	/ 183
朱毛会师，红军诞生	/ 186
艰难时刻：毛泽东在 1929	/ 193
兄弟之争	/ 200
团圆在叶坪	/ 202
苏维埃共和国毛主席	/ 206
国家银行毛行长	/ 213
赤白两区的货币战争	/ 219
振兴苏区经济	/ 223
红白贸易特区	/ 226
冒险主义笼罩红都	/ 229
被批斗的日子	/ 237
印钞乱象与金库转移	/ 241

第六章 奇迹：二万五千里长征 / 245

长征前的种种情形	/ 246
长征开始了	/ 253
红军的出路在哪里	/ 258

遵义会议，毛泽东成为核心领导 / 262

“红军票”的奇迹 / 266

长征路上的大管家 / 269

从四渡赤水到飞夺泸定桥 / 273

爬雪山，过草地 / 279

同分裂主义作斗争 / 282

长征胜利在望了 / 288

长征胜利，红军用脚走了二万五千里 / 292

长征路上的几件事 / 296

留守红军被迫冒险转移 / 301

毛泽覃牺牲时，身上搜出毛泽东照片 / 304

第七章 转战：陕北道路 / 309

在黄土高原上生存 / 310

开采石油与食盐 / 314

斯诺到陕北 / 320

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 / 324

西安事变：戏剧性的历史转折 / 328

秘密接收巨额捐款 / 332

第八章 涅槃：八年抗战 / 337

改编成八路军 / 338

无可挽回的出走 / 345

领导新疆的财政改革 / 352

毛泽民的苏联之行 / 362

改变新疆的落后面貌 / 368

毛泽民一家被软禁 / 373

毛泽民牺牲了 / 377

重庆谈判，蒋介石没打算要和平 / 381

毛岸英回国了 / 389

第九章 深情：革命与婚姻 / 397

毛泽东与罗一秀 / 398

毛泽东与杨开慧 / 401

毛泽东与贺子珍 / 412

毛泽东与江青 / 417

毛泽民与王淑兰 / 420

毛泽民与钱希均 / 424

毛泽民与朱旦华 / 427

毛泽覃与赵先桂 / 432

毛泽覃与周文楠 / 434

毛泽覃与贺怡 / 438

第十章 血脉：毛家后人 / 441

英雄之子：毛岸英 / 442

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毛岸青 / 459

亲情的纽带：李敏 / 470

得爱最多的女儿：李讷 / 475

毛泽东失落的子女 / 479

断了线的思念：毛远志 / 481

“自家孩子”：毛远新 / 485

韶山人民的儿子：毛楚雄 / 488

后 记 / 492

附 毛祖人（毛泽东曾祖父）后裔简表 / 494

前言

回 韶 山

我的故乡，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冲，是一个有灵气的地方。

每年我都会回韶山。小时候父母带我去，如今我和妻子刘滨一起，领着东东、甜甜去韶山冲。去看看那祖屋，依靠着巍巍韶峰。看看那祖田，二十余亩土地，依旧出产着粮食。还有家门口的荷花池，一到夏天荷花绽放，我甚至能想象童年时的爷爷在池塘中嬉水的情景。韶山这片水土于我，是血脉相连，割不裂剪不断的，这里是我们的根。我的亲人很多都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最终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对我们来说，这是起点，但却并非终点。历史是一个圆，但这个圆必将螺旋上升。

辛亥革命之前（1910年）爷爷从这里走出，去求学，寻找革命真理。五十六年前的夏天，再回故乡时，他已经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屋子与当初相比，没有多大变化，堂屋里挂着曾祖父、曾祖母的遗像。爷爷站在像前，沉默，伫立，终于，他对随行的人说：“这是我的父亲、母亲。我父亲得的是伤寒病，我母亲颈上生了一个包，穿了一个眼儿。只因为是那个时候……如果在现在，他们都不会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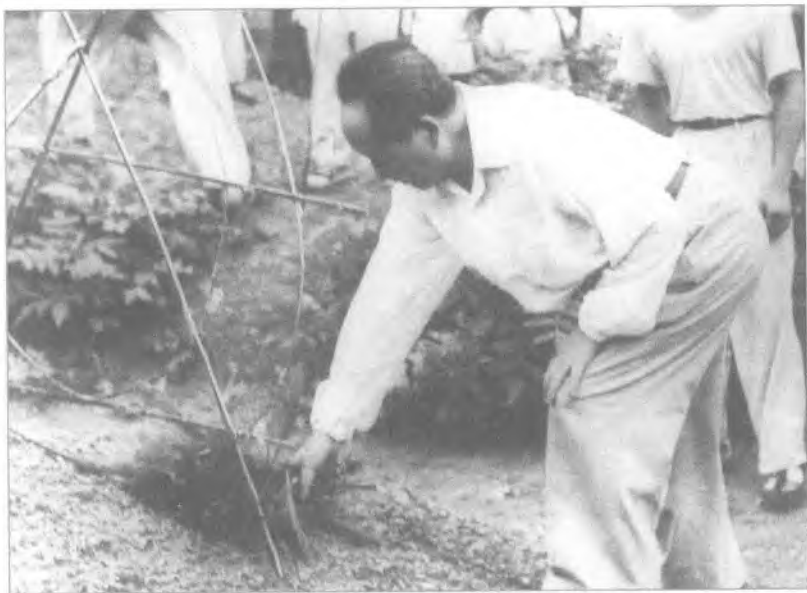
东南角属于爷爷的那间小屋，靠墙是睡床，窗口有小方桌、木靠椅，床头墩的墙上有油灯，早旧了，但依稀能够照见旧书柜内经年古旧了的书籍、笔墨。爷爷童年时曾经使用它们……当年的蒙学孩童已经成长为一代领袖，领导着中国人民一路向前。爷爷走向前，靠近这些能够唤起他记忆的物件，伸出手摸一摸，好像他还是当年的那个石三伢子。

第二天,即1959年6月26日,清晨5时许,爷爷往外走,工作人员不知道去哪,只好跟着。爷爷上了山,来到了他父母墓前,献松柏枝,鞠躬致敬。清晨的薄雾轻笼着这片墓地,整个仪式肃穆简朴但却哀思沉重。曾经共同生活、奋斗的亲人,如今天人永隔,只剩下墓碑上的字迹与爷爷遥遥相对:显考毛公顺生、显妣毛母文氏老大人之墓。男泽东、泽民、泽覃敬立。我的太爷爷和太奶奶都是在五十岁上因病去世。他们不会知道,在他们身后,为革命,我们毛家牺牲了六位至亲,他们分别是毛泽建、杨开慧、毛泽覃、毛泽民、毛楚雄、毛岸英。革命胜利了,新中国成立了,大家有了,而韶山冲毛顺生的这个小家却散了。曾祖父对爷爷的要求不高,他只不过希望爷爷能够继承好家业,照顾好亲人,可是,“谁想到会是笑中带泪的结局!两位兄弟已经青山埋骨,立在曾祖父母的墓前,爷爷该如何交代!那些不该如此早早离开的烈士,都是我们的亲人啊!”

祭奠完毕,爷爷从山上下来,在乡亲家门口坐下,点了一支烟。韶山的乡



★ 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在父母墓前



★ 1959年，毛泽东在故乡湖南韶山冲象鼻山为父母亲扫墓，独自躬身除杂草

亲们围在爷爷身边，笑容灿烂，发自内心，所有人都为韶山出了这样一位杰出的领袖感到骄傲。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当年那个润芝回来了！这是一种凯旋，也是温暖的拥抱。

我们的亲人中最早牺牲的是毛泽建。1928年5月，毛泽建姑奶奶在战斗中被捕，虽一度被营救出来，但怀有身孕的她为了不拖累同志，坚决要求在当地隐蔽，继续斗争。没想到在生产之后，再次被捕。因毛泽建系“毛泽东之妹，‘马日’前后，均负共党要职”，敌人将其从未阳押到衡阳，又从衡阳押到衡山，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可她始终坚贞不屈，她在狱中写道，“誓死为党”，“毛泽东是大有希望的，革命一定胜利”。1929年8月20日，湖南衡山县马庙坪，毛泽建英勇就义，年仅二十四岁，就义前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1930年10月24日晚，湖南清乡司令部司令何键派人冲进长沙县板仓杨宅，逮捕了我的奶奶杨开慧，一同被捕的还有杨家的保姆陈玉英和我的伯父毛岸英。他们用农村常用的公鸡车，一路颠簸将三人推向长沙司禁湾陆军监狱署。风雨如晦，这一天我伯父毛岸英刚满八岁，他来不及过生日，便随着我奶奶一同身陷囹圄。在狱中，有人问我奶奶：“你为什么要做共产党？你犯了法晓得吗？”我奶奶答道：“我没有犯法，是何键犯了法。”那人又说：“现在如果你能悔过自新就无生命危险了。”奶奶答：“我誓不屈服。关于政治，各有己是，我的生命



★



★★

★ 故乡水土故乡人。1959年6月，毛泽东在故乡韶山与家乡父老兄弟在一起

★★ 1959年6月，毛泽东在韶山农民李文贵家中和群众亲切交谈

早不计较，不成功便成仁。”那人再问：“还有什么话要说没有？”奶奶轻描淡写答：“我的话说完了。”当时毛、杨两家无人居长沙，我奶奶的六舅妈严嘉托亲戚打听狱中情形，又去监狱探望，我奶奶却已抱定就义之念，她说，“死不足惜，只望革命早日成功”，又说：“屋里有块青布料子，给我做一套衣服，上路时穿的，年少时，家父有训诫：我杨家死了人，不作俗人之举！”1930年11月14日，我的奶奶杨开慧英勇就义，秋风秋雨愁煞人！这一年，她年仅二十九岁！不久，远在中央苏区的爷爷得知奶奶牺牲的噩耗，悲痛不已，叹息道：“开慧之死，百身莫赎！”爷爷寄来三十块银元，以奶奶三个儿子的名义立碑，上书：“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我的爷爷毛泽东写得一手气吞山河的诗词，但写给我奶奶杨开慧的那三首，却是昂扬中有柔情、有悲叹，缠绕着浓浓的思念。1921年，爷爷创作了《虞美人·枕上》：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无奈披衣起坐
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
不抛眼泪也无由。

那时爷爷与奶奶新婚不久。爷爷是一代伟人，但他不总是“指点江山”，他对奶奶的思念，正是一个丈夫对于新婚妻子的依恋；1923年，爷爷写《贺新郎·别友》，词中有云，“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豪放中含婉约，既英雄气壮，又儿女情长；1957年，我的奶奶杨开慧已经去世二十七个年头，爷爷写《蝶恋花·答李淑一》，生死茫茫二十七载，爷爷对奶奶的思念非但没有淡漠，反倒因为时间的逝去，如酒似玉，更加醇美。“我失骄杨君失柳”，头一句便点出了奶奶在爷爷心中的位置，多么可贵可叹可爱可敬的“骄杨”！令人惊讶的是，1982年，在修葺奶奶的板仓故居时，从杨家大屋的旧墙壁的缝隙里，竟然发现了奶奶被捕前写的遗墨，其中那首五言古体诗《偶感》的第一章写道：“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这是恨不得生出翅膀，立刻飞去与爷爷团聚的奶奶啊！这是宁愿舍弃自由，英勇就义，也不愿发出声明和毛泽东脱离关系的奶奶啊！这是伟人之爱！这是千古奇情！

我的三叔公毛泽覃是坚定地跟着毛泽东走的毛家三弟。他曾是朱毛会师的

“信使”，后来成长为红军指挥员。因为战功卓著，他曾获得过一枚二级红星奖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红军被迫长征，红区变白区，但根据地依旧需要有人留下继续战斗。毛泽覃留下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4月26日，我的叔公毛泽覃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黄田坑村被国民党军包围，为掩护游击队员脱险，英勇就义，年仅二十九岁！

我的二叔公毛泽民，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地跟着毛泽东干革命。他干过出版发行，也在中央苏区做过国家银行行长，承担着革命的财政总管的重任。1938年，二叔公接受党的指派，化名周彬去新疆做统战工作。1942年，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了我叔公和陈潭秋等共产党员。在狱中，毛泽民慷慨陈词，表明“决不脱离党，共产党员有他的气节”，“我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立场”！1943年9月27日，我的叔公毛泽民被盛世才秘密杀害，时年四十七岁。

毛泽覃之子，我的堂叔毛楚雄，1946年随部队突围北上，在陕西镇安县文家庙被当地伪保长杀害，年仅十九岁！

我的伯父毛岸英出生于湖南长沙，是我爷爷和奶奶的长子。他早年生活坎坷，随父母革命四海为家，1930年奶奶杨开慧被反动军阀逮捕时，岸英伯父也一同被抓进监狱。随后，他去了上海，进入大同幼稚园，后又因顾顺章叛变被迫疏散，遍经人间苦楚，才终于在组织的安排下转道欧洲，去了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光。1946年，伯父毛岸英回到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按照爷爷的要求去学种地，上“劳动大学”，而后搞过土改，做过宣传，当过秘书，还做过工厂的党委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他和我的大姨刘思齐结婚，婚后便迅速投入到工作中去。1950年春天，他曾随李克农同志访苏并任翻译。1950年10月，美国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我的伯父毛岸英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在志愿军司令部做俄语翻译和机要秘书，没想到这一年的11月25日，我敬爱的伯父便在朝鲜大榆洞志愿军作战总部牺牲了年仅二十八岁的生命！这对于我们毛家，对于爷爷，是怎样的一种深悲剧痛！

大浪淘沙，风雨兼程，我的爷爷毛泽东带领着毛家儿女经受住了考验，中国革命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爷爷胸怀广大，心系天下，可一回到韶山这片故土，物是人非，想到至亲至爱一个一个从身边离开，天人永隔，他的心怎能不滴血！但我相信爷爷不会懊悔当年自己一心革命，矢志不渝地将毛家儿女带出了韶山冲，走向了光辉又坎坷的荆棘路的。

4月，小雨淅淅沥沥，韶山笼罩在一片迷蒙中。我又和妻子刘滨带着我们的一双儿女东东和甜甜，站在毛泽东广场瞻仰毛主席铜像，并献上花篮，表达我们对毛泽东和毛氏先烈的怀念。在毛泽东遗物馆，我会不厌其烦指着那些遗物告诉我的儿子毛东东和女儿毛甜懿：“这是你太爷爷看过的书，这是你太爷爷坐过的沙发……”他们仔细聆听着。他们年纪尚小，或许不能全然体会其中深意，无法深刻感受到历史的重量。随行人员问他们：“你是哪里人啊？”毛东东和毛甜懿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韶山人。”是啊！说得多么好啊！我们都是韶山儿女！我们从韶山走出，走向中国。我的爷爷毛泽东带领毛家人走出韶山的历程，是一部史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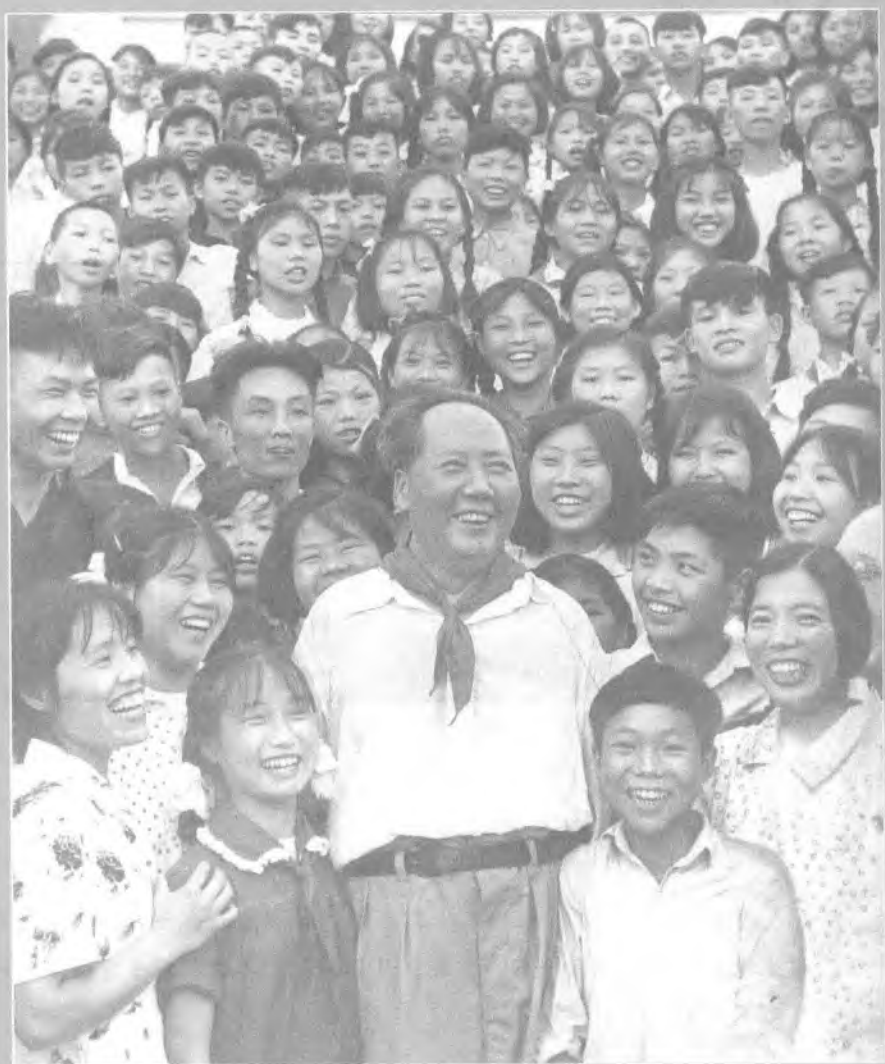
一直以来，我都想写写这段壮阔的历史，尤其是毛泽东家族烈士们的革命历程，几乎就是一部中国革命历程的写真。如今，锱铢累积，终于有了这样一本书献给大家。因为毛泽东家族的革命历程是不曾亲身经历的，我的撰写，也尽量以一种后辈的、相对客观的学术的眼光去写清楚这段个人、家族与国家的变化交织在一起的历史。好在有历史文献，更值得庆幸的是，许多毛家亲属和老一辈革命家自我小时候起，就开始向我讲述毛家的历史。我胸中早有万千印象，而今，我的工作还是还原，我像一个画师，用点点滴滴历史碎片去努力还原一幅壮丽图画，书写毛泽东家族烈士们不同寻常的人生。这是我的义务和



★ 1959年6月25日，
毛泽东回到离别了
三十二年的故乡



★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国三十二年前。
1959年6月，毛泽东在故乡韶山



★ 1959年，毛泽东和韶山学校的师生们在一起



★ 毛泽东在韶山水库

责任，革命史与家族史应当记录、保存。

五十六年前爷爷回韶山，写下七律：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这是一种怎样的豪情！如今我们再回韶山，探寻爷爷当年走出韶山、震动世界的秘密。不气馁，不妥协，不退让，爷爷这个农民之子，以极大的毅力和极高的智慧赢得了胜利。但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它是有着伟大的雄心壮志的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 第一章 ·

起始：韶山毛家

毛顺生夫妇

中国湖南省中部，湘潭、宁乡、湘乡三县交界，有一座美丽的山。它是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一的岳麓山一脉。传说四千年前，舜帝率众南下路过此处，觉得山水灵秀，便命众臣演奏韶乐以助雅兴，乐声优雅，引来百鸟，古书记载，“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因为这韶乐，山便成了韶山，水便为韶水，山冲便为韶山冲，山峰便为韶峰。

韶山起于韶峰，南北绵延五公里，东西宽三公里，是一个狭长的山谷地带。韶山秀，山间遍布草木，山谷有流水。诸峰之中，以韶峰为尊，登韶峰俯瞰，南岳衡山和八百里洞庭似在眼前，古诗曾赞，“从来仙境称韶峰，笔削三山插天空。天下名山三百六，此是湘南第一龙”。的确，韶山又有龙山之名。盘龙踞凤，山水之灵气经年润养，似乎注定要孕育出一个伟人。

冲，指山区的平地。韶山冲，便是韶山山脉里的一块平坦之地。这块平地长十里，足够建屋立业，耕种谋生。毛家在这儿算大姓，祖上可追溯到元末明初。韶山毛氏宗族的第一代祖先叫毛太华，是朱元璋远征云南部队里的一名军官。朱元璋夺天下后，毛太华被安排驻守边关，晚年，他思念故土，有告老还乡之意。因有军功，戍边多年尽职尽责，故其请求得应允。毛太华携妻儿北上，落户于湖南韶山，白手起家。

自此，毛家人耕樵为生，勤俭持家，一传五百年。乾隆年间，毛家第七代起，修族谱，定辈分——“立显荣朝士，文方运际祥；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日后子孙起名，便有了依凭。族谱定，立下家规，共十条：培植心田，品行端正，

孝养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乡邻，教训子孙，矜怜孤寡，婚姻随宜，奋志芸窗，勤劳本业。

毛家第十八代传人叫毛祖人，他和古老中国的千千万万农民没有太大分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耕樵卖力，守着一份祖上传下来的清简日子。毛祖人有二子，长子德臣，次子翼臣。毛翼臣名恩谱，字寅宾，1878年，他与哥哥分了家，从祖居地韶山东茅塘迁至韶山冲上屋场，开辟自己的一份家业。

现在的上屋场是毛泽东故居，坐南朝北，依山傍水，房屋结构是中国南方常见的“一担柴”式，东头十三间半属于毛家，西头五间半属于邻居。当然，这份家业是后来挣的，毛翼臣时代并没有如此规模。相反，毛翼臣一辈子都在为生计发愁，不是因为他自身不够勤谨，而是由于年景不佳，农民的日子不好过。毛翼臣有一子，名贻昌，号良弼。家里人叫他顺生。

毛顺生生于1870年。此时，中国大地上的四亿人口，依旧在清王朝的统治之下。清政府有近九十万常备军，可依旧逃不脱落后挨打的命运。这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帝国，没有机器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政治反动腐败，科学文化落后，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1840年的鸦片战争，已经开始让清政府甚为惶恐，这个庞大中华帝国，在西方的坚船利炮的刺痛下，缓慢地放开了怀抱，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可这一切对毛顺生来说，似乎是遥远的事。但与祖辈比，毛顺生毕竟有了不同。



★ 韶山上屋场，毛泽东
家族老宅



★ 邵华*（前排右五）、毛新宇（前排右六）等毛氏亲属在毛氏宗祠前

他个头高，身强体壮，读过私塾，识字，懂些文化，在小小的乡村他已经算半个文化人。他淳朴敦厚，精明强干，父亲欠下的债务，他靠当了几年兵省下来的饷银偿还。

私塾的读书经历和一年多的军旅生涯，让毛顺生身上多了一些与普通农人不同的东西：眼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有了妻子——湘乡县文芝仪之女文素勤。一个眼睛大大、勤劳善良的姑娘。十七岁，毛顺生退伍回到韶山，开始了他主理家事的旅程。他有一些本钱，是在当兵时省下来的饷银，除去还债多少还能有些剩余用于做小买卖。他有六七亩地，这在韶山不算多，并不能使他完全“脱贫”。

秋熟之季，毛顺生站在自家地头，想必是踌躇满志的。他的志向不算大，无非让自家能过上好日子，这也是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民的共同企盼。对于这个“理想”，他打算用新旧结合的方法去实现：一个是勤俭，这是老法子，祖上传下来的；另一个是盘算，这算新法子，得靠头脑——归根到底，毛顺生靠的还是一个“精”字。

这是一个农民缓慢的“原始积累”。当兵之前他是贫农，当完兵回到韶山冲，

* 邵华，原名张少华，在北大读书时向报刊投稿，开始使用笔名“邵华”，和毛岸青结婚登记时，她写了“邵华”，从此邵华便成了她的名字。故在本书的叙述中，涉及婚前经历的内容，称其为“少华”，婚后则称为“邵华”。

他做生意，买回土地，有了十五亩田。这十五亩地，一年可收六十担谷。一家五口人，一人消费七担，总计三十五担，剩下的二十五担，可拿去贩卖。靠着这种从地里、从口中剩下的粮食，毛顺生有了积蓄，他从堂弟毛菊生手里买了七亩水田，使得自己的田产增添到二十二亩，勉强可算“富农”了。这些田地每年可收谷子八十四担，除去家庭消费，有四十九担剩余。于是，贩运谷子，便成了毛顺生的重要营生。

他让家里孩子和妻子都去地里干活，还雇用了一名长工。冬天碾谷任务重时，他还会多雇一名短工。除去种地、贩谷，毛顺生还涉足贩卖猪和耕牛。他的生意像藤蔓般蔓延。原本，他是从贫农那里收谷物，再拉去城里卖给商人，从中赚取差价。后来生意做熟了，他甚至在银田寺和“长庆和”米店入股，与“祥顺和”“彭厚锡堂”等店铺有密切往来。如今生意做大了总要有公司，那时候则是商号，毛顺生创立了“义顺堂”，还自己印制了纸票，方便流通周转。收入渐多，毛顺生开始着手改善住房条件，但上屋场的几间房屋条件的改善并非易事，直到将近知天命的年纪，毛顺生才把房屋的茅草屋顶换成了瓦片屋顶。

有了家底，再加上热心，毛顺生在毛氏家族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辛亥革命那一年，韶山毛氏修族谱，毛顺生任司事，名列第三位，主管房修。五四运动那一年，韶河修“韶麓桥”，毛顺生捐银洋四块，捐款数额位列前三名。地位和声望让毛顺生在“光耀门楣”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小步。当然，跟其子毛泽东后来的成就比，毛顺生的努力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可在当时，毛顺生依靠自己把日子过好并赢得乡里尊重，已然是当地个人奋斗的一部传奇。

毛顺生的妻子文素勤，因在家中姊妹中排行第七，被唤作“文七妹”。她出生在湘乡县四都唐家托的一个农民家庭。她比毛顺生大三岁，十三岁那年由父母做主与毛顺生许下婚约，十八岁正式结婚，嫁入韶山冲毛家。

人如其名，文素勤首先是“勤”。她是一名温柔的中国传统女性，她愿意与毛顺生一起为毛家的未来奋斗。自从嫁入毛家第一天起，她就成为全家最忙碌的一个。她像古中国千千万万的媳妇一样肩负着三项重要任务：赡养老人，照料丈夫，生养、抚育儿女。长期在农业社会中生活，文素勤对锄地浇园、烧火做饭、养鸡喂猪这些必备技能十分熟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人们的作息，但为了整个家的前景，文素勤常常披星戴月，默默操劳。

文素勤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荒年时穷人来讨饭，她常常给

予施舍。她的这种善心，一方面是大概与生俱来，另一方面可能也与其宗教信仰有关。她信佛，十分虔诚。有了孩子之后，她向自己的孩子们灌输这种信仰。少年毛泽东也曾受到母亲这种信仰的影响。尽管毛氏兄弟最终没有像文素勤那样，在信佛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但她的这种善却给予了毛氏兄弟一种宽宏的胸怀。

作为一个原始积累的农民商人，毛顺生偶尔会吝啬自己辛苦挣来的粮食，文素勤却依旧会在丈夫不得知的情况下，偷偷施舍粮食给穷人。毛泽东读私塾时，同学黑伢子家中断粮，中午没饭吃。毛泽东主动把米饭分给黑伢子吃，自己却吃不饱，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去厨房找饭吃。文素勤得知后不但没有责怪儿子，自此之后，她每天还让毛泽东带双份饭去学校，与黑伢子分享。

二儿子毛泽民曾发现有人偷家里鱼塘中的鱼，前去追讨，要回了两条大鱼。他把这事告诉母亲，原本以为母亲会对他的“捉贼”行为加以赞扬，没想到文素勤却沉下脸，批评毛泽民：“以后，你不要管这些事！捞鱼的那家人生活有困难。你这样一闹。怕是这家人一夜都不能睡觉了。”还有一回，毛泽民碰见有人在田里偷他们家的谷穗，一气之下，连筐带谷都夺回家来。文素勤听后，劝毛泽民说：“那家人没有饭吃才来拿咱家的谷子，你把人家的箩筐和这些谷子一起送回去。”

传统社会中，生儿育女是女人出嫁后最重要的事之一。这关系到香火的传承，也关系到女人在家中的地位。文素勤嫁入毛家之后，生育压力很大。公公希望抱孙子，丈夫又是单传，文素勤自己也渴望早日生儿育女，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可命运偏偏跟这个善良的女人开了玩笑，她连生了两个儿子，却都夭折于襁褓中。文素勤几乎不能承受失子之痛。她无处祷告，只能去宗教中寻求慰藉，她乞求菩萨保佑自己将来诞下的孩子健康平安。

1893年冬天韶山很冷。12月25日，山巅狂风大作，狠下了一场雨。文素勤躺在床上，腹痛不止，这是她的第三次生产。毛顺生站在堂屋，他不信佛，可面对佛龕上的香火，他也诚心祷告，希望妻子生产顺利，希望毛家能有一个男孩。

第二天，也就是1893年12月26日，文素勤顺利产下了一名男婴。

这是她和毛顺生的第三个儿子，按照族谱，这个孩子的辈分落在“泽”字上，他们给他取名“泽东”，字润芝（润之），排行老三。

毛泽东长得很像他的母亲，圆圆的脸庞，宽阔的额头，清亮的眼睛。毛顺

生一连摆了几天酒来庆祝这个孩子的降生。毛恩普老人也为这个孩子的降生欣喜不已，他逢人便说：“我有孙子了。”

生子之后，文素勤的心并没有放下来。头两个儿子夭折的痛苦，仍让这个善良的农妇心有余悸，她开始吃“观音斋”，希望借助神灵的力量来保佑这个来之不易的儿子健康成长。她带毛泽东向南岳观音菩萨许愿，答应毛泽东长大成人后去还愿。

文素勤还想到了去子嗣旺盛的娘家沾沾福气。她征得丈夫和公公同意，抱着刚出生不久的毛泽东回到唐家托。

唐家托文氏一族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从江西迁至湖南湘乡田坪，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改迁高冲双井湾。文素勤的爷爷英年早逝，她的奶奶贺氏却是一位能人，文家在她手里发展到坐拥九十多间房，一百四十亩地，成为大户人家。文家买下唐家托的房子做祖宅。1882年，贺氏于八十八岁高龄无疾而终，厚葬于龙眼塘。此处距离毛泽东故居不过一公里远。

文家发展到文素勤这一辈，人丁兴旺，四世同堂，老少二十余口。文素勤的父亲文芝仪有三男两女，长子文正兴在家中排行老七，系毛泽东的七舅。文素勤请人给毛泽东算过八字，说他八字大，不拜个干娘难保平安。七舅母赵氏是个能生育的女人，子女众多，这在传统社会里被认为极有福气。为托福，文素勤让毛泽东认七舅“干爹”，认七舅母为“干娘”。

拜了干娘，文素勤还觉不保险。她还是希望儿子毛泽东能得到神灵庇佑。韶山滴水洞与唐家托之间，有一块高约十米的天然巨石，似有人形。石后有山泉流出，长年不断。这是一块被当地人认为是有灵性的石头，他们崇拜巨石。他们称它为“石观音”，并给巨石搭了一座庙，唤作“雨神庙”。

一天，文素勤带着毛泽东来到了石前，进香供食，虔诚万分。她让毛泽东跪拜“石观音”，认她做干娘，以得庇护，好茁壮成长。

因为毛泽东排行第三，于是在认石观音为干娘之后，他有了个新的名字，叫做“石三”，按照韶山的叫法，则喊他“石三伢子”。毛泽东对于这个童年时巧得的乳名不可谓不喜欢。参加革命之后，毛泽东写文章写信落款，偶尔会用“石山”。显然是从“石三”演化而来。

1951年，毛泽东见表兄文运昌，也曾提及幼年时文素勤带他认石观音为干娘的事。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吃饭时，众人皆到，毛泽东却站起，问：“我

干娘还没来呢。”众人迷惑，只有毛泽东心中明了。其实，毛泽东对于石三这个名字的喜爱，要源于对母亲文素勤的感念。这看似“迷信”的举动里，恰恰包含着这位母亲希望自己孩子健康成长的爱意。

八岁之前，毛泽东是在文氏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长大。七舅对他视如己出，食同桌，寝同床，七舅母对他也多有疼爱。

在外婆家毛泽东于同辈中排二十三，因此，文家人不但称呼毛泽东石三、石三伢子，也叫他做“二十三”。毛泽东与十几个表兄弟相处得不错，这是一个温暖的集体，他们一起出去放牛、拾粪、打猪草，其中有些与毛泽东保持着一生的友谊，比如姨表兄王季范、表兄文运昌。

1937年11月，身居陕北的毛泽东在给文运昌的信中写道：“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我想和兄及诸表兄弟子侄们常通书信，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

生下毛泽东之后，文素勤在生育这件事上似乎真的得到了神灵的保佑。1896年4月3日，她又生下一个儿子。毛泽东排行老三，这个新生儿自然便是老四，毛顺生给他取名为泽民，字润莲。

生下毛泽民之后，文素勤和毛顺生便投入到简朴又紧张的生产和生意当中。他们带着两个儿子一起劳作，为毛家挣得一份生计。他们的第三个儿子毛泽覃降生，即1905年10月3日，毛泽东已经是十二岁的孩子了，他被毛顺生和文素勤从唐家坨接回韶山冲，开始了私塾生涯。

有了三个儿子，文素勤非常希望有个女儿。毛顺生的堂弟毛蔚生家女儿众多，四十岁上，毛蔚生因过度劳累不幸去世，家庭经济一落千丈，孤儿寡母生活困难。文素勤为了给弟妹减轻负担，愿意收毛蔚生的女儿菊妹子为养女，取名为毛泽建。

文素勤善名在外，菊妹子的母亲知道女儿过去后不会吃苦，便答应了。六岁，菊妹子从东茅塘来上屋场。她比毛泽覃小一个月，自然就成了毛家最小的妹妹。自此，韶山冲上屋场毛家便成了一个有着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的大家庭。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家庭，严父、慈母。为了谋生，毛顺生必须精打细算，家中的几个孩子也绝对不能是在家吃闲饭的人，每个人在毛家都得发挥自己的作用。毛顺生上过私塾，但他毕竟文化不高，在一次柴山诉讼案中，他明明有理，但却因对方巧言善辩而最终败诉。这令毛顺生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

他让儿子们上私塾，是希望读了书的子女日后能为这个家的富裕添砖加瓦。他的确是一位严格又精明的父亲，孩子学会了认字，他就让他们学着给家里记账，并学习打算盘。孩子们闲着，他便会给他们分派任务，脾气来的时候，他还会吓孩子一下，甚至动手打。

毛顺生在食物的分配上也有考量，一家几口的口粮足够，但如果想吃肉，还不是那么容易。每个月毛顺生会给雇工们吃一顿蛋炒饭，但不给肉吃。孩子们作为家里人，需要干活，但却没有这些补贴。不过，严格的毛顺生，却凭借这种刻板的方法，培养出了毛氏兄弟吃苦耐劳的品质。他和柔弱善良的文素勤一起，共同影响着毛家兄弟。

父亲的苛刻，激发起了毛泽东身上的“叛逆因子”。毛泽东从小就恨旧社会，而他的父亲显然就是旧社会农民的代表。

毛泽东同情穷苦人，这是从母亲身上传承来的。“见善就莫欺，见恶就莫怕。”父亲的倔强与严苛，无形中造就了毛泽东兄弟性格中刚毅的因子，他们懂得反抗。母亲的博爱，给予毛泽东一种想要拯救天下苍生的胸怀。毛泽东在给同学邹蕴真的信中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

童年生活

1902年，毛泽东在父亲的安排下，到离家不到两百米的南岸私塾读书，接受启蒙教育。塾师叫邹春培，四十多岁，戴瓜皮帽，手拿戒尺，他先教孩子们读《三字经》，再读《幼学琼林》《论语》《孟子》《中庸》《大学》。毛泽东记忆力强，能够口诵心解，很快领悟，但他对儒学书籍谈不上有多大好感。

毛泽东小时候爱看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在他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他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在当时的私塾先生眼里，这些是禁书，他认为它们会带坏孩子们的思想，“四书五经”才是读书的正途。

毛泽东读这些书的方法很巧妙，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他在学堂里趁老师不注意偷偷读，老师走过来的时候，他就拿一本正经书遮住。许多故事，他甚至能背得出，同学们之间也经常讨论这些历史故事。

即便日后离开小学堂，毛泽东仍在读中国的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他突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故事里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毛泽东为这事纳闷了两年，他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只好自己分析小说内容。

他发现这些小说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他们让农民种田，自己则不劳而获。

怀疑精神，是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涯中最值得称道的地方。这种可贵的怀疑精神逐渐延伸，毛泽东开始以批判的眼光看世界了。

识字之后，毛顺生就开始让毛泽东学习珠算，帮家里记账。1904年秋，毛泽东到韶山关公桥私塾读书，塾师毛咏生；1905年春，又先后就读于韶山桥头湾、钟家湾私塾，塾师周少希；1906年秋，入韶山井湾里私塾读书，塾师毛宇居。

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练习书法。到了1907年，毛泽东暂时停学，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一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账。

尽管务农辛苦，但毛泽东依旧坚持读书，除了经书，他对一切能够到手的读物如饥似渴。

毛顺生得知后十分生气，他希望儿子读经书，因为将来可以“引经据典”，在打官司时用得上。为了躲避父亲的责备，毛泽东常常在深夜时将窗户遮起，不让父亲看见灯光。

表兄文运昌会借一些书给毛泽东，其中有一本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写的《盛世危言》。书中说到中国之所以弱，是因为缺少西方的铁路、电话、电报、汽船等，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改良主义原则。还有一本书是《校邠庐抗议》，作者冯桂芬，他对外国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表示不满，并提出了一些富国强兵的主张。当时毛泽东非常喜欢这本书，书中洋溢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改造中国的构想，让这个山乡少年惊异、感动。郑观应是一名改良主义者，他提出的主张，仅仅是打算从西方引进设备和技术，但这样一部书毫无疑问可以帮助毛泽东打开眼界，他反封建，并不仅因为个人际遇，而是将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反对父权，曾经是那一代人反封建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对于父亲的严苛管理也有不满意的时候。

他用他的方式反抗。

大约十三岁时，有一次毛顺生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因为对事情的看法不同，毛泽东当着客人的面和父亲争论起来。毛顺生当众骂儿子懒而无用。毛泽东一怒之下骂了父亲，离家出走。母亲文素勤追上来劝毛泽东回家，父亲也追上来，一边骂一边命令他回去。

桀骜的毛泽东跑到池塘边，恫吓父亲说，如果你再走近一步，我就跳下去。毛泽东的“威胁”起到了效果，“内战”暂时停止，父子双方经过谈判，取得了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毛顺生让毛泽东磕头认错。毛泽东则表示，如果毛顺生不打他，他可以跪一条腿磕头。



★★

★ 1959年，毛泽东同他的私塾老师毛宇居携手同行在故乡的田间小路上

★★ 毛泽东和毛宇居携手而行

从这件事情中，少年毛泽东体会到了一个道理：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父亲就会软下来；如果一味温顺驯服，父亲反而打骂他更厉害。

爱读书的毛泽东有不错的口才，这在“反抗”父亲的过程中帮了他大忙。他总是能够引经据典地驳斥父亲。毛顺生责备他不孝。毛泽东就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典故来回敬。毛顺生说他懒惰，毛泽东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你的年纪是我的两倍，所以应该多干活。毛泽东还宣称：等自己的年纪跟父亲一样大的时候，一定会比父亲还要勤快。毛顺生面对伶牙俐齿的儿子，常常束手无策。

慢慢地，毛家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家庭权力对峙。“我家分为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但反对党的内部也有分歧，温柔贤惠的母亲文素勤主张用“间接打击”的政策，她不同意爆发任何公开冲突，更反对直接反抗“执政党”的企图，说这些不是中国人的传统做法。

文素勤是丈夫和儿子冲突的缓冲地带，她充当着协调人的角色，总是尽力调解、维持整个家庭的和谐。

毛泽民佩服大哥毛泽东的勇气。在毛泽东带领下，他也开始反抗父亲的“独裁”。和刚烈的毛泽东不同，毛泽民的反抗方法“柔中带刚”，很有自己的特点。有一次，毛泽民下午出门晚上回家晚了，毛顺生很不高兴，要罚二儿子跪香。文素勤心疼儿子，又怕丈夫太过生气，就暗自劝儿子不要学他大哥毛泽东，先跪下，自己再从中调解。毛泽民二话不说就跪了下去，可是，他只跪了一条腿。毛顺生非常生气，问其中缘由。毛泽民说，我有父母双亲，一条腿是父亲给的，一条腿是母亲给的，父亲让我跪，我只能跪一条腿。母亲给的那条腿，我不能跪。毛顺生无从辩驳，只能作罢。

1907年，毛泽东十四岁。毛顺生为大儿子定下了一门亲事。女方家住湘潭县杨林乡赤卫村楼前门，家境富裕，在当地颇有声望。女方姓罗，比毛泽东大四岁，女方家知道毛泽东一表人才，很是满意。而作为父亲，毛顺生也想要儿子早日成婚，一则了却心事，二则媳妇进门，家中也可多一个劳力。

可毛泽东不这么认为，他反对封建，反对父权，从根本上不赞成这门包办婚姻。可在家中，他还不足以和专横的父亲抗衡。另一方面，他也不想伤母亲的心。他妥协了。

但到底没有毛泽东那样傲人的天资，在私塾读书，毛泽民十分勤奋，老师安排背诵的课文，他总是反复记诵，每当老师抽查，他总能不假思索地背出，因此深得老师的喜爱。几年时间里，他读了《三字经》《幼学琼林》《论语》《大学》等读物，有了文化基础。

毛泽民返回私塾读书后，家中农业生产的担子，自然而然落到了毛泽东身上。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做农活、记账、读书。不过这一年，因为母亲生了病要许愿，毛泽东必须独自跋涉一百多里路，去南岳衡山朝佛进香。

这次远行对年少的毛泽东来说非常重要。

一路艰苦。为了节省路费，毛泽东几乎没有买过一顿饭，只靠随身携带的干粮充饥。去南岳进香，年少的毛泽东游览了南岳真君大殿、嘉应门、御碑亭和寝宫，他还登上南岳主峰祝融峰，一览众山。

大自然陶冶了他的情操。毛泽东的性格中始终有种豁达和开阔，这与他幼年时游览群山大川不无关系。他爱祖国山河，并能领略其中美好。

1909年，平静的韶山冲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起了一点波澜。李漱清，长沙政法学校毕业生，一位思想开明的维新派人物。他是韶山人，在外面接受了新思想之后重返家乡成为教师，他成了一个异类。他主张废庙宇，办新学堂。他反对女人裹脚，反对男人留辫子。他是一个“过激派”，用一系列刺激性的言行挑战着韶山传统社会的神经。可毛泽东却对这个人并不反感。他喜欢李漱清身上那种朝气与激情，他所教授的东西，与私塾里儒学经师传授的大大不同。

年少的毛泽东渐渐为李漱清的观点吸引，他和毛泽民一起去找李漱清谈天，各述理想，很快，毛泽东便与李漱清“亦师亦友”了。从李漱清的描述中，毛泽东开始想象外面的世界，他有了想要走出韶山冲的冲动。

可毛顺生却并不喜欢李漱清，认为他是个危险人物。他努力想要两个儿子按照自己的想法成长，怎奈世风渐开，毛顺生也觉得有些掌控不住了。

1910年是个荒年，4月，长沙饥民遍地，他们为求口饭吃，成群地去湖南巡抚衙门示威要求救灾，巡抚不同意，愤怒的灾民冲进衙门，砍断旗杆，吓走巡抚。这些饥民随后就遭到了镇压，很多人被捕杀。这个“造反”事件，给了毛泽东深刻印象。过去，造反的故事只发生在中国旧小说里，如今，却活生生发生不算太远的长沙。毛泽东了解这些饥民，他们都是普通人，只是为了生计才铤而走险，他同情他们，更感世道不公。

不久之后，韶山秘密会社哥老会里的人同本地的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地主去衙门告他们。地主有钱，哥老会的人败诉了。可他们并没有屈服，而是起来反抗地主和政府，撤到本地一个叫做浏山的山里，建了一个山寨。官府派兵去攻打他们，地主散布谣言，说哥老会举起义旗的时候，曾杀了一个小孩祭旗。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做彭铁匠的人。最后他们被镇压下去，彭铁匠逃走，后来不幸被捕斩首。在学生眼里，彭铁匠是一个英雄，毛泽东也这么看，他对这次起义报以同情态度。

“起义”的种子已经星星点点地在湖南大地上发生。毛泽东兄弟感受到了一些什么，这些最切实的感受和他们曾经读过的一些进步书籍一起，让毛泽东兄弟开始有了政治觉悟。

毛顺生对长沙对家乡的这种“乱象”不满意，这打乱了他原本平静的生活，他为两个儿子担心，他们原本就谈不上听话，新思想的进入，则让孩子们更加不“安分”。

为了安顿好儿子，毛顺生打算把毛泽东送到湘潭一家与他有来往的米店当学徒。对于父亲的这个决定，毛泽东并不反感，他觉得这总比在家里种田有意思。但这个提议却遭到了李漱清的反对。他认为毛泽东天资聪颖、志向高远、风华正茂，完全应该外出求学，谋求更大的作为。他和毛泽东的其他亲戚和老师一起，努力劝说毛顺生，请求他给予毛泽东继续求学的机会。

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学堂在当时来说非常新式。地点就设在毛泽东母亲娘家人住的湘乡县，毛泽东的一个表兄在那里上学。他向毛泽东介绍了新学堂的情况和“新法教育”的改革——新学堂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新学”教得比较多，教学方法也比较“激进”。这些都对毛泽东有很大的吸引力。尽管毛顺生刚开始反对，但众多人的劝说和毛泽东的坚持，还是使得这位严格的父亲做出了让步。他同意让毛泽东去那里就学。

这一年，毛泽东十七岁。

离家前夕，毛泽东写了一首诗送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简单几句，豪情尽显，毛顺生看着这首诗恐怕并没有多大感触，他只是希望儿子学成后能够对他的生意有所帮助。可是就当毛泽东走出韶山冲的那一刻，毛顺生也隐隐感觉到，儿子毛泽东已经渐渐脱离了他的管束——这个儿子就快要不属于他了。好在家中还有十四岁的毛泽

民陪伴左右，二儿子忠厚老实，精通账目，是个好帮手。

实际上，毛泽民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也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对内，他勤勤恳恳，协助父母打理好各种事物；对外，毛泽东走后，他就自然而然成为当地的先锋人物。毛泽民会讲道理，肯为乡亲出头，有“程咬金”的绰号。他是乡里的能人。当年毛顺生让儿子们去读书，就是希望他们读了书，家里遇到事时能够与人“讲理”，毛泽民便是“讲理”的高手。

他与韶山毛氏家族“四大宪”——毛宏初、毛明德、毛堂甫、毛吉成等地方势力过过招，总能驳得他们哑口无言。

毛泽民办事沉稳，遇事不慌。有一回，他跟着毛顺生等乡亲一起挑担子去银田寺卖米。路过水易亭，被团防局的岗哨拦住，无法通行。毛泽民主动上前，与团总理论了一番，硬是把团总说服，一行人顺利通过岗哨，毛顺生与乡亲都对毛泽民另眼相看。

毛泽民为人细致，诚信可靠，又读过书，村里人逢买地、建屋这种大事，总愿意请他写契约。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总爱找他商量，就连富人遇到困难，也乐意请他做军师。某年韶山闹灾荒，穷人过不下去，要去富人家吃大户，富人惶恐，找毛泽民商量。毛泽民立刻给了他们一个妙招：你们给穷人钱和粮食，他们很快就会离开。富人没办法，只好照着毛泽民的方法“解围”。

1910年毛泽东离开韶山去外地读书，毛家还有一个小不点最为操心。那就是毛家三弟毛泽覃。毛泽覃比毛泽东小十二岁，跟毛泽东长得像，圆脸，大眼睛。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毛泽覃受到的管束比两位哥哥都少，他自小顽皮，机智过人，是个一般人管束不住的“捣蛋鬼”。可对大哥毛泽东，毛泽覃却是一百个信服，每次大哥从外面回来，谈吐之间，透露出的那种思想和气质，都与父亲毛顺生那一代人大相径庭。父亲的话让毛泽覃感觉“旧”，而大哥毛泽东的话却都是“崭新”的，充满了吸引力。

事实上，不远的将来，毛泽覃正是在大哥毛泽东的关照下外出读书。长兄如父，毛泽东更像是他的监护人和思想上的领路者。不过，毛泽东远行的那一刻，毛家人的心情估计都是复杂的，既满怀希望，又略微有些怅惘。

传奇源于迁徙。

走出乡关的毛泽东，作为毛家的开拓者，双手劈开荆棘，踏出了一条新路。这是一条给穷苦人走的路。

为求学走出乡关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这是毛泽东初入东山完小时写的诗《咏蛙》，借物抒情，多少反映了他初入学校读书时的心境。

毛泽东有傲气。在东山学堂读书时的遭遇，没有让他觉得自卑，反倒让他的这种傲气迸发出来，化作学习的动力，奋发图强。

初入东山完小，毛泽东是一名“异类”。班上学生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毛泽东是农民子弟，穿着唯一的那件短衫裤，破旧，不新潮，很多学生看不起他。学生中有团体主义倾向。在这个学堂，是不是湘乡本地人非常重要，而且还要看是湘乡哪一乡来的。湘乡有上、中、下三里，而上下两里，纯粹出于地域观念而殴斗不休，彼此势不两立。

毛泽东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中立态度。他不是本地人，没有必要卷入本地的派系斗争。可随之而来的结果是，三派人都看不起他。这让毛泽东精神上感到十分压抑。在毛泽东未来的日子里，逆境层出不穷，但这个聪明的韶山人总是采取一种方法渡过难关：隐忍加发奋努力。

那首颇具豪情的《咏蛙》就是一心奋发读书的毛泽东彼时彼刻心境的写照。在吃穿用度的粗俗攀比之外，毛泽东有着寻常学生没有的高远志向和伟大抱负。他像一块海绵，不停地吸收有用的知识作为养分。

在东山学堂，毛泽东的进步是明显的。他写得一手好古文，并理所应当地博得了学堂里教员们的称赞，尤其是那些教古文的老师更是对他赞赏有加，教

经书的老师贺岚岗还特地买了一本《了凡纲鉴》相赠。但毛泽东无心读古文。每天早晨，东山完小会有一次例行的集合点名，校长给学生们训话，会说一些有关中国受列强欺侮的内容，这对于学生们具有煽动性。他们听后觉得十分激愤。实际上，志士们寻找救国真理的步伐，晚清以来从未停止过，但直到1910年，这条道路依旧没有摸索到。

爱国青年毛泽东更喜欢读一些近代人的作品。表兄送给他的两种读物，一种是讲康有为的变法运动，另一种是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毛泽东都细读且思考。在看了《新民丛报》第四号“论说”之后，他作如下批注：“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毛泽东逐渐确立了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伟大志向，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子任，是从“以天下为己任”中化出来的。

在东山学堂，毛泽东也交到了朋友，湘乡人萧三便是其中之一。萧三比毛泽东小三岁，他与毛泽东的友谊在未来的岁月中绵延许久。小学同学，师范同学，一起入新民学会，一起投身新文化运动，一同在延安共事，新中国成立后，还有着二十七年的往来。这几乎是一个关于友谊的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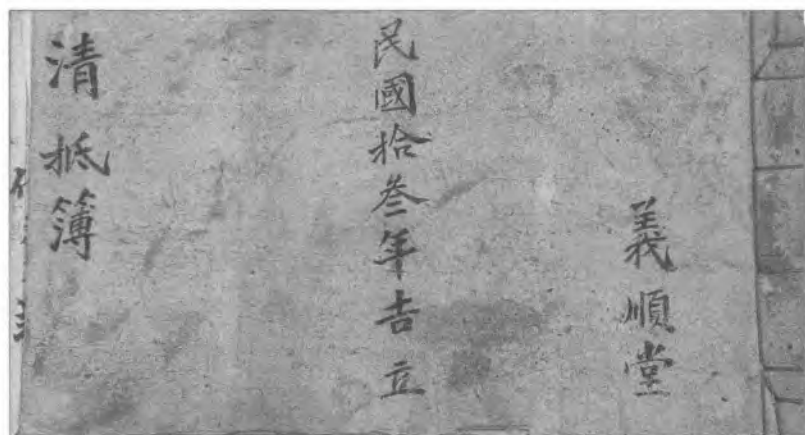
萧三出身富裕，但他并没有看不起从外地来的毛泽东，在东山学堂共度时，他曾借给毛泽东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在这本书中，毛泽东读到了拿破仑、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惠灵顿、卢梭、孟德斯鸠、林肯等西方豪杰的故事。毛泽东赞赏英雄人物身上的大无畏精神。他喜欢《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喜欢《水浒传》里的造反人物，他还喜欢唐朝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的一首《题菊花》：“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他开始向往更大的城市，长沙。

毛泽东离开韶山，毛家生计的重担自然而然落在了毛顺生夫妇和毛泽民身上。

毛泽民十四岁时代替了毛泽东在家中的角色。白天他和父亲一起下田种地，还经常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去送米，晚上就在油灯下帮助父亲记账，还跟父亲学会了双手打算盘的本领。

毛泽民做事很用心，不仅农活做得漂亮，喂牛、养鱼、碾米、砍柴、打桐油，



★ 勤劳致富的毛顺生是毛泽民最好的榜样。天资聪颖的毛泽民在父亲的影响下初显其出众的经济头脑，几年间毛家的经济状况蒸蒸日上。图为毛家经营商铺义顺堂的账本

他都是行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毛泽东走过了一条曲折的探索之路，信仰与道路的确定，需要很长一个摸索过程。庆幸的是，毛泽东的身后，在他的老家韶山，始终有那么一位可以倚重的二弟帮他照顾着双亲，打理着家里那一份不算丰厚的产业。

毛泽民是毛泽东坚强的后盾。后来毛泽东曾动情地说：“没有泽民，我哪里能去读书啊！”

母亲文素勤最了解儿子毛泽民的辛苦，跟邻居家奶奶聊起家事，她曾心疼地说：“润芝不在家，润莲一个人，要种田，要喂鱼，要砍柴，里里外外的活都是他一个人干，他从小受了不少累，吃了不少苦啊！可他父亲在外面做买卖，就不了解这些事情。”

毛泽民的卧室，在整个上屋场中是光线最差的，在最里面、最后面，但却十分重要，因为那是后门。

终其一生，毛泽民都是一个善于守后方的人。

短暂的行伍生涯

1911年，毛泽东来到长沙。他首先要做的是观察和思考。对于一个刚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年轻人来说，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是一个曲折的过程。

辛亥革命前夜，清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只待一个触发点。报纸上宣传挽救时局、号召革命的主张对青年人非常具有吸引力。

一天，毛泽东买了两张《民立报》。这是一份由宋教仁创办、于右任主编的报纸。毛泽东足足看了大半夜，他知道了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同盟会，知道了他们的政治诉求和革命纲领，他把自己对于中国政府官员最佳人选的意见写出来，贴在了学校的墙上：推翻清王朝，组建民国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做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

这当然是一个热血澎湃的学生的天真想法，中国政局的复杂性，远远超过毛泽东的料想，但他的这种爱国热情却彰显无遗。

4月，清政府把四川到汉口和广州的铁路修筑权拱手让给了帝国主义。

5月，保路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展，湖南长沙反封建专制的浪潮越打越高。

徐特立割破手指写血书，要求召开国会。

学生们群情激奋，要用剪辫子来表达反清情绪。毛泽东和一个朋友相约一起去剪辫子，可真到剪时，一些人又犹豫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损，孝子始也”，这是儒家经典《孝经》上的话，他们取笑剪辫子的毛泽东和他的朋友，说剪掉辫子就成了“假洋鬼子”。毛泽东登台雄辩，男人蓄辫，就等于承认清王朝的统治，剪掉辫子则表示有推翻清王朝的决心。可那些原本愿意剪辫子

的人依旧犹豫不决，毛泽东和那位朋友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用“突袭”的方法剪掉了十几条辫子。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湖南紧邻湖北，消息传到长沙，全城民众沸腾。一天，一位革命党人得到湘乡驻省中学校长的许可，到学校作了一次颇具煽动性的演讲。他是黎元洪的下属，黎元洪当时是湖北军政府的都督。他的演讲内容，主要是号召大家行动起来，投身革命，建立共和。毛泽东听完演讲，心情激动，他决定投笔从戎，直奔反清第一线，他约了几个同学，在班上筹了一些钱，准备去武汉做革命军。

毛泽东听说武汉的街道很潮湿，尤其是沿江码头和六渡桥一带，走在街上，必须穿雨鞋。他跑去长沙城外驻军的一个朋友那里借，却意外听到了枪响。起义军沿着粤汉铁路逼近长沙，在城外打了个大胜仗，城内也爆发起义，混乱中，毛泽东迅速穿回城内，在一处高地观看双方的战斗。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战斗。等到他回湘乡驻省中学，学校的大门上已经挂起了“汉”字白旗，起义军占领了学校。

起义胜利了，湖南光复了。哥老会的两个首领做都督和副都督，军队缺乏士兵，新政府招募学生入伍，这便是学生军。这支学生军里有唐生智，后来担任武汉汪精卫政府的国民军司令，他对汪精卫和共产党都叛变了，在湖南开始对农民大屠杀。

毛泽东并不喜欢这支学生军。学生军的成分复杂，不如正规军的士兵成熟，他决定参加正规军，为完成革命尽力。那时候清帝尚未退位，还要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

毛泽东一共当了半年兵。1911年10月底，毛泽东被编在长沙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成了一名新兵。

在军营里，毛泽东依旧关注时局和社会问题。每月军饷七元，除去两月的伙食费和少量的买水钱，剩下的饷银，毛泽东都用来订报纸，苦读不厌。

在《湘江日报》上，他第一次知道了“社会主义”这个名词。

他和其他同学与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他还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同意。毕竟在那个时代，能够往大处想的青年并不算多。在军营里，毛泽东交到了朋友，他很喜欢同班的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还和排长与大多数士兵关系不错。毛泽东能写字，懂些书本

知识，士兵们敬佩他的“大学问”，他可以经常帮他们写信。

革命尚未定局。清政府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但革命军内部却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湖南有人说战事不可避免要再起。有好几支军队组织起来反对清朝，反对袁世凯。湘军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湘军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和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了，南京政府解散了。

毛泽东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军队。他打算重新回去读书。

1955年7月，毛泽东在同警卫谈话时说：“在‘辛亥革命’时期，我当过半年兵，那时不像你们现在，严格得很，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但也学到了不少政治上的学问。”

一师学子

1912年，毛泽东尚未满二十岁，他想要继续读书，可对于去哪所学校他自己也没有明确的目标。

长沙办了很多学校，通过报纸招揽新生。毛泽东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他想去投考一家警察学校，但在考试之前，他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招生信息，说是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可以给一些津贴，很吸引人。毛泽东交了一元钱，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

又有朋友推荐他去投考政法学校，说以后可以做法官，也有推荐去商业中学的，毛泽东又去交了一元钱并写信告诉父亲。父亲毛顺生听了十分高兴，他很容易理解经商的好处。就这么来回付了五六元钱的报名费，毛泽东终于选定了去省立新式商业学校就读。可是，这所学校的大多数课程都采用英语授课，学校又没有英语教师，听不懂课程的毛泽东感到十分厌倦，住了一个月就决定退学。

退学后，毛泽东又花了一块钱投考省立第一中学，发榜时名列第一，因为文章写得太好，校长甚至怀疑不是他自己做的，亲自面试。面试的结果可想而知，文章的确是出自毛泽东手笔。这所学校很大，学生也很多，那里的一位国文老师胡汝霖对毛泽东帮助很大，他因为毛泽东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意接近这个学生。他借给毛泽东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

毛泽东在这所学校里写了不少作文，其中有一篇叫《商鞅徙木立信论》，六百字，借用商鞅变法的故事，紧扣“立信”二字，从立法的角度写法与民的关系。

篇末感慨，“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乎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这篇作文得到了国文教员的激赏，赞其“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给其一百分，并在文题上方写“传观”。但毛泽东对这所学校并不满意，因为它课程有限，校规也令人反感，尤其在读了《御批通鉴辑览》后，毛泽东觉得还不如自学好。

在省立一中读了六个月，毛泽东选择退学。这无疑是个大胆的决定。

他给自己订了一个自修计划。

湖南省立图书馆在毛泽东看来是个宝库，这座由二层小洋楼改建的图书馆位于定王台。退学后，毛泽东借住在长沙南阳街新安巷，距定王台有三里路。每天毛泽东都会起个大早，步行去定王台，第一个进入图书馆读书，中午只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读到图书馆关门才出来。

就这样坚持了半年。

毛泽东的勤奋甚至感动了那里的一位图书馆员。后来这位图书馆员回忆当时的情景：“那时候，我们图书馆每天早上一开门，就‘欢迎’毛泽东，因为他每天必到，又来得最早，而且在门外等候多时了；每天下午关门，要‘欢送’毛泽东，因为他走得最晚，不赶他，他还不走。”

自修期间毛泽东读了很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他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并怀着很大兴趣研究了一番。他曾对同学周世钊说：“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着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得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就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因此我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这时候起，我就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这是一个十九岁青年的胸襟。

毛泽东还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著作，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他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

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自修期间毛泽东住在湘乡会馆，许多士兵也住在那里。住在会馆的学生和士兵总是吵架。一天晚上，他们之间的敌对发展成武斗，士兵袭击学生，想要杀死他们。混乱的环境不适合继续居住，毛泽东开始重新寻找住处，他没有钱，家里不肯供养他，除非他继续进学校读书。

毛泽东回了一趟韶山。

从小一起读书的朋友萧三和他二哥萧子昇打算去投考北京大学，毛泽东有些动心，他打算回家与父亲商量，筹措学费。

毛泽东回家，毛泽民和毛泽覃都十分兴奋，两个弟弟围在大哥身边问东问西，毛泽东带回来的一切消息，包括大哥毛泽东本人，都与韶山冲的农家子弟那么不同。他先进，有理想，有抱负，这对泽民和泽覃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可父亲毛顺生并不赞同毛泽东的想法。在他看来儿子已经“胡闹”过多次，光投考学校就投考了许多次，而后又自学，毛顺生害怕毛泽东缺乏自制而走上错误的道路。

投考北京大学对当时的毛家来说是个巨大负担，不切实际。

短暂的相聚之后，毛泽东重新回到长沙，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前途。他认为自己最适合于教书，于是又开始留意招生广告，这一次他选择投考湖南师范学校，那里不收费，膳宿费也很低廉。

毛泽东写信给父亲，毛顺生同意了儿子的选择。

出于朋友义气，毛泽东写了三篇文章，一篇自己用，另外两篇算是给一同投考的朋友“代笔”，结果三个人都被录取了。

毛泽东1912年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一个学期后，该校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合并，门牌换成“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一共读了五年。

在“一师”，毛泽东读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储才储能，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这里形成了政治思想，获得了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

毛泽东读书十分刻苦，他每天早早起床，洗冷水浴或做运动后，开始读英语，从上午8时到下午3时，他都在教室学习。

毛泽东爱读报，据他在一师的同学周世钊回忆：“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自习室的西头有一间可以容纳几十个人同时看报的阅报室。湖南、上海、北京等地



★ 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求学时的毛泽东

的几种重要报纸，每天都被安置在报架上面。来这里看报的学生很多，而毛泽东每天必到，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并注意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变化。

“他常用饭后、课余和空堂时去看报。看得特别认真、仔细；有时一张报纸可以看上一个多钟头；有时把地图带到阅报室，看看报纸，又看看地图；有时把报纸上面所载各城市、港口、山岳、江河的中文名称，译成英文。他对同学说，这是一举三得的事，就是明了时事，熟悉地理，学习英文。第一师范的同学都称他是‘时事通’。如果有不明白的时事问题，找他一谈就解决了；如果在自习室、运动场找不见他，常常在阅报室可以找到他。晚饭后、星期天，他喜欢和同学们谈时事，他分析世界的政治、军事形势，是那么详尽，那么明晰，是那么有根有据！特别是谈到列强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被侵略而不能抵抗，青年对救国应负的责任时，同学们的情绪，随着他有感情、有鼓动力的谈话，时而兴奋，时而激昂，时而愤怒。”

毛泽东思考着中国的命运。他有一种奇特的感染力，他的气魄很大，他身上总是担负着天下兴亡的责任感。

毛泽东曾说：“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一百六十块钱——里面包括许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

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至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湖南的报纸。”

许多年后，斯诺到访延安，毛泽东曾告诉他：“我成了一个好读报纸的人。”

毛泽东喜欢读书看报，如果有人不注重学习，他也习惯性地批评他们，“不读书，不看报”。

为锻炼在各种环境下读书，毛泽东时而去学校后山妙高峰“静中求学”，时而去长沙城门口最热闹的地方“闹中求学”。这得有定力。

定力的获得需要强健的体魄支持。

毛泽东热心于体育锻炼。

寒假当中，他和同学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见下雨，他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这叫雨浴；烈日当空，他们也脱掉衬衣，这叫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他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下霜的日子，他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11月份，他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

体育锻炼给予了毛泽东强健的体格，对他日后参加革命很有帮助。他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又走过长征二万五千里，没有健硕的体格，是不可想象的。

一师的教师给了毛泽东深刻印象，他后来多次向人提及：“我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最敬佩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杨开慧的父亲），一位是徐老（徐特立）。”杨怀中，又名杨昌济，因世居板仓，人称“板仓先生”，他曾 在日本、英国留学，并考察过德国、瑞士等国，回国后投身教育。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教授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毛泽东在他的影响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受这本书影响，毛泽东写了一篇名为“心之力”的文章，得到杨昌济的高度赞赏。他给毛泽东一百分。

毛泽东十分崇拜杨昌济，他曾冒着酷暑，步行十二华里，去杨先生家中拜访，借阅杨先生家的藏书，与先生讨论学术问题。当然，毛泽东与杨昌济的关系不止于此，在未来，毛泽东还与杨昌济的掌上明珠杨开慧谱写了一曲千古绝恋。

徐老，指徐特立先生，他当选过议会副议长，还曾担任长沙师范的校长，门生遍及长沙城，在湖南教育界有“长沙王”的美誉。徐特立勤俭，清廉，为了让农民子弟有学上，他在家乡创办五美小学。他本名徐立华，十六岁自己更



★ 杨昌济，杨开慧之父，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

名徐特立，取“独行特立，高洁自守，不随流俗，不入污泥”之意。1937年，毛泽东在祝徐特立花甲寿辰的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还是我的先生。”

在一师期间，毛泽东曾和同学一起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五个县。旅行回来后，他觉得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在长沙的一家报纸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他联系。他指明，要结交的是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

他从这个广告里得到了三个半回答。

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加入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得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确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毛泽东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建议就走了。

不过在一师，毛泽东还是团结了一批学生在他周围，他始终是一个有凝聚力的人。这些人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发展成为新民学会，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毛泽东团结的这一群人的共同特点是态度严肃，他们不屑于谈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



★



★★

★ 1918年，毛泽东（四排右二）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班同学合影

★★ 1919年，毛泽东（二排左三）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学合影



★



★★

★ 毛泽东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积极从事党建活动。这是毛泽东（后排左四）、何叔衡、彭璜、熊瑾等部分会员 1919 年在长沙合影

★★ 1920 年 5 月 8 日，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上海丰淞园合影。左七为毛泽东

有一次，毛泽东在一个青年家，他对毛泽东说要买些肉，当着毛泽东的面把他的用人叫来，谈买肉的事，最后吩咐他去买一块。毛泽东很生气，以后再也没有同这个青年见面。原因很简单，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这些行为在现在看来或许有些不近人情，但在当时，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中国正需要这种有抱负有理想的青年人。

1918年，毛泽东在给萧子昇的信中说：“牡丹先盛而后衰，匏瓜先衰而后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其匏瓜乎？”“日学牡丹之所为，将无实之可望。”

不怕艰苦，不怕困难，开小花，结硕果，不学牡丹，而学匏瓜。这是毛泽东的人生选择。他总是选择艰苦的路。“八七会议”后，他不去上海，而去农村，上山结交绿林好汉。

朋友多了，毛泽东觉得有必要建立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1917年，他与朋友蔡和森等人一道，成立新民学会，所谓“新民”，取自《礼记》，“大学之道在新民……日日新，又日新”，宗旨是“改造中国与世界”。

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兴起的革命团体中，以新民学会影响最大，它有七八十名会员，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有名的人物，比如萧子昇、何叔衡、罗章龙、李维汉、谢觉哉、向警予、杨开慧、蔡畅、夏曦、萧三、郭亮等。

湖北也出现一个类似于新民学会的团体，叫互助社，这些团体都是在《新青年》的影响下组织起来的。

毛泽东在师范学校的时候就开始读这本杂志，他钦佩该杂志的主编陈独秀。一时之间，陈独秀代替了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毛泽东心中成为楷模。

组织赴法留学

1918年到1919年，毛泽东曾两赴北京。

这两次北京之行对他影响很大。第一次去他还是迷茫的，是一个刚从学校毕业，寻找救国真理，寻找思想上出路的青年；第二次再去，他则已经蜕变成作为一名颇有组织能力的革命者，可以很好地领导政治运动了。

1918年，毛泽东快要“一师”毕业。恰逢法国政府来华招募工人，蔡元培号召爱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这个时候杨昌济调任北京大学不久，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毛泽东和蔡和森，希望他们抓住机会赴法，同时他也鼓励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学习。

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成员讨论如何“向外发展”，去北平然后赴法显然是一条可行的路。这年的8月15日，毛泽东与萧子昇、李维汉、张昆弟等二十五人，从长沙出发前往北京，四天之后抵达。因为来京之前的宣传工作做得比较好，随后陆续抵京的同学多达四五十人，但因为负责留学工作的“华法教育会”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到位，大家来京之后，一时半会儿无法出国，一些同学难免出现急躁情绪。尽管毛泽东“并未料到后来的种种困难”，而且到京之后，“会友所受意外的攻击和困难实在不少，但到底没有一个人灰心的”，他依旧坚持着，他最大的财富，就是意志力。

对内，毛泽东要安抚好众位“会员”，对外，他需要迅速沟通协调，几十号人必须得到迅速安置才能稳住涣散之心。几经联络沟通，华法教育会终于先后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河北蠡县布里村、长辛店开留法预备班，湖南青

年陆续入学。“军心”稳住了。

接着，毛泽东开始帮大家筹措路费。经杨昌济介绍，他联系上了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由章士钊出面与湖南军阀谭延闿协调，希望谭能够深明大义，支持这些有志于建设国家的湖南有为青年。最终，谭延闿拨出了三万元。毛泽东拿到资助后，又将这些钱按一千六百元一股均分，发给会员们。

罗学瓚在家信中写道：“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学生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

因奔波联络频繁，住在杨昌济家实在诸多不便，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昇等八人搬到了距北京大学不远的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三间狭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睡觉时每当要翻身，都得先和旁边的人打招呼。

他们的生活十分清苦。但这些人都是乐观的，他们还能发现美，欣赏生活中的美好。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毛泽东见识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他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他还看到了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到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他的惊叹和赞美。

在北京，毛泽东帮忙协助赴法留学运动，新民学会对这个运动也支持，但他本人并不想去欧洲。经济方面固然有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觉得他首先应该了解的是中国，把时间花在中国才更有益处。“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



★ 北京鼓楼后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杨开慧的家。毛泽东曾借住于此



★ 1919年3月，环中国学生会在上海送别留法学生合影。后排右一为毛泽东

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

毛泽东可谓有先见之明。中国革命也将证明，中国的问题，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解决，而结合实际，又需要切实的调查研究。但毛泽东并不绝对反对留学，他更主张“大留学政策”，留学不光去欧美，还可以去俄国这种国家。他已经开始向往共产主义的生活。

不过，对初次造访首都的毛泽东来说北京生活开销还是太大。他是借钱来北京的，到了之后，为了生计，必须马上找工作不可。恩师杨昌济帮助了他。杨昌济把毛泽东介绍给李大钊。李大钊当时为北大图书馆主任。经过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允许，年轻的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到一个助理员的职位，月薪八块银元。

这个工资不低，但在北大校园里，图书馆助理员的职位显然不能够引人注目，

毛泽东对傅斯年、罗家伦这些来借阅图书的人极有兴趣，他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时间听一个年轻图书管理员说南方话。

毛泽东没有灰心，他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在北大旁听了一段时间。在这里，他遇到了不少未来颇为出名的人，比如陈公博、谭平山、邵飘萍、张国焘、康白情、段锡朋等。

当然，他还遇到了一位在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女性，那就是杨开慧。他们彼此敞开心扉，思想上共同进步，从挚友慢慢确立了恋爱关系。

这是一段新文化标杆式的自由恋爱，毛泽东和杨开慧，从相遇之初，就已经是一对灵魂伴侣。

第一次到北京，毛泽东对政治兴趣持续增长，他的思想也越来越激进，且经历了一个从混乱到明朗的过程。这个时候，中国的进步人士都为救国在寻找出路，毛泽东也不例外。

他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他还常常和来看他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

他一度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不过，在跟李大钊接触之后，毛泽东开始接受社会主义的影响。1918年，李大钊在天安门广场演讲《庶民的胜利》，毛泽东亲自去了现场。几天后，李大钊的这篇演讲稿刊发在《新青年》杂志上，同期刊发的还有他的另外一篇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毛泽东仔细阅读，开始具体了解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

驱张运动与马克思主义者

1919年至1920年对于毛家来说是非常难挨的一段时光。1919年3月中旬，身在北京的毛泽东接到大弟毛泽民的来信，说母亲病重，速回。

百善孝为先，毛泽东敬爱母亲，他星夜兼程，一路折返长沙。来北京前，毛泽东内心未尝没有挣扎，母亲生病，是私，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是公，小家和大家之间的取舍，很难抉择。

毛泽东给七舅、八舅写信，对他们曾经容留文素勤在家里养病表示感谢，他还四处寻医问药，“今特请人来开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并安排好毛泽民带母亲到长沙治病的行程，初定秋收之后。可是现在母亲病情危重，他必须放下公事回到母亲身边。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回到长沙。他立即安排大弟毛泽民将母亲文素勤从舅舅家接到长沙。三兄弟四处寻医，“亲侍汤药”，或许是毛家三兄弟的虔诚感动上苍，母亲文素勤的病好转。回到湖南的毛泽东继续主持新民学会，在经济上他并不宽裕，他去长沙修业小学教历史课，补贴家用。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全国各地响应。这是一次反帝爱国运动，同时也倡导新文化。毛泽东十分兴奋，在北京，那些文化界、思想界的著名人士无暇听从一个外省进京学生的言论，可在长沙，在比较熟悉的环境里，他发现自己大有可为。

毛泽东当仁不让地领导了长沙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首先是学生举起义旗，毛泽东把学生作为组织对象，很快，“湖南学生联合会”就成立了，学

生们的革命目的也很明确，就是反对亲日的湖南军阀张敬尧。

毛泽东在这次“驱张运动”中显示了天才的领导能力。联合会的会刊《湘江评论》，毛泽东是主编，第一期印两千份，不到一天就告罄，以后每期增印至五千份。这个销量在当时算相当大。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写了不少颇有影响的文章，比如《民众的大联合》。又比如在《创刊宣言》里他这样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他的笔触直白却充满力量，直指人心，很具有宣传力。他热情歌颂十月革命，批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这一切令军阀张敬尧十分害怕，他精神上虚弱不堪，只好动用武力——《湘江评论》出版五期即被查封——张敬尧的军警包围湖南学生联合会，胁迫彭璜停止反日爱国运动，张贴布告，解散学联，强行闯入湘鄂印刷公司，将刚印出的《湘江评论》第五号没收。他还威胁学生们，如果再不听话，就要砍他们的头。这吓不倒毛泽东，他事先得知，已早做准备，学联职员及时离开，重要文稿和学联印信移走，未受损失。

忙碌的日子里也有大悲伤。毛泽东的母亲文素勤来长沙治病后，病情有所好转，但过了夏天，她的病情几经反复持续恶化，毛泽民陪文素勤回到老家韶山冲养病。这可能也是文素勤自己的意愿。大儿子在长沙日夜奔忙，她在身边是个“牵挂”，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万一有不测，能在祖屋闭眼总好过漂泊在外强。1919年10月5日，文素勤病逝于韶山，临终前，毛泽东、毛泽覃不在她身边，毛泽民陪着母亲走完最后一程。

毛泽民说：“母亲是农历八月十二故去的。临终前，她老人家一直呼唤着你们两人的名字，直到最后……”

三兄弟失声痛哭。他们把母亲安葬在楠竹沱的小山上。母亲的去世对毛泽东的打击很大，他不仅失去了母亲，还失去了一位最好的朋友，一位毫无保留的支持者。

1919年，毛泽东曾用泪和墨写下《祭母文》和两副灵联。《祭母文》中说：“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迩亲疏，一皆复载；恺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

头七之后，毛泽东便不得不返回省城，继续领导“驱张运动”。



★ 毛泽东父母陵墓

毛泽覃则要回长沙读书。

文素勤去世对毛顺生也是个巨大打击，年少夫妻老来伴，一辈子夫唱妇随，如今只剩一人孤苦。为缓解父亲的悲伤，毛泽东请伯父毛福生作陪，将毛顺生接到长沙居住。

毛顺生虚岁五十寿辰，毛泽东办了酒菜，请了朋友，一为祝寿，二为冲淡父亲的悲伤。饭后，毛泽东还特地安排家人一起去照相馆拍照。这张照片是毛顺生与毛泽东留下的唯一合照。

谁知祸不单行。文素勤去世不久，毛泽民六岁的儿子毛远益因患急性肝炎夭折。

1920年1月23日，始终没从妻子去世的悲伤中走出来的毛顺生，因伤寒去世。此时毛泽东远在北京，为“驱张运动”奔忙，未能及时回家奔丧。毛泽民在家中打理父亲后事，将父母合葬，代兄尽孝。

毛泽民最了解毛泽东对父亲的深情，他请大哥的私塾老师毛麓钟代作泣父灵联：“决不料一百有一旬，哭慈母又哭严君，血泪虽枯恩莫报；最难堪七朝连七夕，念长男更念季子，儿曹未集去何匆。”

在毛泽东的努力下，教育界很快起来了。10月，湖南教育界一千二百七十一人联名揭露张敬尧摧残教育事业。1919年11月，长沙《大公报》聘请毛泽东为该报政治评论员。

毛泽东不仅仅反对张敬尧个人，而是将其归置到中国的旧社会、封建制度中去加以批判。毛泽东倡导新生活。他的评论文章，内容也相当广泛，他关注社会上各种不平现象，他批判的是旧社会。如果说读书时代毛泽东还只能在书缝中书写批注，第一次去北京，他只能与同学辩论，那么这个时候，他已经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政论家，异军突起在中国的思想界。

长沙女青年赵五贞反对包办婚姻，在花轿内自杀，轰动一时。毛泽东深切关注，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一个星期之内，毛泽东在《大公报》和《女界钟》上发表了几篇论文和杂感。他曾经有过包办婚姻，他对这种形式的两性关系非常不满，正因为这种切肤之痛，他特别能够从旧中国扭曲的两性关系中看出旧制度的黑暗，他“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

12月，长沙举行焚烧日货游行示威，这是继7月第一次焚日货之后，学联举行的又一次行动，导火索是11月16日福州发生日本暴徒持械殴打学生的“福州惨案”。湖南学联散发传单声援，并要求将长沙小吴门火车站查出的日货立刻焚烧。一时之间，长沙的工人、学生、教职员、店员约万人都起来反对张敬尧。

毛泽东和他周围的一群爱国青年和张敬尧的冲突达到了顶点。张敬尧派军警用刺刀和枪托冲散焚烧日货的人群，要追捕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新民学会和湖南学联的骨干分子在楚怡小学连夜开会，决定组成驱张代表团，到湖南以外的地方扩大驱张宣传，寻求更多的支持。

为驱张运动扩大宣传、寻求支持，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北上北京的契机。这位年轻的学生在这次运动中已经迅速成长为一名政治新星，更重要的在他身上有一种非常可贵的品质，那就是他善于联合，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阶级，放眼毛泽东未来的奋斗路，竟然就是一种不断扩大阶级联合的过程，从学生，到工人，到农民，他逐渐联合了中国最广大的一群人，为他们着想，替他们担忧。

毛泽东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农家之子，对于穷苦人，对于中国最广大的被压迫的阶级，他能够做到换位思考，他体会得到他们的痛苦，也能明白他们的诉求与希冀，这正是毛泽东最终能够取得胜利的关键点。当然到目前为止，年轻的政治家才刚刚起步，1919年12月，他率领驱张请愿团离长沙赴北京，北京即刻成为驱张运动的大本营。

毛泽东在北京待了四个月。那是北京最冷的季节，毛泽东住在福佑寺寒冷的大殿里。大殿正中摆着一张香案，很长，左边是平民通讯社的油印机和通讯稿件，驱张的很多稿件都是他自编自刻自印。

湖南人一向勇敢。每次驱张请愿毛泽东都身先士卒，他充满勇气。

请愿代表给北京政府总统、国务总理的呈文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张督祸湘，罪大恶极，湘民痛苦，火热水深，张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无所托命”。1920年新年之前，湖南公民、教职员、学生三代表团，为要求撤罚张敬尧，向北京政府做最后一次请愿，毛泽东以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

中午12点开始，请愿团分三路向国务院驻地进发，后又转赴国务总理靳云鹏私宅。毛泽东被推举为代表交涉，靳托词不见，由其副官长接见，一直到晚上7点，请愿团离开。此后的舆论围剿一波接着一波，张敬尧已然“四面楚歌”。

4月，驱张代表们开始分散，他们分别去武汉、上海、广东和湖南继续活动。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

6月9日，他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湘人为人格而战》，说“湘人驱张，完全因为在人格上湘人与他不能两立”。这已经是北上驱张运动的尾声。没过多久，直皖战争爆发，张敬尧出走，湘军前锋部队进入长沙。1920年6月17日，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到长沙。张敬尧被推翻了，但湖南的政局依旧不容乐观。谭延闿等于巧夺了驱张运动的胜利果实。

毛泽东在北京的四个月，有失有得。他痛失师长、亲人。他于1919年12月18日到北京，刚度过一个月，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病逝。他和杨开慧、杨开智一起守灵，并和蔡元培、章士钊、杨度、黎锦熙等人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启事》，呼吁“诸知交慨加赙助”，“抚恤遗孤”。

没隔几日，又传来父亲毛顺生在家乡去世的噩耗。毛泽东在忙于驱张活动，未能回湘奔丧。短时之内，失去两位亲人，毛泽东内心之挣扎痛苦可想而知。这是失。

至于得，是指这个年轻的政治家在思想上有了明确的认识。第一次来北京时，他只是对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有了一些了解；第二次来北京，就是在福佑寺寒冷的香案上，已经摆着“一大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黎锦熙去看望毛泽东时，称自己“在这里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的全文”。

这些书刊，都是毛泽东第二次在北京期间热心搜寻的，其中三本给了他很



★ 1920年初，毛泽东（左四）和北京大学学生组织“辅社”成员合影

深的印象：《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毛泽东已经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了。

· 第二章 ·

抉择：弃家革命

正月初八家庭会议

在历史转折的关键点，中国的革命者众多，投身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者也不算少，但是举家革命的革命者的确不多。

毛泽东家庭是举家革命。

毛泽东对自己所要走的道路有自信，他希望家里人能够一同前进。

从1919年底到1920年4月离开北京，毛泽东已经在理论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发现北京并不是他发挥作用的合适舞台。1919年夏天，张敬尧下台，相对开明的谭延闿上台，但毛泽东对于湖南的情况依旧担忧，他想要促进湖南自治。

1920年7月7日，毛泽东回到长沙，住在储英源楚怡小学校。8月下旬，毛泽东回韶山休息，祭拜亡父，探望弟弟毛泽民。

父亲去世前后，全由大弟毛泽民一人料理，毛泽东心里十分过意不去。不过这次回家，毛泽东并没有发动弟弟与他一起革命。虽然毛泽东这个时候已经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在1920年的冬天，他已经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他受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指引，但在1920的夏天，他还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自己的组织。但此时已是前夜。1920年8月，上海，“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陈独秀担任书记，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毛泽东在北京见过陈独秀，第二次从北京返回长沙时，他在上海又见了陈一次，他们一直通信。陈独秀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湖南地区由毛泽东负责几

乎是理所当然——毛泽东有才干，在湖南地区有斗争经验，人脉也比较畅通。这一年11月，毛泽东创建了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参加发起者，还有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

不过，在新民学会内部，关于用什么方法改造中国与世界却有了分歧。而且这种分歧，是发生在毛泽东和他年少时代的挚友萧子昇之间。

从东山完小到湖南一师，萧子昇比毛泽东小一岁，却高三届，他的弟弟萧三和毛泽东是同学、好友。当年杨昌济门下有三位得意门生——毛泽东、蔡和森和萧子昇，他们志趣相投，人称“湘江三子”。一文不名时，他们随身只携带一把雨伞和一个小包袱卷，一起徒步游走湖南省内的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他们后来都成为新民学会的会员。

1920年，蔡和森和萧子昇在法国，毛泽东在长沙，在新民学会会员的通信中，毛泽东和蔡和森主张用俄国式的、暴力革命的方法，而萧子昇主张用“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方法。

毛泽东反驳他，“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论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这种分歧是五四运动走向低潮之后的必然。

毛泽东去北京之前，甚至在北京的时候，他都还对无政府主义有较大兴趣，对无政府主义的信条十分熟稔。但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就越发无法忍受克鲁泡特金。在毛泽东看来，无政府主义者要“在二十四小时内废除国家”的举动，无异于痴人说梦，天方夜谭。有一些青年跟着胡适走向研究“问题”，认为改良是最稳妥的道路，另一些青年则跟着李大钊信仰“主义”。意见不合，信仰不同，分道扬镳，不可挽回。

1926年之后，毛泽东和萧子昇再没联系过。朋友的远离，或许让毛泽东感觉到了孤单，他更加意识到找寻可靠的同盟军的必要，他想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不过，毛泽东是有理论自信的，在他经营的文化书社里，《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和《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摆在一处，都属于销售量较大的书籍。

1920年冬天，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组建起来，杨开慧是早期团员之一。

在思想上，她一直要求进步。在长沙，她和毛泽东是比肩而立的“青年偶像”。杨昌济去世，驱张运动在北京告一段落，杨开慧随母亲、哥哥回到湖南，进入

教会学校福湘女中读书。

在教会学校，杨开慧不做礼拜，常外出搞学生运动，宣传学联的主张。她支持毛泽东的革命事业。1920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经费不足，她立刻动员母亲将父亲去世时朋友们筹集的慰问金拿出一部分作为支持。

湖南教育界讨论“男女同校”，杨开慧和其他五名女生毅然进入岳云男子中学，成了男校里的女学生。到了1920年冬天，杨开慧和毛泽东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感情上，都到了成熟阶段，他们已经过了差不多两年的恋爱生活，又都信仰着共产主义。

1929年6月20日，杨开慧回忆她和毛泽东的恋爱，曾这样写道，“他有许多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诉我，我也完全了解他对我的真意”。“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十分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我看见了我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

杨开慧和毛泽东结婚，一不置办嫁妆，二不坐花轿，三不布新房，四不办酒席，也没有送亲客。杨开慧独自提着一只装衣服的小箱子到毛泽东所在第一师范学校教员宿舍，开始与毛泽东共同生活，就算结婚了。是为“不做俗人之举”。过了一段时间才请一些挚友来吃饭，共花了六块大洋。用餐结束，他们向众位客人宣布：“我们结婚了。”这是一种完完全全的新式婚姻，是两个灵魂相近的人的结合，平淡低调，却已然惊世骇俗。

有了共同进退的伴侣，毛泽东的革命路不再孤单。和杨开慧结婚后，毛泽东仍旧忙于文化书社和新民学会的事情。1921年元旦，长沙降下大雪，寒光绚烂，景象簇新，毛泽东开完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心生感慨。文化书社、第一师范、第一师范附属修业小学、新民学会，这些地点、组织都为共产主义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但更重要的，是共产主义需要新的追随者，毛泽东在校内学生中培养追随者，文化书社也会提供一部分钱作为礼物，赠予新入会的年轻人。毛泽东逐渐扩展着属于自己的大家庭。很快，春节到了，他打算回到家乡办一件大事。

毛家兄弟中，毛泽民一直是“守后方”的。1919年，十三岁的毛泽覃在毛泽东的监护下进入长沙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读书。这给家里带来了更大的经济压力。但毛泽民没有犹豫，他理解大哥，也支持三弟，读书才有更好的前程，他宁愿自己守在家乡做后盾。

毛泽民定期给毛泽东和毛泽覃送东西，也送学费，为了不让鞋子磨破，他常赤着脚，挑着担子走到长沙。

1919年和1920年，毛家接二连三出事，父母亲先后去世给毛家弟兄打击很大。这让他们更加明白亲情的可贵。1921年正月初八是已故母亲文素勤的生日，毛泽东带着毛泽覃从长沙赶回韶山。

兄弟团圆是大事，毛泽民夫妇认真准备丰盛饭菜，他和兄弟们已经一年没见面了。过去一年中，毛泽东四处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奔走，毛泽覃刻苦学习，毛泽民则守在家乡，经营耕种。

湖南农村的厨房，有土灶、有火塘，火塘中的火一个冬天不熄灭，吃完饭一家人可以围坐在火塘边，一边烤火一边聊家常。

长兄如父，毛泽民、王淑兰、毛泽覃、毛泽建都很尊重毛泽东。毛泽民并不知道大哥将要向他提出一个足以改变他一生的建议，他插不上话，只知道大哥一直在说外面的人怎么反对封建反帝国主义，还提到了俄共，提到了闹革命，搞共产。

毛泽东突然对毛泽民说：“大弟啊，你们两个在这家里很不容易，1919年死了娘，1920年又死了爹，爹的棺材还是借的埋的，家里又被强盗抢过了，遇到这么多天灾人祸，能保住这份家业就很不容易！我和泽覃在外面读书，没尽到孝心，一切都是你一个人操办的，还要供我俩读书，非常感谢啊！”

毛泽民和妻子王淑兰落泪了。这些年，两个人支撑家业的确不易，大哥的理解让他们心窝子暖和。可毛泽东话锋一转，却说：“大弟，现在爹娘都死了，你们不要种地了，把屋里收拾一下，都跟我出去，一边学习一边做些事。”这句话令毛泽民夫妇震惊，毛泽民几乎脱口而出：“不种田，哪有饭吃？”

毛泽东是个往大处想的人，他要干革命，他希望能带着家里人一起干，一起进步，他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可大哥的这个决定，要让毛泽民一下子理解非常困难。

这可是他们的祖地！在那个年代，让一个农民抛家舍业离开祖祖辈辈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地、家园、他的牛、他的粮食，谈何容易！毛家的家业是在毛泽民的手里走上水的，眼见日子越来越好，突然抛下一切，跟随大哥毛泽东去做一眼望不到边的革命事业，毛泽民心里没底，他吃不准，摸不清，也无法理解大哥为什么如此坚决。

毛泽民的人生理想是从父亲毛顺生那里接过来的。那是一个传统中国农民的人生理想，把家业守住，把日子过好，人生就满足了，圆满了。

毛泽东呢？毛泽东是心怀天下，要救国救民。正月初八的这个晚上，兄弟俩的冲突其实是两种人生理想和两种道路的冲突，是不同人生观之间的撞击。

毛泽民问毛泽东：“我走了以后，这份家业怎么办呢？还有这么多田，还有房子啦，还有麦子在湘潭，还有银票，家里还有些家伙，生活还得活下去。你们都读书，我一出去怎么办呢？”

毛泽东说：“我们欠别人的钱都要还清，别人欠我们的账就都不要了，一笔勾销。我的意思是不要这个家了。”

话音刚落，弟弟妹妹都哭了。这可是传了多少代的祖宅老家啊！

毛泽民佩服哥哥，他有能力、有胆识，从理智上他愿意相信大哥的决定，但在情感上，毛泽民接受这个提议并非易事。他是一名老实本分的农民，让一个农民离开他热爱和依恋的土地，多么痛苦！这些田地、房屋、坛坛罐罐，都是呕心沥血，一点一点积累下来的，如今突然离开，等于连根拔起。

毛泽民问，走出韶山做什么？

毛泽东说，我现在办了一个学校，正需要找人帮忙，你就去管。你读的书不多，还可以到那里去读书。

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毛泽民明白，走出这一步，乡村生活的宁静与质朴，将一去不返，等待他们的是一条荆棘之路。走出去，就不能回头。

毛泽民和王淑兰商量，王淑兰是个农村妇女，但她愿意支持大哥的决定。毛泽覃和菊妹子毛泽建，也都愿意跟着毛泽东出去闯荡。

毛泽民考虑再三，终于下定决心跟着哥哥毛泽东走。正月初十一大早，毛泽东带着弟弟毛泽覃和堂妹毛泽建奔赴长沙，毛泽民和妻子王淑兰留在上屋场，准备搬家。

临走前，毛泽东嘱咐大弟，去长沙不要多带东西，只要带上铺盖和要穿的衣服就行，东西带多了，就要请人送到银田寺，还要坐船，路费、脚力钱加在一起，等于买了这些东西。

毛泽民终于要离开祖屋了。这一年，他二十五岁。上屋场房前屋后是他最熟悉的地方，临行前他忍不住转了一圈又一圈。

毛泽民还特地安排好毛家三兄弟和母亲的那张合影，用镜框镶着，送去表兄家保管。后来白色恐怖，毛泽民的表兄不顾生命危险把照片藏在自家堂屋匾额后面，才得以保存。1959年6月，毛泽东重返韶山，看到这张合影，欣喜得忍不住用浓厚的乡音问：“这是从哪里‘拱出’来的呀？”

王淑兰毕竟是农村妇人，看看家里东西，这个也可惜，那个也可惜，什么都想带走。毛泽民对她一番劝说，她才终于放弃。离开韶山，毛泽民和王淑兰除了衣服和铺盖，只带了几担米、两车柴。

不过毛泽民有毛泽民的想法，他在处理家产的时候，适当做了一些保留，日后他把这些家产全都用于革命事业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中了。

毛家儿女弃家革命，这在当地人心中是那么不可思议。可毛家人义无反顾。这是一个团结的、坚不可摧的革命家庭，毛泽东作为绝对核心，带领着弟弟妹妹们走上了铁血的征程。

一师附小毛庶务

毛泽东看人准，在于他会用人，懂得发挥每个人的长处为大局添砖加瓦。

毛泽东发动弟弟妹妹们参加了革命，一时之间，他必须给每个人安排合适的位置。

毛泽覃和毛泽建还小，被送去读书。

毛泽民夫妇来长沙之后做什么，是毛泽东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其实，作为毛泽东革命道路上最主要的支持者之一，从大哥走出乡关那一刻，毛泽民就已经有了人生定位。

古代打仗讲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工作容易被忽视但却是非常重要的。毛泽民是做后勤工作的天才。他从小和父亲毛顺生学习理家，学得一手双手打算盘的绝技，常年的农耕、经商又让他养成了举轻若重，巨细靡遗的办事风格。毛泽民很有经济头脑。

毛泽东深知大弟的长处，早早为他安排了一份几乎是量身定做的工作——去一师附小担任庶务，负责管理学校的经费和食堂的伙食。从管理一个农家，到管理革命的大家，毛泽民走过了一条脚踏实地却又十分辉煌的路。这条路，可以说是毛泽东为他发掘的，而今到一师附小做庶务，则像是小试牛刀。

毛泽民夫妇热情，心细，到长沙见到杨开慧，听说大嫂和大哥结婚时“不做俗人之举”，立刻撺掇着要再给兄嫂办一次喜酒——这几年毛家喜事不多，一家人又刚聚在一起，好好庆祝一下也是应该的。

几天后，毛泽东和杨开慧把弟弟妹妹们叫到家中，多加了两个菜，吃了一

顿饭，就算庆祝了。毛泽东和杨开慧把他们在一师附小结婚时的婚房腾出来给毛泽民和王淑兰住。晚上，毛泽民就在附小开办的“成年失学补习班”学习，白天，他正式成为“毛庶务”，开始管理附小上上下下的杂事。

民以食为天。在学校里，食堂的伙食“兹事体大”，关系到全校教师的教学情绪。可一师附小的伙食问题一直是个大难题，老话讲，“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教师们每月只交区区四元的伙食费，想要吃到好的也是难事。

毛泽民到任后，发现食堂的伙食的确难以下咽，顿顿糙米、水煮青菜，别说荤腥，连点油水都没有。毛泽民决定从改善伙食入手，打响自己在一师附小的“头一仗”。

毛泽民常年做生意，很有经验，他知道遇到这种情况，必须从采购抓起，于是毛泽民亲自提起菜篮子，活跃在学校附件的菜市场和农民贩粮、贩菜的小集市。货比三家，毛泽民很快掌握了采购的门道：季节不同菜价会有起伏，刚上市的菜要比旺季菜贵得多，傍晚收摊前的菜价又比早上便宜。所以，傍晚收摊前去买旺季蔬菜是最划算的。用较少的钱买到较多的蔬菜，省下来的经费就可以用在改善伙食的其他方面。

接着，毛泽民又叮嘱伙房的大师傅，做饭时，糙米饭做软一点，在饭里可以掺一些芸豆、番薯丝，改善米饭的卖相和口感，教员们更容易接受。没过几天，过去怨声载道的教员们就发现，蔬菜的花样多了，不再是面目可憎的白水煮青菜，还有了萝卜、南瓜、土豆等蔬菜，糙米饭也变得可口了。教员们私下都赞叹新来的毛庶务有办法。

毛泽民的法子不止于此。一个月下来，他发现经过精打细算，不但没有超支，还有些结余。毛泽民欣喜不已，去采购时，不光只看蔬菜，而开始关注鱼和肉的行情了。

很快，他发现了“新大陆”，猪蹄的价格是猪肉的一半，猪下水、鸡爪子、鸡脖子、鱼头的价格只是整鸡、整鱼的三分之一。这些“边角料”毕竟也算荤菜啊！第二天，红烧猪蹄就出现在了一师附小的食堂里。教师们刚走进食堂，就闻到一股香味，毛庶务则站在打饭师傅旁边，笑呵呵地向大家宣布，今天中午除了每人一份蔬菜，再加半个红烧猪蹄！

教师们笑呵呵地看着毛庶务，对他竖起了大拇指。如此一来，毛庶务加菜有功、管理有方的美名就传出去了。打这以后，一师附小食堂的饭菜就开始像

变魔术般地翻新，好的时候每周甚至可以吃上三顿荤菜：卤味鸡爪、剁椒鱼头、酸菜大肠。有的男教师甚至还愿意带点小酒，来食堂就菜喝上两盅。一师附小的食堂开始有家的味道了。提到家，毛泽民也会偶尔贡献出家乡的味道，韶山名菜，“毛氏红烧肉”。

中国的农村，过去很少吃猪肉，过年杀猪自然成了一件大事。为烧好这顿猪肉，毛家的先人们可费了不少心思。红薯干秋天就要蒸熟、晾干，红烧肉快出锅时，将已经上屉蒸软如板栗大小的红薯丁放入锅中，这样做出“毛氏红烧肉”，色泽枣红，肥而不腻，肉中的红薯与肉相得益彰，糯如板栗，香味扑鼻。毛氏兄弟都很爱这一道家乡菜，一师附小的教员们吃了，也纷纷大加赞赏。

“首战告捷”，毛泽民再接再厉。为了节省经费，进一步改善伙食，他又将买水改为派人到乡下挑水，将去菜市场买菜改为去乡下菜户家直接采购，他还动员老师们利用学校周围的空地种菜，动员伙房的大师傅自己喂猪，这样剩下的泔水也就不会被浪费了。

开源，节流，食堂越办越好。毛泽东偶尔也去食堂吃饭，眼见变化越来越大，还有教师们对毛泽民一致认可的口碑，毛泽东再次领略到弟弟那种刻苦耐劳、灵活机智的办事风格。

一师附小食堂伙食的“咸鱼翻身”，是毛泽民有效进行财务管理的胜利，好钱用在刀刃上，是毛泽民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的理财原则。更难得的是，他对于财务的管理，不是让多余的钱财进了自己的腰包，而是服务于革命，指向于“善”。

和他们善良的母亲文素勤一样，毛泽东三兄弟向来同情并愿意帮助穷苦人。毛泽民为一师附小食堂采购的过程中，与下层民众的交往很多，他看到很多学龄前的儿童，没有上学的机会，整日帮着家里人干活，他感到非常痛苦——毛泽民小时候也有过辍学经历。

一次，他终于忍不住仔细询问了一个肉摊的小老板每日的收入和家庭开销，然后他帮着细算了一下，发现这家完全可以负担起孩子去学校念书，他细心劝导说，如果孩子多读点书，今后能写会算，还可以帮你们把生意做大，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

小老板说，我也知道读书好，但学校要一次性交那么多学费，还是有点负担不起。毛泽民明白这个肉摊老板的心理，他不是拿不起钱，而是不舍得一次性投资。毛泽民又问他，如果学费分批次付，能不能接受。小老板笑着答，如

果是零零散散地付学费，平时省一省，可能也就出来了。

毛泽民说好，你等着，他立刻找到了在学校主事的大哥毛泽东说明了情况。毛泽东十分支持弟弟的想法，而且只要不影响学校资金周转，如此操作，对学校的招生和孩子的教育可谓两全其美。毛泽民又立刻去找这个小摊贩，告诉他这个好消息，还托他转告大家。接着，毛泽民在学校门口贴出布告，宣布了学校收费改革的举措，很快，一批穷孩子也有了到学校读书的机会。

在长沙，毛泽民白天“帮学校”，晚上“帮自己”，跟着大哥出来做事情，光靠在老家学的那点知识是不够的，他必须提高、充实自己。

1920年，毛泽东回长沙后创办了“成年失学补习班”，吸收工人来学习，为湖南创立党组织做准备。毛泽东、何叔衡这些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会来学校授课。

工人阶级是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发动的对象，通过办学校，不但让工人们学习了文化知识，毛泽东还真正第一次在政治上做到了将工人们组织起来。

毛泽民在夜校读书，最大的益处就是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与大哥更加靠近了。

1921年5月1日，湖南一师举办劳动节游艺会，举办演讲、游艺等活动，还在纪念面包上印“劳工神圣”“不劳动者不得食”等字样，这些都令毛泽民心潮澎湃。他从韶山走出后，第一次和革命靠得这么近。

毛泽民在夜校交了不少朋友，他们大多是渴望革命的劳动青年，比如一个叫许志行的青年人就和毛泽民比较谈得来，每逢星期天，许志行都会和毛泽民一起去向毛泽东请教问题。毛泽东鼓励他们多读书，读一读《新青年》等刊物上的文章，提高觉悟。

毛泽东还建议他们每周写三篇文章，一篇作文，一篇读书笔记，一篇日记。作文的题材，要与现实斗争相结合。毛泽东还会不失时机地指导他们写作方面的小问题，比如有一次，毛泽民手里有一张明信片，他打算和许志行、毛泽覃联名寄给大哥。毛泽民执笔，写了几句心里话，又在收信人一栏写：毛泽东先生启，在寄信地址栏写：南门家寄。几天后，毛泽东收到明信片，等到再见三人时，他拿出明信片，问他们这张明信片有什么问题没有？三人反复查看，没发现问题。

毛泽东笑着说：“启是打开的意思，你们寄的是明信片，并不需要打开，应该写收才对。另外，家寄是指家中人寄出的信，许志行并不姓毛，写家寄就不合适了。”

三个人恍然大悟。

参加中共一大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是陈独秀在上海成立的，时间是1920年，参加者有五人。

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则是在毛泽东和何叔衡的积极活动下，于1920年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的。

中共一大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有六个小组，五十三名成员。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抵达上海，与李达、李汉俊联系，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上海的党通知各地党组织，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

6月29日，毛泽东和何叔衡作为湖南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乘坐小火轮，从长沙出发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初，到达上海，住在白尔路博文女校。

大会原定6月20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到达上海。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另外还有受陈独秀个人委派的包惠僧。

大会召开了。参加会议的代表十三人，以及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

大会组织比较简单，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记录。开幕式在博文女

校楼上举行，当时学校正在放暑假，正式会议在李汉俊家开的，具体地点是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

大会进行了四天，讨论的问题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章程以及发展组织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讨论中间，对于党的基本任务和组织原则曾经发生过严重的争论。最后在原则上通过一个基本立场：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党的基本任务，决定建立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并以职工运动为中心工作。

大会决定第四天的夜晚，最后通过党章，晚饭后8时，齐集李汉俊寓所的楼上厢房里，主持人刚刚宣布继续开会，楼上客堂发现了一个獐头鼠目穿长衫的人。代表们马上警觉来人的可疑，立即收检文件分途散去，在上海没有适合开会的地方，代表们便赶往嘉兴。嘉兴有一个南湖，代表们借游湖为名，雇了一只大船在船上开会，他们很放心地进行了一天的讨论，直到晚上11点才闭会。

这一天的会议，除通过党章外，还讨论了对孙中山的态度和关系问题，最后讨论成立临时中央局与选举中央委员，确定党名为中国共产党，选举张国焘、陈独秀、李达为临时中央局委员，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为候补委员，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包惠僧认为年轻的毛泽东在中共一大上表现得老成持重。李达后来回忆，毛泽东在会上“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他善于思考，常在



★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后因叛徒告密，为安全起见，大会最后一天将会址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图为嘉兴南湖游船。

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另一位早期共产党员则这样评价毛泽东：“他给了我一个奇异的印象。我从他身上发现了乡村青年的质朴——他穿着一双破了的布鞋子，一件粗布大褂，在上海滩上，这样的人是很难见到的。但我也在他身上发现了名士派的气味。”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一次会晤，尽管它的整个过程如此简朴，甚至有些戏剧性的插曲，但中国的《庄子》上有句话叫“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意思是开头的时候很简略，很少，结束的时候很巨大、很伟大，用来形容有生命力的东西。

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正在于此。一大代表大部分是年轻人，平均年龄二十六岁，只是其中没有一个是工人或者农民。毛泽东的家庭出身在其中不算优越，但日后恰恰是这个从韶山农村走出来的年轻人，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

纵观十三位中共一大代表的人生走向是很有意味的。

毛泽东，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董必武，中共领导者，和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何叔衡，1935年牺牲。

邓恩铭，1931年就义。

陈潭秋，1943年牺牲。

李汉俊，因与张国焘、陈独秀发生矛盾，二大后脱党，但没有放弃马克思

主义信仰，1927年被捕，桂系军阀认为他是共党首要分子，将其枪决。

李达，因与张国焘、陈独秀的矛盾，一度脱党，1949年重新入党，后来死在“文革”中。

陈公博叛党，做了汉奸，抗战胜利后被枪决。

周佛海也做了汉奸，1948年死在南京监狱里。

张国焘1938年叛党，投戴笠门下，1949年逃往香港，最终客死多伦多。

刘仁静受托派思想影响较深，曾在国民政府做事，1950年在《人民日报》发表声明，承认错误，表示拥护中共领导，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并在人民出版社任特约编辑，做到退休，1987年死于车祸。

包惠僧在革命低潮时一度退党去澳门谋生，1957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写了不少回忆录。

王尽美1925年因病去世。

出席会议的尼克尔斯基，1939年被苏联内务机关以“间谍罪”枪杀，后平反。

马林，1942年被德国法西斯杀害。

中共一大代表的曲折人生，复杂离奇，激烈动荡，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风云突变。然而大浪淘沙，只有那些坚定信仰的人，才能在时代的乱流与旋涡中守住自我，奋力拼搏，迎来曙光。

中共一大结束后，毛泽东和萧子昇结伴从嘉兴乘火车去西湖游览，第三天返回上海。

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毛泽东和罗章龙等人一起参加了这个会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毛泽东参加会议后，已经开始考虑回湖南后如何组织工人运动。

建党初期，毛泽东创立文化书社是党组织秘密活动的联络机关，毛泽东想在回湖南之后“扩充文化书社于各县”，所以在离开上海之前，匆匆去泰东书局拜访赵南公，而后，毛泽东去南京，看望周世钊以及在东南大学暑假补习的陶毅、吴钊等六人，他打算在南京设一个长沙文化书社分社，请这些人担负一个分社的责任，并表示回长沙后，可以将出售的书和必需的经费设法寄来。

谈完这些话后，毛泽东便匆匆往下关赶上水轮回长沙去了。

毛家人积极入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但中国共产党的路该怎么走并没有现成的方法。

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是要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也让毛泽东意识到发动工人运动的重要性。

1921年8月中旬，毛泽东回到湖南，与何叔衡、易礼容讨论在湖南成立共产党支部的问题。他们的活动地点依旧是文化书社和毛泽东在清水塘的住所。他们在第一师范的支持下办的夜校，遭到了一些反对派的质疑，这让毛泽东觉得有必要把自己一直想办的自修大学办起来，方便教育和组织更多的工人。

船山学社位于湖南长沙中山东路北侧，是一座单层三进四合院，始建于清光绪初年，为曾国藩祠。1914年浏阳人刘蔚庐联合进步人士设立船山学社，以研究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船山的学术思想。1921年8月，在船山学社董事会总经理仇鳌和社长贺民范的支持下，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资金，毛泽东和何叔衡联手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

毛泽东亲自撰写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发表在长沙《大公报》上，又写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强调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主张“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辅之以教师指导；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淘汰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这个主张显露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意图。

毛泽东此时已经辞掉了一师附小主事的工作，全力展开党的活动。

他已经是个职业革命家。



★



★★

★ 湖南自修大学旧址，位于长沙市中
山东路船山学社内

★★ 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旧址

湖南自修大学9月开学，入学者开始只有一人，即后来非常著名的共产党员夏明翰。夏明翰出身豪绅家庭，毛泽东曾戏称夏明翰“比《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强多了”。后来学员渐渐多起来，达到两百多人。

那个年代，有觉悟到自修大学学习历史、地理、哲学的工人绝非等闲之辈，党组织在这些工人中发现了不少进步青年，他们中有的人后来发展成为共产党员。

湖南自修大学下面还设立了一个补习学校，它相当于是湘区党组织办的党校，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等早期党员都是补习学校第一期学员，毛泽民也参加了第一期补习。

毛泽民在毛泽东的培养下，有了很高的政治觉悟，他在财务方面的天分，也使得他可以为自修大学的管理贡献力量。

1921年冬天，毛家整体搬迁长沙不到一年，每个人都在迅速成长着，毛泽民上自修大学，自我学习，也上补习班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

杨开慧从岳云中学来自修大学学习。

毛泽覃成长更快，他在一师附小毕业，已经是长沙私立协均中学的学生，并且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毛泽建先后在建本女子职业学校和崇实女子职业学校读书。她学习刻苦，成绩优异，还会一手好刺绣，和毛泽覃一样，她也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毛家人一个也没掉队。

1921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在长沙建立，毛泽东任支部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机关设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毛泽东和杨开慧就住在这里。这是一处二进三开间砖木结构民居，离火车站、船山学社和文化书社都不算远，而且周围又有农舍、瓜棚做掩护，比较隐蔽。

毛泽覃和毛泽建入自修大学补习班学习时，就住在清水塘，毛泽东和杨开慧非常关心他们。当时同住的还有张琼和另一位女学生，四个年轻人很快打成一片，共同上下学，一起讨论问题。

年轻人毕竟好奇心强，且行事不够稳重。有一回，杨开慧在客堂的大镜子前照来照去，毛泽覃和张琼觉得事有蹊跷。他们问杨开慧：“开慧姐，你为什么一天要照几次镜子？”

杨开慧没做正面回答，一笑了之。



★ 1921年春，毛泽建由毛泽东介绍到长沙崇实女子职业学校读书，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图为毛泽建（左四）与毛泽覃（前排右一）等人的合影

几个孩子的好奇心更重了。毛泽建发现杨开慧给大门的门环包上了布条，开门关门都变得没声响。几个人又发现杨开慧枕头底下有个箱子，每天晚上，她都枕着箱子睡觉，白天出门则把它藏在床底下。每次出门之前，她总是要从里面取点什么带出去。几个人按捺不住好奇，私自打开了箱子，结果却大失所望，箱子里没什么宝贝，只有一卷写了字的和油印的纸。

杨开慧回家后，发现小木箱不在原来的地方，她看出几个孩子的神色慌张，便问他们谁动了木箱。毛泽覃交出小木箱，几个孩子笑了，可杨开慧却一脸严肃。

杨开慧问他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几个孩子答：大哥大嫂的家啊。

杨开慧说，我的家？这是省委机关，你们都是革命青年，怎么能毫无组织纪律，这些纸张都是秘密文件，比生命还要宝贵。

孩子们吓坏了。

杨开慧原谅了他们，并对他们进行教育。照镜子，是用来监察敌情，看有没有人盯梢，这是做地下工作的基本技能。几个孩子恍然大悟，他们又上了一堂革命课。这件事也从侧面说明，在中共湘区支部成立的日子里，做地下工作，有相当大的危险，毛家人全家投身革命，把自己的家作为省委机关，需要相当的勇气和智慧。



★ 长沙清水塘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

共产党湖南支部成立，吸纳党员成为一大要务。

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向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发出通告，要求每区在年内至迟于1922年7月前，都能发展党员至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并全力组织工会运动。

毛泽东领导的湖南支部吸收党员是递进式的。湖南自修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岳云中学、甲种工业学校里一部分人经过教育，达到了入党要求的，可以经人介绍入党。接下来，支部则在长沙第一纱厂、电灯公司、长沙粤汉铁路工人以及泥木、缝纫、印刷等行业工人中发展党员。

毛泽东为发展党员，四处奔波。1921年10月中旬，他在夏明翰的陪同下，溯湘江而上，到衡阳，在湖南第三师范学校研究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问题，后来吸收了心社——一个进步团体的负责人蒋先云、黄静源和教员蒋孝青等加



入中国共产党。

毛泽民作为毛泽东最信赖的亲人，经过一年的学习，在党员队伍需要扩大的时刻，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党组织。

入党介绍人：陈子博；

入党时间：1921年；

入党地点：湖南长沙；

入党证明人：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邓发。

1922年初，毛泽民服从党的安排，开始在湖南自修大学做会计庶务，同时管理湖南省学联庶务。他依旧做自己的“老本行”，管财务，抓管理。湘区领导人四处奔忙发动工人运动，毛泽民则是稳住后方的定心丸。

· 第三章 ·

潮涌：湖南工农运动

安源的斗争

从上海回来之后，推动劳工运动，成为毛泽东革命工作的重中之重。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已经让俄国翻天覆地，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想要复制苏联的成功。

但这并不是一条坦途。

1921年10月，毛泽东在一师马克思主义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过关于剩余价值的演讲。这位年轻的工运领袖，已经掌握了资本家和工业无产阶级之间关系的奥秘，那就是剥削。

工人罢工是为了反抗剥削，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劳动时间，更重要的，是培养阶级自觉，以全阶级的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工人与资本家对立，农民与地主对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强烈的阶级性，引发了强烈的战斗性。

毛泽东提议湖南劳工会改组。他在《劳工周刊》上发表文章，寄予对劳工会的同情，他还邀请湖南工人领袖黄爱、庞人铨到长沙清水塘他的家中谈话。

谈完后毛泽东很兴奋，他对易礼容说：“谈得很好！他们的见解看法同我们是一样的，愿意同我们一起干。”

革命充满坎坷。1922年刚开始，黄爱和庞人铨就因为领导湖南第一纱厂罢工，遭到军阀赵恒惕杀害。黄爱和庞人铨的惨剧让毛泽东意识到发动工人运动在大城市难度比较大，那里军警聚集，很容易遭到镇压，他必须寻找一个相对安全、相对有保障的“试点”，点燃星星之火，以期燎原。

安源，江西省西部萍乡下面的一个镇。它毗邻湖南，是个偏僻的山区。但

因为矿藏，这里早有德国、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安源煤矿隶属汉冶萍公司，是晚清官僚资本家盛宣怀做的一个企业。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帝国主义三重压迫，使得这里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缩影。

一万两千名矿工，每天在恶劣的环境下劳动十五个小时，小小一块地方，周围就有二十四座基督教堂，工人们的伤病只依靠一个小小的医疗站。死一个人，给十六块安葬费就可以打发。工人们的居住条件也差，丈余宽、两丈深的房子里，竟可以住五十多人。工人的洗澡池类似泥沟。

这是一个麻木的地方，五四运动的天光没有照到这里。

这里是一个封闭的王国，自成体系，每日机械地运转，工人们是资本家巨大采矿机器上的一个个零件。

这里矛盾重重。

工人和矿山当权者之间，矿山当权者之间，上层职员和下层职员之间，地方势力贾、王、文三大势力之间，萍乡镇守使和矿上，盘根错节，危机一触即发。

多重矛盾和深重压迫，再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安源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工人运动的策源地，也就不难理解了。

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中，青年毛泽东在画中占据了中心位置。身后云层翻涌，群山低矮，毛泽东身穿长衫，手拿红色油纸伞，意气风发。

对这幅画，毛主席给出的评价是：“神气还像我。只是这衣服太好了，我那时没有这么好的大衫，都是旧的，没有这个好。鞋子嘛，也没有这样好，那时常常走路，有时一走几天，鞋破了，就光脚走。有时碰到朋友，朋友出钱给买双草鞋，穿破了，又光脚走。伞也对，时常下雨，出门总带把伞。”

从1921年到上井冈山之前，毛泽东先后去安源不下六次，亲自指导了安源工人运动。1921年深秋，毛泽东第一次去安源，走很远的路，鞋破了，就光着脚走。他利用同乡关系，住进安源八方井44号一座极为普通的民居。民居主人叫毛紫云，是一位工段长，人称毛八爷。

第二天，毛八爷带毛泽东去矿上，通往煤矿的总平巷巷口，矿警拿着枪，毛紫云怕毛泽东有危险，专门找了一位下矿的工友，带着毛泽东一起进去。

毛泽东把姿态放得很低。从童年起，他就与穷苦人天生有亲近感。他钻进工棚，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他连忙和工人们促膝谈心。他在工人的引导下下矿井，早上8点进去，下午2点才出来。他顾不上洗理，又去洗煤台、修理处、翻砂房、

水泵房考察。他要切实了解这里的工作环境，他深知他们的疾苦，他愿意与工人们做朋友。

他觉得这是一片工运的处女地，工人们长期以来被压抑的革命情绪，需要党去引导、去点燃。他给工人们打比方：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就折不断了。他号召工人们起来斗争。

第一次考察后，毛泽东心里有了底，回到长沙，他以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给安源的工友寄去了宣传品，还写了信。

很快，1921年12月中旬，安源路矿一部分有觉悟的工人致信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源帮助并指导一切。书记部当即派毛泽东、李立三、宋友生、张理全四人到安源。随后，派李立三在安源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隔年2月成立产业工人党支部。这是湘区最早建立的产业工人党支部。

李立三后来回忆：“毛泽东同志派我到安源做工人运动的时候，他对如何在工人中进行工作，如何把工人逐渐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已经胸有成竹，现在还模糊记得他当时告诉我们的话：‘安源工人众多，受到种种残酷剥削，生活特别痛苦，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的地方。但应该看到，开展革命工作并不是很容易的。首先应当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争取公开活动，以便和工人群众接近，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逐渐地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建立党支部，作为团结广大群众的核心。’因此，他要求我们以办平民教育的名义，由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介绍到安源去。”

的确，毛泽东发动工人运动是有步骤的，他尊重事物发展的规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运用。1922年5月，毛泽东和杨开慧、李立三去安源，检查工作，发展组织。在安源，他看到贴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资产者的标语，便向工人们提出：“你们打倒军阀，打倒资本家，打是要打倒，不过要有步骤，要一步一步来，把基础搞好。”这时候工运刚开展，基础不牢，如果过于冒进，很可能会被反动势力扑杀。毛泽东告诫党员要注意防止暴露党组织。

短短几个月，工人运动迅速发展。路矿当局也开始想办法对付工人。1922年9月，路矿当局勾结地方政府，下令封闭工人俱乐部，激起工人激愤，工人又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提出罢工问题。毛泽东再次来到安源，山雨欲来，罢工一触即发。

毛泽东与蒋先云、朱少连研究情况，蒋和朱当时是安源中共支部的负责人，他们一致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毛泽东更有斗争经验，在驱张运动中，他已经明白取得舆论支持和各方面同情的重要性，他告诉蒋和朱要做好各种准备，迅速组织起工人，争取各方同情，准备破釜沉舟，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

安排好工作之后，毛泽东从安源回到长沙。9月9日，李立三到安源。9月11日，刘少奇到安源。他们是接受毛泽东指挥的领导安源工运的先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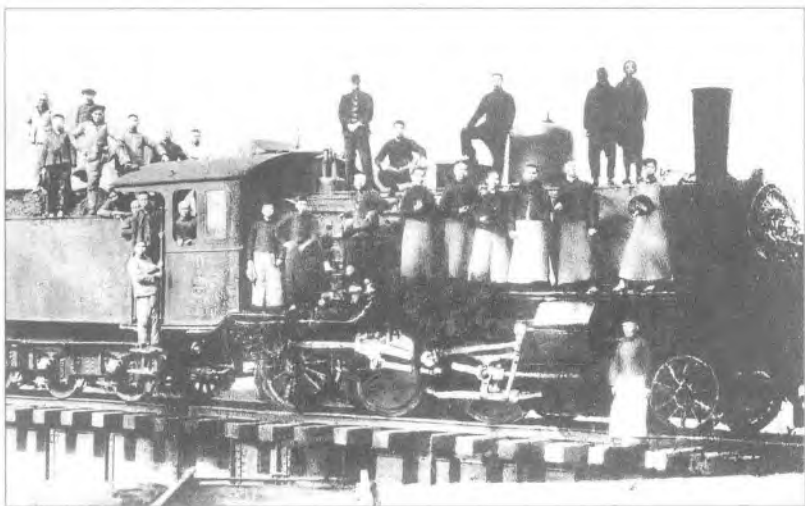
1922年9月14日凌晨，安源路矿原本应该静悄悄的，可这一晚，火把却照亮了安源的夜空，一万七千名路矿工人举行总罢工，发表罢工宣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打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提出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工会等十七项条件，要求与路矿两局谈判。

四天后，工人俱乐部代表、路矿两局代表会同地方商会和绅士调停人，对工人提出的条件进行磋商，同意工人提出的条件，三方签订协议。当天，路矿工人游行，庆祝罢工胜利。安源工人俱乐部会员由七百人迅速发展在一万七千多人。

安源的斗争的胜利是标本性的，开创性的，颠覆性的。

它一下吸引了全国的目光，也给予其他地方想要斗争却不敢斗争的工人勇气。毛泽东抓住机会，迅速播撒革命的火种，他在湖南各地、各个行业建立工会。他的工作非常繁忙，短短几个月，他发动一次又一次罢工。铅印活版工会、缝纫工会、泥木工会、笔业工会、理发工会……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在得知安源

★ 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为反对剥削和压迫而罢工。图为领导罢工的工人俱乐部筹委会成员合影



的胜利之后，甚至派出代表刘东轩到安源工人俱乐部见负责人，要求派人到水口山领导成立工人俱乐部。

那些过去发不出声音的工人们，在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的鼓励下，勇敢地说出了自己的诉求。当然，这些“宣言”有些是经过毛泽东看过才发表的，因此颇具毛泽东革命语言的通俗与有力。

比如泥木工人的罢工宣言：“我们苦力工人，一天的工作，硬是把一天的阳寿和精力来换几个钱去养家赡眷，并非坐食冤枉。”“试看他们商家，不几天又把价码一涨，为什么又没有人反对呢？独于我们工人凭整天‘汗’‘力’得来的几个工钱，还要惨受这样摧残！”“我们别的权利虽是享不着，而我们营业和工作的自由是应当享有的。”“现在我们采取的唯一方法，就是冒得三角四分（甲工）和二角六分（乙工）钱一天的工价，我们全体同盟，决定不做。”如此决心，泥木工人的斗争最终获得了完全的胜利。

毛泽东领导的工人运动令赵恒锡政府头痛不已，他下令查禁共产党的印刷品，可早期共产党的许多工作都在地下运行，只要不暴露，就无从下手。

湖南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风生水起，毛泽东在湖南的能量与日俱增，这是他从北京回来之后掀起的一个小高潮。在湖南，他已经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一年年底，毛泽东曾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份，与长沙知县、警察厅长、政务厅厅长，乃至省省长赵恒锡都见过面，当面交涉十个问题。这些问题居然最终都得到解决。

长沙泥木工人罢工胜利之时，毛家还有另外一件喜事。毛泽东和杨开慧迎来了他们的长子，毛岸英在清水塘出生了。

工人消费合作社

铁路工人在产业工人中是比较先进的。

与许多矿山一样，铁路也多半受外国资本把持，工人惨遭剥削和压迫，反抗情绪强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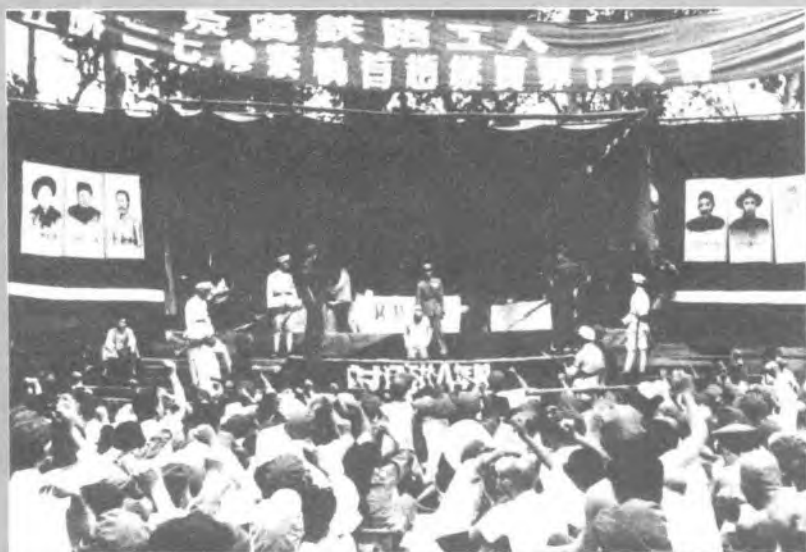
五四时期，北方的长辛店铁路工人就组建了“救国十人团”。北方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长辛店工人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也经常去讲课。1921年2月，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会成立，它被《共产党》杂志赞为“不愧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1922年6月，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很快取得了胜利。它和安源一起，成为中国工运的地标。

安源运动成功之后，毛泽东受上级指示，开始在铁路开展工会工作。很快，毛泽东就主持成立了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长沙新河车站举行。但是，和工人相对集中的安源相比，铁路工人过于分散，与绵长的铁路线比，他们的人数还是太少。

长辛店铁路工人约有三千五百人。汉口、郑州、长辛店铁路工人想要联合起来斗争。他们在郑州组建总工会，但立刻遭到军警冲击。

京汉铁路工人立刻举行总同盟罢工，军阀吴佩孚调兵全力镇压。汉口江岸、郑州、长辛店，处处都有血腥事件，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尽管毛泽东领导的粤汉铁路工会立刻进行罢工声援，但到了1923年年初，尤其是“二七惨案”之后，工人运动的确走入了低潮。

工运领导人不得不正视军阀政府的武装。毛泽东审时度势，他给安源工人



★ 京漢鐵路工人控訴“二七慘案”禍首趙繼賢罪行大會

★★ 1923年2月7日，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正式成立。圖為合作社正式開業的情景



★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旧址

运动的指导意见是：要以“弯弓待发”的姿态等待，看形势发展再决定是否罢工。当时，安源只举行了游行示威，在斗争条件方面也只提出不高的经济要求，很快被矿局所接受。安源的工人运动在全国工运低潮时没有受到损失，反而有所发展。

在安源罢工胜利之后，如何领导工人开展经济斗争，如何保护和争取工人的经济利益，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因为对于很多工人来说，获得更好的生活待遇、经济上更加宽裕也是他们罢工的目标之一。1922年5月，在安源路矿成立工人俱乐部之后，安源党支部曾经尝试过办消费合作社，但参加的工人不多，规模较小，没有单独的门面，只能在补习学校里开设，类似于小卖部。毛泽东慧眼如炬，他知道，“经济问题不解决，则社会上的一切问题俱不能解决”。

经济斗争，必须有懂行的人才能推动。毛泽民自然是不二人选。从一师附小到自修大学再到学联，毛泽民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

毛泽东派易礼容和毛泽民去安源，在经济战线上开拓新路。



★ 在毛泽民的努力下，消费合作社越办越好，改善了工人及其家属们的生活，受到广大工人的欢迎和支持。图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代表与驻部人员合影，二排左八为毛泽民，二排左六为刘少奇

1923年2月7日，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正式成立（同日，吴佩孚制造“二七惨案”）。地点在安源镇老街十字街口，社址是一幢红色二层小楼，四百多平方米。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股份制经济实体。

工人消费合作社成立，易礼容做总经理。他做了一个月就被派去水口山，毛泽民代理总经理之职。没多久，工人俱乐部换届，经最高代表会任命，毛泽民成为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

俱乐部拨款一万，做活动经费。毛泽民又在俱乐部会员中招股，很快有工人认购，募集到七千八百元股金。加上俱乐部经费，一共一万八千块左右。毛泽民又自行设计股票作为凭证，发给每个认股的俱乐部会员。

这显然又是毛泽民从父亲那里学来的方法。发行股票，可以统一管理资金，统一运作。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股票是彩色石印，正面印着总经理毛泽民的名字，而持股者的名字、股金额度、认股日期，则是用毛笔手写的。招股简章则写在股票背面。

毛泽民这个从韶山冲走出来的农家青年，第一次以金融运作的方式打理党的事业，这在中国的金融历史上也值得记录一笔。

新成立的消费合作社和安源街上的银铺形成了激烈竞争。

原本，矿工每个月在矿上领到的工钱叫“矿票”。这是一种代金券。凭借矿票，工人们去资本家开的银铺或商铺兑换东西，资本家只要稍加操控，就可以以不公平的价码与工人交易，层层盘剥，赚取暴利。

矿票的兑换成为难题。

毛泽民轻松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在消费合作社下设立兑换股，只要工人参加了合作社，就可以持矿票在兑换股兑换现金。一元矿票可以兑换一元现金。兑换股成立仅半个月，矿工们便都来兑换股兑换现钱，资本家操控的银铺收不到矿票，很快就被挤垮。

消费合作社主要经营油、盐、米、茶和一些日用品、小百货。同在一师附小管理食堂一样，毛泽民经营消费合作社，依旧在采购上下功夫，进货源头节省资金，才能给工人们更多实惠。他派人去长沙、汉口采购生活用品，再托株萍铁路的工人顺车带回。这样可以比当地市场价低三成。毛泽民广开进货渠道，浙江、广东的盐，附近山野的豌豆、蚕豆，各类杂粮都在他的收纳范围之内，消费合作社的货品充实多了。

尽管毛泽民是总经理，但他没有架子，他是从乡村走出来的，跟工人们聊得来，他把工人们当做朋友。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只是买卖的关系，而更趋近于服务与被服务。把工人们服务好了，就是为党做工作。

身为总经理的毛泽民常常亲自站柜台。一次，一个叫袁品高的工人想买袜子和胶鞋，但他走进消费合作社时，脚上都是泥浆。毛泽民立即给他端了一盆水，让他洗脚。洗完之后，毛泽民又亲自给他穿上袜子和胶鞋。

毛泽民还曾挑着担子，把新来的紧俏货品，送去给住在边远山坳的工人。

毛泽民做的是口碑。有一些工人家属会拿自家产的土特产去街市销售，毛泽民发现之后，立即指示，工人家属的土特产可以到合作社换取生活用品，以物易物，合作社再将土特产卖到萍乡和其他城市去，这样两边都不打空，皆大欢喜。慢慢地，俱乐部和消费合作社的名头深入人心了，当时安源流传着《劳农歌》《工农联盟歌》等歌曲，整个安源俨然成为红色的摇篮。

尽管只有微利，消费合作社还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壮大着。当年的消费合作社的一份月报是最好的佐证：

销售出大米 500 石，食盐万斤，食油 4000 斤，煤油 2000 斤，布匹约值 3000 元，日用品值千余元，兑换银元 2 万元，售货总额约 1.3 万元。

对于总人口只有 8 万的安源来说，这样的销售数字，已经十分可观。合作社的成功引发了资本家和包工头的嫉恨，他们操纵的商店没了生意。

他们想到个坏主意——买空。他们低价从工人消费合作社买进商品，转手以高价卖出，赚差价。

这对消费合作社损失不大，但工人们却再次遭殃。

毛泽民有着经济学家的智慧，他立刻宣布，购物需要凭证，没有消费合作社专制的木牌，不准购物。为了防止竞争对手借牌大量购物，毛泽民还规定，每人每天只能兑换一次，每次只能兑换一元，每月不得超过十次。资本家和包工头顿时没了办法。消费合作社越做越大。

后来李立三提议，矿工下井，衣服损耗大，毛泽民就安排购置了缝纫机，开办缝纫实习工厂服装店，解决工人人们的穿衣问题。矿工服还可以定做。

毛泽民提倡工人储蓄，发展到后来，工人消费合作社开始发行铜元票和纸币，在安源路矿小范围内流通。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是开创性的，是党领导金融事业的先声。安源的消费合作社渐渐屯储了比较雄厚的资金，这对日后毛

泽东在湘赣边界起义大有帮助。

罗章龙曾回忆：“1923年党的三大以后，我担任中央局秘书兼会计，经管全党活动经费。当时，除共产国际定期拨给一部分经费外，党的活动经费的主要储备点，在北方是全国铁总，在南方是安源。安源在取得罢工胜利后，积累了比较雄厚的工会基金，除自己举办了颇具规模的工人消费合作社和工人教育事业外，常给各地提供经费援助。”

经营合作社的同时毛泽民也不忘宣传党的宗旨。他指示合作社，代售《向导》周刊、《新青年》《先锋》《工人周刊》《京汉工人流血记》这些革命书刊，并在合作社门口打出广告：“处在军阀和外力压迫下的中国人民，谁能引导他们向解放的路上走呢？只有马克思派陈独秀们所办的《向导》周刊！”马克思当然无法直接指派陈独秀，但这样一说好理解，宣传效果更好。

毛泽民在安源扮演着这个小区域财政总长的角色，安源的经济实践，也为他日后在更大的区域内发挥才能打下基础，更重要的，他是在毛泽东的委派下来到安源的，他始终都是哥哥的左膀右臂。

消费合作社培养出了不少干部。毛泽民后来成为中央苏区国家银行的行长。消费合作社营业主任林育英，逐渐成长为中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营业员毛福轩，日后成为中共韶山党支部支部书记。

水口山一记响锣

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风生水起的时候，毛泽覃迅速成长着。

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学习刻苦，在湖南自修大学，他承担了一些哥哥毛泽东交代的工作。和毛泽民不同，毛泽覃几乎是在毛泽东的监管下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对他照顾有加，着力培养。毛泽覃从小顽皮，长大后更有一股冲劲，天不怕地不怕。毛泽东明白，二弟毛泽民办事沉稳、细致，适合做后方的一些工作，而三弟毛泽覃则适合到工人运动的风口浪尖去闯一闯。

毛泽东不愿意把弟弟放置在安全区刻意保护。他有意锻炼锻炼毛泽覃。

毛泽东知道，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想要成长，就必须到斗争的前线去。他对十七岁的毛泽覃寄予厚望。安源工人大罢工胜利后，各地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去安源寻求经验，想要建立工人俱乐部。俱乐部需要党的领导——毛泽东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便派毛泽覃去水口山协助蒋先云从事工人运动。

这是毛泽覃第一次“外出”革命。他从长沙乘坐小火轮赴衡阳，毛泽东和杨开慧到码头送行。毛泽东说了很多鼓励的话。他叮嘱毛泽覃务必严格要求自己，与工人们打成一片。毛泽东和杨开慧有些伤感，但同时满怀期许和骄傲，他们带出韶山冲的弟弟，如今也能“冲锋陷阵”了。安源斗争的宝贵经验，需要毛泽覃这种年轻人去实践，去发扬光大。

水口山当时是中国最重要的铅锌产地。水口山矿是湖南境内最大的省立官办工业企业，有三千多工人。在水口山，毛泽覃担任工人俱乐部教育股委员兼

★ 1923年春，毛泽覃任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工人俱乐部教育股委员和工人夜校教员。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图为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夜校旧址



工人学校教员，尽管只有十七岁，但他却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熏陶出来的“老革命”了。他用教学做掩护，宣传马克思主义。

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和有政治觉悟的共青团员，毛泽覃弯得下腰，他常到砂棚、机器间、矿井劳动，星期天，他还同工人们一起去采矿砂。他谨记大哥毛泽东的教诲——搞工人运动，首先是要和工人们做朋友，深入理解他们的痛苦和需要。毛泽覃年轻，有朝气，很快就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工人们肯跟他说实话、说真话。毛泽覃则用浅白的语言，激发工人們的斗争积极性。

他说：“挖煤的工人没有煤烧，织布的工人没有衣穿，做田的农民没有谷吃，不是我们生来就穷，是这个社会太不公平！”工人们问怎么办，毛泽覃说，造反！毛泽覃的话朴素而有道理。不过毛泽覃发动工人之前，还是要听听大哥毛泽东的意见。他把水口山的情况向湘区区委汇报，并问大哥，水口山工人要造反行不行？毛泽东告诉他，工人造反，天经地义。

一声将令震山川。

1922年12月5日，水口山矿工人大罢工爆发。三千多工人就地抗议，强烈

声讨当局残酷剥削。工人纠察队开始巡逻，工头们都怕了，纷纷躲起来。

安源罢工的辉煌景象在水口山重现了。

全省震动！全国也陆续得到了消息。湖南省长赵恒锡立刻派原水口矿务局长赵铭鼎、新任矿务局长刘世涛和两名专员赶到现场处理此事，又调湖南陆军第三混成旅炮兵连开赴水口，妄图武力镇压。

毛泽覃接到上级指示，一面率领大家稳住军队，向士兵宣传革命思想，让他们保持中立，一面向全国各地发请求援助的电邮和传单，制造舆论上的同情。湘区省委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力支持，声援的电报不断地朝水口山飞。

工人们沸腾了。

资本家们企图“暗杀”，两次想要“解决”罢工领导人蒋先云，但均告失败。工人们得知后，矿务局办公楼被团团围住。当局又开始下“请帖”，请工人代表蒋先云去谈判。

这是一场鸿门宴。去还是不去，工人们犹豫不决。去，有危险，不去，罢工的目的达不到。

毛泽覃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主张去，谈判是应该的，而且也没必要害怕，三千工人做后盾，没人敢怎么样。他提出自己可以暗中监视，如果资本家敢轻举妄动，对工人代表不利，他就立刻敲响铜锣。

铜锣声就是暗号。工人们听到铜锣声，就往里冲，保护工人代表。

工人们都说这个办法好。

按照约定时间，蒋先云来到了谈判地点，可双方刚说没几句，资本家就露出粗暴的语气，要求工人立刻复工，蒋先云严词拒绝，资本家招招手，打手们上来了。躲在暗处的毛泽覃见状，立刻敲响铜锣，工人们听到，举着各式土制武器，一拥而入！资本家目瞪口呆，乖乖签字，罢工胜利。

毛泽覃用一记响锣，敲响了自己首战胜利的凯歌。

水口山大罢工锻炼了毛泽覃，他身上的两个特质，一个“灵”，一个“勇”，也日渐鲜明。

他是天生的将才。如此说来，他日后能够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红军将领，也就不足为怪了。

农民问题：中国革命的关键点

1923年4月，赵恒锡下令通缉毛泽东。

毛泽东离开长沙，到上海中共中央工作。6月，他离开上海，去广州参加中共三大预备会议。

工人运动走向低潮后，毛泽东脑海中已经有了新的斗争版图，就在遭受通缉准备离开湖南时，他派出水口山工人刘东轩和谢怀德回家乡衡山岳北白果乡开展农民运动。

刘东轩和谢怀德都是共产党员。他们调查了几个月，发动农民，9月便成立了湖南衡山岳北农工会。这是湖南第一个农会，很快，它的会员就达到了万人。他们开展平粜和阻禁地主谷米棉花出口的斗争，并酝酿减租减息。

白果乡是赵恒锡的老家，这次斗争更像是毛泽东对通缉他的湖南省长的一次示威。赵恒锡派兵镇压了农会，但继工人运动之后，农民运动的山雨也不远了。

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召开。张国焘的“左”倾观点受到多数代表的批评。陈独秀和马林主张一切归国民党的观点，多数代表也不同意。最终出了个折中方案，决定共产党开始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

毛泽东做了发言，他的观点是独特而有预见性的，他“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会议讨论的其他问题都是在会前再三提到过的，只有毛泽东关注的农民问题是首次提出，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直到三大才开始注重农民问题。

以湖南为例。湖南的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漫山遍

野都是农民，在中国发动革命，农民是最重要的力量。毛泽东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

连素来与毛泽东有矛盾的张国焘，后来都感慨，对于农民问题的发现性预见，“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毛泽东自己则说过，“我所爱、所交的朋友是穿草鞋的没有钱的穷人”。

毛泽东赞成与孙中山合作，可能在他看来，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抵御外侮，是当时中国的“当务之急”。在《向导》周刊上，时而可以看到毛泽东大声疾呼反帝的文章。在《英国人与梁如浩》中，他揭露北京政府督办梁如浩丧权辱国同英国人签订“续租”“永租”威海卫草约行径；《纸烟税》则就北京政府屈从英、美两国压力电令取消浙江等省的纸烟税一事发表看法，“洋大人打一个屁股都是好的‘香气’”。

毛泽东的檄文刚劲有力。他依旧重视农民问题，只是在中共三大之后，他没有精力和时间去调查、去研究，他必须把自己投入到国共合作的各种事务当中去。中共三大之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从广州搬到上海，理由是：“这不仅因为上海是工业最发展的中心区，而且也便于对全国工作进行指导和传达。”显然，共产党此时的工作重心还在工人运动上，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提议，仅仅露出了尖角，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毛泽东接受委托，从广州回到长沙，筹建湖南的国民党组织。同年11月，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第二个儿子毛岸青在板仓出生了。但毛泽东并没有多少时间陪在杨开慧和儿子们身边，1923年年底，他就必须离开长沙去上海，然后准备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诗情充沛，他写了一首《贺新郎·别友》给杨开慧，“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这对伉俪又要分别了。不过不久之后，他们将会在上海重逢，那个时候，毛泽东已经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担任要职。

国民党一大召开前，毛泽东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筹备员。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会议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毛泽东成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章程审查委员。此后，毛泽东在国民党

★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开始。图为国民党一大结束后孙中山与李达步行出会场



不同部门任过职。在上海，他做过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文书科秘书；后来在广州，他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持宣传部的机关报《政治周报》，做过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做农委会委员期间，毛泽东尽其所能为农民运动做过不少事。1926年国民党二大，毛泽东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提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惟有首先解放农民。”他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毛泽东接任前，从1924年开始，农民运动讲习所已经办了五期，主办人是广东农民运动领袖彭湃。毛泽东从第六期开始办，他投入了全部精力，他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见解有了讲授的舞台。这一届“农讲所”有三百多个学生，来自二十个省区，全部经过毛泽东等人的复试，合格后才得以录入。萧楚女为教务主任，高语罕为政治训练主任。1926年5月15日开课，课程注重理论，也注重实际研究，毛泽东主持拟定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三十六个项目引导学生做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农讲所还重视军事训练，军训时间占到三分之一。

在党内党外经历了一系列打击和阻碍后，毛泽东在农讲所重新找回了革命



★



★★

★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课堂

的激情。

有一次，农讲所举办纪念“五卅”大会，毛泽东率学生到东校场参加广州各界的游行示威，游行时大雨滂沱，群众精神振奋，高呼口号，唱革命歌曲。回所后，毛泽东又冒雨演说十分钟。不久，农讲所全体学生参加“沙基惨案”一周年纪念大会，游行时，又是狂风大作，大雨滂沱，毛泽东依旧走在最前面，高呼口号。雨中的毛泽东是如此昂扬，北伐的狂风暴雨即将到来。

6月，毛泽东开始为学生讲课，共授课二十三个小时。毛泽东认真备课，其讲稿是这一阶段他对农民问题看法的汇总，有学术深度，也有现实意义。他总结中国农民斗争，尤其是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指出在此之前，中国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正在于“完全未得三万万二千万农民来帮助和拥护”。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对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毛泽东已经有了体系化的认识：“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革命党的一个中心问题。谈到农村的教育问题，他提出现在农村的教育，是“封建教育”，就是忠孝主义，它“钳制人民自由数千年之久，使个性发展丝毫没有”，但现在的学校教育是资本主义教育，即“新学”，反映新经济，讲新思想、民族思想等。这种教育受地主阶级的反对，也受农民的反对，因为它不适合农民的切身利益。农民教育应该“适合于农民经济之发展，并使农民得到解放”。

很显然，毛泽东需要更大的舞台，以他此时在组织中的位置，他的这些鲜明独到一针见血的看法没有足够的发挥空间，年轻的共产党还要走过一条曲折的路。

不过，在此之前，毛泽东有一个契机实际主持农民运动。当然，令人意外的是，这个契机却由一场不愉快间接造成，整个1924年，毛泽东的心境从昂扬到低落，反复变化着。

2月中旬，他从广州去上海，开始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执行部由胡汉民、汪精卫、叶楚傖组成常委会，毛泽东做胡汉民的秘书，同时也做文书科秘书。

国民党执行部内部争斗重重。

比如当时组织部有一个决策，凡是国民党老党员都要重新登记谈话，每人必须填一张表，经审查同意后，方是改组后国民党党员，发给党证。



★ 1924年2月，毛泽东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留下了一张难得的合影，其中有汪精卫、戴季陶、胡汉民等国民党大员。左起：第一排：一为邓中夏、六为胡汉民、七为汪精卫、十为向警予。第二排：四为叶楚伦、五为王荷波。第三排：二为毛泽东、四为沈泽民、七为罗章龙、八为恽代英、九为邵力子、十为戴季陶

一天，一个人冲到楼上，胡汉民、汪精卫都起来打招呼，他们三人交谈。毛泽东和罗章龙不认识此人。那人说，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结果大家都认为党员人人都要填，此人一怒而去。毛泽东不得不做善后工作，派人送一张表去，请秘书解释，最后此人填了表。

胡汉民和汪精卫常年在广州活动，不坐班，与毛泽东当面打交道的机会不算多，胡汉民给毛泽东写信，语气都还算客气。但执委不在，组织部的大部分工作都要年轻的共产党员来完成，毛泽东不堪重负。加之另一名常委叶楚伦对毛泽东的工作一直不满，且对共产党员抱有戒心，两人经常发生分歧。

上海第四区国民党党部成立大会，左、右派斗争表面化。右派为了多争取选票，炮制了两个方案：一、请孙中山出面，争取选票；二、争取不成，就破坏。叶楚伦去请孙中山，孙中山没表态，右派便纠集流氓，准备上主席台搞破坏。选举眼看要成为闹剧。毛泽东不许这样的事发生，他请王荷波组织了一个强大的纠察队，把闹事者挡在会场外，流氓无计可施，右派失败了。

1924年7月，毛泽东辞去组织部秘书职务，只领导文书科工作，另推荐中共党员张廷灏继任组织部秘书。

毛泽东和叶楚伦的矛盾日益明朗化。

8月1日，叶楚伦已经开始在大学的会议中专门研究“如何处理共产党分子”，立刻遭到左派激烈反对。第二天，一些国民党右派党员强行闯入执行部，殴打执行部工农部秘书（共产党员邵力子）。

毛泽东领头，恽代英、邓中夏等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伦“主持不力，迹近纵容”，破坏国共合作。

当时蔡和森主办《向导》周刊，他一个人负责，一周一期，繁重的工作致使哮喘病发。蔡和森只能休养，毛泽东接手。办周刊，另外还有国民党执行部的工作要处理，毛泽东更辛苦了，常工作到深夜。但毛泽东和叶楚伦的斗争还没有结束。

11月，孙中山北上和谈，途经上海，毛泽东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处文书科主任的名义领衔，同组织部秘书张廷灏、干事罗章龙、宣传部秘书恽代英等十四人，联名致信孙中山，反映上海执行部的经费自8月起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停滞，要求派员解决。可孙中山当时忙于北上谈判，加之患有肝癌，无暇他顾，致信最后不了了之。

1924年底的毛泽东大觉“内忧外患”，与国民党合作遇到困难；农民问题上，他与陈独秀也有分歧，自己的身体又越来越坏，他有些神经衰弱，失眠了。

杨开慧看不下去，建议他回韶山休息一段时间。实际上，日后毛泽东每次遭遇人生低谷，回到家乡都能获得继续前进的力量。快到春节了，毛泽东也想回家乡看看。12月底，黄浦江边，毛泽东带着杨开慧、毛岸英、毛岸青和杨开慧的母亲向老太太踏上了回湘的轮船。

老朋友蔡和森和向警予来码头送别。蔡和森问毛泽东回去的打算，毛泽东笑笑说，一边养病，一边做农村调查。蔡和森支持毛泽东的看法。

汽笛长鸣，轮船离岸，毛泽东和杨开慧离开了上海，这座远东的大都市似乎与毛泽东这个农民之子始终有一种隔膜。

他要回到土地上去。

谁也料不到，毛泽东这次回归，竟再次与同样回家养病的弟弟毛泽民一起，在韶山刮起了一阵农运旋风。

韶山党支部

1924年秋，在安源路矿消费合作社工作了两年多的毛泽民病倒了。

他是累病的。他得了急性阑尾炎，腹部剧痛难忍，高烧不退，不得不住进长沙湘雅医院。医生为他做手术时，他的阑尾已经化脓穿孔，十分危险，以至于手术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伤口都无法愈合。毛泽民被折磨得苦不堪言。

鉴于这种情况，让他继续工作已经不现实，湖南省委当即决定，让毛泽民离开安源，住在长沙休息一段时间。

1925年初，毛泽东回到长沙，兄弟俩因为生病，意外在长沙重逢，真算是忧中有喜。他们促膝长聊，毛泽民迫不及待地向大哥汇报自己在安源做经济斗争的成果，也说了经济工作对于革命工作的重大影响。

毛泽东也关心弟弟，他告诉毛泽民自己对于农民运动的想法，并阐明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位置。毛泽民理解并支持哥哥。这不仅是出于兄弟感情，从理性出发，他也十分佩服大哥毛泽东的高瞻远瞩。毛泽东说，我想趁过年，做做农民调查。毛泽民说：我跟着大哥干。

1925年1月中旬，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到长沙板仓岳母家过春节。同期，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一年多以前，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毛泽东是中央局五名成员之一，如今四大召开，毛泽东回乡养病无法出席，选举出的新的中央局五人团，已经是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和瞿秋白，毛泽东不再位列其中。但毛泽东并不灰心，他调整好心态，做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情。他相信只要用心调查，好好做工作，农民运动会有曙光。

韶山的冬天又湿又冷，好在春节刚过，山村里到处都有喜气，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两个儿子，连同弟弟毛泽民一起，从长沙回到韶山。随行的，还有一百多斤重的书籍。

冬天农闲，还没出春节，毛泽东和毛泽民便一起到乡亲们家串门，和他们一起打骨牌、玩麻将，扯白，唱山歌，还邀请亲友到韶山南岸家中，谈家常、讲时事。这期间，和毛氏兄弟来往较多的有从安源煤矿回来的共产党员毛福轩，贫苦知识分子毛新枚，汤家湾的小学同学钟志申，李氏族校和庞氏族校的小学教员李耿侯、庞叔侃，还有湘乡唐家氏外祖父家的人。韶山一带的知名人士，比如老学者毛简臣、李漱清，开明士绅庞坦直等，毛家兄弟也去访问过。

通过接触、调查，毛泽东和毛泽民了解到韶山附近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村的阶级状况和各种社会情况。同时，他们也向乡亲们讲述国家的政治形势，农民穷苦的原因和摆脱贫困的办法，启发他们觉悟。

毛泽东和毛泽民启发乡民的方式简单生动，毛泽东的宣传语言很具有引导性，他不强行劝服，而是让农民们自己思考。为了做思想工作，毛泽东和毛泽民常常天不亮就出门，一双单鞋走几十里山路，有时候甚至在半夜，他们还会入山，完全不顾山中有没有猛兽出没。

毛泽东太熟悉这片土地了，他利用一切机会发展组织。婚丧嫁娶是好机会，他和弟弟毛泽民总是去参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调查完回家后，毛泽东总是要处理笔记，他的本子记得满满的，他对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思考，如今有了相对应的第一手的调查材料，这令他兴奋，有时候连夜他也要处理好这些资料。另外，外面寄来的资料也源源不绝送到银田寺，这是毛泽东的朋友寄来的书和报，毛泽东也不忘写信把自己在乡村的发现告诉朋友们。

2月，三弟毛泽覃也回到韶山，跟着哥哥们一起干。

韶山开始出现秘密农协。这是与工会相似的保护农民利益的组织，毛泽东、毛泽民和毛泽覃发动的那些亲戚、熟人、朋友，比如毛福轩、毛新枚、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都成为骨干。

渐渐地，韶山附近的秘密农协越来越多。

农民的反抗意识开始生长、壮大。毛泽东和毛泽民经常召集农协骨干开会，他们举例子，把土豪劣绅如何压迫、剥削农民的问题讲透，然后再告诉农民怎

样和这些土豪劣绅斗争。

赵恒锡当时在湖南提倡平民教育，毛泽东三兄弟抓住这个机会，以合法的形式展开活动。在湘潭，毛泽东三兄弟推动建立了二十多所夜校，发展平民教育，传播革命思想。这些夜校多半是在原有的公立学校、族校和祠堂上办学，教识字、珠算，也讲三民主义、国内外大事。毛泽东特别强调，夜校讲课要通俗明白，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他太了解这一片土地，了解农民的水平了。

杨开慧和李耿侯在教育界很知名，他们发动了不少进步教师，为夜校授课、奔走。毛泽东一家人全然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了。

夜校讲课是一种斗争艺术——团防局不来，教师们会传授革命思想；团防局一来，课堂里立刻开始教授写字和珠算。

没过多久，夜校成员大都成为秘密农协的骨干分子，夜校场所则一般是秘密农协的会址。这是毛泽东在长沙办自修大学得来的经验。

毛福轩，韶山乡韶源村人，自小放牛，稍长做长短工。1922年，经毛泽东介绍，他开始在湖南自修大学做校工。安源工人运动兴起后，毛福轩和毛泽民一起，接受党组派遣，去安源工作。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返乡之前，



★ 1925年春，杨开慧在韶山协助毛泽东创办农民夜校，秘密开展农民运动，并给农民上课。图为韶山毛氏宗祠内的农民夜校课堂

乡教书；钟志申，韶山钟家湾人，曾带领家乡几十个农民反抗地主，斗争失败后离家出走于江浙一带，当过兵；庞叔侃，韶山花园村人，曾由毛泽东介绍去湘江中学读书，后回乡协助毛泽东开展农民运动。

介绍完毕，开始入党宣誓。

这是整个会议最庄严的一刻。

每个人都握紧右拳宣誓：“努力革命，牺牲个人；服从组织，阶级斗争；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中共韶山党支部就此诞生。

毛泽东委派毛福轩为党支部书记。为适应秘密工作的要求，以“庞德甫”作为党支部代号。毛泽东又在银田镇开办一家书店，为韶山党支部秘密联络机关。韶山党支部的这五名党员，后来被称为“韶山五杰”，他们都为党的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钟志申1928年就义前曾这样写：“当我入党之时，就抱定视死如归的意志。我认定，共产党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成功。我牺牲生命，把一切贡献于革命，是为了寻找自由，为了全国人民求得解放。”

不久，毛泽民的妻子王淑兰带着女儿毛远志也回到了韶山，毛泽民去安源时，安排她回湘乡县团田刘家湾娘家暂住。毛泽民为妻子和女儿的回归兴奋不已。他经常左腿坐着毛远志，右腿坐着毛岸英，怀里抱着毛岸青，带着孩子一起玩。

紧张的革命生活因家庭的抚慰有了一抹温暖的亮色。

王淑兰过去一直是一位能干的农村主妇，回到韶山，家里家外的活计，她一个人全包，在此之外，她也要求进步。她和大嫂杨开慧很谈得来。在革命这条路上，杨开慧是老前辈了，王淑兰一有机会就向嫂子请教，两个人一起在韶山做妇女工作，反封建，争取妇女解放。

王淑兰在韶山生活了许多年，各村各庙她都熟悉，做起工作来驾轻就熟，很快就上手。在妯娌俩的发动下，韶山的妇女很快也起来了，她们上夜校，参加秘密农会，韶山妇女界风气为之一大变。

在毛泽东三兄弟的积极引导下，韶山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小山村。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长沙工人、学生声援，韶山革命者响应号召。以秘密农会为核心，他们成立了二十多个乡雪耻会作为公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开展斗争。

雪耻会的成立使得韶山党支部和秘密农会有了合法的公开身份，他们散传单，做演讲，还派出纠察队设卡检查，禁售洋货。各个祠堂成为雪耻会聚会的地点。

有一次，毛泽东在雪耻会上讲话，自动来围观的群众多达三四百人。

毛泽东从上海国民党党部选举的斗争中积累了经验，这对他在湖南开展斗争，大有益处。随着雪耻会的斗争逐渐深入，他们开始打算夺取教育权。

1925年7月30日，西二区公私学校教育会会员大会在郭氏祠堂召开，毛泽东打算在这次会上改组教委会和学委会。教委会管行政，学委会管经济，掌管了这两块，就能够掌控教委会，为革命工作服务。开会前，毛泽东和毛泽民等人已经掌握了材料。会议开始，大家立刻揭露上七都团访局长成胥生的亲信唐默斋、郭伯生等阻挠教师进行爱国宣传、不准办夜校及贪污学款、克扣教师薪水等行为，利用省长颁布的教育法，宣布唐、郭把持教育会、学务未经选举，不合教育法令，必须改组。唐、郭猝不及防，退出会场。

两会当即改组。庞叔侃、李耿侯被选为两会执行委员，十多个公立和私立学校校长也都由进步教师担任。

从秘密斗争到公开斗争，毛泽东巧用政策缝隙，逐渐把斗争公开化。当年，赵恒锡把他赶出了湖南，如今，回归后的毛泽东在湖南这片土地上闹出了更大的动静。

1925年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

8月，韶山大旱，田地龟裂，禾苗长不起来，没有收成。农收时节，地主趁机囤积谷物，抬高谷价。农民要吃饭，可地主的高价米，他们又买不起。毛泽东和毛泽民立刻召集党员和农协骨干商量对策。

他们派钟志坤和庞叔侃去地主成胥生家递条子，要求他平粜。所谓平粜，是指荒年用平价出售积粮。成胥生态度恶劣，他宁愿谷子烂在仓库里，也不拿出来平粜，他甚至连夜偷偷把谷子运到银田镇，准备去湘潭等地出售发一笔财。

韶山党支部书记毛福轩得知后，立刻派钟志申、庞叔侃带领几百个农民，带着锄头、扁担、箩筐，连夜赶到银田，阻止其出境。人多势众，成胥生十分惊恐，只能将谷子平价卖给农民。“平粜阻禁”斗争获得胜利。一时间，韶山十里八乡的农民都起来了，永义亭、瓦子坪、鳌石桥、如意亭等地平粜斗争不断，都获得了胜利。

农民已经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了，这是一场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贫农和军、商、大地主之间的矛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遭遇灾害时更加凸显。

接到成胥生遭毛泽东组织“平粜阻禁”的告密消息之后，湖南省长赵恒锡

坐不住了。他和毛泽东见过面，他曾经把毛泽东驱赶出湖南，在他看来，毛泽东再回湖南闹事，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他怒气冲冲道：“湖南若有毛泽东，就没有我赵恒锡！”他密电湘潭县团防局：“立即逮捕毛泽东，就地正法！”

然而，毛泽东在韶山能量巨大，他广受拥戴，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毛泽东韶山脱险的整个过程充满戏剧性。

郭麓宾，时任湘潭县议员，是位开明绅士。他在县长办公桌上看到了赵恒锡的密电，立刻退出办公室，写信交给侄子郭世奎，叫他连夜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拿到信拆开，上面写着：泽东兄，事急，省里密电拿你，务希在今晚离开韶山。毛泽东并不慌张，他用开水泡了点饭吃，又请弟媳王淑兰给他请轿。

轿子来了，毛泽东先跟轿夫讲好。抬的是谁？抬的郎中。送轿子的人，只一天一夜就回来了，团防局来捉毛泽东的人，隔了好几天才来捉人，自然捉不到。他们问，毛泽东在家吗？家里回答说，不在。团防局的人扑了个空。

毛泽东到长沙见了郭亮。

没多久，他就和毛泽民、萧劲光直奔广东。临行前，湘区书记易礼容在文



★ 20世纪80年代，张文秋（右二）、毛岸青（左二）、邵华（左一）、毛新宇（右一）、李杰在橘子洲头怀念毛泽东

化书社楼上摆了饭为他们饯行。毛泽民和萧劲光北上武汉，经上海，走水路。毛泽东则走陆路南下。

已经是秋天了。临行前，毛泽东来到湘江江心，站在橘子洲头，他的心境已不似上海时期的灰暗，再一次从湖南出走，他十分从容。

在与省长赵恒锡的较量中，毛泽东早已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三十二岁了，他有改造中国的信心。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他如此热爱湖南的山水和人民，毛泽东坚信自己终会回来。

考察湖南农民运动

1925年9月南下广州之后，毛泽东做了很多事。他成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持《政治周报》，但他最看重的还是自己在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所做的一切。

“农讲所”为中国的农民运动培养骨干。

1925年12月，毛泽东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杂志第四期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开门见山地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阶级划分使得革命的目标和主体变得明晰。

毛泽东把当时的中国人分成五大阶级。划分的理由是他们的经济地位以及对革命的态度。地主和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

毛泽东点明：“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些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这篇文章为中国革命队伍的构成指明了方向。1926年，《中国农民》和《中国青年》做了转载，广东汕头出了单行本，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

1926年10月，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已经结束。



★ 毛泽东在广州

北伐开始，捷报频传。10月，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昌，吴佩孚主力被消灭。11月攻克九江，又进南昌，孙传芳主力被消灭。革命突飞猛进，国民政府即将迁都武汉，毛泽东已经没有必要继续留在广州。11月，他去上海，杨开慧则带着两个儿子岸英、岸青和母亲从广州回到湖南。

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这个委员会在汉口设办事处。按照约定，毛泽东应以委员身份常驻中央，但他并不打算留在上海。在十里洋场对广大乡村的革命事业指指点点，毛泽东觉得太隔膜，他宁愿回到土地上去看看。

毛泽东从上海经南昌赴武汉。

在南昌，他见到了林伯渠。林此时是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他们谈了在武昌办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问题。毛泽东的心始终牵系在农民运动上。他为江西的一百五十名学员争取到了一万两千元的经费。

11月底，一到武汉，毛泽东就去与湖北省党部商量，准备举办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如果继续待在武汉，毛泽东很可能成为三省农讲所的领头人，可一次邀请改变了他的计划。

这天，毛泽东收到一封电报：“敝会已于东日（12月1日）开幕，现在讨论各案。



★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留影

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

来电方是：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毛泽东答应了。二次出湘后，他早就想回去看看，他关心湖南的“农运”。

1926年12月22日的《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对毛泽东的出席做了报道，下面这番话也很像是对毛泽东几年来“农运”生涯的一个总结：“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重。去岁回湘养病，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早。后为赵恒锡所知，谋置先生于死地，先生闻讯，问道入粤。在粤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要职，此次革命军势力北展，先生为发展全国农运，奠定革命基础起见，遂于前月离粤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农民代表大会开幕时，曾电请先生回湘，指导一切，现已抵湘。”

毛泽东已经像广东的彭湃一样，成为农民运动的一方王者。

冬天又到了。1925年毛泽东和毛泽民回韶山，也是冬春之交。农闲时节尤其适合做田野调查。

和1925年不同，这一次回湖南，毛泽东已经是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他对农民运动，既有实践经验，也有理论基础，现在他需要的是切实的调查。他希望把湖南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况告诉中国、告诉世界。湖南的成败都将是标本，可以给全国的农运提供经验。

1927年1月4日，毛泽东从长沙启程回农村考察农民运动。

第一站：湘潭县城、银田、韶山。

出乎他意料的是，此时的韶山已经是农民的天下。

当年他和毛泽民、毛福轩等人播下的农运种子已经长成参天大树。

祠堂庙宇不再是宗族偶像栖身的场所，农民协会通常把会址设在里面。农协已经成为组织农民的有效机构，修塘、修坝、禁赌烟、办夜校，都由农协出面。

妇女觉悟也大大提高。银田寺白庙召开第一区农协干部和会员大会，毛泽东当场看到有很多妇女到会，便说：“过去妇女受压迫，封建思想作怪，妇女进不得祠堂，现在打倒了族权，能进祠堂了，今天要请她们坐头席。”

他赞扬农民的革命精神。

“我搞革命是为了无产阶级事业，我所爱、所交的朋友是穿草鞋的没有钱的穷人。我们的革命还才开始，要彻底消灭封建地主劣绅，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还得三四十年。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也不回韶山来了。”

毛福轩、王淑兰这些过去毛泽东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已经成为韶山农运的领导人物。他们为农运付出很多。

毛泽东跟他们谈话，肯定了他们的成绩：“我从银田到韶山来，看到农民都起来了，已经掀起了一个农村大革命。过去雨神庙有很多‘流民’，现在没有了，他们有的参加了农会，有的在劳动，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湘乡县唐家坵，毛泽东的外祖父家，毛泽东小时候在这里生活过七八年，毛泽东去湘乡考察，见了两位舅父、几位表兄和一些老农，共二十余人。团结就是力量，农民运动的潮涌，已经迸发出不可抵挡的威力。毛泽东鼓励他们说：“外国人说我们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不团结。别国群而不散，我国散而不群；别国强，我国弱；别国富，我国贫；别国工业发达，有飞机大炮，我国仍是大刀长矛多。要想国家强盛，人民不受压迫和剥削，就要起来干革命，团结起来，打倒列强，驱除军阀。”

团结，始终是毛泽东发动革命的要点，他的统一战线的提法，也是出于团结，他总是愿意团结更多的人，去实现革命目标。

湘乡饭店，农协驻地，毛泽东召集农协主要负责人，他拿着小本子，边问边记。“农会组织得怎样？有多少区乡农民协会？多少会员？农民武装情况怎样？乡里人对农民协会有什么看法？有没有反对农民协会的？”毛泽东葆有着一百二十分的兴趣，好像在关心自己家里的事一样询问着。

他需要真实的数据。

县农协执委、负责武装工作的邹祖培来了。

毛泽东问他：“禁止赌钱抽鸦片的事怎么样了？农民武装办得好不好？”

邹祖培说，湘乡历来牌赌盛行，鸦片流毒很广，农会一成立首先禁止赌钱打牌，禁止抽鸦片烟。

毛泽东笑道：“好得很！”又说，“农民要组织自己的武装，把团防局接收过来，在全县组织农民自卫队。湘乡可以成立一个审判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

下一站是衡山县。

白果乡，湖南省长赵恒锡的老家，这里的农民运动开展得早，毛泽东赞扬他们敢于在军阀赵恒锡的胞衣盘里闹革命，鼓励他们要以南岳衡山革命烽火去引燃其他几个“岳”。他又去福田铺，去调查商店。他问得很细，营业额、捐税、工资、伙食开支、货路、供销行情变化……他的小本子上记得密密麻麻。

24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对湘潭、湘乡、衡山三个县调查做总结，27日又去醴陵县考察。他们连续开了三个晚上的会，每晚都开到深夜。

李味农，共产党员，时任国民党醴陵县党部宣传部部长。农民积极开展打倒土豪劣绅的运动，李味农同情陈独秀的右倾思想，认为农运过火，与同志们颇不合。毛泽东视察醴陵，委婉地对他说：“味农同志，你是好好先生，却不懂革命理论，被压迫阶级受层层压迫已久，若不将压迫阶级无情压制，被压迫阶级不能得到彻底翻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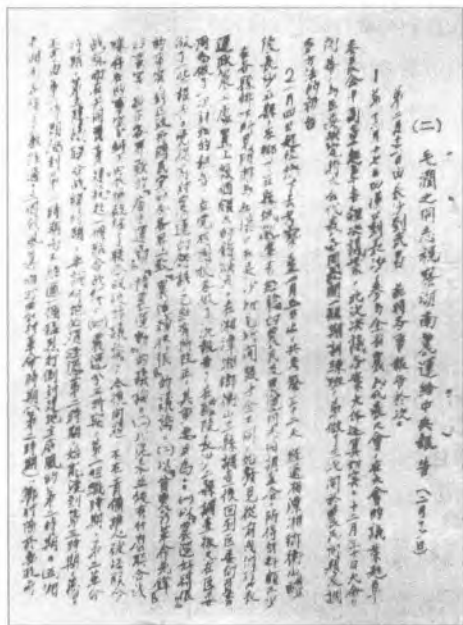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一共考察了三十二天，足迹遍布湖南五县。他回到长沙，把调查的情况向湖南区委报告，改变了区委领导对农民运动的错误观念。

毛泽东用实际调查扭转党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弊病。

1927年2月，湖南区委给中央写了一份《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上面说：“我们在此社会群向农运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的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而且限制区乡农协执行委员，皆须现在耕种之农民担任，对于罚款、逮捕之人，皆须扫除，几乎不自觉的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故可以说此时改变从前站到富农、中小地主方面限制贫农之错误观念矣”。

这是自我批评，也是毛泽东调查的胜利。这一调查，是毛泽东一段时间以来对党内针对农民运动态度的一种回应。

1927年3月，北伐势如破竹。北伐的胜利与农民运动的兴起无疑是相互促进的。5日，毛泽东在湖南区委的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上发表了《湖南农民



★ 毛泽东视察湖南农民运动后给中央的报告

运动考察报告》。

一年前，他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革命的朋友和敌人进行了划分，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领导者不接受。陈独秀害怕农民运动，他厌恶毛泽东的这种提法。时隔一年，毛泽东用一份扎实的报告再次挑战党内的对手，这是一种反击。

他毫无悬念地遭到了阻碍。

《报告》的发表过程多少也能反映党内意见不合的情况。

当时中共的机关刊物是《向导》周报。毛泽东写完，拿去给周报，可刚刊发到前两章，就被喊停——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彭述之怕得罪陈独秀，不敢刊发。

1927年3月，瞿秋白到武汉，他是中共中央临时委员会的三名成员之一，主抓宣传。他看了《报告》，立刻找彭述之，让他刊发。彭述之拒绝。

瞿秋白气愤地说：“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

此路不通，另找别路。

3月28日，《湖南民报》开始连载《报告》。4月初，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单行本。

瞿秋白亲自作序。他称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

瞿秋白用他那饱含浪漫主义色彩的笔触写道：“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书印得很快。4月的头一天晚上，武昌城中心马路旁的一幢三层小楼上，毛泽东正在养病，《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送到了他手上。他十分感动。在他艰难地为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上下求索的时候，党内还有地位如此重要的领导者支持他。

毛泽东对瞿秋白的感情很深。后来毛泽东发动工农武装割据，瞿秋白去苏联，又去上海，两人曾在苏区重逢。瞿秋白被抓后牺牲，毛泽东十分悲愤：“为什么不把瞿秋白带到长征的队伍中来？”

长征胜利后，在杨家岭，毛泽东和朋友谈起瞿秋白还说：“要是瞿秋白不死，现在来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那多好啊。”

毛泽东之所以对瞿秋白惺惺相惜，与早年瞿对他的支持很有关系。《报告》的发表就是一例。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出现就成为中国革命的经典著作。

国民革命奋斗了几十年，失败了，为什么？

先前的中国的革命者脱离了土地，中国的革命，大多在城市里发生。革命者的头脑中的中国，与现实中的中国，相差太远。他们远离土地，看不起，甚至惧怕农民，导致中国的革命之火始终是星星点点，随时都可能被扑灭。



★ 毛泽东在武昌的住室

大多数的农民没有起来。

偶尔的城市暴动，只像是在池塘里投入几颗石子。

毛泽东说，革命党人要极端重视农民斗争，要支持农民的革命举动，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乃是协会的中坚，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他在《报告》中着重提出的湖南农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则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举措。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式，简直是急风骤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

毛泽东有着超越前人的自信。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

《报告》还传到了国外。

这一年的5月和6月，《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转载了《向导》刊印的《报告》。英文版编者按：“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某次会上谈到《报告》时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到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毛泽东是有预见性的。

不久，国民党右派倒戈，发动“清党运动”和反人民战争，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在一系列城市暴动失败后，必须在城市道路还是农村道路之间做出选择。

届时，毛泽东也将用行动为自己的判断正名。

·第四章·

辗转：大革命风雨

打开革命书报发行的局面

1925年9月，遭赵恒锡通缉的毛泽东、毛泽民兄弟分别从路、水路去广州。到广州后，毛泽东因身体极度虚弱住东山医院，进行短期疗养。

毛泽民则进入农讲所第五期学习。

不久，毛泽覃也来广州投奔大哥。黄埔军校刚成立一年多，毛泽覃被安排进黄埔军校政治部做科员。在1927年的5月之前，毛泽覃先后在中共广东区委、广东省农民协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作。

这段时间，毛家三兄弟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大变化。

1924年暑期，还在韶山的毛泽覃在冬茅塘毛禄东家和赵先桂结婚。婚后不久，赵先桂被党组织送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毛泽覃则南下广东，两人天各一方，没法共同生活。

毛泽覃自由恋爱，和周文楠走到了一起。他们在广州生活，直到1927年5月，北伐革命形势有所发展，才决定北上武汉。毛泽覃的这段生活相对平顺。毛泽东在广州国民党党部担任重要职务，他对爱弟照顾有加。

杨开慧也比较喜欢周文楠这个弟妹。她们经常交流，杨开慧给周文楠不少生活上和思想上的指导。

毛泽民就没有这种“幸运”。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1925年11月，毛泽民刚到广州不久，经党组织决定，他立即被调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化名“杨杰”，公开身份是印刷厂经理。这又是一个管财务、管业务，同时还需要很高的政治觉悟的工作。毛泽民在安源的工



★ 上海书店是中共中央早期的出版发行机构，于1923年11月开业。其最初的负责人为中共中央出版部书记洪鸿（张伯简），后由毛泽民任经理。图为上海书店旧址（今上海人民路1027弄内）

人消费合作社待过，有“做生意”的经验，这个工作交给他再合适不过。

中央出版部设在上海，1924年5月成立。中共四大之后，更名为中央出版发行部，王若飞任部长。发行工作由上海书店负责，书店经理徐白民是中共早期党员。五卅运动之后，大革命进入高潮，革命的宣传工作变得繁重和复杂，急需一个“能人”来打理。

这又是一项开拓性的事业，负责人得有经济眼光。

毛泽民去之前，上海发行部的运转是不尽如人意的。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印三千，发一千，发行能力十分不足。像《新青年》《前锋》这种季刊、月刊，干脆因发行量不足停刊。各地代理商的欠账，令发行部资金周转成了问题。门市部的经营也不容乐观。开门营业，一天四五块钱的生意算好的，到了1924年下半年，才勉强做到收支平衡，略有盈利。

书店主要卖革命刊物，销量明显受到革命形势好坏的影响，到了1925年，南方革命形势大好，上海书店的外埠发货量猛增，印刷量高了，党组织索性建立一个印刷所——国民印刷所，以满足需求。毛泽民来到上海接手发行部，负责《向导》周报的发行工作。发行部的底子弱。满打满算，也只有七十二元三

角八厘的资金,《向导》周报每月在其他报纸上刊登广告的宣传费就要七十二元,除去中央拨付的六十元,发行部自己需支付十二元。

《向导》周报是中共创办的第一份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蔡和森做主编,中共的重要人物常在上面发文章。《向导》发得好不好,关系到共产党的宣传,关系到革命的发展。

毛泽民深感责任重大。

革命形势高涨,《向导》上的文章质量很高,毛泽民相信,这份刊物是有人愿意看的。那么,接下来他要去做的工作,就是让更多人有机会看到《向导》,让读者接触到,读者才有可能购买,才有可能产生影响。

扩大销售点是毛泽民首先想到的办法。

上海书店,在南市小北门花园路振业里11号,位置较偏僻,人流量小,如果仅仅在书店里摆放书刊,发行量肯定上不去。还是要多设点。于是,毛泽民亲自“跑生意”。很快,沪西、沪东、闸北都有了周刊的分销处。毛泽民给书摊老板一定折扣,卖出去就有钱赚,只认钱的老板们自然不管卖的是什么性质的报刊了。

毛泽民凭借他的经营才能,很快在上海打开了局面。

他并没有满足,他明白,要打开局面,还应该拓宽人脉。

这时候毛泽民的个人装扮也有了大变化。这个曾经赤脚从韶山走到长沙,给大哥毛泽东和三弟毛泽覃送学费生活费的“泥腿子”,为了便于工作,开始穿起西装,打起领带,穿上皮鞋。当然有时也穿长衫,戴最时兴的帽子。

打理好自己,毛泽民开始“拜码头”。他先找到了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孟邹。汪是晚清秀才出身,跟陈独秀有交情。辛亥革命后,陈独秀在安徽省里做官,汪孟邹想去谋职,陈独秀却建议他去上海开一家书店。于是有了亚东图书馆。

亚东是一家小型私人出版社,但名气却很大,它支持新文化运动,出过很多有影响的书刊,毛泽东也曾拿着陈独秀的保单,跟亚东有过业务往来。

亚东下面有一个编辑所,由汪孟邹的侄子汪原放主持。《向导》的印刷和发行工作,汪氏叔侄都发挥过作用。

毛泽民与亚东建立了联系,经常与汪氏叔侄讨论业务问题,摸清出版行业运作的门道。他开始在全国“跑发行”,他知道,只有分销点多了,才有可能增大发行量,除了稳住上海、北京、广州、长沙这四个较大的发行点,他还扩展



★ 20 世纪 20 年代末，毛泽民在上海

了全国二十多个大中城市，甚至乡村。在海外，巴黎和柏林也能买到《向导》周报，《向导》的影响逐渐扩大，开始有人订报，每一期，毛泽民都能收到上千元订金。资金链接上了，发行工作推进起来更加方便了。《向导》周刊在全国的发行量一度高达八万多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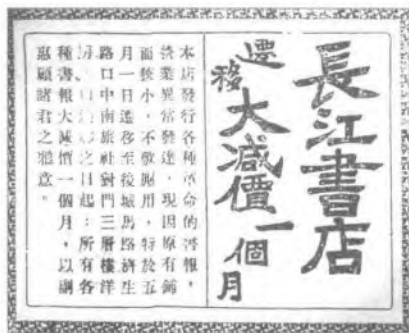
毛泽民任职才一年，发行部就实现了盈利，储备金从入职前的不足百元，上升到一万五千元。且来往交易均一本清账，绝无贪污舞弊。

随着北伐的胜利突进，武汉一时成为革命的中心，毛泽民认为是时候在武汉设立一个公开发行人点，他向党中央汇报，获得批准后，便前往武汉，在汉口的“雪花世界”（一个综合性的游艺场所，人流量比较大）租了店面，开办长江书店，作为党的公开发行人机构。毛泽民安排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刊登书店开张的广告，并用大字写出：《中国青年》《向导》周报、《群众》周刊，都出版了！

武汉革命形势大好，读者对革命书刊的需求量很大，从广州、上海运来的书，



★ 1927年3月，由毛泽民负责筹建的武汉长江书店和武汉长江印刷所正式开业。图为长江书店旧址（今汉口中山大道831号）



★ 长江书店开业后，其销售的进步书籍受到群众的欢迎，常常供不应求。为解决书源问题，毛泽民从上海等地调运进步书籍以满足读者的需求。图为《汉口民国日报》刊登的长江书店的广告

三天就告罄，因为书刊供不应求，毛泽民不得不拉上铁门，暂停营业。毛泽民有办法，他立刻从上海调书调刊，委托在长江上跑运输的水手、茶房，偷偷运过来。

瞿秋白领导长江书店，具体工作由湖北区委派人负责，这个书店出过很多好书，其中包括毛泽东那本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为党的事业忙碌，不知不觉，毛泽民已经过三十岁了。当初，从韶山出逃广州之前，他和发妻王淑兰办了离婚。他明白革命之路千难万险，两人离婚，是对王淑兰的保护——军阀说不定哪天就会去韶山找麻烦。

在上海，毛泽民一个人出出入入。这在上海是很危险的。

上海是个五方杂处的地方，各种密探、流氓横行，一个年过三十却没有家室的男人，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组织考虑到了这一点，便派纱厂女工钱希均配合毛泽民开展工作。

钱希均共产党员，在纱厂做过工会工作。他们1926年夏天相识。钱希均主要做交通工作，她往返于印刷所与陈独秀、周恩来、瞿秋白这些中共高级领导的住所，取送稿件。革命需要，她有时要扮演成阔太太，有时又需要扮演成穷苦的妇女。在那时的上海，女人做交通工作，不那么容易引人注目。

毛泽民和钱希均慢慢产生了情感，他们是革命伴侣。1926年年底，他们结了婚。

这是一段现在听起来很有意思，但在当时却是异常艰难的日子。

毛泽民和钱希均对外的身份是老板和阔太太，为了掩盖真实身份，他们必须时不时“装富”。

他们必须穿戴整齐，偶尔还得“十分像样”，上点档次。

他们每个月的津贴只有十五元。这十五元大部分都得花在“穿”上，除此之外，留给“吃”的钱自然就很少了。

为了方便印中央的内部文件和内刊，毛泽民又主持建立了一套秘密印刷发行机构，地点在培德里。

搞地下印刷，必须有可靠的人。毛泽民想到了老家韶山，他给韶山党支部写信，要求他们派一些可靠的党员、团员来这里工作。韶山给他派了人，秘密印刷慢慢发展起来了。

对外挂招牌是某某印刷厂、印刷公司。

毛泽民比较灵活，外面的活，他接，这算做生意赚钱，然后再用这个钱补贴秘密印刷，印共产党的秘密文件、书籍和传单。

1927年2月，北伐狂飙突进，毛泽东在湖南乡下考察农民运动，毛泽覃还在广州，毛泽民则依旧在上海干着他的发行工作。

《向导》周刊一期发八万份，《共产主义的ABC》半年卖三万册。

1927年3月下旬，北伐军占领南京，为策应北伐军攻克上海。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发动工人武装起义。

为配合宣传，毛泽民接到赶制传单的任务。钱希均刚从党中央取回秘密文件，他就开始组织制作，连夜印刷，必须在起义前夜送到青云路总指挥处。

十六开红黄绿三色光纸，印一万张，印完就要送出去。可在这个关口，送货员却退缩了。送传单要过宝山路口，那是华洋交界处，由“杀人魔王”——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李葆璋把守。



★ 毛泽民在上海新闸路培德里一幢石库门的房子里建立起秘密印刷发行机构，专门负责党中央文件和内部刊物的印刷和发行。图为设在上海新闸路培德里的中央出版发行部机关旧址

时间紧迫，就算是刀山火海，毛泽民也要闯一闯。他捆装好传单，和毛遂自荐的印刷工人沈玉山一起“送货”。

太阳已经落山了。他们雇了一辆人力车，故意把传单放在显眼的地方，过关卡时，审查的士兵果然问，这是什么？红红绿绿的。沈玉山答：是基督教的《马太福音》书，所以有红有绿。士兵们没在意，一挥手，放行。

1927年3月21日，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发动上海产业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很快取得了胜利。北伐军与工人起义军里应外合，迅速占领上海，毛泽民不失时机地在起义当天，正式设立上海长江书店，地址选在闸北宝山路宝昌路口。

毛泽民并在报纸上连续做了十几天的广告。一时间革命书报的销量大增。

毛泽民和钱希均也陶醉在革命胜利的喜悦中。

可他们并不知道，更大的危机很快就会到来。

寻找中国革命的出路

毛泽民的上海长江书店开了没几天就被查封了。

北伐成功大大膨胀了蒋介石的野心。他对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十分反感，决定实行“清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与共产党翻脸，他收买一批流氓，穿蓝色短裤，装扮成工人模样，袭击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缴了纠察队的军械，查禁工会，枪杀工友，当场打死三十八人，打伤三百多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

仅仅三天，上海共产党员被杀三百多人，被捕五百多人，另有五百人失踪。不断有人脱党和叛变。

事实上，早在“四一二”前夕，上海已经是谣言四起，人心惶惶。3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吴稚晖等五人聚会，就提议对共产党进行“应行纠察”，要“取消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党籍”。而已经窃取国民党中央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也早就为对共产党的“清党”阴谋做足了准备。

“四一二”不是一个突然的决定，它是酝酿已久的暴行，是血腥的开始。

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宣布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一切决议为非法，公开通缉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吴玉章、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百九十三人。

统一战线的和谐曲调终于被蒋介石的一阵乱弹破坏。他利用了北伐！利用了共产党！利用了国民党左派！



★ 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

为了迎接蒋介石的北伐军来上海，毛泽民的印刷所不顾危险连天加夜地忙碌着。可现在，鲜血染红了黄浦江。

上海总工会、各区工会、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上海学联、上海妇联等革命团体都被查封。一切都措手不及，刚刚成立的公开发行的上海长江书店也未能幸免。

毛泽民的努力付之东流。

他被迫调往武汉，继续领导中共中央出版工作，兼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

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于1927年4月出生，短暂的喜悦过后，毛泽东不得不面对一个时代的大悲剧。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令毛泽东震惊。

蒋介石发动的“清党”是残酷的。国民党所用的清党方法就是屠杀，就是宁可错杀，也不放过。

国民党手里没有共产党员的名单，他们根本没法清楚辨析谁是共产党，谁是“纯粹”的国民党。在两党的蜜月期，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使得每个人的党派定位异常复杂。蒋介石和他的特务们，采用极端的方法判定每个人的身份和态度，只要有共产党嫌疑，立刻就会遭到屠杀。

华北，南方，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军阀都开始反扑。

短短时间内，中国共产党损失惨重。

在北京，李大钊被张作霖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

在上海，共产党著名领导人赵世炎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砍头，陈独秀之子陈延年被乱刀砍死。

广州的屠杀比上海更甚，国民党一周之内杀了两千名共产党员，著名共产党员萧楚女、李启汉、邓培、刘尔崧都被屠杀。

四川、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甚至海外，清党运动血光四溅。

毛泽东在长沙的文化书社也被查禁。

革命的局势急转直下。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毛泽东预感到风云将要突变，他能想到的反蒋的办法就是工农武装斗争，可他对农民运动的构想，遭到国民党，甚至党内实权派领导人的反对。

共产党在武汉匆匆召开了“五大”，讨论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但共产党的领导人对汪精卫和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还有幻想，他们还在妥协。

陈独秀依旧被选为党的总书记。毛泽东是中央候补委员，只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

毛泽东主张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给反革命以颜色，可他的提议甚至都未加以讨论。中共高层并没有制定出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陈独秀说农民运动“糟得很”，是“痞子运动”，批评它“过左”。

毛泽东心急如焚。据罗易回忆，毛泽东在武汉“一刻也停不下”。毛泽东说，湖南的“农民大众正在受苦受难”，他不能在武汉过舒服日子。

毛泽东迫切地想要回湖南去，他觉得自己哪怕不能扭转局面，也应该与湖南的农民大众共同进退。可是，他在党内的位置，使得他不可能自由来去。组织有组织的纪律，他必须遵守。

1927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5月，毛泽东依旧感到四周一片肃杀。五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和刚生完第三个儿子的杨开慧依旧住在武汉。

毛泽东处于一种焦躁之中，只有杨开慧能够理解丈夫的烦扰——他在为湖南的农民大众担忧，他在为中国革命的前途担忧，他是什么都往大处想、不考虑自身安危的一个人。可是现在，杨开慧知道丈夫很无力。

毛泽东在家中后院来回走动，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杨开慧来到后院，默然

地看着丈夫。她太理解丈夫了，几个月以来，她心中同样无比愤懑，大革命失败了，中国革命要找出路，毛泽东心怀天下，可如今这一股浩然之气被闷气挡住，总需要找一个出口。

毛泽东看到杨开慧来了，眼下，他有话也只能对她说，也只有她能全然理解。

他很沉痛，他说独秀同志只讲合作，不讲斗争，对国民党一味让步、妥协，共产党付出的代价是血染湘江。

杨开慧看着焦急的丈夫，心痛不已。她希望丈夫先平复心情，再想办法。她说她可以陪他出去走走。他的苦，他的愁，她都愿意和他共同承担。

一切都好像这武汉江边的烟雨，朦朦胧胧。中国革命未来的走向，谁也不能说完全看清。古诗讲，“无言独上西楼”，重点落在“独”字，所幸杨开慧和毛泽东还可以并肩战斗。

他们来到武昌黄鹤矶，登上黄鹤楼。这座古楼宇名声很大，号称“天下江山第一楼”。两人放眼长江，烟波浩渺，龟蛇二山，烟雨朦胧。毛泽东心境苍凉起伏，想想前途，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他写下一首词，《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毛泽东仍在苦苦寻找中国革命的出路。

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紧急时期，中国共产党必须进行选择，是东征讨蒋？还是继续北伐？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

周恩来是赞成讨蒋的。“蒋能直接使用之军队仅五个师”，“故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于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可共产国际不那么认为。他们要求继续北伐，不得东征。

革命形势更加恶化了。

毛泽东告诉杨开慧，他打算上山结交绿林好汉，搞武装斗争。

这不是杨开慧第一次听毛泽东说这个话，她完全理解丈夫的选择。共产党没有自己军队，没有自己的武装，当初和国民党合作，却是像新娘子上花轿，

勉强挪到新房去，还没有懂得应该当主人的道理。以后更是看人家脸色过日子，一味隐忍，才弄到今天这个地步。

政治斗争之外，共产党必须开展武装斗争。

可是，杨开慧的心又怎么能够不痛！搞武装斗争，就意味着她和毛泽东将再一次分离，这是长久以来她最不愿意接受的局面。她爱他那么深！可是，为了革命胜利，她又不得不放下自己渴求的那点温暖，他们都是革命儿女，他们有共同的崇高理想要去实现，能够一起为这个目标奋斗，就已经是幸福了。

想到这，杨开慧释然了。

毛泽东建议她先回板仓，照顾好自己、母亲和孩子，同时可以开展土地革命资料的调查，自己安排好武汉的事情会赶回去。

天色渐渐暗了。

毛泽东和杨开慧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们轻声交谈着。

这短暂的相聚。

团圆在武汉

1927年5月，毛泽民从上海调往武汉。

上海反革命政变已经爆发，四处清党，上海不适合继续工作，但武汉国民政府方面的态度尚未明朗，毛泽民去武汉可以继续做出版工作。他去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

这个月，毛泽覃、周文楠也途经上海去武汉。毛泽覃要去汉口国民革命军工作。兄弟俩在上海见面，交流了分别之后的种种经历，十分热络。他们打算一起坐船到武汉去。

上海笼罩着白色恐怖，沿江各地形势也不大好。

毛泽民在上海锻炼出了地下革命的经验，他告诉毛泽覃和周文楠，上船后，先装作不认识，攀上老乡之后，再显出亲热。毛泽覃和周文楠对二哥十分佩服，当然照办。

毛泽民又叮嘱他们，记住，我姓杨。毛泽覃笑着说，知道，杨老板。

三个人上了船，一开四五天，沿岸时不时传来枪炮声。

到了汉口，他们又乘渡轮去武昌。他们的大哥毛泽东住在武昌督府堤41号，化名杨先生。毛泽东已经有一段日子没见到弟弟们，十分高兴。杨开慧也带着毛岸英、毛岸青和刚出生的毛岸龙来见叔叔们。杨开慧和周文楠热切地聊着彼此的变化。周文楠已经怀了孩子。

毛泽东告诉弟弟们。他回了一趟湖南做调查，也回了韶山。韶山已经和1925年他们离开时大不一样了。农民运动组织起来了，农会的干部成长很快，

他还谈到了毛福轩、王淑兰这些熟悉的名字。谈到了他们外公家，谈到了几个舅舅、几个表兄的状况。

毛泽东依旧认为，农村问题，是国民革命突破的关键点，加强农村革命运动，是挤垮蒋介石反革命运动的突破口。可是，党中央不支持他的建议，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依旧把控着中央。

5月18日，何键在益阳、常德的部队开始屠杀革命群众。武汉、长沙之间消息断绝，长沙城内人心惶惶，拥蒋反共的口号在城内喊得震天。19日，何键部队守军开始挑衅，要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当晚，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独立第三十三团团团长许克祥，在军长何键的支持下，公开挑衅闹事，打伤多人。

在这种情况下，湘区省委动摇、软弱，提不出切实的措施，反倒通知工农两会纠察队，不许抵抗，任其缴枪。省委则匆忙开会，每人分五十银洋，作鸟兽散。



★ 1927年杨开慧与毛泽东在武昌从事革命活动时的住址——武昌都府堤41号

郭亮和柳直荀迅速组织临时省委，挑起反对蒋介石、许克祥的斗争，工农群众喊口号，“朝打铁，晚打铁，打把梭镖送农协。梭镖磨得亮亮光，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革命情绪高涨。

可正当起义军高歌猛进，眼看就要胜利的时候，陈独秀突然派李维汉到阵前宣读他的手令：“农军不得进行武装斗争。湖南问题，静候武汉国民政府解决。”他斥责工农革命军的起义，是“小孩子的把戏”，让他们即刻撤退。许克祥部下有了喘息之机，疯狂反扑，袭击湘区农协、省总工会等一切革命组织，释放在押的土豪劣绅，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长沙城立刻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二十多天，杀了两万多人。

这就是惨无人道的“马日事变”。

残忍的消息不断传到耳边，毛泽东心痛不已。

6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组织新的湖南省委，毛泽东任书记。接到任命，毛泽东立刻启程奔赴长沙，在衡山、长沙等地四处奔走。“马日事变”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延续，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必须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他要求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

可毛泽东的湖南之行刚十几天，右倾的陈独秀又立刻命令他回去，指责毛泽东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毛泽东只好又从长沙返回武汉。中共中央依旧在妥协、让步、退缩，陈独秀教授已经被吓退打垮，中共中央的扩大会议，居然还在重中国民党的领导地位。

对毛泽东和一切想要革命的人士来说，这是一段屈辱的时光。几重约束，让党的事业和工农革命群众几乎被推到了悬崖边上。

在毛泽东看来，这些决议听上去是如此刺耳：“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受国民党的领导”，“工农纠察队必须置于国民政府的监督之下”。

毛泽东只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他只能抓住机会发言，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党为革命事业心急如焚。

7月4日又开会，针对湖南问题，毛泽东一吐为快：“长沙事件为何键夺唐生智政权。唐生智本欲拉我们反何，但见我们没有力量，遂拉拢何键部下打何，故唐不能打许克祥。”“在国民革命军中有几个师和军反蒋，应促成唐生智和何键分化，拉唐反蒋。”关于策略，毛泽东说“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

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提议是对的。可中共的决定还是比不过反动派变脸的速度。

7月12日，共产国际停了陈独秀的职。中共中央改组。1927年，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仍有完全的控制权，“他们给中共提供的不是什么‘意见’，而是干脆发的命令，中国共产党显然甚至无权不接受”。

7月15日，左派有的退出，有的被赶走。汪精卫开始“分共”，这就是“宁汉合流”。汪精卫开始在武汉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

大革命彻底失败了。

中共中央开始从武汉紧急疏散、撤退，隐蔽党在武汉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去四川，但毛泽东请求仍回湖南工作。

毛泽民被迫辞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之职，和主笔茅盾转入地下。7月，他因奉命筹办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报《大江周报》被捕，后因证据不足释放。

毛泽东把二弟泽民、三弟泽覃找到一起，他说：“和平的日子不多了，我们三兄弟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

何去何从，毛泽东也是茫然的。上面有人发号施令，他没有决定权，而且就当时情况看，决策者也不知道哪条路是正确的，只能拼，只能闯。

毛泽东说了党中央的决定，谈了三兄弟的不同去向：他回湖南，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毛泽民回湖南准备秋收起义；毛泽覃留武汉，准备随南下的部队去南昌。

周文楠快生了，毛泽覃却要随军离开。他对周文楠说：“我要回部队去了，准备向江西方向开，你自己要多保重，把孩子安全地生下来。”

毛泽覃下到叶挺的部队，随军转战，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

毛泽覃在血与火的前线得到了锻炼。

毛泽东三兄弟，一文、一财、一武的格局基本形成。

后来毛泽东戏称，“泽覃是我们家第一位将军”。

南昌起义失败后，毛泽覃南下，部队走到广东被打散，兵败潮汕。他给周文楠写信，告诉她真实的情况。他落了单，不得不卖掉了一件她买给他的绸布衣服。他问她孩子生下来了吗？健康吗？

周文楠这时已经在大哥毛泽东的安排下，由毛泽民护送回到长沙。她在长



★



★★

★ 南昌起义旧址

★★ 南昌起义时周恩来住过的地方，这里曾举行过重要会议

沙生下了她和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

1928年，周文楠和刚出生六个月的儿子毛楚雄被清乡司令部逮捕。1930年才被营救出来。到1935年毛泽覃牺牲，周文楠也没能再见丈夫一面。

中共开始正视农民运动，临时中央发出《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指出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阶段。

这让毛泽东感到振奋。他对湖南农民运动有许多构想。

南昌起义之后，汪精卫在武汉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如此疯狂的举动让武汉三镇陷入一片恐慌。

中共已经决定要发动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这也是共产国际的指令。他们从一个反面，走向另一个反面，要求通过暴动，建立一个湖南政府，建立革命政权，以夏曦、郭亮、毛泽东、任卓宣为委员，毛泽东为书记。

毛泽东还在武汉奔走，营救同志、开会，在迷茫中坚持。这是临时中央的决定：毛泽东暂不去湖南，暂留武汉担负原任工作。

他成了汪精卫要捉拿的要犯，在江边，有特务问毛泽东，你看见毛润之他们没有？毛泽东冷静朝远方一指，好像到那边去了。

特务追过去，毛泽东从容地走回家里。他不是没意识到危险，但他知道，必须冷静。他和杨开慧迅速转移，督府堤41号已经随着大革命的失败成为一个危险的所在。

任命的反复变化，多少显露了非常时期党内决策的混乱和人事上斗争的激烈。

八七会议只开了一天。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参加了会议。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毛泽东破除了“素以为领导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观念，在发言中严厉地批评了陈独秀。国共合作问题、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问题，陈独秀的几次大妥协，导致中国革命的形势不断恶化。

中共组建临时政治局，瞿秋白成为新的领导人，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会后，瞿秋白找到毛泽东，他们是老朋友了，瞿秋白想让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

毛泽东却说：“我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8月12日，他便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和弟弟毛泽民一起回到湖南。

秋收起义前夕的几件事

秋收起义的计划已经定下，但毛泽东并不打算妄动。他要先做一些调查，摸清楚起义前夕湖南社会的状况和普通大众的心态。

1927年8月12日，他回到长沙，住在已故杨昌济在长沙的住所“板仓杨寓”。他见了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易礼容。

易礼容是马日事变后临时就任湘区书记的，在反动派的疯狂搜捕下，他十分艰难地开展着地下工作，两三天就得换一个地方，时常乔装打扮。

他有时是工人，有时是农民，有时是小贩，有时又成为绅士。非常时期，环境恶劣，毛泽东和易礼容简要说了说就散开了。

第二天，毛泽东启程回板仓农村，他打算先回去看看杨开慧和孩子们。在板仓，毛泽东找来五位农民、一位篾匠、一位教师，他们都是地下党员。几个人开了两天的会。

毛泽东通过调查了解到，农民要求全部解决土地问题。

很快，湖南省委改组了，毛泽东成为省委委员。毛泽东觉得自己的调查还不够，他和杨开慧一起又从板仓乡下回到长沙，依旧住在长沙的“板仓杨寓”，摸底人民的情绪——人民对国民党已经十分厌恶。

长沙县的党组织已经瘫痪，毛泽东安排仇寿松回长沙任县委书记，恢复党组织。

得知毛泽东回到长沙，韶山也来人了。毛福轩、庞叔侃、李耿侯、毛月秋来见毛泽东，告诉他韶山的情况。

许克祥的军队开进了韶山，农协组织人激烈反击，但最终落败，土豪劣绅反扑，杨昭植、毛新枚都已牺牲。

上屋场被何键抄了家。王淑兰逃去了湘乡。

罗一秀的父亲罗鹤楼被迫一家远走；罗鹤楼的侄子罗石泉一家去了华容县湖口，罗石泉教书，他儿子罗正凯种田；毛钦明被杀，毛钦明的弟弟毛森晶躲在乡下；毛泽嵘也躲在华容。

因为自己，族人受到如此大的连累，毛泽东心痛不已！

毛福轩他们没来之前，毛泽东已经对韶山的情况做了不乐观的估计，可没想到，实际情况更严重。

毛泽东半天没有说话。毛氏一族因他遭遇不幸，这难道就是革命的代价？还要继续革命吗？

毛福轩问毛泽东怎么办。毛泽东说，只要革命胜利了，就能够杀回去。

8月18日，湖南省委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开会，讨论暴动的目标和范围。

毛泽东提出：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至于暴动的范围，多数委员想发动全省暴动，攻占长沙，毛泽东却认为从实际情况看，还是应该缩小暴动范围。但他仍同意把全省暴动的意见报给中央。

毛泽东转向了“枪杆子里面夺政权”，他已经彻底抛弃国民党——“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他给中央写信说，“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失败”。

可瞿秋白领导的中央却与毛泽东的意见相左。瞿要纯粹依靠群众力量，以军事的力量为帮助。

那时候中央和湖南之间的联系全靠信件。这多少在沟通上产生了一些困难。

中央写信来，要求暴动要有三个暴动点，以长沙、衡阳、宝庆为中心，发动全省暴动。

毛泽东觉得这太冒险，力主缩小范围。最后几经拉锯，变成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县的湘中暴动。

这仍然过于冒险。瞿秋白为首的中央对于形势的估计太过乐观，而且，知识分子出身的他，坚持以城市为中心。

8月下旬，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平江浏阳农军的负责人在今修水山口镇老街举行会议，决定将队伍合编为一个师，以余洒

度为师长，下辖驻修水的第一团，驻铜鼓的第三团。这支队伍后来成为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主要力量。

安源有报告来了。湘赣边界的兵力、武器、财力都十分有限，要发动全省暴动，几乎是天方夜谭。

湖南省委临时开会，讨论秋收起义的最后计划。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有条件的地区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动暴动；决定成立暴动领导机关：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

省委派彭公达去汉口向中央报告湖南暴动计划，毛泽东去湘赣边界统率工农武装，组织前敌委员会，领导秋收暴动。

秋收起义，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为了尽可能取得好的效果，湖南省委不得不“先斩后奏”了。

毛泽东是前委书记，起义前，他派夏明翰去浏阳、平江，派毛福轩回韶山，派向钧去株洲，派庞叔侃去安源。

杨开慧也想参加秋收暴动，她早就期待这场暴风雨的到来，但毛泽东建议她回板仓，照顾母亲和孩子，参加当地的农民运动。

起义越来越近了。毛泽东想回去看看杨开慧和孩子。一天晚上，毛泽东悄



★ 杨开慧的表弟向钧，1928年1月24日在长沙教育会坪牺牲，年仅22岁

悄回了一趟板仓。

杨开慧的保姆陈玉英后来回忆这一晚：“当时我正在生病，睡在床上起不来。后来，听说主席是从屋后竹山翻过来的，和杨开慧交代了一些事情，脚都没歇，又翻过后山走了。”

杨开慧是多么想与毛泽东共进退啊！可是，母亲和孩子需要照顾，她理解毛泽东的苦心。她愿意支持丈夫将革命进行到底。

天快亮了，毛泽东必须走，他拿起雨伞，对杨开慧说：“霞，我得走了。”

杨开慧先去外面看看动静，见无异常，才示意毛泽东从屋里出来。她把他送到杨家大屋的后山。天还未亮，周围朦朦胧胧。

毛泽东说：“霞，我走了，你回去吧。”

杨开慧站在屋后，目送毛泽东钻进树林。

她怎么也料不到，这竟是她最后一次看到这个高大坚毅的背影！

毛泽东要到安源去发动革命了。

起义头一天晚上，他与易礼容彻夜长谈，他们一个负责前方，一个负责后方，必须里应外合，不能单独行动，否则会失败。易礼容表示一定等毛泽东的前线的消息，不会妄动。

第二天，也就是1927年8月31日，毛泽东乘火车去安源，他要去部署武装起义。他在株洲见了朱少连、陈永清，9日到安源，他又给湖南省委写信，几经讨论，最后定下来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暴动，15日长沙暴动。

9月8日，驻在江西修水的余洒度带领的师部及第一团接到前敌委员会的通告，决定立即夺取平江，直攻长沙。因接到指示，秋收起义要打出工农自己的旗帜。前敌委员会即指派师参谋长陈树华、参谋何长工、副官杨立三负责设计军旗。

何长工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见过苏联红军的军旗，他提出方案，三人反复推敲、修改，终于设计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红色旗底，象征革命；旗帜正中黄色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五星内的镰刀、锤子象征工农大众；旗帜左边沿白色涵管纵书：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修水县城数十名裁缝主动请缨，布店老板无偿献出红布料，连夜赶制红旗一百面，红领巾、红袖章一千多条，以备起义时用。

局势越来越紧张。毛泽东要组织军队，奔波于汉冶萍矿工与农民武装之间，可就在9月8日，正当他和潘心源途经浏阳张家坊时，却被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了。



★ 秋收起义口号宣传

老天冷不防地朝毛泽东开了个玩笑。

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毛泽东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毛泽东打算贿赂押送他的人，获得释放，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软的不行，毛泽东只能强行逃跑。

那几乎是毛泽东生命中最危险的时刻之一。

他在寻找合适的机会。可是，走了一路，民团都把他看管得很紧，直到离民团总部只有二百米距离的时候，他才终于想到了办法。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十块银圆，朝地上一撒，士兵们忙去抢钱，毛泽东和潘心源趁机分两路逃跑。

毛泽东往田野跑，他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毛泽东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追踪他，还强迫当地的农民一起搜寻，有好多次，他们离得很近，有一两次毛泽东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有五六次，毛泽东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被再次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他没有被发现。

最后，天近黄昏，民团放弃了搜寻。毛泽东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他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他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给他住处，又领他到了邻县。毛泽东身边有七块钱，他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东西。当他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他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9月10日，农历八月十五，毛泽东到了江西铜鼓萧家祠第三团团部。他和全团排级以上干部中秋聚餐，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湖南省委秋收暴动计划及安源张家湾会议确定的军事部署；正式宣布驻铜鼓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要求全体指战员响应湖南省委号召，立即武装起义。

走自己的路，向山区进军

1927年9月9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和师部在驻地江西修水县城宣布起义，各地工人开始破坏铁路，秋收起义爆发了。

秋收起义中，原警卫团团长卢德铭是总指挥，毛泽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

毛泽东把第一师编成四个团。第一团由原警卫团组成；第二团由安源工人、矿警队以及醴陵、萍乡的农民军混编；第三团由平江、浏阳的农民军组成；第四团由原国民党军邱国轩团组成，总计八千人。这一天，第一团立即从修水出发，朝湖南平江长寿街进军，先师部一天到达渣津。

起义并不是很顺利。马日事变之后的血腥镇压，群众基础变得较以前薄弱。起义第三天，第一团越过修水、平江边界占领龙门厂。正在攻打金坪时，第四团突然倒戈，第一团顿时腹背受敌，损失惨重。卢德铭只好率部向第二、三团靠拢。

与此同时，第二团从安源出发，攻打萍乡县城，但当地驻军早有准备，一交火就打得很苦，二团只好改打老关镇，得胜后又攻下醴陵县城，因敌军反扑，又打浏阳，结果又遭到敌人重围。第二团突围，溃不成军，突围出来的一部分人急忙朝文家市方向撤退。

第三团从江西铜鼓出发，攻占浏阳县白沙镇，第二天，又攻占东门市。毛泽东要求团长必须警惕西面达浒、官渡之敌，可三团团长放松了警惕，导致敌人占据先机。14日，反扑的敌人与第三团激战，三团不敌，向北方退却。

三个团出师皆不利，长沙暴动已经没有必要，毛泽东致信湖南省委，要求



★ 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

立刻停止执行长沙暴动计划。

师长余洒度依旧想要进攻长沙，但毛泽东等多数人主张向南撤退。

这个时候攻长沙，等于以卵击石！

9月19日，秋收起义部队第一团、第三团和第二团余部，在浏阳县文家市会师，全部只剩一千五百多人。

何去何从，关系到剩下官兵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革命力量能否保存下去，毛泽东坚持放弃攻打长沙，转去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先找落脚点，保存实力，再图发展。

这无疑是个英明的决定，是中共从一味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的新起点。

当日，湖南省委却还在下令“立即爆发长沙暴动”。

这个命令已经无人执行。

毛泽东决定走自己的路。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不得不独立思考、独立行动的时刻。

20日清晨，里仁学校操坪站满了人。毛泽东站在台阶上，对着秋收起义后剩余的一千五百名官兵说：“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只要



★ 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人员1937年在延安合影

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

第二天，毛泽东便率领工农革命军，由文家市出发，沿着罗霄山脉南下，向江西萍乡、莲花前进，开始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进军。

这在当时是一种“发明”，但对于毛泽东来说，这可能并不新鲜，他少年时候读的那些造反故事中，总有许多绿林好汉，活跃在山野。现在，他也带着部队结识绿林好汉去了。

罗霄山脉是江西和湖南的交界，是湘江和赣江的分水岭。它绵延八百里，层峦叠嶂，是个人迹罕至的地方。

毛泽东就这样迈出了湖南，不久之后，他将在江西开辟出一个新战场。

白色恐怖下做出版

八七会议后，毛泽民跟着大哥毛泽东回湖南，做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

为了筹备物资，他曾秘密回到韶山，筹备军饷。参加革命离家前，他没有完全听大哥的话，散尽家财，而是妥善处理了一些物资，秋收起义刚好派上用场。

毛泽民始终是大哥毛泽东的财政后盾。

9月9日，秋收起义打响，毛泽民没赶上。起义形势发展太快，毛泽民去追赶起义队伍，却和哥哥毛泽东一样，被地方团防局的清乡队逮捕。等他机智逃脱，一路乔装打扮去追赶哥哥毛泽东的部队到湘赣边界时，却因民团阻挡，无法继续前进。

毛泽民只能先回长沙。

他在长沙做了几个月的省委交通处处长。

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需要争取革命群众的支持与同情，在舆论上击垮国民党。宣传工作变得十分重要。1927年9月，共产党成立了出版局。10月，瞿秋白主编的中共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在上海创刊。从陈独秀时代的《向导》到瞿秋白时代的《布尔塞维克》，中国共产党高层在颠簸的革命路上被迫实现更迭，但发行工作，依旧是熟手来做比较好。毛泽民是在上海做过书刊发行的优秀人才，所以，1927年11月，党中央紧急把他从湖南调往上海也就变得不难理解了。毛泽民是来“救场”的。

在毛泽民之后，党的出版发行负责人更替了好几次，可他们或者脱党，或者成为叛徒，发行部的账目变得一团糟，当年的盈余和存货也所剩无几，甚至

连账本都丢了。

毛泽民主持工作的时候，所有进出，全部做到“一本清账”，可现在，他不但需要从头再来，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烂账”甚至还引起了党中央对他品格的怀疑。

毛泽民十分苦恼。他给党中央写信申诉，可非常时期，很多事都无从查起，他只好忍辱负重，先把手头的工作做好再说。

毛泽民要做好的第一项工作是把《布尔塞维克》发行好。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出版的第一本机关刊物，它是白色恐怖中的一星火种，很多党的重要同志都在上面发文章，十分鼓舞人心。

为做好发行，毛泽民必须巧妙地与国民党作斗争。环境变了，毛泽民不可能像发行《向导》周报那样，四处跑分销点，他必须随时和来搞破坏的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布尔塞维克》很受革命群众欢迎，国民党就趁机创办《新生命》月刊，与共产党对着干。

党中央为了扩大宣传，又创办了《红旗》周刊。国民党反动派恼羞成怒，开始搜捕、严查进步书刊。毛泽民干脆让印刷厂给革命书刊换上假封面，书瓢是革命的，书皮却是《中国文化史》《新时代国语教科书》这类“无害”的。他偶尔也促狭国民党一下，把《布尔塞维克》穿上国民党机关刊物《中央》半月刊的外衣，令搜查的国民党特务哭笑不得。

毛泽民还创办书店，印行革命书刊，无产阶级书店、华兴书局、浦江书店，都是他一手创立的。

做出版发行，中央的经费依旧不足。毛泽民为维持报刊正常发行，常常一忙就是一天，他没有时间吃饭，也不回家，饿了就买两个烧饼，开水泡泡就吃下去。

在外活动，他就去吃一碗阳春面。他是老板，吃阳春面在外人看来会有点异样，这样很可能会暴露身份。所以有时吃完阳春面，他还要自我解释似的拍拍肚皮，自言自语说因为油水吃多了，吃点阳春面清清肠胃。

在白区工作，毛泽民必须和反动派斗争。有一次，他创办的秘密印刷机构协盛印刷所正在印刷党的宣传品，十几个“包打听”突然闯进来，拿着印刷品问毛泽民怎么解释。

毛泽民十分镇定，说我这是正常赚钱，谁给的价钱高，我就给谁印，何况

是现金，为什么不干？我是商人，不懂什么国民党共产党。

“包打听”不由分说，带走了毛泽民，他们把毛泽民押到旅馆，想要勒索一万块。毛泽民依旧不慌不忙，他说上海滩谁不知道我杨某人，他拿出三百块，甩到“包打听”面前，说身上只带这么多，其他的出去再给。

钱希均得知毛泽民被抓，立刻汇报给中央负责人周恩来。周恩来紧急安排营救，他批准了三五千元活动经费，以保毛泽民安全，不过，毛泽民以他的“江湖”手段，只用了八百块便顺利脱身。

身在十里洋场，毛泽民从未忘记大嫂和大哥。他给杨开慧寄钱，贴补大嫂和侄子们的生活。

杨开慧在给朋友的信中就曾提及：“由于泽民的家庭观念，我还没有饿饭。”

毛泽民还时刻关注大哥的消息。他做出版发行，只要一旦发现大哥毛泽东的消息，他就会欣喜若狂地仔细阅读，并和钱希均分享。毛泽东在苏区看到的党中央的刊物，很多就是经过毛泽民的手寄出的。

上海的环境不断恶化。1929年，党中央决定让毛泽民和钱希均转移到天津继续出版工作。

毛泽民在上海《新闻报》登了广告，把他经营的“协盛印刷所”的机器全部卖掉——买主是他自己，这样就可以避开国民党的耳目，顺利把机器送到天津去。



★ 天津华新印刷公司
旧址

到了天津，毛泽民化名周韵华，创办华新印刷公司。他依旧是老板，而手底下的一批人，则都是上海的原班人马，其中还有韶山来的侄子毛远耀、毛特夫。

为了不暴露自己，毛泽民夫妇住在英租界小白楼附近福安里的一座两层小洋楼里。他们和邻居的关系很不错，经常请邻居到家里来玩。毛泽民做老板自然也有老板的派头，他和钱希均穿着都很体面，但日常开销却分外节俭。

大环境和党内环境时时都在变化，毛泽民尽管做经济工作，但当他听到哥哥毛泽东的消息时，神经总会突然绷紧。如果有人诋毁哥哥，他更是无比担忧。

毛泽民夫妇在天津工作近一年，工作做得还不错，但毕竟天津相对于上海偏一些，工作比较难展开。

1930年底，他和钱希均接到党中央指示，立即返回上海，继续从事出版发行工作。

上海的局面已经跟当初不同。

李立三的“左”倾盲动路线，使白区党组织受到很大打击，再建印刷厂，只能转入地下。周恩来给出指示，要“化整为零”，他派中央机关会计熊瑾玎和钱之光一起筹备中央出版发行机关。很快，他们选定齐物浦路元兴里的一座两层带连体门面的小楼，西面开绸布庄，这个钱之光擅长，东面开印刷厂，这个毛泽民擅长。如有重要文件出入，则伪装成绸布拿进拿出。

毛泽民夫妇就住在印刷厂。印刷厂周围有个小五金工厂，日日冲床机都发出巨大的噪音。毛泽民夫妇宁愿忍受，因为这种噪音尽管讨厌，却是一种很好的掩盖印刷机作业声的保护伞。

1931年，毛泽民三十五岁了。自参加革命以来，他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即便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他也从未背弃当年自己的入党誓言。

这一年，党内斗争尤为严重，王明取代了李立三把控了中央，罗章龙又跳出来反对王明。毛泽民则一直坚持走正确的路线，坚持不犯错误。

1931年4月，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抓，立即叛变。他掌握中共地下党的核心秘密，他一叛变，共产党许多地下党员都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幸亏钱壮飞等人及时得到顾叛变的情报并上报党中央，周恩来立刻实施紧急措施，避免了毁灭性打击。但因为顾顺章在特科地位高，知道的事情多，上海的地下党还是遭到了巨大打击。恽代英、蔡和森等中共高级领导人，因为顾顺章的叛变相继牺牲。

毛泽东、毛泽民、周恩来得到这个消息都非常心痛，蔡和森和毛泽东是同乡、同学、同志，和周恩来是一起留法的同志，就这样牺牲了十分可惜。

聂荣臻后来回忆说：“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

因为这个突发事件，毛泽民和钱希均也被迫秘密转移。

这年6月，他们便南下香港，去参加广东省委的工作去了。

毛泽建的牺牲

毛泽建这个名字是她到上屋场以后毛泽东帮她取的。

她出生在 10 月，正是菊花盛开的时节，所以乳名叫做“菊妹子”。

毛泽建的父亲是毛泽东嫡堂叔，毛泽建是毛泽东的堂妹。幼年时，因为生活困难，毛泽建被过继给毛泽东的母亲文素勤做干女儿，长到十几岁，毛泽东的父母先后过世，毛泽建生活没了依靠，经亲戚牵线，被送到湖南杨林一个姓肖的人家做童养媳。

毛泽东的母亲病逝前，曾去长沙住了一段时间，毛泽建也跟着去了，大概有两月光景。文素勤曾经把毛泽建托付给毛泽东，希望他把她当做亲妹妹看待。毛泽东记住了。

1920 年年前，毛泽东回到韶山，不见毛泽建。当他得知毛泽建已经嫁人了，去别人家当童养媳，立刻找人去送信，请毛泽建回家。兄妹得见，毛泽东和毛泽建都十分高兴。

毛泽东问妹妹是否愿意跟他去长沙读书，毛泽建立刻表示同意，她不愿意去肖家做童养媳，她非常渴望跟着大哥一起去干革命。

毛泽建走了，肖家很着急，他们打听到自己家的媳妇被她哥哥带去了长沙，就写信去问。毛泽东回信说，泽建不会回去了，让他们再找一个媳妇。

到了长沙以后，毛泽建先后进入“建本”和“崇实”两所女子职业学校读书。她很刻苦，成绩很好。没过多久，毛泽东在长沙办自修大学，设了补习班和平民学校，实际上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毛泽建积极参加，思想上进步很快。

她曾为党组织的秘密会议站岗放哨，还曾去发传单、贴标语。

有一次，毛泽东把毛泽建和毛泽覃叫来，要当面考考他们是否认真学习。毛泽覃笑着说：“先考‘钝钉子’吧。”“钝钉子”是个绰号，是毛泽覃替毛泽建取的。

毛泽建笑着说：“我这颗钉子，钝是钝了一点，但只要下功夫，还是能钉进去的。”

考试完毕，毛泽东给毛泽建下评语，他称赞妹妹的刻苦精神，“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1923年上半年，毛泽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年夏天，毛泽建改名毛达湘，经夏明翰介绍，从长沙去衡阳从事革命活动。

初秋，她考入衡阳县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后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和湘南学联女生部部长。

毛泽建已经开始独立组织革命活动了。她发起“旅衡同学会”“旅郡励进会”和“品学励进会”；她热心妇女运动，宣传妇女剪发、放脚；她批评“三从四德”，反对纳妾；她积极发展先进分子成为共产党员，扩大党的组织。在“三女师”，毛泽建是一个进步的明星。

她和她敬爱的大哥毛泽东始终有联系，在精神上，毛泽东始终是她的支柱和导师。

1925年，毛泽东回韶山发起农民运动，后遭通缉，南下广州。路过衡阳时，毛泽东曾去探望毛泽建。他给了她很多鼓励和指导，要求她学习上刻苦，政治上进步。

在毛泽东的“牵线”下，毛泽建认识了她一生的伴侣陈芬。陈芬是省立“三男师”的毕业生，也是共产党员，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让他与毛泽建惺惺相惜，他们恋爱了。这一年冬天，他们结为夫妻。

1927年，毛泽建和陈芬一起被党组织派往衡山从事革命活动。他们参与建立了中共衡山县委，陈芬担任县委书记，毛泽建做妇女主任。毛泽建还领导了衡山的游击战争。她性子烈，倔强，身手不凡，很有斗争精神。奇袭挨户团，痛打土豪劣绅，爆炸县衙门，破坏铁路等都是她的“杰作”。

反动当局痛恨这个“女游击队长”，但又拿她没有办法。她给自己取了个别名“毛日曦”，寓意为，共产党人要像太阳一样，光明普照，轰轰烈烈。



★ 1926年至1927年上半年，毛泽建在衡阳、衡山等地从事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发展党组织，创办农民协会和农运训练班。图为毛泽建领导创办的神皇山模范农民协会旧址

她的名字叫泽建，但她更喜欢把自己的名字写成“泽剑”，她希望自己像宝剑一样锋利，所向披靡。她写信的时候，便常常在末尾画上一把宝剑。

1927年，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起义失败后，转入井冈山发展革命根据地，继续斗争。毛泽建和陈芬依旧在衡阳、衡山等地领导工农运动。

1928年，朱德、陈毅在上井冈山之前发动了湘南暴动。而这时，毛泽建和陈芬刚刚领导了南岳暴动，起义的队伍一度攻占了南岳镇，但最终失败。

1928年3月，因为叛徒出卖，衡山县委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毛泽建和陈芬在党组织的指示下，化装离开衡山，突破层层封锁来到耒阳，与朱德会合。4月，朱德要上井冈山，陈芬和毛泽建则留在耒阳展开地下斗争。

此时的毛泽建已经有了七八个月的身孕。

1928年夏天，在耒阳下塘铺的一次突围中，毛泽建和陈芬被捕，并负重伤。陈芬被杀，敌军割掉了他的头颅，在耒阳城头挂了三天三夜示众。

井冈山方面得到消息后，派了一支部队突袭挨户团，救出毛泽建。即将临盆的毛泽建躲在夏塘铺一个孤老太婆家产子，她生下一个男婴，取名艰生。可是，婴儿的哭声引来了敌军，毛泽建再次遭到逮捕。一起被捕的，还有陈芬的姐姐陈淑元和毛泽建刚出生的儿子。陈淑元没暴露身份，她被保释出狱，带着孩子。

敌人没打算放过毛泽建，因为她是共产党地方支部的领导人，大名鼎鼎的女游击队长，又是毛泽东的妹妹。在狱中，毛泽建经历了千难万苦，抽皮鞭、压杠子、拔指甲，她坚贞不屈……

陈淑元来看她，毛泽建已是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她说想见见孩子，可是，小艰生已经因为无奶水喂养，出生几个月便夭折了。陈淑元见毛泽建思儿心切，不忍心告诉她这个残酷的消息，她从老乡家里借了一个孩子，带去见毛泽建。

毛泽建抱着孩子，又是笑又是亲。面对此情此景，陈淑元失声痛哭。

一个无论如何不肯叛变的共产党员，对敌人来说，即是最大的羞辱。敌军把毛泽建关了一年多，终于下了杀心。1929年8月20日，衡山城南门马庙坪，毛泽建慷慨就义，年仅二十四岁。

她是毛家第一位烈士。

杨开慧之死

为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离开了家。

他走后杨开慧只收到过一封信，此后，她只能从报纸上得到丈夫的消息。当得知毛泽东秋收起义后上了井冈山，与朱德会师，革命队伍扩大了，她为他们高兴。

但朱德的妻子伍若兰的牺牲却让杨开慧感到了一丝阴郁。那是 1929 年 2 月的事，国民党把伍若兰的人头挂在长沙城示众。

杨开慧为此写了一篇杂感，叫《见欣赏人头而起的悲感》，控诉敌人的残暴。

杨开慧又开始思念毛泽东了。秋天到了，天气凉了，白色恐怖让长沙城一片萧瑟，因为思念，杨开慧写了一首《偶感》：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心怀长郁郁，何日复重逢。

白色恐怖严重，她把这首诗藏了起来，五十八年后才得见天日。

杨开慧并不是一个只顾念儿女私情的人，毛泽东走后，她担起了家庭的重担，照顾孩子和老人——她和毛泽东有三个儿子，岸英、岸青、岸龙，她母亲向氏身体不好。她依旧坚持地下斗争，经常在长沙周围各县奔走，上传下达。

1930年，长沙的白色恐怖已经到了极点，湖南省委遭到破坏，被迫转移到安源，后又迁去湘南。杨开慧和省委断了联系。

其实，毛泽东一直想给杨开慧写信，但始终不知道她的通信处。1930年夏天，李立三掌握了中共中央的军事指挥权，他下令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军攻打大城市，比如南昌和长沙。尽管毛泽东并不看好，但他还是得按照指示行动。

红军开始攻打长沙了，毛泽东率领军队来到了长沙郊区的田心桥。杨开慧此时不在长沙，她去了平江，但得知毛泽东的消息后，她立刻往长沙赶。

红军围攻长沙十六天，因敌我双方兵力强弱悬殊，始终未能突破敌守阵地。

9月，毛泽东不得不率部队离开了长沙城，南下吉安。不知情的杨开慧来到了长沙，一路上，她遇见了从长沙撤下来的农民赤卫队，这才得知，毛泽东已经走了。

她再次与日日思念的丈夫毛泽东失之交臂。

杨开慧回到板仓。杨老太太看到女儿回来，大惊失色，她告诉女儿，现在长沙十分危险，红军攻打长沙，何键十分愤怒，他正疯了样到处抓人。

杨开慧却很冷静，她告诉母亲，自己还需要组织板仓一带的同志撤退，等一切安排好，她立刻离开板仓。

杨开慧知道，外面何键密探很多，她有地下工作的经验，行事十分小心，但一个五十多岁的侦缉员还是发现了她——他挑瓦罐在板仓附近转悠，一看见杨开慧立刻跑回团防局汇报。半夜，团防局派出了八十多人，将板仓杨寓团团围住。

杨开慧迅速烧掉了手上的机密文件。鹰犬们冲进了房间，逮捕了杨开慧和家中保姆陈玉英，一同被抓的，还有杨开慧和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

杨开慧等人被押送到长沙，先后关在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清乡司令部和陆军监狱署。

何键得知杨开慧被捕欣喜若狂，他们扬言：“杨开慧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

他们想尽办法对杨开慧进行逼供，皮鞭抽、木棍打、竹签扎、杠子压，可是翻来覆去，得到的也只有三个字：“不晓得。”

在他们看来，杨开慧是一个危险分子，因为她不但经受住了审讯的折磨，还总是想尽办法对狱中的难友宣传革命道理，鼓励大家要经受住考验，不怕牺牲，坚持斗争。

这是一个共产党人的气节，这是毛泽东之妻的风骨！

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曾经是湖南省内响当当的人物，他的门生遍布全省，他的影响力在他死后依旧很大，杨开慧被捕后，共产党组织多次营救，社会名流、各界群众也要求何键当局释放杨开慧。

开慧被捕，全国舆论为之哗然，蔡元培、章士钊等知名人士纷纷发电报，要求保释杨开慧，南京政府也曾致电何键，嘱其缓刑。

可何键恨透了毛泽东，他怎么愿意放过杨开慧呢，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他征询叛徒任卓吾的意见。任曾经是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他说：“攻心为上！何不动员她与毛泽东离婚。把离婚声明登在报纸上，对毛泽东、地下党组织，会是一个重磅炸弹！政治上就是一大胜利。以此为不杀杨开慧的条件，对社会名流也好搪塞。”

任卓吾来到监狱劝杨开慧：“你年纪轻轻，上有老母，下有孩子，要好好想一想，何苦执迷不悟跟着毛泽东呢？只要你登报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以获得自由。”

杨开慧说：“我杨开慧把自己跟毛泽东的关系看得比生命更宝贵。头可断，血可流，要我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你们是痴心妄想！”

任卓吾灰溜溜地走了。

何键听闻杨开慧不肯照办大为震怒，在他看来，杨开慧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 1983年冬，毛岸青（右）、邵华（中）、毛新宇为杨开慧扫墓

他放出舆论，说：“毛泽东的堂客不杀，别的政治犯都可以不杀了。”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从容就义，时年二十九岁。

她是毛泽东家族牺牲的第二位亲人。

杨开慧牺牲，毛泽东痛苦不堪，要知道，杨开慧是因他而死的啊！如果她不是毛泽东的妻子，如果毛泽东不攻打长沙，如果夫妻二人可以相见，一起去干革命……人生没有如果，杨开慧二十九岁去世，毛泽东却还有很长的革命路要走。

1930年12月，他得到杨开慧牺牲的消息时，直觉得五雷轰顶，甚至需要警卫员扶着才能站住，他给杨开慧的亲人写信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毛泽东开始了漫长的对杨开慧的思念。

1957年，毛泽东接到杨开慧的好友李淑一怀念烈士柳直荀的一首词后，当即和了一首《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高亢遒劲，荡气回肠。

杨开慧死后，毛泽东对开慧的母亲十分照顾，他让儿子们去看望外婆。

1962年，杨母去世，毛泽东给杨氏亲属写信，提及杨开慧，依旧称她“我亲爱的夫人”。



★ 毛泽东和早年挚友柳直荀的夫人李淑一
在长沙合影（1959年6月）

“三毛”流浪记

1929年毛泽东给李立三写过一封信：“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的情形。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

自秋收起义离家后，毛泽东一直十分思念杨开慧和儿子们，怎奈工农武装割据刚刚起头，万事十分艰难，一直没能团圆。

1927年10月，毛泽东在江西宁冈写信给杨开慧：“霞：我来此经商，开始生意不佳，蚀了本，如今渐有好转，兴旺起来了。差堪告慰……润。”

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11月即被军阀何键残忍杀害于长沙市浏阳门外识字岭，年仅二十九岁。

保姆陈玉英和儿子毛岸英当时也一同被捕入狱，但因为岸英年纪尚小，根据法律不能处死，何键便想要用毛岸英做诱饵，诱捕更多共产党人。

开慧牺牲十八天后，毛岸英和陈玉英在亲友的保释下出狱，回板仓和外婆向氏和舅妈李崇德一起生活。何键派出特务，经常在附近活动监视。

杨开慧被捕当年曾经写过一封“遗嘱样的信”，写给他的弟弟：“……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严肃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欢喜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扰得我非常利（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

们的，而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倘若真的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而不至于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

杨开慧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她已经考虑到孩子们的未来，这才向堂弟“托孤”。谁承想在她被捕之后没多久，杨开明也被捕入狱，很快牺牲。这封信没能寄出，直到几十年后修葺板仓杨宅才在墙缝里发现。

杨开慧牺牲，毛岸英三兄弟失去了妈妈这个保护伞，命运之神突然露出了更加狰狞的面孔。

母亲的牺牲给幼小的毛岸英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创伤。在狱中时，他见敌人把他妈妈打得遍体鳞伤，他用小手抚摸着妈妈的伤痛，说：“妈妈，他们现在打你，将来我长大了要狠狠地打他们。”可眼下他却无办法，他年纪尚小，没有力量与那些凶残的反动派对抗。他希望自己快快长大，可坎坷的童年偏偏如此漫长。

开慧被捕的消息一个月后传到江西中央苏区，毛泽东当时忙于第一次反“围剿”。他在一张缴获的报纸上看到了开慧的近况，五中似沸，可是，山高路远，局势非他可以掌控。

1930年底，毛泽东在江西吉水敌伪的报纸上看到开慧牺牲的消息，简直像遭遇晴天霹雳，他悲痛地写道：“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他托人辗转为板仓杨家寄回三十块银元，嘱为烈士修墓碑。当地群众用这些钱修了墓，立了碑，上书“毛母杨开慧墓”。

长沙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时刻都有可能危及毛岸英三兄弟，外婆向氏年事已高，舅妈李崇德要在外为生计奔波，毛岸英三兄弟待在长沙已不合适。这时毛泽民刚从天津回到上海，他得知消息后很不放心几位侄子，写信给湖南省委，让他们想办法把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送出来。

毛泽民又附信给杨老太太，一来安慰，二来向他们征求送三兄弟出湘的事。杨家人商量了一夜，决定就按毛泽民的说法，把孩子送去上海。

外出需要盘缠，李崇德就去长沙找老熟人胡子敬借了五十块银洋。杨老太太则帮着收拾行李，她把毛泽民的密信缝在小岸龙的裤腰里。

春节过后，杨老太太和舅妈带着三个孩子到杨开慧的坟前磕了几个头，让孩子一定要记住这血海深仇，随后便上路了。

孩子年纪小，舅妈李崇德不放心，她随一位农民纠察队员用土车推三个孩

子到白水车站，再护送三个孩子坐火车，又转坐江轮，到上海从十六铺码头上岸，按照信上的约定找到“天生祥酒行”地下联络站。

上灯的时候，毛泽民和钱希均来了。

毛岸英年纪大一些，懂事也多，他一头扑在叔叔毛泽民的怀里，流着泪说：“叔叔、叔叔，我要见爸爸。妈妈被反动派杀害了，我要找爸爸，我要报仇！”

岸青、岸龙还小，只是流泪。

毛泽民哽咽了，他拉着毛岸英的手一颤一颤地，“好孩子，不要哭，革命是要死人的啊！坚强些，你爸爸不在上海，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打反动派。为妈妈报仇！为穷人报仇！你们现在还小，等长大了，为妈妈报仇，为穷人报仇！”毛泽民告诉毛岸英，他爸爸已经托人带信，要他在上海听话，照顾好弟弟。

当晚，毛泽民亲自安排他们住进了附近的大安旅馆。

周恩来得知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来到上海，决定将他们送到中共地下党主办的大同幼稚园抚养——很多中共领导人的孩子都先后被幼稚园收养。

毛泽民和钱希均给孩子们买了新衣服，又帮他们改了名字，分别叫：杨永福、杨永寿、杨永泰，再领着他们去了幼稚园。此时毛岸英八岁多，毛岸青七岁，毛岸龙不到四岁。幼稚园的负责人是中共地下党员、上海圣彼得教堂的牧师董健吾。

顾顺章叛变对上海党组织的冲击很大，毛泽民和钱希均也必须暂停在上海的出版发行事务，南下香港去广东省委工作。毛泽民不放心几个侄子，临走之前，想见见他们。



★ 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化名杨永福、杨永寿、杨永泰，于1931年初由叔叔毛泽民安排进上海大同幼稚园。图为毛岸英（二排左一）、毛岸青（二排右一）、毛岸龙（二排右二）在大同幼稚园合影

非常时期，为了保护孩子们，幼稚园已经封园，毛泽民进不去。后经幼稚园负责人董牧师协调，毛岸英三兄弟经由地下交通员带出，在法国公园和毛泽民夫妇以及外婆见面。

毛岸英说，晚上兄弟三人睡在一起，每天都念书。孩子们问叔叔毛泽民，爸爸是否也在上海。毛泽民心痛不已，大哥为革命付出全部精力，三个侄儿却在上海漂泊，自己又要南下，以后的生活真是未知数。

毛泽民说，你们的爸爸不在上海。毛岸英最懂事，他从怀里掏出一封早已写好的信，交给泽民叔叔，请他转交给爸爸。

毛泽民表示一定转交。

这是一场伤感的离别。

就在这个夏天，一天夜里，毛岸龙突然生病，腹泻、高烧，由保育员陈凤仙（又名秦怡君，李求实同志的爱人）抱到附近的广慈医院就诊。医院诊断为痢疾，经救治无效当夜死亡。次日由幼稚园负责行政事务工作的姚亚夫买棺入殓处理了丧事。

谁知上海的情况变化很快，一天，幼稚园的保育员桂荷英出去后就没再回来。情况有变！出于对革命后代的安全着想，幼稚园负责人考虑再三，决定隔年春天解散幼稚园，园中孩子全部安排回家。可是，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没处去，董牧师只好把他们带回家抚养，半年之后，又转去董牧师前妻黄慧光处，和黄慧光共同生活了三年多。

1935年秋至1936年3月，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曾像三毛一般在上海街头流浪了大半年。他们卖过烧饼，当过报童，卖过油条，推过板车，拾过破烂，饥一顿饱一顿。

他们在一座破庙藏身。天冷了，他们的铺盖只有旧报纸和稻草。他们还曾卖报为生，遭到法国巡捕的殴打。

从1935年秋天开始，上海特科的丘吉夫、徐强、李云就开始寻找毛岸英兄弟，隔年3月，终于在一座破庙里找到了他们。此时毛岸英十四岁，毛岸青十三岁。他们又被送回董家。

直到1936年6月底，在冯雪峰、董健吾、李杜、杨承芳等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毛岸英、毛岸青兄弟才有机会离开上海，乘法国船，经香港、西贡、孟买，过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到法国马赛，然后坐火车去巴黎，由苏联驻法领事



★ 毛岸英（左）和毛岸青

馆通知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代表团再派人接他们入苏，住进莫斯科市郊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开始了新的生活。

解放后，毛岸英看到电影《三毛流浪记》，激动地说：“那时我和岸青在上海的流浪生活，和三毛相比，除了偷，给资本家做干儿子外，其他几乎都经历过。”

毛泽东也曾感慨：“为了革命事业，这些孩子从小就吃百家饭，走万里路啊。”

1939年6月，毛泽民受到党组织派遣来到莫斯科。他与两个侄子有过短暂的团聚。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师哲了解毛岸英、毛岸青在莫尼诺儿童院学习和生活的情况，毛岸英等革命后代因为长期受到反动派追捕，警惕性很高，一段时间内始终隐瞒着自己的身份。

毛泽民听到后，又是感动又是伤心。感动的是，侄子毛岸英这么小的年纪就有了斗争意识；伤心的是，他们受了那么多苦，毕竟还是孩子啊！

千万里路，毛泽民终于再次见到了两个侄子。毛岸英、毛岸青激动地围在二叔身边，毛泽民落泪了。毛岸英拿出父亲毛泽东从国内寄来的照片，他说他很想念父亲，他还说，自己已经是共青团员了，打算报考军事学院，长大后要像爸爸一样做一名军人。

一路风雨，毛岸英和毛岸青走过来了。

苏联的十年制学校曾给毛岸英作如下鉴定：

永福——谢廖沙，七年级生，中国人，共青团员，1922年生人，1937年进入儿童院。总体发展和能力佳。能够轻松快速地掌握教学材料，成绩优异，遵守学校及儿童院纪律。与同学关系很好，能够帮助后进同学。在班级中有威信。有政治觉悟，在班中宣传政治消息，是宪法助理员。在学校中从事社会工作（学生会成员）。

毛岸青则在1940年填写过这样一份《个人简历表》：

我姓毛名岸青，在苏联将名改为杨永寿，因要使人不知我是谁，或是谁家之子。

我在湖南乡下杨公庙在第一年级学了一年后，在上海自己学了几年，再后到苏联进中国学校大概学了一年多，此校地址不知，再后到莫尼诺的第二国际儿童院，进俄国学校并学到六年级了。

除俄文之外，我知中文和一点点德文，中文我会说会写，写得不好，德文只知道几句话和会念拼音。

1930年，我的哥哥毛岸英及母亲杨开慧在长沙乡下被捕，因我母亲是毛泽东之妻。我哥不久放了。母亲被何键枪毙。

从幼到十一年曾在中国，因上苏联曾经过法国，1936年到苏联。

在中国先做了一年小学生，以后到上海做了一个街上流浪。养我们的人是党，是共产党。

我父姓毛名泽东，在革命以前，我不知道他做什么事，大概是革命，现在他是革命家。他现在是中共之主席。地址不知。

我母亲姓杨名开慧，她早死了，是被何键枪毙的。

爱与恨，恩与仇，早已经刻在了这些孩子们心中，他们渴盼着回到父亲身边，他们想要快快长大，为母亲报仇，为祖国效力。

毛泽东家族，从踏上中国革命这一条路起，就注定不再平凡。



★ 毛岸英（三排左四）和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一起

★★ 周恩来和邓颖超与毛岸英（右一）、毛岸青兄弟在苏联合影



★



★★

★ 毛岸英（后排左二）与国际友人在一起

★★ 革命后代在苏联。毛岸青（右四）

Место
для
фотоаппарата
(прикрепить)

(57)

1. Занятость должностью.....
2. Время зачисления на работу и № приказа.....
3. Время ухода с работы. № приказ, причины ухода.....

вопросы:	ответы:
1. Семейная жизнь, отношение [родственников]. При переписке фамилия или имени и отчества указывать старые и прежние переписки.	姓毛在出生 现在结婚 <i>Cyril</i> 104 pp
2. Время и место рождения старшего [родственника], и второго (оба, крайний, второй и самый) младшего ребенка.	1941 男 重庆南岸
3. Сохранение и воспринимание [родственников].	(妻子 若古 男) 起做作事
4.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перечислять все учебные заведения с указанием их местонахождения).	中学 7 年级
5. Какие языки знает, кроме русского, и в какой степени владеете им.	中文 知识有限 英语 1/2
6. Влия профессии или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и.	
7.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указывать время и место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в В. классного б-ла).	
8. Составляла ли расказы в каких либ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ях, в каких и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ях и других видов.	
9. Присоединяла ли к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группировкам, разделила ли антипартийные взгляды и в какие классные годы занимала, или была партизанскими во время рассматривания, норма, и т.д.	

育種時間：1956年未列於表

25. Чем занимались за границей и на какие средства существовали.

左神圖

67. Известно ли гражданам или родственникам в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странах,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в странах, где сред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х, их фамилия, имя и отчество

ВН. РОДСТВЕНН:	ОТЦИ:	МАТЬ:
а) фамилия и место жительства (указав место жительства фамилии матери)	王福泉	杨同美
б) Время и место рождения		
в) Какие данные выдают при рождении (указав место, дату и год)		
г) Какие данные даются при регистрации в школе	杨同美注册	杨同美注册
д) Чем занимается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кем, где	在福建大学	杨同美注册

89. Родителя воин (муж)

а) фамилия, имя, отчество	
б) Прены и место рождения	
в) Беспопоее и под, прологодонение	
г) Имен Выходяе неленения му- нестоо, кода в рде.	
д) Чем занимался до революция и после.	
е) Чем занимается и где выходит- ся (точный адрес)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мя.	

30. Фамилия, имя, отчество, партийность, место работы и должность, место жительства, данные совершеннолетия сестер, братьев, супруги и детей.

Москва. Ст. Ломоносова. Сферическая экстремальная геометрия. 1989.

• Подвергаются ли партнеры взаимному влиянию, то есть могут ли они измениться?

14. Принимала ли активное участие в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е, когда, где и в чем именно участвовала. Какие участки.

14. Случался ли в старой армии, когда, в какой-либо части, столько времени, в качестве кого и какой ты был член

13. Служа ли Ви в Чужа родственика
на войска и учредената бели
правителствата (бели армии), в ко-
вом чине (должност), где и кога

14. Были ли Вы в Били родственным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Белых, где, согласно
протоколу и чем занимались.

10. Служил ли в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 когда
где и в какой должности (послед-
няя должность):

16. После отчисления и военной службе
в застольный время.

17. Прямая ли же и судя,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была ли преступная, подверглась
ли наказания и судебном или ад-
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м порядке, когда,
где и за что именно. Если суди-
мость была, то когда.

16. Преправилась ли в суду,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была ли престолан, подвергалась ли наказаниям и судебном порядке, когда, где и на что именно Ва-ша охватывая родственники.

19. Имелись ли Вы или Ваши родственники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прав в на-
шах?

20. Семей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холост, женат, вдов). Если разведен, укажите бывшую жену и детей.

21. Семейная, или в отчестве юниц
(женская) или папийская и

22.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28. Подданство (гражданство). Если

- состояли в др. подданстве, то в
каком именно и когда приняты в
гражданство СССР или подданство
России.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много)
--------	----------------

10.4	Know (seven)
------	--------------

一

MEETA GAYLEN
WETA CONDUCTOR/STATION MANAGER

И. П. №	НАИМЕНОВАНИЕ УЧРЕЖДЕНИЯ И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ДОЛЖНОСТЬ	С ИМЕНИ РА- БОТНИКА	ПОДПИСЬ
12	在上海 自九岁起至 12-13岁 给人家当所 差 (指她, 倒被丑黄)			

Я, нижеподписавшийся
дв. вышестоящий подполковник [Иванов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а то, что сказано выше, имеет место и при приеме обращения от
секретных почитателей в мое отсутствие быть не должно. Если
дальнейшие действия, касающиеся а) не имеют ни малейшего
Также обязуюсь сообщить секретарю в знак вынужденности в по-
подписания в 10 родственных извещениях, являющихся служебными
впоследствии.

Имею честь, что из вышесказанного никак нельзя по секретному
работе а некую строгую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в худшем порядке.

Подпись: _____

Подпись: _____

1940 г.



★ 在苏联留学时的毛岸英



★



★★

★ 1944 年，毛岸英在苏联

★★ 在苏联当兵时的毛岸英

·第五章·

星火：
南方苏维埃

三湾改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领着一小支部队向江西萍乡、莲花前进。

这一路并非坦途。到萍乡县上栗市，得知萍乡县城内驻有敌军，部队只能绕道芦溪进入莲花。到了芦溪之后，师部命令在芦溪街上露营，毛泽东觉得这会影响百姓，且容易招来敌军，传令移驻芦溪西南大山下宿营，且途中不准点灯火。

第二天，部队向莲花进军，却因军事侦察不力，敌情不明，遭到敌军袭击，损失人枪各两三百。

工农革命军继续向前，终于攻克莲花县城，打了个小胜仗。革命军俘虏了保安队长，解救被关押的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七十余名，开仓放粮，救济贫苦民众。可师长余洒度却擅自放走了保安队长。

毛泽东听后十分生气。这支革命队伍的领导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比较复杂。此前，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一直支持毛泽东，可等到攻克莲花县城，卢德铭已经在之前的突围战中牺牲了。

师长余洒度和三团团长苏先俊一直对毛泽东不服气，余洒度最初就力主攻长沙，被毛泽东压下来。秋收起义失败后，他又认为毛泽东不听从共产国际、党中央、湖南省委的命令，擅作主张带兵南下，很有情绪。到了莲花城，余洒度又将保安队长放走，这使得他和毛泽东的矛盾激化了。

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评余洒度。余洒度拒不接受批评，会还没开完，他站起来就走。

毛泽东不予理睬，他听了朱亦农等汇报莲花县党组织、农民武装以及江西永新、宁冈农民武装斗争的情况，证实井冈山确有两支地方武装。

毛泽东决定向井冈山靠近。

这个多事之秋，毛泽东的身体出了问题，他脚部疼痛，不能行走，但他却坚持不坐担架，与大家一起朝永新方向进发。他想用“以身作则”来鼓舞军队士气。在攻入莲花县城之前，在高滩村，他向部队士兵讲过话，他要求指战员不要怕行军困难，不要怕暂时受挫，要看到光明。

毛泽东已经感受到了部队中异样的情绪。

当工农革命军从莲花出发向着永新三湾前进的时候，毛泽东发现，他必须要正视并解决一个大问题——部队的纪律和士气。师长、团长都有情绪，何况下面的士兵。

从文家市转兵以来，一路突破国民党各路“围剿”，进行多次战斗，导致伤员不断增加；连续行军，长途跋涉，怕苦怕累的都有，有一些人掉队，还有少量士兵自行离队；再加上又是夏秋之交，疟疾肆虐，很多人生病，因为得不到及时医治，不少人就死在路旁；还有一些长官带有旧军队习气，随意打骂士兵，有的长官怕艰苦意志动摇开了小差，有的团营甚至出现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的情况。

军纪松弛，人心浮动，再不加整治，眼看就要变成一群乌合之众。

余洒度这样的师长正在对稳定军心起着反作用。他率领部队进了永新县三湾村，当地群众被吓得躲到了山上，毛泽东为了召回老百姓，让各单位派人去山上喊话，向群众做宣传，说工农革命军是为穷人打仗的，让他们不要怕，天下穷人都是一家人。群众这才回到村里。

毛泽东深感问题的严重性，这样一支军队，自身实力差，军心不稳，又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很快就可能覆灭。

他必须当机立断。1927年9月29日晚上，毛泽东在三湾村主持召开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

第一，整顿组织，把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陈浩做团长，下辖一营、三营、特务连、军官队、卫生队。同时毛泽东提出去留自由的原则，真心愿意干革命的，留下，欢迎；不愿意干的，给路费，欢送。

第二，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把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设党委，部队由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支部建在连上，确保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方便做思想工作，利于一统军心。

第三，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连、营、团三级建立士兵委员会。

这就是“三湾改编”。

当时三湾流传着歌谣：“三湾降了北斗星，漫山遍野通通明。1927 那一年，三湾来了毛司令……”

毛泽东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

这支军队区别于旧军队、国民党军队，是一支有战斗力、有凝聚力的队伍。

毛泽东用这种强有力的改编，煞住了余洒度等人的分裂之心。不久，余洒度和原三团团长苏先骏就以向中共湖南省委汇报为名，私自脱离了工农革命军。

三湾的枫树坪，那两棵老枫树粗壮挺拔，枝繁叶茂。9月30日，毛泽东站在枫树下，向全体指战员宣布改编的情况。

“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带了一军人。我们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成功。”“要革命的留下，站在枫树左边。”

毛泽东的话总是那么鼓舞人心，大浪淘沙，只有有信念的人，才能走到最后。



★ 三湾枫树坪

当时的连指导员罗荣桓，就一直从三湾坚持到了革命的胜利。

站在枫树坪，面对改编后的官兵，毛泽东对未来抱着信心，不过眼下，他要为这支部队找一个落脚点，敌人很可能从后方追来。井冈山上有群众，还有两支地方武装，他必须要取得群众的支持，取得地方武装的接纳。他给永新农民自卫军首领之一的袁文才写信，又联系中共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希望能够展开合作，一道开展革命斗争。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因追赶不上起义部队，已折返回长沙，从事地下工作，他将要去上海。

三弟毛泽覃，不久前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工作，随军驻在九江。

因蒋介石“清党”，打算联蒋反共的张发奎要将第四军内的共产党员杀光。

毛泽覃提前知道了消息，化装连夜逃离九江。他听说南昌起义爆发，连忙赶去南昌，可等他赶到时，起义军已经撤出南昌城，他只好迅速出城追赶。最终，毛泽覃在临川城外追上了周恩来，转而进入叶挺部工作。

毛家三兄弟就这样随着革命的潮流，走着各自要走的路，谁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团聚。

落脚井冈山：从茅坪到茨坪

三湾改编后，工农革命军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一位连长曾这样给妻子写信：“我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同志之间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

可一直行军打仗也不切实际，毛泽东必须给部队找一个落脚点。

井冈山是个好地方，但已有人“先入为主”。毛泽东需要给当地农民赤卫队做工作。这两支队伍，更像是毛泽东小时候看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里的“占山为王”，两个领袖，则有点类似“山大王”。

袁文才，江西省宁冈县茅坪马源村的一个贫苦农民。1927年，他和王佐发起“永新暴动”，攻入县城，营救了一批共产党员和群众，成立赣西农民自卫军。后因敌人反扑，退到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地区宁冈县茅坪一带，打游击战。

王佐，江西遂川客家人，裁缝出身，1923年就参加了绿林武装，后在遂川成立农民自卫军。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永新国民党右派政变，他被迫进行“永新暴动”。

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善于与农民打交道，他了解袁文才和王佐的戒心。这是人之常情。毛泽东不着急进入井冈山，而是先写信探探情况。

毛泽东给中共宁冈县负责人龙超清和袁文才写的信，他们很快就收到了。龙超清原是本地富家子，后去南昌求学，参加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尽管他只有二十二岁，但已是党在宁冈县的负责人。他知道毛泽东的大名，瞿秋白

早就称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他对毛泽东率部来到宁冈欣喜不已。

袁文才是有防备的。毛泽东的信他看到了，言语恳切，文采风扬，不是一般的人物。可毛泽东来井冈山做什么？他是不是想占山？这对他们是个大威胁。

他召集心腹讨论对付。手下陈慕平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毛泽东的课，十分佩服，一听说毛泽东来了，兴奋不已，说这是个大人物。

龙超清接到毛泽东的信后，积极做袁文才的工作。袁文才让陈慕平陪着龙超清一起去见毛泽东，自己先不出面。

1927年10月初，三湾村，毛泽东见到了前来接头的龙超清和陈慕平。尽管毛泽东的学识和身份都远远高出很多，但他依旧平易地和他们说明工农革命军的政治主张和来意。

龙超清当即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但具体事宜还得和袁文才商量后再定。他建议部队可以先去离三湾三十里的古城镇。

10月3日，毛泽东率部离开三湾向宁冈古城前进。出发前，他再一次在枫树坪对官兵讲话，要求大家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

毛泽东一向注意军纪，非常时期，取得本地武装和本地群众的好感十分重要，他不得不三令五申，让士兵们注意自己的形象。

这是一支和善的军队。

到了古城，部队开了三天的会，主要讨论“安家”和开展游击活动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这次秋收起义，现在看来军事指挥有缺点，没有高度集中部队，没有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军事上我们失利了，但在战略上不能说我们失败了。虽然说我们的人少了，却很精干，力量还很强，大有希望。现在我们作战略上的退却，来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广大的农村是海洋，我们是鱼，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是我们劳动人民的天下，不是敌人的世界。”

毛泽东的诚意很快打动了袁文才。10月6日，袁文才和毛泽东在大仓村见面。毛泽东胆识过人，他知道要取得袁文才的信任，不能带大部队去——他只带了少数随员前往。这令袁文才有些吃惊。

毛泽东的诚意还不止这些，他送了袁文才一百支枪。在战争年代，这是十分珍贵的礼物——枪是革命的本钱。袁文才也不愿表现得小气，这些农民自卫军身上都有一种江湖义气的，他当即拿出几百块银元，并表示愿意帮助筹备军粮和安置伤病员。他还答应上山做王佐的工作。

毛泽东为自己的部队争取到了地方，隔天，他们进驻井冈山脚下茅坪一带，部队得以休息。在茅坪的象山庵设了留守处，在攀龙书院设了后方医院，辎重和多余枪支也有了安放的地方，伤病员得到妥善安排。

毛泽东并没有让全部官兵休停，伤员留下，剩下的人或者去开展游击战争，或者出去做政治宣传，并调查井冈山周围的情况。

自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就开始派人兵分两路，去湘南和江西各地进行革命宣传，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的名义，写标语、贴布告。布告内容一般都是说明自己是什么军队，宗旨是什么，号召群众起来打土豪，闹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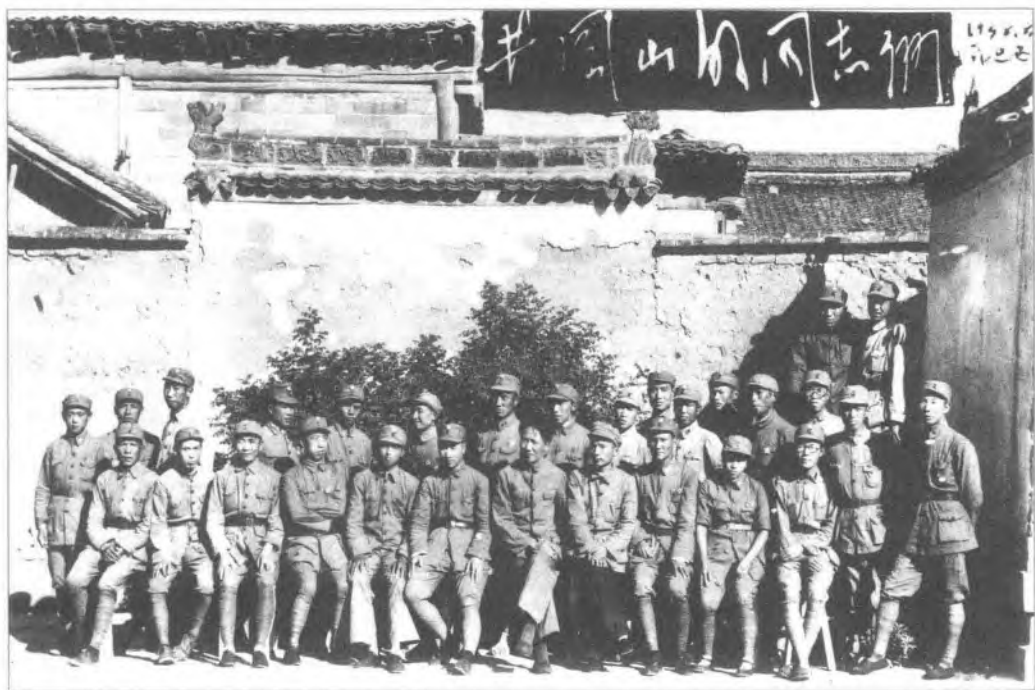
宣传工作毛泽东从未放松。日后成立红军，他就明确要求部队要完成三大任务，‘人人都要会打仗，人人都要会做宣传工作，人人都要会做组织群众工作。每个红军战士，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

毛泽东的脚伤还没好，他被安排在乡村郎中谢家慈的八角楼上住。这是一栋土砖结构两层楼房，楼上有一个八角形天窗。日后，毛泽东就是在八角楼的清油灯下，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这样的经典著作。

茅坪是山脚，毛泽东准备上山了。可一路以来一直与毛泽东有矛盾的余洒度、苏先骏等人不那么想，他们不想上山，认为这是落草为寇。他们坚持认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根本没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国际上也没有这个先例。



★ 井冈山茅坪毛泽东旧居——八角楼



★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入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图为1938年毛泽东与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部分指战员在延安合影

他们要去找上级告状，脱离工农革命军。

毛泽东的态度是，愿意留下来的就继续革命，要走的，不留。

毛泽东从报纸上看到了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的消息。他彻底打消了退往湘南的念头，坚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也就是井冈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

毛泽东开始注意发展新党员。酃县（今炎陵）水口叶家祠，一次入党六人，他亲自主持仪式。他要扩大共产党组织在井冈山的影响，就必须培养新苗子，战争中牺牲了不少同志，党需要新鲜血液。

他还帮助袁文才训练士兵。在步云山，毛泽东派的人不但对袁文才部进行军事训练，还进行政治训练。袁文才虽然加入了共产党，但他的政治觉悟还需要提高，而新招募的士兵，有很多都是无业游民，他们需要通过政治训练成为合格的士兵。毛泽东不歧视他们，反而热情接纳，他们都是被压迫的阶级弟兄。

他关心部队的军事训练，还去练兵场询问战士的训练情况，鼓励战士练好本事。

刚到井冈山不久，毛泽东需要熟悉环境。他又开始用他的看家本领——社会调查，这是他深入了解社会的一种有效方式。

在水口，他了解了罗霄山中段周围各县的敌情、阶级状况、土地占有情况、地理环境、物产资源等。他已经做好长期待在这里的打算。袁文才已经去做王佐的工作，王佐还不是共产党员，他在山上坚持斗争。

敌人突如其来的进攻加速了毛泽东“上山”的步伐。

湘军分两路从茶陵开来进攻工农革命军。毛泽东兵分两路，一路去茶陵打游击，扰乱敌人后方，另一路则沿湘赣边界游击，并努力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因为人员少，只能打游击，毛泽东深感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结合的重要，如果没有农民的帮忙，在这茫茫深山作战实在困难。

地主武装冷不防跑来“捣乱”。1927年10月23日凌晨，部队在大汾镇遭遂川地主武装“靖卫团”的袭击，队伍被打散。第三营与团部失去联系，向南进到上犹与桂东交界地区。毛泽东率领团部与特务连撤退，一直跑到井冈山南麓黄坳，收集失散人员共四十多人。

情况已经十分艰难，但毛泽东还是以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引导着大家战斗。

罗荣桓曾这样回忆那一段经历：“大家又饥又饿，无精打采，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几个战士带着钱从老百姓家里找来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和大家一起用手抓饭吃。饭后，毛泽东站起来，朝中间空地迈几步，双脚并拢，身体笔直，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连长喊口令！’这种坚强、镇定、大无畏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指战员，他们一个个提着枪站起来，列队向排头看齐。”

就这样，毛泽东带领着大家向井冈山转移。

他穿草鞋，脚被草鞋带子磨烂，行动很困难，但他坚决不坐担架，拄着棍子步行。部队走到井冈山西南荆竹山下，王佐派人来了。毛泽东带着部队上了山。

毛泽东没有放松警惕，他对自己的部队有要求，他跟战士们说，一定要跟山上的群众和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

他颁布了工农革命军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

一个晚上，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先到大井，第二天到茨坪。



★ 1965年5月27日，
毛泽东接见井冈山
管理局的干部

王佐欢迎了他们。跟对待袁文才一样，毛泽东也以枪作为见面礼——他给了王佐七十支枪。王佐回赠五百担稻谷做军饷，又给了一些银元。

秋收起义的纲领没有得到中央的批准，第一师又受到严重损失，从城市中心论的观点来看，这个运动似乎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中央委员会明确地指责毛泽东。湖南省委也攻击毛泽东，说他们是“枪杆子运动”。毛泽东被撤销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

那些坐在上海办公室里的领导人，不但对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指手画脚，他们的“左”倾盲动主义不久将会让共产党受到更大的打击。可对身在井冈山的毛泽东来说，这些杂声，不听也罢，而且因为交通不便信息阻碍，上面的这个决定要到1928年3月才传到井冈山。

11月中旬，李宗仁对唐生智发动战争，江西国民党军队被卷进去，茶陵敌军军力空虚，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派人攻打茶陵。

部队出发前，他不忘做思想工作，要求部队沿途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攻克茶陵后，要帮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当月18日，茶陵城破，县署的卷房被查抄，监狱被砸烂，农运骨干被救出来八十多名。

城是打下来了，可新政权的建立却很曲折。三湾改编时任命的团长陈浩，私自委派工农革命军战士谭梓生做县长。谭梓生觉悟不高，还按照旧政府的程序，

升堂审案，纳税完粮。陈浩则贪图享受，一进城就和手下一起吃喝玩乐，还嫖上了一个妓女，丧失了一个工农革命军人应有的品格。

一营党代表宛希先忧心不已。他写信给毛泽东说明情况。毛泽东回信说：“由部队派人当县长是不对的。不能按国民党那一套办，要成立工农兵政府。要保护商店，保护邮局，保护学校，保护医院……”

宛希先接到信后，立即把毛泽东的指示向党组织汇报。11月27日，工人出身的谭震林被选为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第二天，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在洣江书院操坪举行成立大会。

这是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工农兵政权。

红色信使到井冈

毛泽覃没赶上南昌起义，只好沿着起义大军南下的路线追赶。快到江西临川边境，起义军发现了他，他被当做奸细绑到司令部。

迎接他的是周恩来，他们曾经在黄埔军校共事过。毛泽覃是政治部科员，周恩来是政治部主任。见到毛泽覃，周恩来很高兴。他把毛泽覃安排在叶挺的十一军政治部。

随后，部队转战广东，主力在汕头、揭阳等地遭到敌军的围攻，损失惨重，不得不分散行动，大约有两百人逃往饶平，毛泽覃跟着这两百人一起走，遇到了前来增援的朱德。自此，毛泽覃便随着朱德、陈毅，在湘鄂赣交界活动，在湘南开展革命斗争。

朱德领导了宜章暴动，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但湘南显然不是一个可以长久待下去的地方，粤桂湘军阀混战结束了，军阀们勾结起来，用七个师的兵力，“围剿”起义军。朱德、陈毅需要为起义军找一个新的落脚地。

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这消息令朱德兴奋不已。

井冈山，易守难攻，敌人势力薄弱，如果能去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就可以保存、壮大革命势力。但在毫无沟通的情况下贸然前去，又不妥当。朱德得知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就在军中，便请来毛泽覃，问他是否愿意去井冈山跑一趟，和他大哥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联系。

毛泽覃一口答应下来。

毛泽覃穿国民党军官军服，带好证件（国民党第十六军的副官），化名覃泽，

一路向北闯关，终于来到茶陵坑口村。毛泽东指挥的部队刚拿下茶陵县城，成立了工农兵政府，毛泽覃的到来引起了哨兵的注意，他们把他押送到工农兵政府，一经查问，才知道覃泽是化名，来者是毛委员的弟弟。

工农兵政府派人把毛泽覃护送到井冈山。在宁冈茅坪，毛泽覃终于见到了自己思念已久的大哥。

毛泽东很迫切地想知道毛泽覃这一段时间的情况。他看弟弟一身国民党军装，便问：“武汉一别，再无音讯，你还在张发奎的第四军吗？”毛泽覃说，他刚从武汉到九江不久，张发奎就想杀掉军里所有的共产党员，幸亏叶剑英通知，他才和政治部的几个同志化装逃出九江，他们听说南昌爆发起义，就连忙往南昌赶。毛泽东又问：“你参加南昌起义了？”

毛泽覃说，他们到南昌城的时候，起义军已经南下离开，张发奎占领南昌，他们只好出城追赶，这时候他和几个同志也走散了，在城门口又被守卫拦住，幸亏他口袋里还有一张四军的军官证，官兵才愿意放行。

毛泽东问：“你追到了起义部队？”毛泽覃说：“在临川附近追上的，身上没钱，就讨饭，困了，就地休息，终于找到了部队，见到周恩来同志，我就在叶挺的十一军政治部工作，后来我军主力在汤坑被敌军包了饺子，又在流沙吃了败仗，起义部队一下散了，敌人到处杀人。”

毛泽东问：“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毛泽覃说：“部队散了，我和几个同志一起，后来又会合了几百人，打游击到了饶平，在饶平遇到了朱德。朱德那支部队在三坝河打了三天三夜，突围后本打算去潮汕和主力部队会师，但遇到我们之后，才知道已经没必要去了。”

毛泽东问朱德那有多少人。毛泽覃说本来有一两千，但一路不断损失，现在估计只有七八百人了，现在只有一个团，朱德是团长，陈毅是指导员，王尔琢是参谋长。

出奇的相似。都是一个团，都是千把人。

毛泽覃接着说：“朱德同志很为部队的去向着急，他看到报纸上有大哥的消息，就派我来打探打探。”

毛泽东这才明白三弟突然前来的用意，一是“探亲”，二是当革命的信使。

毛泽东招待毛泽覃在茅坪吃饭，袁文才、陈慕平以及贺子珍、贺怡姐妹陪坐。

毛泽覃到底年轻，说着说着就得意地说起打仗的时候，朱德让他在太庚当“县

太爷”的事。毛泽覃的“县太爷”论立刻就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茶陵刚成立的时候，陈浩私自推人做县太爷，已经遭到了严肃的批评，在毛泽东看来，旧政府的办事方式与红色工农政权的办事方式有本质的区别。旧军队的积习一定不能有。

毛泽覃立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饭后，毛泽东和毛泽覃并肩站在茅坪的夜色下。

毛泽覃问：“大哥，有二哥的消息吗？”毛泽东没有说话。

毛泽覃又问：“有嫂子和孩子们的消息吗？”毛泽东还是不作声。

毛泽覃笑着说：“我也好久没有文楠的消息了，也不知道她过得好不好，孩子生下来没有，我给她写过信。不过，因为筹钱做路费，我把她给我的一件绸衣服卖掉了。”

为了不让毛泽东感到太沉重，毛泽覃的口气故作轻松。烽火连天，儿女私情理应放到一边，可谁又能真正放下呢。毛泽东惆怅了一阵，又立刻恢复昂扬的斗志，因为他知道，只有革命胜利了，挽救了大家，才能有小家的幸福。

毛泽东抱着一百二十分的希望与朱德会师。没过多久，他就主动给湖南省委写信，提议改组前敌委员会，表示朱毛联合的意向。信中说：部队行动，由朱德、陈毅、张子清、宛希先、余贲民、袁文才、毛泽东七人组成前委，请批准。

中共中央致信朱德，支持朱毛联合。“桂东的北面茶陵、酃县以至江西莲花均有毛泽东同志所带领的农军驻扎，不知你们已和他联络否？”“他们如果驻在这些地方，你们应确实联络，共同计划一个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

不过，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不满逐渐加重。他们给湖南省委写信，认为毛泽东的所作所为，“未能实现党的新的策略，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要求省委“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中同志大会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在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任党代表”。不过，随着湖南省委被破坏，这个决定后来改由湘南特委派人来执行。

毛泽东领导的前敌委员会派出何长工向湖南省委汇报了工作，而后，何长工几经辗转，在广东韶关犁铺头找到了南昌起义余部，和朱德、陈毅取得了联系。

1928年1月，何长工返回井冈山，向毛泽东汇报了情况。这算两边接上头了。

毛泽覃留在井冈山工作。前委派他去宁冈县乔林乡干革命。在大哥毛泽东

的教导下，毛泽覃已经是一位很有工作方法的党的干部了。他要帮大哥稳住民心，发展队伍。到乔林乡，他从访贫问苦入手，了解情况，他在村里给大伙开会，用农民能够理解的语言讲革命道理，鼓励他们打土豪，分田地。在这个过程中，他积极培养先进分子，只要写了入党申请书的，他都召集起来办补习班，让他们明白党的纲领、党的政策。

毛泽覃的工作做得又快又细致，他在乔林乡建立了党支部，这是宁冈县最早的党支部，是井冈革命的“火车头”。

打虎亲兄弟，毛泽覃的到来，给了毛泽东很大支持。这令毛泽东感到十分鼓舞。

不过，刚成立的工农红色政权茶陵，很快又遭到了反动派的攻击。毛泽东并没有预料到，这次外患，还夹杂着更为危险的“内忧”。

第一次肃反

陈浩一直对毛泽东不满。

尽管在三湾改编时，他是毛泽东亲自任命的团长，但他和毛泽东在价值观上冲突很大。他不赞成上山。虽然他没有像余洒度那样逃走，但他一直有抵触情绪。

攻下茶陵之后，他与副团长徐庶、参谋长韩昌剑、一营营长黄子吉，违反党的纪律，吃喝玩乐，还私自任命县长。被毛泽东批评后，他不但不服，还有了叛逃的想法，不打算再回艰苦的井冈山。

1927年12月下旬，毛泽东即将迈入三十五岁，这本应是个祥和的生日：三弟毛泽覃到来，秋收起义余部在茅坪已经安顿得差不多，他脚背的溃伤也有了好转，加之茶陵的工农兵红色政权刚刚建立，一切似乎都回升向好。

但毛泽覃缴获的一封密信却让毛泽东紧张起来。

到井冈山之后，毛泽覃去了乔林乡发展党组织，一天，他突然见陈浩的手下，一团参谋长韩昌剑，带来了一个排的人在乔林乡活动。

韩昌剑不是应该在茶陵吗？毛泽覃产生了怀疑。

他抓了几个兵仔仔细细查问，原来，韩昌剑是奉陈浩之命，带人去找“围剿”井冈山的国民党十三军军长方鼎英。方鼎英曾经是黄埔军校的教育长，陈浩是黄埔一期的学生。陈浩和毛泽东的矛盾升级之后，便动了反心，打算去投靠方鼎英。

韩昌剑对井冈山的地形并不熟悉，他找了一圈，根本找不到方鼎英的部队，

反被毛泽覃抓个正着。毛泽覃从韩昌剑那拿到了陈浩写给方鼎英的密信，立刻向毛泽东汇报。

秋收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眼看就要毁在叛乱分子手里，毛泽东当即决定，下山！

去茶陵需要两天，陪同毛泽东下山的，除了弟弟毛泽覃，还有陈伯钧带的一个班。陈伯钧是从秋收起义就跟着毛泽东一起革命的，任工农革命军三营六连一排排长，属于毛泽东的“嫡系”。

可等几个人来茶陵城郊，却发现城内枪声紧促。毛泽东没有贸然进城，他打算探明情况再行动。

这是上天送给毛泽东的一个惊险的生日礼物。

湘军第八军军长吴尚派出的独立团，和湘东地主武装“挨户团”正联手攻打茶陵。一共有十几个连的兵力。可城内呢，茶陵的工农革命军第一营和第三营，总共也只有七个连，敌我力量悬殊。

仗打了一天一夜。城内就快撑不住了，党代表宛希先和二营营长张子清主张，保存革命实力，立刻回撤井冈山。

可团长陈浩却不同意，他命令手下立刻撤回城东门河上的浮桥，切断工农革命军回井冈山的退路，强行命令部队南撤，朝桂东方向进发。

这是一场慌乱的逃亡。晚间，一营和三营被迫从茶陵县城撤出，行至离县城六十里远的湖口墟，茶陵县委书记陈韶、工农兵政府主席谭震林以及两三百名群众，几乎是被陈浩催促着出城的。

湖口往东，就是宁冈，往南，则走往桂东，陈浩等不回韩昌剑，似乎已经感觉到了不对，他和徐庶、黄子吉要求部队即刻南下，宛希先则据理力争。陈浩恼羞成怒，搬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强令一营、三营官兵南撤。

毛泽东和毛泽覃从茶陵的城郊赶到湖口，命令部队停止向南转移。

27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委员宛希先、何挺颖、二营营长张子清等用事实与证据揭露了陈浩等人叛变投敌行为。

一场灾难消歇，革命被挽救了。这是多么危险的时刻，任何一个小石子，都可能让历史的车轮扭转，猝不及防地驶向万劫不复的境地。新生的幼年红军在悬崖边上被毛泽东、毛泽覃和一些坚定地向往革命的同志拉了回来。

毛泽东带领部队回到了宁冈砬市。谭震林率领茶陵两百多名赤卫队员随工

农革命军到砦市，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二营。

在砦市，毛泽东召开前敌委员会，揭露和批判陈浩等投敌叛变行为，决定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并任命张子清为团长，朱云卿为副团长。陈浩等人被处决。

毛泽东还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有了这块根据地，我们屁股坐在罗霄山脉，两脚伸出江西、湖南，依靠周围几十个县上千万人口，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

这是工农革命军成立之后的第一次肃反，毛泽覃的机敏，毛泽东的果断，都在这次肃反中表现得十分鲜明，可是，败走茶陵，也让部队蒙上了不安定的情绪。

毛泽东捕捉到了这种情绪。他认真地思考了工农革命军的战术问题，他跟指战员们一起开会时说：“现在敌强我弱，不能用过去的那套战法，更不能硬拼。从前井冈山有个‘山大王’朱聋子，同官方的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打圈是个好经验，不过他打圈只为保存自己，不是为了消灭敌人，扩大根据地。我们改他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强敌来了，先领他转几个圈子，等他晕头转向暴露弱点以后，就抓准狠打，打得干净利落，打得要有收获，既消灭敌人，又缴获武器。”“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

这便是毛泽东游击战争战术思想的雏形，他的军事思想很多都是从民间汲取的。

朱毛会师，红军诞生

1928年一开年就有大事发生。年关将至，工农起义军特别有革命热忱。

1月，方志敏、邵式平在江西弋阳、横峰起义。

同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从广东进入湘南，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当地农军的配合下，接连发动宜章、郴州（今郴县）、耒阳、永兴、资兴等县起义，革命队伍扩展到八千多人。

周逸群、贺龙则开始在洪湖、湘鄂边界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已经有起义的苗头。

远在井冈山的毛泽东，还没有完全取得王佐的信任。他派何长工去做王佐部队的党代表，争取王佐。何长工不负众望，帮王佐除掉了他多年的宿敌——反动民团总指挥尹道一，取得了王佐对于共产党的信任。

1928年2月，毛泽东将袁文才和王佐的两支地方武装改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任命袁文才为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为副团长兼二营营长，何长工为党代表。

毛泽东还亲自做过王佐的工作，一次路过茨坪，他跟王佐谈话，谈完之后，王佐对团党代表何长工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上一次，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农历新年前，毛泽东击败了地主武装，又一鼓作气率部攻下了遂川县城，用他的话说，这是“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遂川的敌军实力比较差，工农革命军很快攻下来，毛泽覃在战斗中表现特别勇猛，农历年一过，他就被大

哥毛泽东派到宁冈大陇进行土地革命试点。

毛泽东重视的还有宣传工作。井冈山根据地急需普及革命知识，军是鱼，民是水，他要以宁冈为中心，将整个井冈山地区变成红色的海洋。进驻遂川之后，除团部和特务连，其余部队全部被分派下去，分三路去做宣传工作，打土豪、筹款子。他亲自下乡，去城西草林做工作。

刚在井冈山立住脚，毛泽东的统一战线范围比较宽，军纪比较严。他去赶集，开会说保护中小商人，商人的一颗枣都不能动，团结一致，打土豪，分田地。

春节过后，他又颁布了一个工农革命军最早的“六项注意”：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

他甚至十分善待俘虏。工农革命军的俘虏政策是：不打骂俘虏，受伤者给予治疗，愿留的收编入伍，要走的发给路费。结果大部分俘虏自愿留下，就是走了的，也做了工农革命军的义务宣传员。

毛泽东的“攻心战”令赣军第九师师长大为震惊，认为这种做法“毒矣哉”。

对于游击战争，毛泽东这时候已经提出了十二个字：敌来我去，敌驻我扰，敌退我追。他也确实实行了这个战术，赣军反扑遂川，毛泽东立刻率部撤出，进入井冈山伺机而动。

毛泽东已经明确认识到，与敌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保存有生力量才是最重要的。他灵活的战术，让国民党军防不胜防。比如，国民党军清晨做徒手



★ 井冈山茨坪毛泽东
旧居

体操时，毛泽东突然派兵突袭，全歼一个正规营和一个靖卫团，击毙营长。这是攻新城时候的事。

毛泽东到井冈山没几个月，就已经聚集了巨大能量，他营造的根据地，不是一个点，而是一片。

袁文才、王佐这类农民武装，只顾自守，没有政治上的力量，很难壮大。可毛泽东不一样，他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土壤结合，再加上新型军队的游击战争，一时间野火燎原，以宁冈为中心，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中共县委，酃县有了特别区委，莲花有了党组织。宁冈、遂川、茶陵有了工农兵政府和地方武装。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具雏形。

可是，中央并不十分认可毛泽东的工作。1927年12月，湖南省委已经接到中央的信件，指责毛泽东“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希望省委派一负责人去纠正井冈山的错误。后因湖南省委被破坏，由湘南特委执行。

1928年，杨福涛担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他是一直不肯上井冈山的。

3月，湘南特委派军事部部长、二十九岁的周鲁来到井冈山。他是代表中央来“宣判”的——专程来传达中央上一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12月30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他说毛泽东“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

毛泽东刚在井冈山站住脚，如果采取中央的那种极“左”政策，连小商人都一并打击，他们很可能就会遭到当地民众反对，将革命队伍置于危险的境地。

一切都应该从实际出发。

周鲁宣布了三条处理意见：一、取消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成立单管军中党的机关、不能过问地方党的师委，以何挺颖为书记，毛泽东改任师长；二、开除毛泽东的党籍；三、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去支援湘南暴动。

开除党籍？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误会，中央给的处分是“开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撤销现任省委委员”，并不是周鲁所谓的“开除党籍”。

毛泽东感到无比错愕，但他必须服从长沙派来的“钦差大臣”的决定。他带领部队离开井冈山，去湖南酃县中村集中待命。

敌人很快占领了井冈山。刚刚成立的革命根据地，迎来了长达一个多月的“白色恐怖”，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又率部夺了回来，但却损失了不少兵力。这是“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

不过，毛泽东在执行盲动主义命令时动了点心思，他并没有直接去湘南，而是说服了周鲁，先在湘东开展群众运动。毛泽东派弟弟毛泽覃率领特务连，赶往湘南与朱德部联络。他则按兵不动，静待时机。

3月下旬，朱德、陈毅的部队在湘南遭到蒋介石部队两面夹击，毛泽东心急如焚，他决定兵分两路去接应和掩护朱德。3月，山区的天气还有些湿冷，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毛泽东跌落水田，患上了重感冒，不停地咳嗽，众人劝他在后方休息，毛泽东坚持前往，“这么大的事，我若不去，岂不是终身遗憾”。

朱德和陈毅兵分两路撤退。一路从未阳出发，经安仁、茶陵去酃县，由朱德指挥；一路从郴州出发，经资兴、桂东去酃县。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先到桂东沙田圩。得知敌军由汝城北进资兴，企图侧击撤退中的湘南农军，毛泽东命令袁文才的第二团立即奔赴滁口，迎击敌军，他则率第一团奔赴汝城，牵制敌军，使了一招“围魏救赵”的妙计，顺道还打垮了反动地主武装何其朗部。敌军果然不得不回守汝城。

随后，毛泽东从汝城退到资兴，在龙溪洞地区接到萧克带领的宜章农军独立营五百多人。两部一起向酃县进发。毛泽东得知，朱德、陈毅已经率部退到酃县一带非常兴奋。

敌军又来进攻酃县县城。毛泽东大无畏地亲临县城西门接龙桥指挥战斗，从中午打到晚上，赢得了战斗胜利，而后，毛泽东率部去了十都镇，驻进了万寿宫。

十都在酃县东北部，挨着井冈山。也就在这一天，朱德率部到了酃县沔渡。沔渡在酃县中东部，东南面就是十都。

朱德一到沔渡，听说毛泽东同志就在十都，立刻带部分人马和主要干部快马加鞭赶往十都。

毛泽东早在万寿宫门口等候，何长工是毛泽东派去的信使，曾经见过朱德、陈毅等人，他站在毛泽东身边，遥遥一指，告诉毛泽东哪一位是朱德同志。

毛泽东连忙走下台阶，伸出手。

朱德也笑盈盈地走上前去，伸出手。

两只大手握在了一起。

万寿宫是为纪念江西的地方保护神许逊而建，毛泽东和朱德在此处首次见面，似乎预示着他们要在江西干出一番大事业。

这一年，毛泽东三十五岁，朱德四十一岁。

陈光对朱毛首次会面有过回忆：“4月间，朱毛会合酃县之十都。我在该地首次见到了毛主席。他首次向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四团、三十五团等讲了话，我今天还能将大意回忆起来。记得那天下着小雨，他左手打把洋布伞，留一个西式头，身着灰色中山装，赤脚套上战士穿的草鞋，他讲话的中心意思是号召我们要团结和鼓励起来，战斗到底。一般指战员因退出郴州情绪不高，但听到毛主席的讲话声音笼罩全场，个个由沉静的脸色变成笑嘻嘻的。”

史沫特莱则说：“中国土地革命的两大主流汇合了，朱毛这两个人的全部生活便浑然成为一体，好像同一身体上的两只臂膀。”

随后，袁文才、何长工率领的第二团先返回宁冈砦县，筹备两军会师事宜。

1928年4月24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回到砦市，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从沔渡到达砦市，当地军民热烈欢迎，两军胜利会师。

会师当日，毛泽东带着身边的干部，在龙江书院，再次和朱德、陈毅等见了面。毛泽东提出，以罗霄山脉中段为根据地，发展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向北发展，向南游击的方针。

他们决定，沿用北伐战争中军内共产党员多、战绩辉煌、纪律严明、备受群众称颂的国民革命第四军的番号，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毛泽东和朱德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工农革命军正式成立。5月25日，中共中央颁布的《军事工作大纲》正式给这支军队定了名：“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

红军诞生了。井冈山的这支军队，便是“红四军”。

红四军成立，朱德和毛泽东都开始为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努力。小仗不断，朱德出色的军事才能，屡屡击破赣军的围剿，井冈山经常能收到胜利的消息。毛泽东则依旧注意军纪问题，这是军队在根据地长期待下去的根本保证。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贯彻下去，但有的战士偶尔还是会犯错。毛泽东会纠正他们。比如有一次，红军战士因为行军过程中太过饥饿，把农民一块地里的苞米吃光了。毛泽东得知后，立刻对指战员进行群众纪律教育，并亲自在一块竹牌上写道：因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米吃光了，违反了纪律。现在把两元钱（光洋）埋在土里，请收下。



★ 1935年，毛泽东（二排右三）在保安和红四军部分负责干部合影

毛泽东还得对各方面对井冈山根据地的质疑做出适当的反击。上级组织与根据地之间依旧有分歧，湖南省委曾经要求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并要求毛泽东“须随军出发”。毛泽东他们没有接受这种指示。

这一年，毛泽东写了两篇著名的长文，以回答“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一篇是《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其中，第一部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题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另一篇主要阐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叫“井冈山的斗争”。

1928年年底，彭德怀和滕代远也来井冈山了。他们在平江起义后，建立了红五军。

红四军、红五军在新城会师，根据地的革命力量更加壮大了。

毛泽东在茨坪会见了彭德怀，跟他谈了很多，主要讲对中国革命和前途的看法，讲为什么必须建立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在中国能够存在的独特原因等。

这一席话让彭德怀终生难忘。

革命的铁流，慢慢朝井冈山这片红色的大海汇聚着。共产党人已经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撕开了南天一角。

夜深了，八角楼的清油灯依旧亮着，毛泽东常常彻夜工作。他偶尔会想起家人们，三弟毛泽覃已经来到他身边，并且已经是一位革命干将。



★ 土地革命时期，江西兴国县厚塘乡苏维埃政府送给红军家属的红布匾——“当红军是最光荣的”

毛泽民在上海。

杨开慧和孩子们在湖南。还有菊妹子毛泽建，她在衡山组建农民游击队，早已是敌人闻风丧胆的“女游击队长”。湘南暴动后，她身份暴露，转移到耒阳，是耒阳妇女联合会的负责人，依旧坚持游击战争，并于1928年8月被敌人杀害。毛泽东还常常想起毛泽建。

天冷了，贺子珍为毛泽东披上了一件衣服。她现在是毛泽东秘书。早在这年6月，在永新县塘边一起工作的日子里，毛泽东和贺子珍已经结成了革命伴侣。一直到后来，他们也没有结婚仪式，没有摆酒席。唯一的纪念品是贺子珍在清油灯下给毛泽东缝制的一个长方形大挎包，内有几层，外面缝了几只口袋，可以装办公用具。这个挎包陪伴了毛泽东不少日子，行军、作战，它是一个“百宝袋”。

艰难时刻：毛泽东在 1929

毛泽东信念坚定，他一生遭遇坎坷无数，但却从未动摇过。

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有人彷徨，有人脱党，有人甚至成为叛徒，可毛泽东的革命信仰却坚如磐石。1924 年他被讥讽为“胡汉民的秘书”。1927 年五大，党组织也批判他在农运上的冒进。可即便是在党组织对他有误解，甚至遭到无理打击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更改为党、为革命继续奋斗的初衷。

这是一个奇迹，足见毛泽东的赤胆忠心。

朱毛会师后，毛泽东和朱德成为井冈山的领路人，但朱、毛所走的路并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可。

1929 年对毛泽东来说十分艰难。

4 月，井冈山收到了党中央 2 月 7 日写给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中央依旧在强调城市工作的重要性，红军在农村的前途在他们看来是悲观的。

中共中央决定把红四军拆散，将具有凝聚力的战斗部队，拆分成小部队，十人到数百人为一组，散入湘赣边境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这显然是不了解根据地的情况和革命的实践经验。秋收起义的经验，就是必须一个拳头打人。拆分部队，党的军队将失去力量。

来信还要求，“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两同志得到中央决定后”，“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朱德见信激动，毛泽东则神色淡然。这不是他第一次受到如此安排，陈独秀时代，他曾多次感受到这种与主要领导人观念不合的压力。八七会议，他也

批评了这种迷信主要领导的观念。如今，中央领导人变更，共产国际依旧牢牢控制着党的政策走向，在莫斯科、上海、井冈山之间，存在一种隐隐的角力。

毛泽东并不与中央强烈抗辩，但他从不惮于表达自己的观点。经过红四军前委讨论，朱、毛给中央复信：“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这是实践的自我证明。

复信指出：“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1927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都失败了。”

“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

在根据地刚刚发展起来，还需不断与国民党的围剿抗争的紧要关头，让朱、毛离开，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复信最后，有一个小小的促狭，当然也是实际情况，反映了中央和根据地在沟通上的不畅通——“三年以来中央的刊物我们一本没有收到。”“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且可以看到何键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

中央“二月来信”之时，正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大发展，毛泽东和朱德在大柏地打了大胜仗，江西的国民党军遭到重创。蒋桂战争一触即发，国民党江西主力被撤回，朱毛趁机发起攻势，拿下闽西一大片土地。

中央又写信来指示，说明原则上朱毛要离开部队，但若一时不能到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到中央报告工作与参加讨论。

只是，这封信还未送到根据地。红军内部又出现了问题。刘安恭的到来加速了危机的爆发。他是中央派来的“钦差大臣”，和1928年湘南派来的周鲁一样，他们都是来传达上级精神的。



★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

刘安恭一到宁都，就被任命为中共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他向前委和党员大会作报告，贯彻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刘安恭从苏联留学回来，他带来了“一种形式主义理论”，思想路线完全是脱离中国实际的照搬主义，他向前委和党员大会作报告，贯彻“二月来信”精神，说脱离生产的红军不能存在，散布对红军的消极主义。

这无疑在红军内部制造了极大的混乱。

更糟糕的是，刘安恭带了一种新的“斗争”手段，他将党内斗争公开化，给领导人分派别，说朱德听从中央的指示，毛泽东自创体系不服管束。这种混乱导致的结果是：不久之后，红军七大召开，前委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争论的最终决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制。

会议选举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陈毅当选。

毛泽东退了下来，他决定去闽西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他得了疟疾，根据地没有药物，毛泽东忍受着疾病和党内斗争的双重打击，他需要一个调整期，身体上的，心态上的，以期恢复力量。

毛泽东来到了闽西著名的永定金丰大山。

牛牯扑，只有十来户人家，他住进一个小竹寮，仅有十来平方米。他除了服药治病，大量时间是读书看报，批阅战场上送来的情报、查看军事地图、拟制作战方案。

这个竹寮，既像是战地指挥所，又像是文房书室，毛泽东亲笔在一块木板上题写“饶丰书房”，把它挂在门口。他始终挂记井冈山，隐居大自然，更像是又一次“充电”。

毛泽东和当地居民关系很不错，大家都叫他杨先生。

这几乎是毛泽东人生中“最低调”“最神秘”的一段时光。深山，老林，读书，养病，毛泽东的生活简单又踏实，也只有到这里，他才能真正静下来，暂时不想那些党内党外的争斗，恢复力量。

毛泽东在牛牯扑隐居养病，永定县革命委员会严格保密。一时之间，毛泽东去哪儿了，成为外界十分好奇的问题。敌报发出号外，宣称“匪首”毛泽东被“击毙”于“养病山中”。

共产国际信以为真，还发了一个讣告：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

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在福建前线逝世……作为共产国际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使命。

毛泽东的使命远远没有完成，他只是韬光养晦，随时准备为党工作。但原则上的问题，他不打算妥协。他既然从领导岗位上下来了，就不会轻易回去，除非中央给出明确的调令。

事实上，毛泽东的“下台”令许多人震惊，朱德和毛泽东的关系面临着会师以来的第一次危机，当选前委书记的陈毅，也深感在井冈山，他的能量远远不及毛泽东。

中共中央也做出了反应，在得知毛泽东在选举中落败后，中央立刻发出指示信，对中共红四军七大做出批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错误的，又把刘安恭调回了中央。

这是一个讯号，历史的天平终究还是会向正确的一方倾斜，归根到底，大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的事业。

1929年8月下旬，陈毅出根据地，奔赴上海，应中共中央的召唤，去汇报工作。他一共写了七个报告，最主要的就是《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

政治局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周恩来召集了三人委员会，要对毛泽东去留的



★ 1965年5月24日。
毛泽东接见井冈山
群众

问题做出一个决议。

周恩来一见陈毅就说，你能行吗？回去后赶快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

周恩来的判断是对的。

根据地的问题，只有毛泽东最了解、最有办法，在这个时候让毛泽东“下野”，无异于扼杀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周恩来及时地纠正了“二月来信”的偏差。陈毅代中央执笔，周恩来审定，于是便有了著名的“九月来信”。

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了指示信：从过去的艰苦经验中就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做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指示信对红四军七大及前委扩大会议处置的缺点提出批评。

的确，红军生长在对敌斗争的肉搏中，哪有精力放任内部关门闹纠纷。中央指示，“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

“九月来信”抵达根据地需要一定的时间。

朱德开始向老战友伸出橄榄枝。红军攻克上杭后，朱德主持红军八大，他请毛泽东来。

毛泽东回信：“我不能够随便回来。”这是立场与原则的问题。来来去去，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才行。毛泽东有他的坚持。但毛泽东在军中的呼声很高，毛泽东离开后，大家一致认为“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红军八大采纳了很多代表的意见，大家致信希望他务必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

朱德对人说：“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

毛泽东正在发作疟疾，但他还是坐担架赴会，只是当他赶到时会已开完。大家见他身体虚弱，浑身浮肿，只好让他继续安心养病。

毛泽东的病十分严重，他却没有停止工作。他在永定县农村养病，常常带病作调查研究，与基层干部和群众座谈，了解情况。朱德攻下上杭后，毛泽东由地方武装用担架抬着，去与红四军会合。他病体沉重，到了上杭，只能住在临江楼继续养病，幸好寻到了上杭县一名西医治疗，毛泽东的病情逐渐好转。

长达半年的逆境，行至临江楼，已经到了尾声。毛泽东挺过来了。

重阳节到了，临江楼庭院中，黄菊盛开，汀江两岸，霜花一片，毛泽东又有了诗情，他填了一首词，《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一段沉寂，毛泽东终于恢复了精神，不似春光，胜似春光！

10月，陈毅带着“九月来信”从上海回来了。他向前委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又派人去找毛泽东，把“九月来信”亲自送到毛泽东手上，并附信：“我这次到中央去了一趟，我们的争论问题都解决了。七次大会是我本人犯的一次严重错误，我可以检讨。中央承认你的领导是正确的。此间，同志们也盼望你回队。希望你见信后坐担架赶快回来。”

中央的指示、战友的召唤纷至沓来，是时候复出了。

11月26日，毛泽东和朱德、陈毅在福建长汀会合。

28日，他给上海写信，“中央：我病已好，11月26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长汀，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我们望得书报如饥似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

即便在反“围剿”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刻，理论学习和政治提高，依旧是毛泽东最注重的问题之一。

很快，红军九大召开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

这次会议确立了从思想上建党和政治上建军的原则，是党领导下的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

古田会议后，毛泽东给当时思想消极的第一纵队司令林彪写回信，并以党内通信的方式印发给部队干部，批评了林彪等同志的悲观思想，说明了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

这封信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兄弟之争

1930年初,毛泽覃在黄公略任军长的红三军担任政治部主任,代行政委职权。吉安被攻下之后,转任吉安县委书记、赣西南后方办事处主任,驻扎在君埠。

这年冬天,国民党调集十万大兵“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张辉瓒师九千余人,拟从吉安县东固进攻永丰县龙冈和君埠。

毛泽覃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领导当地军民扩大红军队伍,筹粮备款,准备反“围剿”斗争。

一天,毛泽东前往和丰县的路上看到两名红军战士押着一个青年去当兵,



★ 1929年1月,毛泽覃随毛泽东、朱德离开井冈山,参加开辟中央苏区,任中共吉安东固(东古)区区委书记。他积极发展党组织,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使东固成为模范区。图为吉安东固区一角

他们身后，一位老大娘哭个不停，跌跌撞撞跟着，喃喃自语，说家里没有劳动力了，不想让儿子去当兵。

红军战士不予理睬，还是押着青年往前走。

毛泽东见状，连忙走上前去，扶住伤心不已的老大娘，喝止两位红军战士道：“扩大红军是当前的重要任务没错，可参加红军要自愿，你们这样强行抢人，只会让红军失去民心！是严重违反党的政策的！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谁派来的？！”

红军战士说：“我们是赣西南地方红军，是办事处的毛泽覃毛主任派我们来征兵的，因为任务很重，我们只能这样了。”

傍晚，毛泽东来到君埠，他满腔怒火，气得饭都吃不下，立刻请人把毛泽覃叫来。

毛泽覃很快到了。两个人就扩红的方式、方法问题，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屋外路过的人，都听到了两兄弟的争吵声。

毛泽覃很不理解，国民党大军眼看迫近，他去扩红，是为了革命好，是充实革命队伍，而且在当时来说，强行征兵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大哥如此愤怒，太没必要。

年轻的毛泽覃并不明白，在大哥毛泽东心里，民心对于革命队伍来说有多么重要。毛泽覃为自己辩解着。

谁知，毛泽东突然高高举起了拳头，他要揍这个违反扩红政策的弟弟。

毛泽覃见状，大声说：“这是革命队伍，不是毛氏宗祠！”

毛泽东听了这句话，猛然醒悟，放下了拳头，仔仔细细跟弟弟谈了谈红军的纲领和纪律的问题，他要毛泽覃作书面检讨，并向老大娘一家赔礼道歉。

毛泽覃认识到了错误，亲自将那位扩红“扩”来的青年送回家，并当面赔礼道歉。

一场“兄弟之争”，就这样得到了妥善解决。

团圆在叶坪

顾顺章的叛变给上海地下党以极大打击，毛泽民夫妇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远走香港，去广东省委工作。可没多久，顾顺章带着人到香港指认中共南方局书记蔡和森。蔡和森不幸被捕牺牲。

香港变得不安全起来。毛泽民夫妇到香港之后，根据党组安排，暂时没有外出露面。可是香港太小，1927年之后，来香港避难的人又多，免不了还是会遇见熟人，一会儿遇见在上海认识的互经会的同志，一会儿又遇见在天津认识的姨太太，有人认识，就可能有危险。

为了规避危险，不给组织添麻烦，毛泽民基本在秘密机关待着。南方湿热，毛泽民筋骨痛得难以忍受，他还是坚持不去看医生，只让钱希均趁天黑去英国药店买点红花油擦擦。

在香港待了一个多月，毛泽民无法展开工作，继续待下去也不适合，经批准，中央决定派毛泽民去中央苏区工作。

去苏区，是毛泽民梦寐以求的。1931年，中央苏区已经在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带领下，成了赫赫有名的革命根据地。毛泽民做地下工作那么多年，他想去苏区，想去甩开膀子干事业。

苏区和上海已经有了交通线。一条是主线，沿途站点是：香港—汕头—潮州—大埔—青溪—永定进入中央苏区。一条是副线，沿途站点是：汕头—澄海—饶平—大埔进入闽西。这些站点都是秘密的，有药房、文具店、百货店、电器行、饭店、旅馆等。从秘密交通线去苏区，一般都需要先化装成商人。

交通线 1930 年建立，输送过不少同志，项英、邓发、叶剑英、任弼时等同志都是通过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但这条交通线并非百分之百安全，且尚未经过有关人员巡视，现在，毛泽民夫妇通过主线进入中央苏区，他们的另外一个任务就是巡视交通线。

1931 年 7 月，毛泽民夫妇启程了。他们从香港出发，一路辗转，在地下交通员的引导下朝中央苏区前进。毛泽民做工作向来以细致著称，他仔细审查着路过的每一处交通站点，与负责人交谈，传达党的最新指示。他们走了十多天，终于到达了闽西。

闽西苏区和赣南苏区被一片白区隔着，直到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这两片区域才连成一体，毛泽民夫妇要去赣南苏区，还得等待时机。

他们在赣南一等三个多月。在此期间，他并没有闲着，而是担任闽粤赣军区经理部部长，日夜忙碌着。9 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闽西和赣南之间的阻碍消失，毛泽民终于可以去见哥哥毛泽东和弟弟毛泽覃了。很快，他被调往中央苏区工作。

第三次反“围剿”之后，中央苏区已经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囊括二十八个县境、十五座县城，总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辖区人口二百五十多万的小“国家”。

中央苏区的建设如火如荼，正需要毛泽民这样一位懂经济的骨干。

和大哥已经四年没见了，毛泽民和钱希均恨不得用飞的速度赶到苏区中央。

瑞金，江西东南部，武夷山南段西麓的一座小城。第三次反“围剿”之后，这座小城成为中国南方苏维埃的中心，下辖二十八个县境。

瑞金的一切都让毛泽民感到亲切，他赶上了中央苏区的全盛时代。

毛泽民经人引导，走向叶坪村，那是瑞金的中心，红军总指挥部的驻地，他的大哥毛泽东就住在那里。

时隔四年，无数挂念。毛泽民的到访让毛泽东感到惊喜。仅从外表上看，毛泽东和毛泽民已经那么不同。毛泽东穿着旧的土布衣裳，上面有几块补丁。毛泽民则西装革履，他从白区来，上海、天津的生活，已经让他改头换面，变成一个摩登人士。但他们的内心都没有变。

毛泽民小跑到毛泽东身边。两人拥抱在一起。久别重逢，毛泽民又可以在大哥毛泽东指导下开展革命工作，一想到这些他就觉得十分鼓舞。



★ 毛泽东（左一）在江西瑞金与红军战士合影

毛泽民夫妇暂住在毛泽东的住所，搭行军床，床与床之间用两屉桌隔开。革命战争年代，住宿条件简陋，叶坪的这座不起眼的二层小楼，住着中国革命的几位首脑级人物——朱德、毛泽东，以及这年年底才来到苏区的周恩来。

落下脚，毛泽东和毛泽民彻夜聊天。毛泽民说了自己上海、天津做出版发行工作的情况，说了顾顺章叛变对上海地下党的影响，说了自己从香港来苏区前前后后的各种经历。

说到大嫂杨开慧，毛泽民眼眶湿润了。

毛泽东面色凝重。为革命，杨开慧牺牲了，她到死都不肯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坚持共产主义信仰。

这是毛家人的精神，这是革命者的品格。

毛泽民拿出毛岸英写给父亲的信，又说了三个孩子在上海的情况。他说毛岸英要来苏区，说岸英一定要给妈妈报仇。毛泽东非常看重毛岸英，他是毛家的长子，可如今却漂泊在外，生死未卜。毛泽东叹了一口气，没再说话。

毛泽东让毛泽民留在苏区好好工作。第一次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毛泽民立刻投入到准备工作中。

毛泽东还为毛泽民夫妇引见了贺子珍。都是干革命的，大家能谈得来。

没几天，毛泽覃夫妇也来了，他们是率领代表团参加“一苏大会”的，此时的毛泽覃已经是中共永（丰）吉（安）太（和）特委，贺怡是永吉太妇女部长。

他们刚结婚不久。

毛泽民想不到，时隔四年，大哥毛泽东和三弟毛泽覃竟成了连襟。

一同前来的还有贺子珍和贺怡的父母。贺氏兄妹参加“永新暴动”后，贺家二老也随子女参加革命。贺怡与毛泽覃结婚后，二老随女儿、女婿住在东固，一苏大会是苏区的空前盛会，二位老人也想来看看。

重阳节快到了，一家人在瑞金团圆。

毛家三兄弟、三妯娌再加上两位老人，贺怡又请来了她大哥贺敏学。贺敏学是一位1928年就上井冈山的“老革命”，现在也在中央苏区工作。贺子珍、贺怡、钱希均一起备了一桌菜。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了一顿热热闹闹的饭。

革命狂潮中片刻的风平浪静，无比珍贵。

重阳登高，是中国人的传统。重阳节那天，毛泽东和弟弟毛泽民、毛泽覃一起去登叶坪西面的龙珠塔。

兄弟三人一路说笑，心情大好。毛泽覃说：“瑞金真是金银宝地，山好，水好。等革命成功了，我就在这里建座房子，安家养老。”

苏维埃共和国毛主席

三次“围剿”，发兵百万，除了折损三十万兵马，损失二十万步枪、千挺机关枪、百门大炮、无数弹药，蒋介石并没有捞到太多好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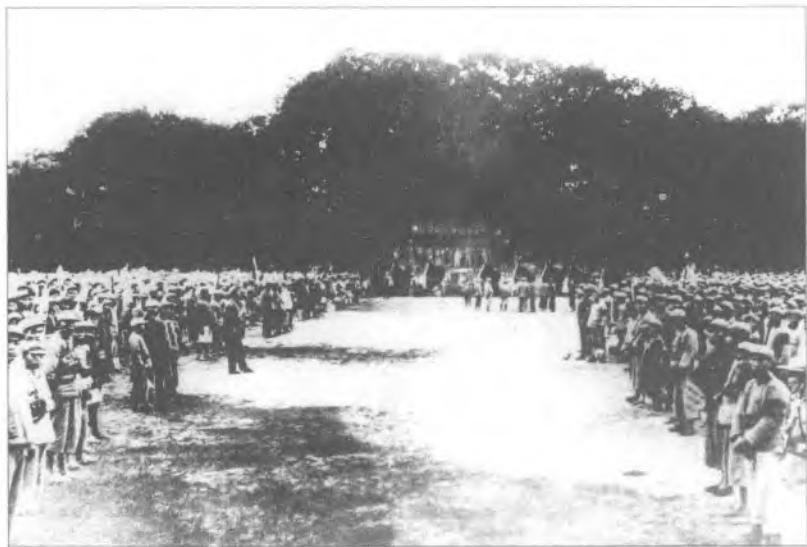
苏区却不断发展壮大，小苗变绿树，已经到了成立红色国家的时候了。

天无二日。这是蒋介石在理智和情感上都不能接受的局面，他下令轰炸瑞金。

苏区没有飞机，没有防空能力，更谈不上制空权，无从应对抗蒋介石的轰炸。

可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是要如期举行。

这一次，共产党人采取“起早贪黑”的法子。



★ 1931年1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给红军授旗

红军阅兵典礼，在凌晨举行；群众庆祝大会，在晚间举行。

叶坪村中间有一块铺满绿草的天然广场，阅兵头一天，广场上便布置好了检阅台，正中横挂红布条，上书：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红军检阅台，后幕挂马列像，两边挂工农红军军旗。

凌晨6点30分，毛泽东、朱德、项英、任弼时步入会场。受阅部队各就各位。

项英宣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阅兵典礼开始。

阅兵总指挥彭德怀巡视红军方队后，跑步至检阅台汇报情况。

毛泽东、朱德回礼。总司令朱德发布指示：“阅兵开始！”

广场上响起了步伐声和军号声。

迫击炮、冲锋枪、“汉阳造”步枪，还有大刀片、红缨枪，这就是红军当时的武器，配置是杂乱的，但战士们昂扬的精神面貌却令所有与会者精神振奋，他们高喊“苏维埃万岁”！

这是“十月革命”在中国的衍生，世界的东方诞生了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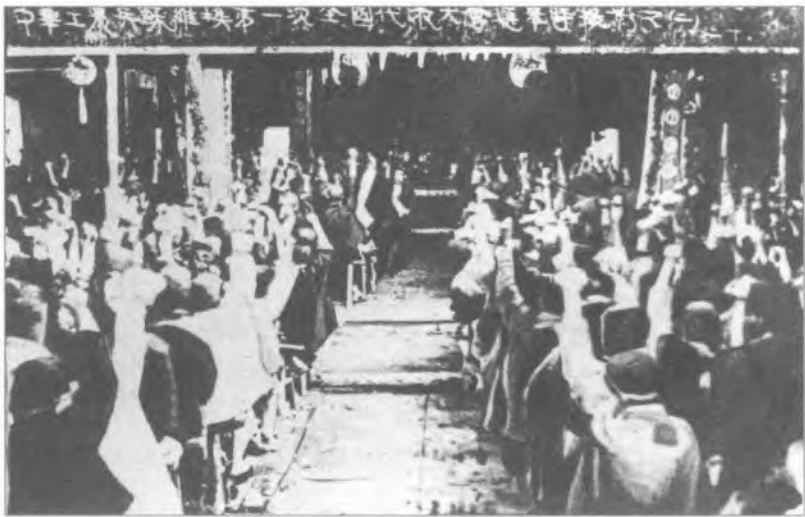
这是马克思主义对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帝国主义的胜利。

霞光普照，万物清明。

约8点，阅兵结束，各单位迅速疏散，撤回驻地。蒋介石的飞行部队准时来报到了。

北方一阵闷雷似的声音，涂着青天白日标志的白色飞机掠过瑞金上空，毛、

★ 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图为大会选举的情形



朱、项、任退入叶坪中央局古樟树林下的防空洞，欣赏蒋介石送上门来的表演。

城内一片寂然。

找不到目标的蒋介石的飞行员们开始乱丢炸弹。

一阵胡乱轰炸后，飞机远去，飞到福建长汀红军设置的假会场，又是一通乱炸。假会场顿时一片火海。可有什么用呢，毛泽东他们早已慢慢步出防空洞，继续开会。

人们都说，这是蒋介石送来的“鸣礼炮”。

1931年11月7日下午2时，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如期在谢氏祠堂举行。主席台正面挂着马克思和列宁像，均为木刻。镰刀铁锤红旗放在中间，特别鲜艳。

主席台两侧有对联。上联：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下联：建立布尔塞维克的群众工作；横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讲台前方挂有“工农炮垒”“民主专政”等标语。

毛泽东为大会召开题词，“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项英致开幕词，宣布全苏大会成功，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全场沸腾。

会后，苏区中央局的同志拍了一张合照。党内同志平等相待，七个人站成一排，分别是：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

拍照前，王稼祥发现毛泽东衣服上一颗纽扣未扣，上前帮忙扣好，然后站在一边，两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毛泽东大病初愈，一脸清瘦。朱德打仗出身，一贯是腰带不离身的，这次拍照，他没扎腰带，两手笼在袖子里。七个人中，只有毛泽东没戴帽子。

暮色四合，天渐渐黑透，提灯晚会开始了，各村军民手提灯火，朝谢氏祠堂聚，十余里星星点点光亮，慢慢汇聚，蔚为壮观。

祠堂外红军广场，灯火辉煌。

这是赤都的狂欢。

毛泽东、朱德、项英、任弼时走向人群。

毛泽民夫妇、毛泽覃夫妇也站在灯火下，和大哥一起，沐浴着阶段性胜利的喜悦。

蘇區中央局委員攝於第一次全蘇大會紀念日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



★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攝影）於瑞金



★★

★ 1931年，中央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合影。左起：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

★★ 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举行首次会议。中立讲话者为毛泽东，其右侧第一人为朱德



★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日合影。
二排左起：康克清、钱希钧、周月林、
贺子珍，一排左起：曾碧漪、彭儒



★ 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率领国民党二十六军之两万士兵，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这是蒋军中爱国官兵反对蒋介石内战起义的首次壮举。图为1937年毛泽东、王稼祥、萧劲光在延安凤凰山麓与宁都起义部分同志合影

11月27日，按照程序，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主席、副主席和各部部长。

经投票，毛泽东当选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午后，新当选的一届领导走入叶坪的一片树林里。突然有人建议：“大家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毛主席讲话。”

毛主席这个名头，从此叫开了。毛泽东告别了“毛党代表”“毛委员”这些称谓，开启了“毛主席时代”。

这时的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1943年3月20日，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书记处主席；1945年七届一中全会，毛泽东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1959年4月29日，他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但依旧是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慢慢地，人们想起毛泽东，便总是亲切地叫他毛主席了。

国家银行毛行长

参加革命以来，毛泽民一直在经济战线上奋斗。从一师附小，到上海党报党刊发行部，再到闽西苏区闽粤赣军区经理部，毛泽民所要管理的事业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接近金融工作的核心。

在闽西革命根据地工作的日子里，毛泽民已经开始考察中央根据地的金融问题。

闽西和赣南开过信用社，也开过平民银行。1930年，还开起了工农银行。

毛泽民对闽西工农银行行长阮山很有印象。为解决资本不足的问题，阮山曾发行过股票，募集到二十多万元，奠定了银行的基础。

毛泽民对阮山的几个手下同样印象深刻。

会计科长曹菊如，龙岩红坊人，出身贫苦，读过几年书，后去江西做学徒，五四运动之后曾远走印尼。红色根据地建立后，他非常激动，返回家乡，想要做一番成绩。他很会打算盘，还时常研究银行的记账方法，手头常放一本大学商科的银行簿记讲义，办公桌玻璃板下，则压着从书上抄下来的账簿表格。做金融财务工作，就是要细，就是要钻，毛泽民很看好曹菊如，他曾经送给曹一本《银行簿记实践》。曹菊如受益匪浅，经验丰富的他急需提高的正是理论水平和科学规范的财务认知。

业务科长赖祖烈，永定湖雷人，十三岁闯荡上海、扬州，做学徒，做店员，后受革命刊物和阮山感召，回到闽西参加革命工作。最初县里设备不足，他便四处借款，从扬州代买回一部卷筒油印机。他还参与创办了信用合作社、永定

县农民银行，在业务上十分得力。

毛泽民到中央苏区与毛泽东、毛泽覃团聚后不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了。这块红色区域被白色恐怖包围着，但已经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国家”，它想要运转，就必须要有自己的金融体系。

创办国家银行势在必行。苏区得选出一个“红色财魁”，这个人一要懂得财务工作，二要政治上绝对可靠。

党组织思来想去，放眼整个苏区，没有谁比毛泽民更适合做国家银行行长。他是经过革命考验的、业务上绝对拔尖的财务专家。

这不仅是荣誉，而且是党组织交付下来的必须完成的革命任务，毛泽民接受了。他立刻为组建银行奔忙起来。

建银行，首先需要班子。毛泽民想到了曹菊如和赖祖烈。他亲自骑马去了一趟福建长汀，约闽西工农银行行长阮山和曹菊如、赖祖烈座谈，开诚布公地谈了谈组建国家银行急需人才的事。毛泽民说：“我是个农民，不会办银行。国家银行刚刚成立，各方面的工作，还要靠大家的帮助和支持。”

国家大事，阮山全力支持。曹菊如和赖祖烈很快从长汀来到瑞金参加工作，曹菊如定岗为国家银行会计科科长，赖祖烈定岗为国家银行业务科科长，他们都做自己最擅长的一块。

三个人不够。毛泽民的爱人钱希均也学了一些会计知识，被招进来做普通会计。

莫均涛，红军战士，做过店员，做过英资银行的信件传递员，刚好适合做总务。他被任命为国家银行总务科科长。

一个行长，两个会计，一个业务，一个总务，五个人，硬是撑起了一个国家银行。这在中国的金融史上，前无古人。

任务无比艰巨。要知道，摆在他们面前，不是收收钱算算账那么简单的问题，他们需要立即建立起一套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这需要怎样的魄力、智慧和耐心！

人齐了，还要有办公地点。毛泽民在叶坪村转了又转，选中了谢公祠右前侧的一所农宅。占地三百多平方米，面阔三间，两进，土木砖木混合结构，它后面就是中央警卫连驻地，在这里办公比较安全。

距离国家银行五十米远，有一处农民柴房，十来平方米，可以用作金库，

柴房旁边几棵大樟树，枝繁叶茂，伸向江边，方便卫兵站岗眺望。

毛泽民做通了屋主的工作，屋主愿意让出一部分给国家银行办公。毛泽民开始分配办公地点了：楼上小厅，是财政部记账员的办公室；小厅旁的两间屋，一间留归己用，做办公室兼寝室，一间做员工寝室；楼下的小厅做国家银行的办公室和营业室；小厅两边的屋子，一间做库房，一间备用。至于办公用品，文具、算盘、铁皮箱、油灯等，能在总务厅领的则领，不能领的去群众家借，借不到的自己动手做。

毛泽民制定了一个章程，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定下了国家银行的宗旨：巩固苏维埃金融，帮助苏维埃经济发展。

至于业务范围，则包罗万象，从放款到放贷，从贴现到金银、外汇买卖，从收受存款到保管贵重物品，从发行公债到还本付息……

毛泽民和他的下属们所做的一切，对于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来说，都是开创性的。

他们必须马上劈开混沌，为苏维埃的金融体系的运转理出头绪。

1932年3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成立，毛泽民出任行长。充实金库，为统一财政、统一货币做准备，是国家银行建立之后的当务之急。

办银行必须要有启动资金，何况是国家银行。毛泽民面临的情况不容乐观。人民财政银行拨款一百万，可实际到账的只有二十万，没过多久，这二十万也被借走了。

一穷二白。毛泽民只能自己想办法。

战争中缴获的物资是国家银行财政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2年，毛泽东率部打福建漳州城，获得大捷。缴获物资良多：两千多支枪，六门大炮，十三万发子弹，四千九百发炮弹，一部无线电，两架飞机。

这是毛泽民筹集物资、款项的好机会。他领着刚成立的没收征集委员会到漳州城展开筹资工作。

首先，毛泽民要清点战利品。清点检查完成，再想办法把这些东西从漳州运回瑞金。毛泽民和周恩来在当地发动了三千多军民，浩浩荡荡把这些东西抬回瑞金，其中的一些军工机器、印刷纸币的印刷机、图书和材料，都对接下来的工作很有帮助。

其次，毛泽民发动当地商人捐款。红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军进城后，

并不对商铺和本地住户进行骚扰和打劫。但红军也有红军的政策，红军不没收商店，不强迫华侨缴纳钱款，但鼓励大家捐款。这就需要有人去做思想工作。毛泽民和他的同事们深入街道，反复与商人们沟通，宣传红军的政策，他甚至表示希望商人与红军做生意，互惠互利，共同发展。这种方式、方法和政策，让当地的商人和华侨资本家比较接受，没过多久，捐款、捐物十分踊跃，珠宝、金银、玉器、药品、布匹、食盐、汽油……这些对于苏区建设大有裨益的物资纷纷缴纳上来，更重要的是，这次毛泽民他们还筹到了一百万大洋的款子。

这是国家银行的第一笔大额资金。

有了这笔资金，毛泽民办银行就有了底气。

但金银运到瑞金，存储又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在的银行有金库、保险库，可当时的中央苏区并没有一个现成的金库可以存放重要物资。毛泽民找毛泽东，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建秘密金库的确有必要，他安排毛泽民立刻去选址，并叮嘱他做好保密工作。

烂泥坑是石城横江镇的一个自然村，地处武夷山麓、赣江源头，是石城、瑞金、长汀几个县的交界，闽赣粤通衢的交通要道，运输比较方便。这里四面环山，森林茂密，是个贮藏东西的好地方。

毛泽民选定了烂泥坑村作为金库所在地，立刻向毛泽东汇报。

1932年8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到临近瑞金的石城县烂泥坑村视察地形——毛泽民在烂泥坑村找到了一个靠山的房子，房子紧靠着山坡，他们在山坡上开了一个地窖，不算太大，但十分干燥，作为重要物资的储备地十分合适。地窖前的房子可以作为岗哨，派人守护。苏区主席毛泽东视察过后，同意这里作为国家金库，从漳州等地筹集的物资，可以放在这个地窖里。

接到主席指示，毛泽民开始安排存库了。

保密工作是头等大事。参与存库的，除了毛泽民，没有国家银行的其他人员。要放入金库的财物，包括金条、金饰、金器，银元、银元宝、珠宝、法币、外币等，全部经毛泽民亲自清点，再由可靠的红军战士用麻布包裹好，放在挑担里，盖上防火石板，总计三十担。

一个排的战士轮流把担子担到离地窖一里外的山下，放出警戒讯号，确认安全，再请另一个排的战士把担子挑进地窖。

全部都放好后，毛泽民亲自视察。所有东西录入清册，清册一式两份，毛

泽民亲自保管一份，另一份由总务科科长莫均涛保管。为了不失密，清册上只写黄酒若干、白酒若干，黄酒代表黄金，白酒代表白银。存储好后，红军战士们再将窖口用石板堵死，在外面布置好伪装。隔天，参与贮存的红军战士全部撤离，换上另一批战士在地窖前的房子里守卫。

苏区的国库制度为委托代理制，国家银行为代理国家金库，这促进了分行和支行的建立。总行设总金库，分行设分金库，支行设支金库，区设特派员。

毛泽民派赖祖烈去福建长汀建立了福建分行。各省级银行，也逐步改为国家银行的省分行。比如，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国家银行川陕省工农银行等。省行与国家银行没有业务往来，独立核算。

办银行，需要许多知识和技能，在战争时期办银行更是如此。

毛泽民深知学习的重要性。他经常是一双草鞋、一顶斗笠，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随同部队去打土豪，筹款、筹粮、筹军用物资。他的背包总是满满的，里面装着笔墨、账本、算盘和经济学著作。

同事们得知后开玩笑说：“毛行长的办公室打在背包里。”

银行刚成立的时候，工作人员对筹备和实行银行代理金库的任务无从下手，只会整理账簿和表格。毛泽民向大哥毛泽东请教，跟苏区财政部长邓子恢商量，集思广益，解决问题。

偶尔，敌人也会给毛泽民和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以启发。有一次，银行收到前方来款，包现洋的纸是一张税务机关的四联单。这启发了毛泽民和曹菊如，经过几个月的研究，他们改进了金库的管理制度和流程，草定了金库管理条例，并逐步建立会计、预算、决算、审计等制度。

1933年，林伯渠从苏联回国，在中央苏区做国民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长，毛泽民也经常找林老请教、商量。苏区办了一个财会培训班，林伯渠和毛泽民去讲课。

毛泽民提倡节俭。他说：“我们为工农持家，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约。要不得吃，没得穿，怎谈得上打反动派呢？”“财经工作是管钱、管物的，不能差错分毫，要细心，要廉洁奉公。”

那时，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吃和住，一切从简。每人每天七八两米，分成两餐或三餐，包在一个蒲草包里煮，这叫“包包饭”。菜以青菜、南瓜为主，萝卜干和腌菜则算是“大餐”。没有足够的盐，便吃自制的

硝盐。办公和住宿在一起，白天挤着办公，晚上点着油灯继续工作。

身为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是有条件开小灶的，但他和钱希均从来不搞特殊，就吃大锅饭。他配有专门的公务员，帮他打理起居，但他从不支使公务员干家务、干杂活。

接待客人上，他力求简便。就算是大哥毛泽东、弟弟毛泽覃上门，他也只是便饭伺候，或者干脆清茶一杯。旁边的人看不下去，说主席来了，好歹弄几个菜招待招待。

毛泽民却说，革命友情和兄弟友情，哪个重要，主席比我还清楚，为了革命成功，手足之间也应该“君子之交淡如水”。

赤白两区的货币战争

朱毛会师后，湘赣边界逐渐形成了一片独立的红色区域。

为解决经济问题，毛泽东和朱德下令在上井村建立了红军造币厂，以墨西哥鹰洋 1895 年和 1908 年版为摹本，铸造了红色政权首批金属货币。为强调独特性，货币隐蔽处有一个工字，因此，这批货币被称为“工字银元”。不久，吉安县东固平民银行，用自产松烟油墨，蜡纸刻板，印出了苏区第一张纸币铜元票。截至 1929 年 1 月，红军造币厂共铸造了一万多枚工字银元。

当时，国民政府的法币、白区的杂币也在苏区流行，这给苏区的金融市场造成了混乱。

1931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东固、兴国印刷厂，东固造币厂，江西省苏维埃造币厂相继合并。国家银行开始着手发行自己的货币，统一货币市场。毛泽东下达指示，毛泽民领导的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开始着手货币发行工作。

有人劝毛泽民：“毛行长，我们自己制造货币条件还不成熟，市面上不是有货币流通吗？将就几年再说吧。”可毛泽民不打算将就、凑合。在他看来，市面上流行的货币，是敌人印制的，敌人掌握主动权，江西既然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就应该有自己的货币。

发行纸币，纸张来源是首要问题。苏区没有现成的造纸材料。毛泽民四处查访、咨询，还召开会议，向一切对造纸有经验的人“取经”。哪怕被俘虏的“原国民党守望队”队员，只要对造纸有了解，一样会被毛泽民请到会上来，畅所欲言。很快，毛泽民综合大家的意见，打造出了一套土法造纸方案：用毛竹、树皮、旧布、

棉絮做造纸原料，再用铁锤捣成浆，置入酸碱水中，泡七天七夜，便可以造出造币纸。

有了方案，毛泽民带头走街串巷，收购破布、旧棉絮、麻袋，又和银行员工一起上山砍毛竹，终于备足了原料，造出了造币纸。

光有纸张还不行，印钞票，还需要油墨。从白区购买是最简便的方法。可蒋介石对苏区采取封锁政策，白区的油墨即便买了也运不进来。毛泽民只能另想办法。当他听说吉安“和茂钱庄”的老板，能够穿梭于白区和苏区，毛泽民请他代购。老板一口答应了。

钱庄老板专程去了赣州，买了油墨，可在返程路上，油墨却遭国民党哨兵没收。此路不通。

钱庄老板没完成托付，十分不好意思。他建议毛泽民，实在不行就用土法造，松膏烧成烟油，辅之以熟桐油，就能制作出油墨来。毛泽民依法一试，果然炼出了油墨。

纸张和油墨不成问题了，接下来要找人设计钞票票面。毛泽民找到汀州毛铭新印刷厂，打听到一个叫黄亚光的人，日本留学回来的，有美术基础，可能可以做票面设计。可是，等毛泽民找到黄亚光时，他已经快被押赴刑场，差点被砍头——当时苏区肃反，黄亚光被错认为是“社会民主党”，眼看就要杀头。

毛泽民爱惜人才，顾不上那么多，他冒着自己可能也被打为反革命的嫌疑，亲自去找大哥毛泽东，请他去跟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说明情况，邓发了解到情况危急，立刻派出莫均涛，奔赴长汀，与县政治保卫局交涉。这才有了“刀下留人”的惊险一幕。

黄亚光被救回来了，他十分感激毛泽民，他被组织从闽西调到瑞金，就职中央政府总务厅文书科，为领导同志抄写文件，国家银行开始设计纸币时，他立刻投入到设计工作当中。

毛主席为造币工作做出指示：要设计印制一套像样的苏维埃政权货币。

黄亚光没有设计纸币的经验，毛泽民鼓励他发挥创造力。当时苏区的工作条件艰苦，绘图的笔和圆规都很缺乏，毛泽民得知后，立刻派人从上海弄来绘图笔、圆规。很快，五分银币券设计出来了，跟着是二角的、一元的。黄亚光想要在钞票上放毛主席头像，但这个方案没有得到毛泽民和毛泽东的赞同，最后只好改用列宁像。

毛泽民强调，设计苏维埃政府货币，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他和黄亚光仔细商讨后，决定以镰刀、锤子、五角星、地图等图案为设计元素，设计五种银元图案和银毫子图案。

毛泽民带领银行员工，挥刀扬凿，在花岗岩条石上做模具，压出银元坯子。银元很快便批量生产出来。不久，红军战士缴获一台铸币机，这可帮了大忙，毛泽民立刻和大家一起拆洗、安装，迅速投入使用。造币速度大大增加了。

苏区的纸币票面有四种：1元、2角、1角、5分。为了防止国民党搞破坏制造假币，纸币上有两个特殊的标志——邓子恢和毛泽民的俄文签名。

仅仅这样还不够。

毛泽民还想了一个办法，在印制钞票的纸张里面掺羊毛。掺入羊毛的纸币，拿起来对着光，会发亮，可以看见羊毛，有线。把纸币撕开，点着，烧出来的味包含着羊毛的糊味。这种防伪技术，大大确保了苏区货币的安全，国民党想要造假也不那么容易了。

邓子恢曾经这样回忆毛泽民主政国家银行时的情形：“毛主席要我当财政部长，泽民当国家银行行长。他搞银行工作搞得很好，很出色。他到苏区以后，根据主席统一财政的指示，把货币统一起来，市场货币流通一律用国家银行券和铜板，国民党的货币一律不准用，打土豪缴的款和政府收的税一律交银行存，由银行开给收据……银行的钱不能随使用，须经财政部批准。这样一来，货币金融统一了，财政也就随之统一。我1932年10月到瑞金，一两个月以后，即到底，苏区财政就统一了。这是泽民同志的一大功劳。”

财政统一了。可是，自打苏区货币发行的那一天起，红白区域的货币战争，便开始了。

毛泽民主持印发的苏区货币迅速在苏区流通起来，白区货币遭到驱逐。国民党当局不肯善罢甘休，蒋介石叫嚣着，“极尽全力扰乱苏维埃经济、破坏苏区金融秩序，使共产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使其不攻自乱，一举而歼之”。

国民党想到的扰乱方法，首先是造假币。国民党特务派出铸币专家，潜入中央苏区南端的会昌县筠门岭，勾结当地土匪，将红铜镀银，铸造假苏区银币。他们还派出行动小组，潜入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叶坪村，打听苏区纸币制造流程，偷偷印发假钞。

有一天，毛泽东把造币厂厂长谢里仁找到办公室，拿给他一枚二角银币。

谢里仁是行家里手，他把银币在手里掂了掂，便确认这是一枚假币，是在红铜片上电镀了一层银膜。

毛泽东笑着说：“我们的谢行长都成孙猴子了，火眼金睛。”

谢里仁说：“银币比铜币重，不过我们现在也听说有人在制造假币。”

毛泽东找来毛泽民，要求立刻剿灭造假行为。

毛泽民从红军大学抽调二十名学员，大作宣传，不但在桥头、河道、街市加强稽查，还教民众识别假币的方法。毛泽民又请国家政治保卫局组建假币侦破组，一举端掉了国民党安插在中央苏区的造假窝点。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时候，苏区财政经济情况不容乐观。国民党特务趁机煽风点火，哄抬物价，苏区币值急跌，国家银行的信用遭到质疑，群众不明真相，哄拥着去银行兑换现洋。会计科长曹菊如立刻向毛泽民汇报。

毛泽民赶到营业厅，发现厅里挤满了拿着纸币前来兑换现洋的人群，且情绪都十分激动。毛泽民发愁了，他在瑞金县城转了一圈，发现大小商铺前都插着牌子，上书：只收现洋。

毛泽民立刻向财政部长邓子恢汇报，又找来外贸总局局长钱之光一起商量。毛泽民表示，办银行最怕的就是信用破产，发生挤兑现象，这与国民党的假币大量流入市场有关，打假是治本，但眼下必须想办法平息挤兑，维持住国家银行的信用。

经过仔细研究，国家银行从金库里提出了大批现洋，公开兑换纸币，老百姓们蜂拥而至，毛泽民咬牙坚持。如此下去不是办法。情急之中，毛泽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让红军警卫开路，让曹菊如带着箩筐队游街，箩筐里装满了金银珠宝和现洋，哪里人多往哪里走。老百姓一看，国库充实，银行“财大气粗”，自然也就没必要着急兑换现洋了。缓兵之计奏效了。

另一方面，钱之光从前线连忙运回大量缴获的物资，这些紧俏物资，被毛泽民调往合作社出售，店前竖牌子，上书：只收纸币，不收现洋。

纸币能够买到日用品，信誉度大增。没几天，挤兑危机便平稳度过了。

振兴苏区经济

苏区的经济底子非常薄弱，蒋介石的经济封锁让苏区的财政雪上加霜。

为了撑起苏区经济，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不得不想方设法搞“创收”。造纸、运盐、淘金、炼铁，他都干过。比如淘金，去淘兴国县枇杷垅池塘里的沙金，淘出了几两，但这解决不了大问题，毛泽民必须另辟蹊径。

瑞金，得名自“挖地得金”“合生瑞气”。赣南多矿产，要想提高财政收入，开矿是个路子。

毛泽民发了个布告，发动群众：“苏区地域，遍布宝藏。一旦开掘，国富民强。军民报矿，一概有奖。”

人多力量大。没过多久，红三军团一小通信员就带来一块钨矿石和一封信：“距我部驻地两里，有个叫铁山垅的地方产钨砂。红军到来前，广东矿商在此组织开采，八块光洋一百斤。”

这块钨矿让毛泽民兴奋不已。

他赶到会昌铁山垅，找到了挖砂工栖身的草棚，了解到挖砂的三种情况：一是捡零砂；二是集体组织，合伙搭棚，风险共担，盈利共分；三是工头雇工人挖砂，按月支付工资。1929年初，毛泽东和朱德带领部队到赣南时，为了贴补军费，曾经动员战士们挖砂，但都是零散生产，不成规模，效益不高。

毛泽民还了解到，钨砂市场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状态，挖钨矿，是苏区创收的突破口。

毛泽民很快就组建了一支挖砂队，大约有五百人。1932年1月，铁山垅钨

矿场成立。这是一家国营矿场。毛泽民的构想需要中央的支持。他给苏区中央政府写报告说：“全世界一半的钨矿藏在我们中国，在我们苏区。我们应该用力地发展生产，以其出口来加紧打破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毛泽东得知后，十分支持毛泽民的想法，报告两天就批下来了，上书：“着毛泽民筹办。”

1929年3月，中华钨矿总公司成立。毛泽民的速度很快，除了铁山垅钨矿场，上坪、庵前滩、吴山、蜈蚣山他都安排恢复了钨矿生产。会昌白鹅墟，还成立了“白鹅洗砂厂”，专加工钨精矿。

总公司成立之初，毛泽民任命胡克功做总经理。做了八个月没有起色，财政部长邓子恢着急了，他撤掉了胡克功，请毛泽民坐镇。

新官上任三把火，毛泽民毫不含糊，他先反腐，撤掉挪用公款的干部，然后，改善矿工待遇，跟着扩大、鼓励生产。

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关心矿工们的生活。毛泽民受委托，亲自去矿工生活的地方调查、问讯、征求意见，得知矿工家庭有的连铺盖都用不起后，他想办法让银行拨款，又发动国家工作人员募捐，有钱捐钱，有物捐物，很快，矿工家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救助。

矿山自然条件恶劣，矿工看病难，特别是春夏之交，蚊虫肆虐，流行病也容易暴发。病患不得医治，只好使用土法子：要么“水攻”，泡在水里；要么“火攻”，吃辣椒；要么“毒攻”，生吞癞蛤蟆。

毛泽民看在眼里，下决心办医院。他借用铁山庵办门诊、药房、住院部，又花高薪——每月十块光洋，聘请草药郎中和中药郎中。来看病的人太多，住院部住不下，毛泽民就再想办法，搭建临时住房，千方百计救治矿工。

矿上生活物资奇缺。毛泽民借鉴安源的经验，开办股份制消费合作社，矿工入股，生活物品统一解决。

生产方面，毛泽民实行“两手抓”。公营矿场生产要抓，个体的民工的合作社和合作组的生产，他也抓，合作组只要和总公司签订《钨砂交售合同》，可提前拿到百分之七十的款子。无论是公营还是合作社的矿工，一律八小时工作制，礼拜日休息。

“公办带动集体，集体推动公办。”毛泽民这样说。

毛泽民还曾参与改进生产方式。矿工们惯于使用短钎、小锤、单人打炮眼的作业方式，生产效率不高，毛泽民集思广益，在一中队长的建议下，在队里

推广长钎、大锤、双人组合作业方式，提高了生产效率。

毛泽民一贯不吝奖励，能提出好建议的矿工，他就重奖。

矿工们的积极性被激发起来，钨矿生产很快如火如荼，产量直线上升。1933年的产量是1932年的4倍。铁山垅和盘古山的产量，由1932年的648吨上升到1753吨。

截至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中华钨矿公营职工5000余人，开采收购钨砂4193吨。

红白贸易特区

蒋介石实行经济封锁，断绝苏区与白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想要在经济上“饿死”苏区。

他在南昌设立“赣江封锁处”。赣江口岸，被国民党士兵封锁，赣州城城墙上贴着《赣江封锁条例》《取缔接近赤区各地运输主要物品办法》，进出城的老百姓都必须接受严查。封锁物资、封锁交通、封锁邮电，是为“三封”政策。赣州防务官员还强迫老百姓沿城墙构筑工事，护城河挖了几丈宽。

国民党还在红白区交界处设立食盐、煤油公卖处，当地居民，每人每月食盐限定三到五两，十人以上每户每月煤油不得超过半斤，五至九人不得超过四两，五人以下不得超过二两，每半个月卖一次，不得超购。

更有“五家连坐法”，指若有一家朝苏区贩运食盐，另外四家密而不报，则定“甘心赤化”罪。

一时间风声鹤唳。红白区正常经济往来被隔绝。交通小道上，苏区运输队肩挑手拿，运送食盐、药品和军工器材进瑞金，半路上常常遭遇国民党军队的伏击。

苏区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本地产出的稻谷等粮食，烟叶、茶叶、樟脑等特产运不出去，必须从外地进口的食盐、布料、煤油、西药等必需品又进不来，产品无法交换。一段时间内，红都瑞金就食盐问题采取了非常配置，每人每月的食盐供给量，从六两下调为四两。尽量白天开会，若晚上必须开会，则只点一根灯芯。中央局的墙上贴着这样的倡议书：“同意者请签名：一、每天节省二

两米；二、不要公家发新衣服。”在医院，伤员们提出少用药或不用药。

主抓苏区经济的毛泽民必须想法子打破僵局。

首先是自力更生。没有盐，苏区红军和群众便就地挖硝熬盐。

其次是想法子。国民党可以封锁运输，苏区红军也可以实行反封锁。毛泽民曾建议去白区购盐的红军，抬着棺材去，装作送葬，棺材做成两层，上面一层用臭猪肠打掩护，下面一层偷偷放盐，负责检查的国民党兵嫌味道臭，检查不仔细，盐自然就被运过来了。若是走水路，就把盐巴放在密封的铁桶里，铁桶吊在船底下，国民党兵怎么也搜不到。

1933年2月，中央苏区成立国民经济部，设外贸局，努力打破封锁，开展对外贸易活动。“一切苏维埃的商业机关必须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与合作社资本，同他们发生多方面的关系。苏维埃政府除以关税政策来调剂各种商品的输出外，保证商业自由，鼓励各方面群众的与私人的商业机关的自动性，去寻找新的商业关系与开辟通商道路。”

红白区之间的贸易往来完全是有可能性的。红白区之间的货品具有互补性，白区需要木材、粮食、矿产，苏区需要药品、食盐、日用品，这就奠定了区域贸易的基础；红军游击队的积极行动，使得敌人的封锁没办法做到密不透风；白区官员贪腐严重，这也是一个漏洞，完全有可能与他们进行私下交易。

1933年4月，毛泽东指派钱之光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贸易局局长，并就对外贸易工作提出了一个十六字方针：“队伍要强，撒网要宽，胆子要大，办法要巧。”

毛泽民一直以来都在思考着苏区经济振兴的办法，大哥毛泽东的指示，让他一下放开了膀子。毛泽民和钱之光，成了一对配合默契的战友，事实上，他们不但是战友，还是亲戚——钱之光是钱希均的哥哥，钱希均是毛泽民的妻子。

很快，福建新泉、会昌乱石圩、吉安值夏、赣县江口都设立了外贸分局，赣江、赣西设立了办事处。从上海到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上也开设了不少秘密商店。货品供应以苏区的需要为准，苏区需要什么，秘密商店就卖什么。秘密商店里的工作人员都是地下党，他们都与上级单线联系，彼此并不相识，这样有利于保密和安全。

负责采购物资、运输的交通员则是从红军学校挑出来的可靠人选，都应遵守《秘密交通条例》，对自己的生活严格自律，因为任何一点小的差错和自我放

纵，都会给党组织带来大灾难。

毛泽民是中华钨矿总公司的总经理，钨矿的对外贸易工作，由他亲自主抓。他想到和军阀做生意。

国民党政治腐败，很多军阀都有自己的生意要做，负责赣州防卫的广东军阀余汉谋部李振球，在城内最大的利民百货占80%的股份，蒋介石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煤油和食盐都实行公卖后，李振球依旧私贩煤油，他的外甥是赣州“广益昌”的少东家，专为李振球炒黄金、收钨砂。

国民党的封锁链条显露出脆弱的一环，毛泽民决定从李振球入手做工作。他打听到赣州地下党员刘东生与李振球的外甥是同学，便请刘东生去牵线，吊一吊他们的胃口。

刘东生不负众望，很快吊足了“广益昌”少东家的胃口，少东家再向李振球汇报，李振球一听有钱赚，立刻派手下赵林去跟红军秘密谈判。

毛泽民是做生意的行家，他一方面安排谈判，一方面吩咐江口分局，钨砂价格一律上调，国民党越是想挣钱，我方就越是讨价还价，结果最终成交价格涨了六倍多。

双方达成协议：进口的货物由李振球部护送，从广东韶关等地运到信丰县，再以运往赣州为名装船，顺桃江而下，船到江口，押送方向对岸发送信号，苏区江口外贸军和赣江办事处的人接到信号，带空船来装货，货搬出来，再装上苏区押送来的货，李振球的船押着交换来的货，原路返回。

当然，双方的交易方式并非一成不变。国民党特务众多，为了掩人耳目，红白区的交易船之间，偶尔也会上演“假抢劫”的戏码。货物送到地点，突然枪声大作，押送人落荒而逃，回去就说，货被红军抢走了。

李振球和红军的生意越做越大，风声不胫而走，其他军阀眼红，也纷纷派来联络员，红白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兴盛了。

1933年11月，苏区的贸易工作又有了新突破。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与共产党联合反蒋，福建岩新、龙冈、金砂三地的贸易一下被打开了。苏区成立“中华实业有限公司”，作为外贸总局在福州的办事机构，钱之光做总经理，通过这一渠道，苏区的钨砂大量外运，白区的物资也可以从此处购入，食盐、药品、煤油、枪支……封锁线上的贸易，就是这么奇异地进行着。

冒险主义笼罩红都

陈独秀遭到批判之后，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人的更替速度甚为惊人。

1930年，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的几个月，接连下令红军发动狂飙式的对城市的进攻，让根据地红军攻打长沙。尽管毛泽东对中央的这个指示存有疑问，他和朱德还是强攻了两次，但均告失败，红一、三军团都遭受较大损失。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次进攻还带来了一个极坏的消息——红军的攻击激怒了长沙的军阀，杨开慧被捕牺牲。

共产国际派瞿秋白、周恩来清算了李立三的错误，李立三被送往苏联“学习”。可瞿秋白的工作也无法令共产国际满意，从莫斯科回来的一批人一跃而上，在共产国际的扶持下，登上了历史舞台。

这些人后来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代表人物王明，他将“左”的风潮，从上海刮到了苏区。

种子在1931年1月就已埋下。

1931年1月，上海的风又湿又冷，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了，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扶持一个年轻人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他的名字叫陈绍禹，不久之后，他改名王明，开启了“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毛泽东和朱德都没能参加这次会议，他们远在江西，四处征战，而且共产国际也没打算让他们参加。毛泽东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1年8月，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临时总前委写了一封信：“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例如你

们容许地主残余租借土地耕种，对于富农实行抽肥补瘦，抽多补少，而不实行变换富农肥田给他坏田种的办法”，“犯有富农路线的某些错误”。“红军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与小团体的观念，这与红军已在进行大规模战争与担负着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是不相称的”。

这些批评大多数与事实不符。但上海方面却不但认识不到这一点，还被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仅仅隔了一个多月，中央发出了由王明起草的决议《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错误地认为“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要求红军立刻攻打中心城市。

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红军还处于弱小阶段，尚不具备攻打中心城市的力量，两次围攻长沙，就是最好的例子。

1931年9月，王明受顾顺章叛变的影响远走莫斯科，到共产国际当中共代表去了。12月，周恩来赴苏区。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博古在上海成立中共临时中央，开始对苏区发号施令。

王明和博古是好朋友，“一苏大会”前夕，中央苏区党组织在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重点批评中央根据地的一些正确的东西，着重批评毛泽东。

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被指责为“富农路线”；红军的作战方式被指责为“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和“街市战”。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领导权遭到挑战。

两个月后，毛泽东便被迫离开了中央局的领导岗位，请病假修养。

“一苏大会”之后，新成立的中革军委取消了红一方面军建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销，毛泽东这个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也就自动被撤销了。

1932年1月9日，博古掌控的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味“左”倾冒进，要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毛泽东和朱德都不赞成打赣州，但多数人要执行临时中央的决议，结果，赣州打了二十多天都没打下来，中革军委指挥红军组织爆破总攻，一败涂地。

情势危急，毛泽东被专程赶来的项英请下东华山，去前线参加决议。天下

大雨，毛泽东不顾病痛赶到瑞金，他立刻复电前线指挥部，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起用预备队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

电报发出去，毛泽东又带着警卫班，日夜兼程，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

朱德告诉毛泽东：按照你在瑞金复电的意见，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在红四军的支援下，红三军团已经解围脱险。

善断，是面对复杂情况能够深刻判断进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胆略。善断的毛泽东，总能够在革命危亡的时刻，在别人无法找到出路的时候，破釜沉舟，用兵如神，力挽狂澜。

可是，“左”倾势力为一己私利，故意忽视毛泽东对于革命队伍的巨大作用。

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遭到猛烈攻击——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在赣州战役失利后主张红军向敌人统治较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但这被批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中克敌制胜的“诱敌深入”方针，被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义危险”。

周恩来为毛泽东说话，认为后方的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有些过分，他坚持主张毛泽东留在前方。朱德和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

但“左”倾势力却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

毛泽东被逼交出军权。

他虽然“仍留前方助理”，但也不得不“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长期操劳，毛泽东消瘦不堪，他该去养病了。临行前，周恩来到毛泽东的住处送别。他是支持毛泽东的，他清楚地知道毛泽东对红军的巨大价值是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布尔什维克”们所不能比的。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若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回来。

毛泽东去了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医院院长傅连璋请他住在老古井休养所。他和群众一样，喝老古井的水。每天傍晚，他会在傅连璋的陪同下到屋后的卧龙山散步。

一次，毛泽东发现一株松树正在流松脂，他对傅连璋说，松脂是从松树的伤疤流出来的，树受了伤，用自己身上的松脂来医治，人也一样，得了病，要靠自己的抵抗力来恢复健康。

毛泽东从未被打倒。说也奇怪，这位农民之子每次走到人生低谷，只要接近自然，总能够迅速恢复，再度崛起。

在福音医院，毛泽东竟然能遇到知音。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也在此处养病。罗明当初是反对“立三路线”的，他实事求是地干，却被批为右倾。毛泽东来到长汀养病时，他刚好代理省委书记之职。

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是毛泽东和罗明的共同点，他们一见如故，很谈得来。毛泽东说，罗明就仔细地听，时不时会发表自己的见解。

毛泽东说，福建和江西弋阳，应加紧开展广泛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罗明大感正确。

毛泽东又说，在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驻漳州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

听了毛泽东的话，罗明如醍醐灌顶。

出院后，他立刻在长汀站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与会者一致赞同。

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主张使得闽西苏区的局势迅速好转。

可“听话”的罗明却很快迎来了一场无妄之灾。

1933年1月下旬，博古和陈云从上海出发赴中央苏区，在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乘船到汕头，再改乘火车到潮州。到了潮州后，骑马，走两天到上杭白砂。罗明正在上杭开展游击战争，得知博古前来，立刻杀鸡备酒，好生招待。罗明简单地向博古汇报了工作情况。

博古却反问：“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上杭、永定、龙岩干什么？”

罗明答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是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毛泽东的指示？”博古脸上露出不快的神色，“你对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见？”

罗明说：“我还没有听到传达。”

还未等罗明继续说话，博古便说：“吃饭了，不谈了。”说罢不耐烦地走了。

博古路过长汀，有人提议去看看正在养病的毛泽东。博古依旧不耐烦，说：“毛泽东又有什么可看的。”

博古很不高兴，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他们不执行，却在这里搞游击战争。

即便在养病期间，毛泽东对中央苏区的影响依旧这么大。在博古看来，这是对中央的一种挑战。他决心扭转这种“错误局面”。月底，他到达瑞金，与先期到达的洛甫（张闻天）等人会合，这标志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来中共苏区中央局与中共临时中央合并，改成中共中央局。从此，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

红都瑞金有了新主人。毛泽东第一时间受到了打击。

1月底，罗明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汇报他在长汀、新泉、连城的工作情况。

这份报告激怒了博古等人。

他们觉得罗明在报告中的一些字句，分外刺眼，比如“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就遭到博古质问。他问罗明，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怎么能把毛泽东跟斯大林甚至列宁相提并论”！

博古还说：“不光是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有比你更高级的干部，也同样犯了错误！”

“更高级的干部”，是指毛泽东。

新主人们要“杀鸡儆猴”了。他们开始全面推行“进攻路线”，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博古后来也承认，“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写道：“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

罗明被撤销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职务。

毛泽东结束休养，回到瑞金叶坪村，得知罗明受自己的牵连，尽管他依旧乐观，可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从莫斯科带回来“左”倾冒险主义的朔风，刮遍了整个中央苏区，且一刮就是四年。

虽然毛泽东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但共产国际和中央局显然凌驾中

央苏区所有人之上。他们态度傲慢，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是个农民游击战士，但他们对毛泽东在整个苏区的影响力有所忌惮，所以“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

6月，毛泽东出席在宁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的对待提出申诉，但立刻遭到博古的反击。

毛泽东愤懑不已，但他依旧坚持正确的观点。八一前夕，他应邀出席工农剧社举行的纪念“八一”晚会，做中国工农红军历史的演讲。谁能比毛泽东更了解红军的历史呢，他是创建人、见证人，他出生入死奋力保留革命火种，而那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布尔什维克，只是纸上谈兵。

提起红军，毛泽东心潮澎湃，他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说到广州起义，从井冈山的斗争说到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清楚地指出：每一次战争的胜利，都是靠全党的正确路线，都必须克服“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空谈与动摇。

这是求真的毛泽东。他是一个巨人，伸开两臂，紧紧拽住中国革命的长龙，使得它不会向左或者向右，偏离航道。实践已经证明，中国革命照搬苏联的模式注定不能成功。但毛泽东与莫斯科回来的布尔什维克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大军，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这一次，敌人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很快占领黎川。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苏区来了一个德国人，他是共产国际东方部派来的，原名奥托·布劳恩，中文名叫李德。博古在上海时得知李德毕业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便聘请他来中央苏区做军事顾问。

李德掌握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这是一场灾难。

11月，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这是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

毛泽东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 1933年，毛澤東（右一）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八县贫农团代表会议上讲话

这是天才的军事战略。

可博古和李德却畏首畏尾，不肯采纳毛泽东的建议。红军未能主动及时地援助第十九路军，错失了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战机。由此可见，“左”倾朔风有时候也会朝右刮。

但他们却坚决不为战事的失败负责。黎川失守，浒湾失利，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和李德等人一股脑把责任推给萧劲光。

他们在瑞金对萧劲光进行公审，称之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判处他五年监禁，开除党籍、军籍。在公审之前，李德等人甚至主张杀掉萧劲光，毛泽东坚决不同意。公审判决后，萧劲光被关押起来，毛泽东派贺子珍前往探视。

贺子珍转达了毛泽东的话，大意是：黎川失守是整个指挥部署的问题，你应该撤退，做得对。

萧劲光被关了一个月，转去红军大学当战术教员。

后来，萧劲光回忆当时：“我得以释放，能活到今天，是毛主席同‘左’倾机会主义者坚决斗争的结果。”

被批斗的日子

反“罗明路线”斗争，一时间满天飞。1933年2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做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闽粤赣省委即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2月16日，博古在红军学校作了《拥护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的讲话，全面“揭露”和批判罗明。

党中央的机关报《斗争》，连续发表《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什么是进攻路线？》《反对腐朽的自由主义》，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走向高潮。

在闽西，什么样的情况都能朝“罗明路线”上戴帽子；前线不能执行进攻路线是“罗明路线”，马上被撤回；贪污腐败，消极怠工，也是“罗明路线”。党内被斗争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

当然，最受冲击的还是罗明。他不分白天黑夜地接受批斗，白天中级干部批判他，晚上一般干部批判他，会一开几天，罗明苦不堪言。批斗时，甚至有激进分子会跳出来，干脆把罗明枪毙掉，还是中央局的杨尚昆上来讲话，才得以平息。

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昏了头脑，在罗明推行毛泽东指示的新泉，一些干部并不愿意反对罗明，他们认为罗明和毛泽东是对的。他们说：“留得红色区乡在，可以不断出红军。”可临时中央的人一听说有人反弹，立刻进行打压，给他们扣“机会主义”“腐朽的自由主义”的帽子。

很快，反“罗明主义”斗争扩大化，受毛泽东“连累”的不止罗明，毛泽覃和贺怡夫妇等人也受到冲击。

1933年3月，“左”倾领导们发明了“江西罗明路线”，开始对江西苏区的领导人进行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首当其冲。

他们都是毛泽东的支持者。

他们曾对“左”倾领导人讽刺毛泽东不满。他们说：“大城市中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他们把上海来的“左”倾领导人，叫做“洋房子先生”，意思是他们住在洋房子里，脱离现实，是教条主义。

这个“雅号”传到博古等人的耳朵里，他们立刻火冒三丈。

赣南会议后，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赣东特委书记谢维俊，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对“左”倾路线公开抵制。

在军事问题上，他们主张诱敌深入，反对军事冒险。

在经济政策上，他们主张均分土地，反对痛击富农。

在扩红原则上，他们主张群众武装逐渐发展成红军。

这深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临时中央认为这些人是“毛派”，必须采取措施予以打击。1933年，苏区中央代表在检查赣南苏区工作时，认为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和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的做法，是向罗明看齐，是执行与中央相反的防御路线。

临时中央绕过江西省委，直接召开会、寻、安三县积极分子会议。认为邓小平等人的领导是在敌人进攻面前“悲观失望”，是“对于群众和党员同志的力量没有丝毫信心，以致一闻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刻表示张皇失措，退却逃跑”。

4月15日，《斗争》杂志发表了洛甫的《罗明路线在江西》，“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在江西”，“防御路线的问题，不但在会、寻、安，而且还在江西其他地区”，并公开提出反“江西罗明路线”的问题。

第二天，临时中央又督促江西省委开会，批评“江西罗明路线”，提出“邓、毛、谢、古小组织”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必须予以批判。

邓小平和毛泽覃等人都写了申明书，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可临时中央看了之后，认为不够诚恳，立刻打回去，要求他们重写，要求他们的“检查”，要深刻、要具体。

邓小平这样写道：“我们交的两份检查，写的全是实话。回顾历史，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是对中国革命负责的。”又说，“自己感

觉到不会走到小组织的行为”，“反右派与我没有关系”。

毛泽覃被迫在声明书中承认过去在土地问题上犯了错误，但不认为自己有“小组织行为”，只是因许多意见“不敢向党提出，仅只秘密地谈论”。

谢维俊、古柏都不承认什么“反党小组织”。

5月5日，苏区中央局批准了以江西省委名义做出的《对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责令四人“必须向党作第三次申明书”，还以开除党籍相威胁。

“四大金刚”之首的邓小平被撤职，给予党内“最严重警告”处分，派到边远山区当巡视员，可很快又被调回来。

邓小平回忆说：“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即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后，要求另调工作，于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一般宣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排在第二位的毛泽覃则被下放劳动，后被安了一个闲差，当苏区互济总会宣传部长。

如此毫无必要的斗争对苏区的打击是巨大的，周恩来后来总结：“1933年又反对罗明路线，反对邓、毛、谢、古，正确的同志都受到打击。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因为临时中央1933年初到了江西，执行国际路线。结果使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苏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

这个时候，毛泽覃和贺怡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贺怡要照顾孩子，同时还在瑞金县委组织部担任部长，生活十分繁忙、艰难。毛泽覃受到打击，贺怡十分着急，她知道丈夫是正确的，她全力支持。她去找大哥毛泽东和姐姐贺子珍想办法。

毛泽东至情至性，弟弟有难，他怎么能不伸援手，可是这个时候，临时中央正在大整他，他暂时无力回击，身边的亲人受到连累，毛泽东痛苦不已。

可是，毛泽东和毛泽覃料想不到，事情竟然朝更坏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和毛泽覃被打为“反动分子”，“反动家属”们也纷纷受到冲击。

贺子珍和贺怡的哥哥贺敏学被撤职，送去红军大学接受审查。贺子珍和曾碧漪（古柏之妻，曾任毛泽东机要秘书）原本一直做着管理文件的工作，这个时候也“靠边站”，文件再不用她们管；贺怡被撤职，成为重点批判的对象，送

进党校学习。

毛泽覃和贺怡的孩子一岁多了，毛泽覃被贬在外，贺怡又要去党校了，孩子只能托付给姥爷、姥姥照顾。

1933年10月，贺怡进党校，名为学习，实为监禁。当时，博古是中央党校校长。“左”倾领导人们想要以贺怡为突破口，搞到毛泽覃的“黑材料”。

贺怡不从，就成为重点批判对象，白天遭批判，晚上写检讨，但她始终坚持，毛泽覃是个好同志，她也不愿意与毛泽覃划清界限。

党校男多女少，很长一段时间内，女同志只有贺怡一人，她一个人一间房，地上铺着稻草，她就睡在稻草上。她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但始终不能和毛泽覃见面。

一关数月，贺怡要分娩了。领导对“顽固”的贺怡很不满意，但又不能不让她离开党校出去生孩子，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开除党籍，以观后效。幸亏副校长董必武赶来劝阻，最后给了一个党内警告，保住了党籍。

天佑良人，贺怡顺利分娩，可还没出月子，她就又受到批斗。

毛泽覃来看贺怡和孩子，见他们消瘦苍白，十分痛心。贺怡想不通，毛泽覃他们明明是革命的先锋，怎么一夜之间，却成了被批斗的对象。

毛泽覃一向气性大，可经历了那么多，也成熟了，他告诉贺怡，革命是曲折的，革命的路上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遇到，但革命的信念不能动摇，要经得起打击，要有耐心和信心，继续革命。

被批斗期间，贺怡有时会找姐姐贺子珍排解苦闷。

毛泽东知道后，对贺子珍叹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谁让他们是毛泽东的亲戚呢！”

毛泽东为了不让更多人受到连累，想到了一个办法——少跟同志们说话，同志们怕加重毛泽东的“罪责”，也不跟他讲话。

一天，两天，一周，两周，毛泽东只是一个人默默办公，学习，不跟外人说一句话。

罡风乱红都。

毛泽东一家人都在坚持着。他们团结在一起，相互鼓励，他们坚信，革命会有转机。

印钞乱象与金库转移

毛泽东离开了领导岗位，“左”倾领导人们还不满意，反“罗明路线”斗争，毛泽覃夫妇，贺敏学、贺子珍兄妹都受到影响，撤职的撤职，靠边站的靠边站。

毛泽民夫妇也没能幸免。

毛泽民是中央苏区国家银行行长，主抓经济，属于业务部门，按理说不应该受到思想领域斗争的影响。可是，博古等人没打算放过毛泽民。他是毛泽东的弟弟，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不整一整毛泽民，毛泽东就还有羽翼。

1933年，在国民党的恶意煽动下，中央苏区一度发生了挤兑现象。幸亏毛泽民和邓子恢机智能干，压住了挤兑风潮，国家银行又恢复了正常。

但博古等人并不认为这件事可以那么轻松过去，他们不找客观原因，却找主观原因，说发生挤兑是因为财政部的政策，是“向印钞机瞄准”，是滥发票子导致金融市场震荡。

可等到钞票发行稍稍紧张，他们又立刻转向，批评国家银行的发行工作是“抓着怕死，放开怕飞”。邓子恢被撤职，不再担任财政部部长，转做副职。

闽赣省工农政府成立后，毛泽民被调任省委常委、党团副书记兼财政部长，他虽然还是国家银行行长，但也只是挂个虚名，国家银行实际上被博古等人控制。

少了毛泽民的监管，国家银行的印钞机一下子失去控制。

博古等人不顾经济规律，疯狂印刷钞票，中央印刷厂的印钞机日夜不停，加紧印刷。纸币发行量猛增。1932年，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六十多万元，到了1933年，一下子猛蹿到三百多万元。大量纸币流入市场，中央储备金又不足，

通货膨胀，纸币的信誉度明显降低。

毛泽民得知后，心急如焚，他苦苦树立起的苏区纸币的口碑，眼看就要被这些外行人毁坏。

毛泽民找大哥毛泽东商量，尽管毛泽东当时正受到错误的批评而“赋闲”，但他依旧是苏区国家主席，他坚决反对滥印纸币。1934年2月，“二苏大会”毛泽东作报告，他说：“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苏维埃财政的收入，是苏维埃财政政策的重要部分，明显的效果已在闽浙赣苏区表现出来，在中央苏区也开始表现出来了。这一方面工作的着重地进行，是苏维埃财政机关与经济机关的责任。这里应该指出：国家银行发行纸票的原则，应该根据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方，这一方面的充分注意是绝对必须的。”

可领导机关并不把毛泽东和毛泽民兄弟的担忧放在心上。

毛泽东和毛泽民之忧，并不是针对个人境遇，而是针对苏区的发展和未来，可“左”倾分子们却认为这是毛泽东和毛泽民对他们领导权的挑战。

中央印刷厂的印钞机持续疯狂运转。

物价上涨，货币贬值。

毛泽东和毛泽民为人民群众的生活担忧。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做结论，始终强调要关心群众生活。“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1933年，李德进入苏区，在博古的支持下，他实际上控制了红军。

面对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中的堡垒政策，毛泽东一针见血指出：“他们大筑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可李德、博古并不打算吸取前四次反“围剿”的经验，他们要“堡垒对堡垒”，命令红军“御敌于国门之外”。

这是和蒋介石拼消耗，可是，苏区又哪里消耗得起呢？于是，博古和李德只能寄希望于大量印刷钞票，以解燃眉之急。

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1934年上半年，苏区的纸币发行量高达八百多万元。这在当时已是天文数字。

毛泽民经常去市场上转悠，发现红军战士买一头猪，居然需要三四十元，老乡看不过去，干脆把猪崽送给红军，支持红军给养。

大哥二哥为苏区经济状况发愁，毛泽覃也没闲着。1933年3月他因反“罗明主义”被撤职后，一度赋闲，经当时的财政部长邓子恢支持，去了石城县开办国家银行支行，并担任支行长。

毛泽覃向二哥毛泽民请教办银行的法子，毛泽民倾囊相授。毛泽覃心里有了数，到石城之后，他先物色了两位在总行工作的石城人，把他们调来石城工作，一个做会计，一个做保管，而后，他又慢慢物色了十多位人才进入银行工作。

毛泽覃选了一处没收来的布庄做营业场所，银行迅速建起来了。1933年3月18日，国家银行石城县支行成立。银行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毛泽覃在县里不同的区建立了分行。可是，没过几个月，敌军误以为石城县驻扎着红军主力，开始派飞机疯狂投放炸弹，县城顿时变成一片火海。

作为支行长，毛泽覃并没有因为敌人的炸弹就停止办公。他把办公室搬到一个偏僻又简陋的五龙岩山洞里，白天可能有轰炸，他就去山洞办公，晚上再回到县城休息，如果敌军轰炸得紧，他就日日夜夜都住在山洞里。

毛泽覃每个月回瑞金一次，山路难走，但毛泽覃还有一项秘密任务，就是绕道去瑞金东面和石城交界处的烂泥坑村，去看看秘密金库的安全。

国家银行建立之初，毛泽民曾经在那里藏了不少金银和物资。

毛泽覃就这么尽职尽责地扮演着银行支行长的角色，一直到1933年9月被调走。

1934年4月底，博古、李德直接指挥广昌战役，红军因同敌人进行阵地战，并采用“短促突击”战术，虽然给予敌人重创，但自身伤亡五千五百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被迫撤离广昌。

广昌是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失守，意味着中央苏区瑞金、石城、宁都、兴国、雩都、长汀旦夕之间便可能遭遇攻击，情势已十分危险。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三军团，彭少辉、萧华指挥“少共国际师”，三万余人，浴血奋战，拼死抵抗逼近石城的八万国民党大军。

毛泽民的神经一下绷紧了。石城如果失守，秘密金库将落于敌手，多年积

累也就毁于一旦。

秘密金库必须转移！

一天夜里，毛泽民来到高围云石山毛泽东住所，开门见山地说：“中央政府成立时，我们打土豪、分田地，缴获了大批金条、银元宝和银元，还有国民党中央银行发行的全国通用的纸币，也有一些苏区制作的银元。那时根据你的指示，我和吴吉清、黄亚光三人秘密雇用一百多个挑夫，把这些东西挑到瑞金东边与石城交界处一个叫烂泥坑的地方，埋藏在十分隐蔽的山洞里。我们堵塞了洞口和道路，很难被敌人发现的。”

毛泽东问：“大概有多少东西？”

毛泽民答：“大概有一百多万块银元，几百根金条，还有一些银元宝和国民党发行的纸币。清单还保存在我这里呢！这都是红军和中央政府储备的资金。现在形势吃紧，我特来请示这些资金要怎样处理？”

“是啊，这是中央政府的资金，是红军的钱，一文钱也不能动。”毛泽东说，“经济部长，你看怎样处理？”毛泽民那时候是国民经济部长，毛泽东是苏维埃国家主席，自从毛泽东被免了军权之后，他的工作重心就转到苏区建设上来，毛泽民则是哥哥的左膀右臂。

毛泽民说：“要么将这些东西取出，原封不动地转移到兴国的深山，再隐藏起来。”

毛泽东说：“据最新情报通告，东面敌人已逼近石城，西南的敌人已经到达滕田、东固、黄沙岭一带，兴国是去不得啦！”

毛泽民说：“我们就赶紧把东西取出，跟着队伍转移，只怕途中搬运困难。”

毛泽东说：“对，把东西全部带走，这些决不留给敌人。我们让部队自己管理这些资金，可以化整为零，把东西分散到人，一个人背一点。这不就运走了。这样走，既安全，又可靠，还可行，便于战斗时部队应急使用。你立即订出一个具体方案告诉我。”

毛泽民听了大哥的话，匆匆离开云石山，赶往叶坪。他要赶紧制定出一个方案，保住这批资金。

事实上，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兄弟保住的这批资金，是红军重要的经济来源，为长征的最终胜利出了一份力。

·第六章·

奇迹：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前的种种情形

广昌战役失败的原因，毛泽东看得很透。

他说：“我们不能按本本主义先生们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以卵击石。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

他深知红军的优势所在：“农村是海洋，我们红军好比鱼，广大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要爱护民力，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一心是我们胜利的本钱。”

可博古、李德等人哪里肯听毛泽东的呢。

他们固守自己那套战术，结果败得很快。1934年7月，国民党以三十一个师的兵力，分六个方向“围剿”中央苏区中心区。博古、李德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军事战略，在前线指挥红军节节抵御，同优势敌人拼消耗，企图在各条战线同时阻挡敌人。

这种极其笨拙的军事战略，带来的后果可想而知，红军遭受重大损失，革命根据地不断沦陷。

广昌失守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他们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

夏季，为准备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策划。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很明显，博古、李德是真正的核心。

毛泽东愁闷不已，前线没什么好消息传来，红军自成立之后，没有吃过那么多那么大的败仗，可他不在红军的领导岗位，无法作为。

毛泽东从瑞金前往会昌考察。会昌有高山，为疏解心情，他天不亮就去爬山。他知道要长征了，但他不确定，中央有怎么样的安排，他有些苦恼。

刚到会昌时，赣南军区司令龚楚去看望毛泽东，两人谈了很多，毛泽东叹道：“我自从参加革命以来，受过三次开除中委和八次严重警告的处分，这次更将造成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在我的身上。现在，可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天下了！”

每次走入人生低谷，毛泽东总爱走入大自然，这一次，他登高望远，用辽阔伟岸的大自然景象，冲淡心中烦愁，但他并不消沉，一直以来他都是那么倔强，越摧越坚，越压越硬。

他相信自己和红军都能渡过难关。他又有了诗情，他写了一首《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可苏区的战局却没能郁郁葱葱。

博古不懂军事，李德这个外国人把持了全部军事指挥权。李德不懂中国的国情，不懂井冈山的地域特点，甚至连敌我双方的优劣势都没弄明白，他开着中国革命这艘船，不顾风暴，强行攻入国民党设下的旋涡中。

1931年8月31日，国民党军占领广昌的驿前。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东线和北线都被敌人突破，西线和南线形势也十分危急，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已经破灭，只剩下战略转移这一条路。

前线吃紧，毛泽东挂心战局，日夜忧思，可他插不上手。9月，他向中央提出，去零都视察，中央同意后，毛泽东带着秘书和警卫就走了。

刚到零都没多久，毛泽东突然病倒，他得了恶性疟疾，他以前也曾被这种病偷袭过，高烧数日不退。

洛甫（张闻天）得知后，立刻派给毛泽东治过病的傅连璋从瑞金赶到零都。毛泽东的病情稳住了。可刚好转一点，他就又开始翻阅文件。

傅连璋说：“毛主席，你不能太辛苦了，你的身体受不了。”

毛泽东说：“局势很紧张，休息是做不到的。”

9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准备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前往湘鄂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10月上旬，毛泽东在雩都接到中共中央有关准备转移的秘密通知。他派警卫员到瑞金云石山通知贺子珍，中央已批准她随部队出发，同总卫生部休养连的同志一起行动。

毛泽东依旧十分负责，比起个人命运，他更关心集体的情绪，他连夜赶回瑞金梅坑，召集临时中央政府各部的领导人开会，布置善后工作，宣布和说明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决定。他强调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

这次战略大转移，核心层的领导人早有准备，不能说是仓促行事，各级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和广大指战员，的确没有准备。毛泽东得知后还在做思想动员工作，可在王明路线的指导下，博古等核心领导层根本没有做群众性的思想动员工作，连政治局也没有讨论过，相反还严格保密。

毛泽东知道自己可以参加战略转移了。那毛泽民和毛泽覃和他们的家属呢？能不能跟大部队一起走？

手足情深，毛泽东不禁有些担忧。谁走谁留，全部由“三人团”做主，实际上等于是博古和李德说了算。

参加长征，生死未卜，留下作战，更是万分艰难。十万红军都保不住苏区，留下两万人又能如何？大部分人想要参加长征。

李维汉回忆过长征前的去留问题：“当时干部的去留问题，不是由组织局决定的。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批准。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是洛甫，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总工会党团书记是陈云，这些单位的去留人名单，分别是由他们决定的。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中央的高级干部，主要是由博古决定。”

毛泽东原本也可能被留下。

中共中央的苏俄派，早在1934年春天就曾有过打算把毛泽东弄走。毛泽东生病了，他们想把他送去苏联“治病”，但共产国际没同意，毛泽东本人也坚决反对。他说：“我不去，我不离开中国。”战略转移开始，“左”倾领导人又有机会把毛泽东甩掉。

伍修权曾回忆：“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零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

让毛泽东参加长征是周恩来的提议，他认为毛泽东是中央红军的创始人，在红军中有很大威望，同时他在军事思想上颇有见地，让他参加，有利于红军作战。

博古、李德等人为此考虑再三，他们觉得毛泽东难控制，加之他在红军有巨大威望，很可能在长征路上“夺权”，但当时毛泽东已无军权，留下他，他就很可能成为苏区根据地的领导人而东山再起。博古、李德还是决定把毛泽东带上，能用就用，严密控制。

毛泽民可以参加长征。

他是国家银行行长，需要跟随部队负责起经济工作，没有理由将他留下。他和国家银行的其他十三位成员被编在一个大队。“秘密金库”里的金银、苏区货币，还有一些机器，被打成担子，一共有六七十副，由一百多个运输员担着走。这个大队关系着长征的财务安全，中央特地配了一个警卫连。

毛泽覃被留了下来。李维汉负责决定毛泽覃的去留问题，他问博古，是否让毛泽覃走，博古不同意。

这是毛泽东最痛心的一件事，他是多么爱惜这个毛家最小的弟弟啊！这可



★ 张文秋（右一）、
偕女儿刘思齐（左一）、
张少林（前排中）与伍修权（
中间站立者）及夫人
（左二）合影

是他一手培养起来，和他感情最深，革命路上，始终伴随在他左右的弟弟啊！现在，他走了，二弟毛泽民也能随部队转移，剩下毛泽覃和贺怡留在根据地。毛泽东明白，这一走，很可能就是生离死别！

留守名单很快定下来。项英，政治局常委，苏维埃国家副主席，中革委代理主席，他留下做总负责人。陈毅，跟朱德一起上井冈山的老革命，此前他指挥兴国战役负伤，盆骨碎裂，正在医院休息。他被留下来了。

瞿秋白患有肺结核，还是被留了下来，进行地下斗争。这很具有讽刺意味，瞿秋白曾经当过国民党一大候补中央委员，他很知名，现在他需要面对国民党的“围剿”。对他来说，留下来意味着前途渺茫。

瞿秋白想走，他不止一次向人求助。他跟毛泽东当面提出想要一起走，毛泽东在中央局会议上提出，可根本不奏效。洛甫（张闻天）后来回忆：“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

何叔衡，这个与毛泽东一起从湖南奔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老党员，也被留下了。

他们最后都牺牲了。

毛泽覃在瑞金的红林山区作战时牺牲。

瞿秋白在敌人的监狱里就义，临刑前高唱《国际歌》。

何叔衡在转移时落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他们有的是毛泽东的亲人，有的是毛泽东的朋友和战友。

多年以后，毛泽东对人说：“长征出发的时候，像瞿秋白、刘伯坚，还有我的爱弟毛泽覃等人都应该带出来的，教条主义搞宗派，把他们留在苏区，给敌人杀掉了。”

暴风雨就要来了。

突围出发前，毛泽民和钱希均来到贺家，他们想见见哥嫂和弟妹，一家人再团聚一次。走出苏区，未来如何，谁也不知道，这一走很可能就是生与死的距离。

可毛泽东和毛泽覃都不在。毛泽东症疾病发，正在雩都的房间里发寒热。贺氏姐妹聚在父母家里，她们在商量毛岸红的安置问题。

这是贺子珍和毛泽东的儿子，小名毛毛，两年前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降生。贺子珍要跟着部队走，按规定不准带孩子，毛岸红只能留下。贺怡答应姐姐，会好好照顾小岸红。

毛泽民同钱希均没有孩子，他和王淑兰有个女儿，叫毛远志，一直没联系上。他们还收养过别人的孩子。

毛泽民和钱希均也为小毛毛的未来担忧。

钱希均落泪了。她留给毛毛一件夹衣、一包糖，送给贺家二老各一块布料，匆匆走了。毛泽民则给了贺怡一些钱，这是他和钱希均省吃俭用省下来的，算是对三弟毛泽覃和贺怡最后的帮助。

不久，毛泽东从雩都回来了。贺子珍说起小毛毛的安置问题，落泪了。毛泽东着急道：“你也太狠心！等我回来，让我看一眼再抱走不行吗？你们真蠢！”

秋风秋雨愁煞人。

这个重阳，毛泽东一夜无眠。他的房间里没有灯光，但第二天清早桌子上却摆着两张毛边纸，一张写满了“红”字，另一张上面写着：

英（狗）青（猪）

龙（兔）红（猴）

这是他四个儿子的名字和属相。

两张纸上都有泪水。

10月，中革委印发了毛泽东写的《游击战争》小册子。

10月10日，中午刚过，一群人开始在中央红军司令部门口不远处的交叉路口集合。有男有女，男的居多，他们都是被派往休养连的，属于老、弱、病、残、孕，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也在其中。她怀了孕，配备了一匹马。

共产党的创始人董必武也在这个队伍里，他四十八岁，已不算年轻。但还有比他年纪更大的，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五十七岁，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六十岁，因为身体原因，他们原本很有可能被留下——像瞿秋白那样，但最终他们还是争取和部队一起出发了——越是生病，越应该走，留下来将更加危险（当时中央根据地的“五老”——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走了四个。何叔衡被留下，最后遇难）。

他们每人发了一袋干粮，大约十斤米，还发了毯子、梳子、刷子、笔记本、肥皂，他们可以随身带一两本书，他们腰上都别着搪瓷缸子，里面塞着毛巾和牙刷。编好队后，每人发给一枝红缨枪。

太阳已经开始偏西，邓发来到大家面前，他当时是苏维埃国家保卫局长、六届中央委员，他是海员出身，平日比较严肃，但有时也喜欢讲几句笑话。

他在休养连对面的一块石板上坐下来，显得有些严肃，但他看了大家一眼之后，露出笑容来，用带着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说：“我们这个连很好。各方面干部全都有，男的、女的，有音乐家、有搞戏剧的，还有文学家，如果演个节目，不用到别的单位去借用。还有很多做群众工作的同志，各行各业都不愁没人做群众工作，真是应有尽有。哈哈哈哈哈……”

邓发爽朗的笑声让大家轻松很多。

大约下午5点，休养连开始前进了，一路纵队，一个紧跟着一个。地面上有了“红星”路标，他们就按照这个路标向西走。

正是这一天晚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八万六千余人，开始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毛泽东还没离开，他还有重要任务，他要对留在雩都的干部们发表讲话。

10月15日，毛泽东在雩都谢家祠堂，讲台下都是人，他们将留下来。毛泽东还是像往常一样充满激情和信心，他对留在苏区的地方干部说：“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这一年，毛泽东已经四十一岁了，他双颊消瘦，面色憔悴，但一双眼睛依旧炯炯有神。

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带着警卫班、秘书和工作人员，在雩都北门的一处小院子里集合，毛泽东只带了一袋书、一把雨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和一块旧油布。

他没有带地图。他也不知道自己和红军会走向哪里。

雩都河上架着浮桥，这是工兵营的杰作。月亮升起来了，枯水期，河面比较平静。毛泽东和他的战士们踏上浮桥，顺利地过了河。他们的步子逐渐加快，他们经过了几个熟悉的村子，暮色苍茫，暮烟缓缓，时不时会有人回望一下身后的村庄，每个人都不免有一种依依惜别的心情。

他们就此离开了无数志士用鲜血打下来的雩都城，踏上了长征的路途。

长征开始了

1934年10月10日，红军中央军委总部从瑞金出发，长征开始了。

长征前夕，住在“独立房子”的李德和他的下属们，开始吃房子周围养在水稻田里的鸭子，总部出动的那一天，他们吃完了最后一只。

驻扎在江西雩都，福建长汀、宁化的红军部队，也先后出动。这些地方和瑞金一样，都是红军的出发地。而长征开始的时间，则应从军委总部出发的日子算起。

李德指挥的转移方式显然是笨拙的，他采用“甬道式”搬家：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从两翼掩护，五军团为后卫压阵，中间是军委总部和中央纵队，这已经十足浩荡，再加上三千多副挑子挑着的“坛坛罐罐”，其中包括印刷机、印钞版、造子弹的机器、爱克斯光机、金银、各种文件、药品、粮食、发报设备等等。

真像一次“大搬家”。

这支队伍着实负担笨重，行动迟缓，八万多军马在山中羊肠小道前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能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敌人处处围追堵截，部队沿途只能消极避战，像叫花子打狗似的，边打边走。

红军是要北上抗日的，但是当时北面和东面，到处都是敌人构筑的“乌龟壳”（碉堡），红军主力想要通过比较困难，而西面，敌人的“乌龟壳”要稀松些，大部队由西向北前进，这是肯定的。至于转移到什么地方，走什么路线，要走多久，恐怕连核心领导层也不知道。因为是撤退，也只能定一个大方向，其他

的全靠随机应变。

红军长征时，博古不过二十六岁，他是从苏联回国的书生，不懂军事。李德的那一套“短促突击”的军事理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就已经被证明是失败了，红军撤退，对他们来说这是个难题。

撤退过程中军事上的问题将在不久的未来暴露出来。

这是一场伤感离别。苏区的百姓给红军送行，他们送来了菜干和辣椒。

战士们每个人有个水杯，一双筷子插在绑腿里，帽顶里缝着一根针和几根线，所有人都用晴雨两用的斗笠，两层竹篾夹一层油纸，许多人还会带一把伞，另外每人有一支步枪。

刚开始几日，红军也采用夜间行军的前进方式，以便进入敌区之前熟悉夜行军。有些人不适应，但习惯之后，却也没太大问题。夏秋天气，乘着月光夜行军很畅快。月朗星稀，清风徐徐，有时虫声唧唧，有时流水潺潺，有时犬吠数里，空气中有野花和菜花的香。

经过村落，从稀疏的灯火中，可以看到全村的男女老幼，带着诧异而又愉快的眼光，望着走不尽的铁流一般的红军。常常可以听到这些话：“晚上走，凉爽呀！”“你们真多呀，走了三日三夜了！”“白军早走了！”“你们真文明呀！救命菩萨！”

如果没有月亮，敌人又离得不太近，红军会打火把。火把是自制的，找两三根较细的干竹，破成几片，合起来一节一节地捆起来，容易烧燃，光大且不怕风，也耐烧。点火把夜行军是很壮丽的，走平坦大道，真是可以光照十里，穿过森林时，一点一点，一线一线的火光，在树林里若隐若现，如火蛇钻洞，红光照天。

但有时夜行军是很苦的。上山下坡，过桥过水，前面一有阻碍，后续部队就走不动，常常是走三步停十步。若遇上大风大雨，一时找不到避雨的地方，只能硬着头皮前进，地上又湿又滑，跌倒了，爬起来继续走。

慢慢地，红军战士们习惯了，也掌握了一些规律：第一，每个人背的包袱要用白的，以便后面的人看得见前面的人；第二，每个人找一根棍做杖，以免摔跤。

敌人很近或者要穿过敌人碉堡线的时候，夜行军是很肃静的，不准打火把，不准照手电筒，不准乱吃纸烟，不准谈话。当然，若无敌情顾虑，红军战士们

就谈开了。

10月21日，红一军团在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围。25日，中央红军与敌人激战，全部通过国民党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横扫敌人的碉堡。

这道防线突破得不算太困难。扼守于此的广东军阀的军队纷纷逃命，沿途丢下无数武器弹药、军用品、食物以及有国民党青天白日帽徽的军帽、文件等。有一个敌军师长，据说前夜就闻风先逃了。

这是“赤白交界”的地区，群众对红军十分拥戴，红军一到，他们就放鞭炮热烈欢迎。后续部队到达，小孩子们就欢欢喜喜拉着红军去看敌人的“乌龟壳”。它们大部分已经被群众彻底毁坏，个别角落还冒着烟，小孩们总是边骂边捅，见到青天白日军帽总要踩它几脚。群众对反动组织“铲共团”更是痛恨到了极点，哭诉他们过去欺压百姓的罪行。群众把红军看成自己人，帮红军做饭，补衣服，给红军带路，抬伤病员。

从上井冈山的第一天起，毛泽东就清楚地明白群众的作用，他那个经典的鱼与水的比喻，形象地阐明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

夜色中，毛泽东和他的战士们踏在白区的地界上了。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走出中央苏区啦！”

再见了！那些一起奋斗过的同志。再见了！为中国革命奋起而起了先锋作用的江西群众。

信丰县古陂，贺子珍也随着第二野战部队来了。她来看毛泽东，这对夫妻在战争中也短暂分离，迈着各自的步伐朝前走。

蒋介石听闻多年经营的西线碉堡群被红军突破，大为震惊，急忙调兵从后面追击，在前面堵截，红军却已经大步前进，直指湖南。

红军沿着江西、广东边界运动，一般没遇到较大的敌军，几处小的敌军不敢阻挡，一触即溃。有时遇到民团，地主们听到机关枪响，就作鸟兽散。

红军占领了民团总部，敌人扼守要地的正规军还来电话，问：“共军到了吗？”红军指挥员回答：“没有敌人呀！”

进入11月，到了广东城口与湘南汝城之间广东军阀陈济棠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了。周恩来早就提前做了工作，10月上旬，他派出潘汉年和何长工做红军的代表，去与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黄质文、黄旭南进行停战谈判，双方达成了五项协议。这个谈判为中央红军通过粤军设置的封锁线创造了条件。

红军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蒋介石无比震惊，他怎么也想不到，陈济棠为了防止国民党军吃掉粤军，会和红军做交易。对军阀们来说，没有永远的同盟，只有永远的利益。

连破两道封锁线，红军士气大振，尽管这支队伍是笨重的，但目前为止，还没暴露出问题。

毛泽东和朱德在红军中依旧有着强大的号召力，他们在长征路上联名散发传单《出路在哪里？》，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向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劳苦民众指出，他们的出路就在大家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暴动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建立工农自己的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

红军在湖南境内向西挺进。蒋介石的部队还没跟上来，只有少数敌军尾随，湖南的军阀堵击红军，但又不敢靠近，红军好几天没遇到什么劲敌，就进到了湖南军阀防守的第三道封锁线。10月中旬，红军占领了粤汉公路线上的宜章县城。红军的一个师，冒着雨，横扫一小股敌人，一直追到宜章城边。

城内敌军趁着夜色进行了最后一次抢劫，半夜弃城逃跑。天亮时，城门大开，城内群众拥出来，欢迎红军。

湖南军阀的部队抢走了群众的所有值钱东西，群众十分惊恐，同时对他们憎恨无比。红军进城没收了土豪地主的财物，分给了当地农民，全城沸腾了。

这是“朱毛红军”活动过的地方，群众对于红军的认知度很高，也很拥戴。政工人员一号召大家参加红军，打倒反动派，立刻就有很多人响应。红军马上扩大，招收了一批新战士。

长征前期，尽管李德、博古的转移方式存在问题，但在战斗上，是比较顺利的。红军有时还能打下国民党的飞机。

但朝哪里走的问题还是逐渐浮出水面。

毛泽东忧心忡忡。行军早期，他的身体还没从疟疾的袭击中恢复过来，他有时需要坐担架。能坐担架的都是高级领导。邓颖超当时患了肺病，会吐血，坐担架。胡耀邦在长征开始就得了疟疾，一个多月才康复，多亏了担架。毛泽东尽管已经没有军权，但依旧是苏维埃国家主席，担架保证了他身体的恢复。

不过，毛泽东从未停止思考，尽管他没有权限指挥部队，但他对红军的感情比莫斯科来的人要深得多，他非常关注红军的命运。

所幸在担架上的毛泽东还有几个辩论的同伴。

洛甫（张闻天）和王稼祥同毛泽东在一处。洛甫可以骑马行军。王稼祥必须坐担架，他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炸伤，肚子里还有弹片。

他们早在出发前，就对中央“最高三人团”将他们几个政治局成员分散到各军团去有意见，最后他们被分在一起。洛甫当时已经对博古的“左”倾错误不满，他和毛泽东闲谈时，说到了这一点。尽管洛甫和博古是同学，但他打算站在正确的这一边——十九路军事件过后，他对“三人团”的领导很有意见。广昌战役后，矛盾几乎公开化——几个月来，洛甫和毛泽东慢慢接近了。

王稼祥也是留苏回来的，虽然他不能算作“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但他对博古有过支持，可在广昌战役失败之后，他也开始有了变化。这一路，同在担架，毛泽东和王稼祥谈了很多，他们分析了江西的事情，毛泽东谈到战术上的问题以及广昌惨败的缘故，王稼祥十分认同。毛泽东儒雅、真诚的做人风格，也令王稼祥佩服。

洛甫、王稼祥都开始向毛泽东靠拢了。

李德虽然不懂中文，但他还是觉得有些不对劲。他试图给王稼祥和洛甫做工作，要求他们团结。可在真理面前，哪一个明白人也不会选择站到谬误一边。很快，红军在道州附近渡过了潇水，红旗直指湘江。

国民党的第四道防线看上去坚不可摧。

李德和博古的抉择，将红军带向了十分危险的境地，也加速了“左”倾势力在红军中领导地位的倒台。

红军的出路在哪里

红军西进，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但也暴露了红军的行动目标和战略上的企图。蒋介石布置了天罗地网，敌军从四面八方来尾追、堵击红军。

敌军兵力多达三四十万，空中还有飞机轰炸。蒋介石想利用湘江天险，在广西全州、兴安之间，建立第四道封锁线，形成一个口袋状，一举消灭红军。

蒋介石的部队在和红军赛跑。他们先赢了一局，占领了全州。

若不是因为尾巴后面那个笨重的辎重部队，红军是可以顺利渡过湘江、通过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的。红军的先头部队虽然没能占领全州，但是他们还是顺利渡过了湘江，控制界首至觉山铺间的渡河点。

这为红军主力渡河创造了条件。

可是，李德设置的甬道式前进方式，让时机一点一点错失——队伍拉得太长，辎重又过多，行动缓慢，大部队尚未过江，就遭到优势敌军的拦截。在这种情况下，李德还是被动招架，只命令部队硬打硬拼以便突出重围，把希望寄托于与二、六军团会合上。

11月底，红军接近湘江，四十万敌军逼拢，企图在湘江东岸、湘江与潇水之间消灭红军。

犯了逃跑主义错误的李德等领导，只顾夺路突围，命令一军团往前冲，三、八、九军团在两侧打甬道式的掩护战，拼命顶住敌人，掩护中央纵队通过，五军团做后卫，边打边走。由于战士们的英勇作战，中央纵队安全渡过了湘江。

毛泽东是在30日渡过湘江的，战斗之惨烈，令他深深震撼。

湘江战役，从11月25日打到12月3日，足足鏖战一个星期。

红军各军团大量减员。

三军团的两个团阻击敌人的两个师，在“保卫党中央”的铁一般的意志下，拼死战斗，连续三天三夜，把敌人挡在湘江面前不能前进，但自己损失也很大，两个团的领导干部都牺牲或负伤了，营连指挥员剩得没几个了。

担任后卫的五军团，不分昼夜，抗击了尾追的敌人，到达湘江边时，左右两侧的敌人已经占领江边阵地，部队不得不另找渡河点，既无浮桥，也无渡船，只能轻装涉水过去。

五军团的三十四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

这是空前浩劫，是令人发指的灾难，是红军在长征路上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多年之后，李德在他回忆录里提及这场战役居然轻描淡写——他不敢下笔细写惨痛的湘江战役，他从侧面暗示，尽管红军损失巨大，但是战斗素质增强了。他把责任推给周恩来。

可是，凡是参加过湘江战役的人都不会这么认为。湘江转弯处，江水慢流，上游漂下来的红军尸体占满了河道。红一军团的领导望着漫山遍野的红军尸体，泪如雨下。

数字不会说谎。湘江战役，红军损失了三万八千骨干，这也就意味着，突破国民党四道封锁线之后，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到三万余人。

这是军事上错误领导造成的严重恶果。

红军突破了封锁线，红军战士是无坚不摧的，可这回为什么败得那么惨呢？失败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久经沙场的红军指战员们不由得义愤填膺，部队里开始发出这样的声音：

“这是哪里来的打法？”

“这是什么军事指挥？”

“成万的英雄儿女就这样中途丧命！”

“这些战友们是怎么死的？”

“是不是要把中国革命断送掉？”

“毛主席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的仗！”

“早就把毛主席排挤出军事领导岗位，而那伙人根本没打过仗。”

“五中全会还不请他参加，他不也是政治局委员吗？这又是从哪里来的章程？”

李德惊慌失措，一筹莫展，唉声叹气，愁眉苦脸。

他开始骂人。他把三十四师师长周子昆找来痛骂一顿，训斥他带的什么兵，把部队拖垮了，自己的老婆倒带着。他还让人把周子昆绑起来，要送交军事法庭。可周围的警卫员根本不愿意动手。

公道自在人心。

在一旁的博古默不作声，毛泽东出来解围，说交给我吧。

这算给李德一个台阶。可李德终究不能在台子上站得太久了。

指战员们要求换领导。

过了湘江之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

王稼祥支持毛泽东，洛甫支持毛泽东，周恩来支持毛泽东，朱德也支持毛泽东，红军的官兵支持毛泽东！

人心向背，无可抵挡。历史再一次选择了毛泽东！

可博古和李德还是不肯接受批评，过老山界，中央领导内部发生了争论。过湖南通道，中央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就红军行动方向的问题展开讨论，纷争再一次爆发。

李德坚持红军主力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毛泽东从敌军重兵阻拦红军主力北上这一情况出发，力主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

王稼祥、洛甫、周恩来赞成毛泽东的建议。

毛泽东的建议被通过了。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继续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

博古、李德还是固执地要求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境建立根据地。

争论很激烈，但王稼祥、洛甫、周恩来等多数领导人赞成毛泽东的建议。

毛泽东的建议再一次被通过了。红军西进渡乌江北上。

李德和博古在红军中越来越不得人心。李德经常训斥和辱骂干部，很不讲理，上至朱德总司令，下至一般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他几乎没有一个瞧得起。连李德的翻译伍修权，都快受不了李德专横粗暴的作风了。

有一次，伍修权对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说：“李德简直是个帝国主义分子，我完全是凭着党性，才给他做翻译工作的。”

有一回李德竟然训斥总参谋长刘伯承，说他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话很难听。伍修权为了给双方打圆场，故意不照他的原话翻译，只说参谋工作做得不到位。可是刘伯承自己听得懂俄语，事后他对伍修权说：“你真是一个老好人啊，他骂我的话都没有翻译。”

李德的影响快到头了。

毛泽东却逐渐恢复精神，部队行至湘桂群山间，毛泽东豪情迸发，写出了三首《十六字令》：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
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
赖以拄其间。

时间进入到了1935年。1月2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在瓮安县江界河强渡乌江，架起浮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随同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渡过乌江。

1月7日，红一军团第二师袭占遵义城。

在进入遵义城之前，王稼祥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倡议。

这便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毛泽东成为核心领导

红军战士们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了遵义城。

毛泽东随军委纵队进了城，同洛甫、王稼祥住在遵义新城古式巷原黔军旅长易少荃的宅邸。三天后，毛泽东又和朱德等人参加了在遵义贵州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举行的遵义全县民众大会。毛泽东发表演说，讲述共产党和红军的各项政策，指出共产党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方军队一致抗日，强调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大会宣布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



★ 遵义会议旧址

1935年1月15日，在遵义旧城军阀柏辉章的公馆二层楼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了。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洛甫、陈云和刘少奇，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凯丰，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因为战事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邓小平以党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李德也被通知出席。彭德怀和李卓然因为部队发生了战斗，会议中途离开了。九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为部队没有渡过乌江，未能参加会议。

会场就在公馆楼上一个不大的房间里，靠里面有一个带镜子的橱柜，朝外是两扇嵌着彩色玻璃的窗户，天花板中央吊着一盏旧式煤油灯，房间中央摆着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还生了火盆。

晚饭后，会议开始——因为白天大家都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所以会一般定在晚上开。博古主持会议，大家随意地坐下。开会以后，博古作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主要报告。他也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



★ 遵义会议会议室

但是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临时中央和自己的错误作了解释和辩护。

周恩来第二个发言，他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副报告。

洛甫第三个发言，他作了一个反对“左”倾军事错误路线的报告，是批评博古的。

该毛泽东发言了，他已经听了各方面的意见，再一开口，就是总结性的了。

他讲了一个多小时，与别人的发言比起来，这算长篇大论了，但大家都听得很入神，反“围剿”失败，湘江惨败，已经让大家十分困惑和愤怒，大家都迫切想找到正确的路。毛泽东说，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问题，他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消极防御”方针和它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

毛泽东还尖锐地批评了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毛泽东又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

毛泽东指出，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牺牲。

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他支持毛泽东的观点，批驳李德和博古在军事上的错误，他拥护毛泽东指挥红军。

该朱德发言了。朱德一向沉稳谦和，但这次发言，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

朱德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对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参加中央核心领导。

周恩来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李富春、聂荣臻都很严厉地批判了李德那一套。

彭德怀的发言也很激烈，他强烈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林彪以前是支持过李德的，在会上他一言不发。

会上直接被批判的是博古，不过批判博古就是批判李德，李德处境十分狼

狈，会议一开始，别人都是坐在桌子旁边，他却坐在会议室门口，俨然像个被告。李德垂头丧气，神情沮丧，他对红军的指挥，终于走到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

会议开了三四次。会后，洛甫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三人团”被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被取消。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

“红军票”的奇迹

红军在遵义休整了十二天。

这十二天太重要了。红军已经走了三个月，一路艰辛，战事无数，湘江战役后，他们无论在身体还是精神上都已经十分疲惫，必须停顿休整。

在这十二天里，毛泽东再度成为党中央的领导人，东山再起，而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则利用这十二天，创造出一个金融史上的奇迹。

遵义是贵州省第二大城市，一路上，红军走的都是小路和偏僻地区，荒凉不堪，而一进入遵义这个西南地区较大的贸易集散地，红军战士们立刻觉得，这就是乐园。

红军占领遵义后，全市商店特别是洋货铺、书店、面馆、酒店等宾客盈门，红军战士们经过长途行军，需要补充生活用品。有的人要买文具、书籍，有的人想吃辣子鸡丁、醋熘鱼、血花汤等当地美味。红军中很多人长期以来积累了不少纸币，因为每个伙食单位都按人头领取伙食费，由于自己动手生产，每月伙食常有结余，这种结余分给每人自用，叫做“伙食尾子”，从几角到几元不等。突围以来，由于没收土豪劣绅的粮食、家畜等，“伙食尾子”更多。很多人过去没有机会花费这笔“私产”，有的人手头保存着十多元。

但是，这些都是苏区自己印发的纸币。

在战乱频繁的年代，很多军阀都发行钞票，各路钞票在群众眼里毫无价值。现在，红军来了，需要买东西，可白区的商人们未必认可苏区的纸币，摆在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难题：如何使得红军票取得遵义商人们

的认可？

毛泽民知道，想要让一种货币取得认可，有两个条件是必须具备的：一、这种货币能够买到物资和商品；二、必须有相应的准备。

林伯渠是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毛泽民找他商量对策。

毛泽民必须两头做工作，这些工作还必须在红军进城消费之前做好做完。

首先，他得挨家挨户去做遵义的商人们的工作，让他们开门营业，有货可供。比如，他专门去了一位姓余的商会会长家拜访，还去了丁字口协记绸缎铺老板刘伯庄兄弟家做工作。刘氏兄弟在黔军溃退时被抢了一些财物，而红军先头部队进城时则保护了他们的财物。刘氏兄弟被争取过来了，他们不但帮着毛泽民说服商界同仁开业，还积极帮助红军采办货品。

其次，毛泽民需要尽快建立红军票的信用，好让这种苏区发行的纸币能够在遵义城迅速流通起来。

为了提高红军票的信誉度，毛泽民盯准了遵义城的两样紧俏商品，食盐和烟草。

在贵州山城，食盐是最吃紧的货物，一般百姓做菜时都不放盐，他们把盐坨吊起来，偶尔用舌头舔一下。红军的先头部队进城之后，没收了军阀官僚地主奸商囤积的食盐，又从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家的仓库里缴获了大量烟草。有了这两样法宝，毛泽民开始胸有成竹地变他的经济魔术了。

他打开盐仓，平价销售。消息一放出去，遵义城轰动了，大家都来买盐，但毛泽民用了一个办法很奇妙。他要求，买盐可以，但必须用“红军票”。他在遵义城里、城外设了二十几个兑换点，群众可以去兑换点兑换红军票，然后再去购买食盐。

红军票有了信用。商家们也就愿意接收红军战士们手里的纸币了。指战员们买好了东西，物资获得了补充。

卫生部长贺诚，最关心的是药品，一到遵义城，他立刻钻进丁字口的太平洋药房，把药房的药全都买过来了。湘江战役受了伤的战士们有药了，日后的万里长征，这批药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这十来天，毛泽民一直忙碌着，为了让苏维埃币有价值、可信赖，他每天都会挑着大洋，到兑换处让群众兑换苏维埃币。这就意味着，苏区纸币能够自由兑换成银元，一元苏维埃币可以兑换一块银元。这样一来，群众对苏维埃币

就放心了，都愿意使用苏维埃币。

遵义并不是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很快，红军要走了。消息一传出去，毛泽民的工作量立刻暴增，为了不让当地群众受损失，他必须在离开遵义之前，把当地群众手里的苏维埃币回收回来。

他在遵义闹市区张贴布告，用一比一的方式，用银元和食盐兑换群众手里的苏维埃币。

红军票回笼工作，毛泽民负责到底，一直到国民党追兵追来，他和兑换干部们一直兑换到天亮才离开。

这次红军票的发行工作，是毛泽民的一次大手笔魔术。长征路上，遵义是红军唯一一次发行纸币的地方。这是毛泽民对大哥毛泽东的最好支持，也是给部队的最佳给养。这次停留，红军恢复了元气，继续上路。

十二天完成发行、流通、回笼的全过程，这在中国的金融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创举。

毛泽民发行的红军票，在当地影响很好。群众说：“红军好，不坑人，‘红军票’很值钱。”

而那些少量没有兑回的红军票，在1955年新中国发行人民币的时候，还按一比一的比例兑回了。

红军票是值钱的，红军是有信誉的。

遵义，红军长征路上非常重要的一站。

长征路上的大管家

苏维埃国家银行工作人员中，有十四人参加长征。

他们是：毛泽民、曹菊如、郭金水、钱希均、曹根全、任志远、黄亚光、莫均涛、刘建棠、吕汉勋、张达远、章水柏以及一名总务科长和一名马伕。

他们被编在中央军委下面的十五大队，负责运输国家银行金银、钞票等贵重物资。因为都是用扁担挑，所以被称为“扁担银行”。

长征头三个月，根据博古和李德的指示，毛泽民所在的十五大队的运输比较困难，因为东西太多、太沉，他们的运输完全是“搬家式”，加之要走的路多半是山中的羊肠小道，所以进程更加缓慢。

十五大队的扁担里，全是毛泽民担任国家银行期间积攒下来的家底，是红军长征的后备资金、中央红军的救命钱。两担黄金，几十担银元，四五担二角银毫和铜分币，几十担纸币，还有油墨、印钞机和印钞版，浩浩荡荡，前后还得有部队保护。

红军突破了国民党三道封锁线，但到了第四道封锁线，因为辎重过多，影响行程，中央红军没能及时渡过湘江，毛泽民和第十五大队接到命令，必须甩掉负担，忍痛把印刷机和印刷材料丢掉。

湘江战役后，红军进入遵义，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毛泽民和十五大队也开始总结经验教训，红军进入桐梓后，十五大队将银毫和铜币抛入井中，银元则分给红军战士们背着。

这是战略转移，不是简单的搬家，什么都想带是不切实际的。红军的优势

就在于灵活多变。

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十五大队又烧掉了一些纸币，剩余的纸币分给战士们背运，从而彻底实现了轻装上阵，一天能走一百里。后来，十五大队因减员而撤销建制，大部分人员并入林伯渠的总供给部。

十五大队里，毛泽民始终是最辛苦、最繁忙的那一个。他身体并不好。长征前得了疟疾，在安源患上的阑尾炎也没有根治，长征途中他又患上了严重的胃病，进入云贵高原时，因为高原反应，他曾经口吐鲜血。但这一切都挡不住他为部队服务的热情。

毛泽民革命不是为自己，是为大家。

他常常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翻山越岭，涉水过河。他总爱先去探探路，帮战士们鼓劲；部队一到营地，他先是号房子，然后给大家介绍当地的情况；队伍休整完毕，要出发了，他又要检查好纪律问题——他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坚定执行者；有的同志误杀了群众的猪，他会立刻赔偿并道歉。

毛泽民是没收征发委员会副主任和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他必须应对长征过程中红军的衣食住行问题。

吃饭一条，首先就是个大难题。从过湘江之后，一直到长征结束，毛泽民每天需要面对那么多人的吃饭问题。长征途中的粮食供应主要靠打土豪和少数捐款的方式来实现，筹粮筹款是一大任务。他们沿途没收地主、官僚、土豪的财产和物资，作为自己的给养。

没收是根据苏维埃的法律有计划进行的，没收过后，再统一调配。但随着红军进入边远荒芜的地区，粮食供给的问题更大了，战士们饿得面黄肌瘦，毛泽民就需要四处想办法。他有时候得去找谷子和青稞，但又找不到东西脱壳，只能用手搓，搓得手出了血。

炊事员在行军中要背锅和粮、菜，而且必须赶在大部队之前做好饭，这个任务非常重，炊事员们十分疲劳。毛泽民得知后，便要求干部每隔十天，轮流做一次饭，让炊事员休息一次。他自己也参加做饭，队伍里没有例外。

根据毛泽民的级别，上头给他配了一匹马，但他很少骑。这匹马，不是驮着伤病员，就是驮着粮食。有人患上了痢疾，骑这匹马；有人得了疟疾，也骑这匹马。毛泽民的马成为很多人的救命坐骑。可毛泽民自己却穿草鞋走路走得磨破了脚，鲜血直流，以至于化脓，走到瓦窑堡还没痊愈。

毛泽民乐观地说：“这是长征留下的纪念。”

宋任穷的妻子钟月林在长征路上病得厉害，身体眼看垮掉，走路走着走着就跪下了，冬天要来了，这样下去很危险。毛泽民得知，立刻安排给钟月林做了棉衣、棉裤、棉鞋。钟月林顺利度过了冬天。

对于家人，毛泽民一如既往关心着。贺子珍被编在休养连，和毛泽民同在中央纵队，长征前她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身体不是很方便，毛泽民每次遇到她，都会安慰几句，有困难，他也会尽量伸出援手。

长征早期，毛泽东因为身体没恢复好，一直坐担架。毛泽民为哥哥担忧，但因为工作繁忙，他不能常和大哥接触。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再次进入党的领导核心，毛泽民为大哥高兴，他总想为大哥做点什么。冬天，行军路更加艰苦，毛泽民拿从土豪劣绅那没收的皮毛给毛泽东做了一件皮衣。

毛泽东收到后，立刻退回。长征路上，一视同仁，谁也不能搞特殊，他毛泽东也不能例外，这是毛泽东多年来坚持的原则。

毛泽民没办法，他知道大哥辛苦，怕他身体吃不消，就又拿来一条从敌军那里缴获的皮褥子。

毛泽东看见了，说：“这是谁拿来的？这个东西不能睡，睡习惯了可不得了。”

皮褥子毛泽东到底没有接受。

可就在遵义会议之后，毛泽民却突然遭到不怀好意者的打击报复。毛泽民一向谨言慎行、与人为善，他怎么会遭到如此对待呢？他可是长征途中不可缺少的经济大管家啊！

事实上，遵义会议后，军事上的“左”倾已经纠正了，思想上的“左”倾在部队里尚有遗毒。

毛泽东的“东山再起”，再一次“连累”了毛泽民，说一千道一万，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弟弟呢。一位带有宗派主义思想的中央纵队负责人对毛泽东重掌大权很不满意，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他突然取消了毛泽民配备警卫员和马匹的资格。毛泽民成了普通战士，跟着战士们一起走。

毛泽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但陈云看不下去了，他在上海时就跟毛泽民一起工作，他了解毛泽民的为人和品性，再说，毛泽民整天为红军筹款筹粮，

身体已经受到很大损害，再这么下去会有很大危险。

陈云找到周恩来，周恩来了解情况后，把毛泽民安排在中央纵队保管处，担任副主任一职，又配上了马匹和警卫员。毛泽民的身体得到了恢复，这保证了他能够走完长征。

从四渡赤水到飞夺泸定桥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开始领导中央红军作战。

毛泽东说过：“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的确，长征是艰苦的，一路坎坷，艰难险阻何止千万。

毛泽东又说，“雄关漫道真如铁”，但恰恰是这样一种逆境，反倒凸显了红军的机智与大无畏。红军是一支铁军，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只要有好的领导者指挥，它立刻就能展现出神奇的威力。

1935年1月19日，毛泽东同军委纵队离开遵义，到达泗渡。中央红军分三路从桐梓、松坎、遵义地区向川南开进，在土城击溃贵州军阀的三个团，修理工好被敌人拆断的浮桥，西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寻机北渡长江。

这是一渡赤水。

红军准备在土城一带消灭军阀的先头部队，但川敌占据了有利地形，红军迟了一步，后续部队也没能及时赶上，虽然几次冲锋，可总杀不出一个葫芦形隘口。红军打了一天，没能消灭敌人，不得不退出土城。

朱德在土城指挥作战，撤退时敌人火力突然增大，他仅由一个排掩护撤出。朱德妻子康克清则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向敌人猛冲，也突围了出来。四川的“双枪兵”追过来，两军激战，红军进入云南东北角扎西地区。

时值农历新年，红军在这里休息了几天。敌人围过来了，在长江两岸遍布埋伏，从这里渡江十分危险，毛泽东果断改变计划，让红军返回四川南部，在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渡过赤水河——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国民党军驻川、

黔各部慌忙调兵阻止，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

毛泽东在干部会议上说：“敌人就像手上的五个指头，我们要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把它消灭掉。”

蒋介石紧急致电王家烈，让他出兵防守桐梓、娄山关与遵义一线。王家烈亲自到遵义督战，想与红军最后一搏。25日，红军猛攻娄山关，经过肉搏，占领了制高点。28日，重占遵义。红军实现了五日之内，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取得长征以来最大胜利。

毛泽东过娄山关，豪气万千。他写了一首《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这一大胜利震撼了全国。

蒋介石慌了，他立刻飞到重庆“督剿”，电令驻川、黔各军在乌江设防，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之间地区。

毛泽东洞察蒋介石的意图，将计就计，故意让红军在遵义地区徘徊，引诱敌人合围。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中央红军突然于3月11日北进，16日到达怀仁县茅台镇，当晚至17日12时前，中央红军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这是三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将国民党军主力引向赤水河以西地区。

蒋介石急令各路大军向红军逼近，企图再次对红军形成包围圈，又是赶筑碉堡，又是派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追剿”。

毛泽东十分潇洒。他立刻指挥红军向东回师，突然折回贵州，中央红军从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完成了四渡赤水，然后掉头向南，在敌军的间隙中穿插急进。3月31日，中央红军南渡乌江，把蒋介石集结的军队全部丢在乌江以北。

4月2日，红军假装要攻打息烽城，大军南下，逼近贵阳。蒋介石急忙调军队增援息烽。但红军并没有攻打贵阳，而是向东进入开阳县境，摆出东渡的姿态。

毛泽东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云南的军队被调来贵阳附近，其他敌军纷纷向东移动。

8日起，中央红军主力以日行一百八十里的速度，经青岩、定番、紫云等地，向敌兵力空虚的云南急进。到此，红军完全把国民党的军队远远抛在后面了。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运筹帷幄的得意之笔。这是运动战的经典，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忽南忽北，声东击西，敌军则显得无比笨拙。

敌军一头雾水，红军远走高飞。

用兵如神的毛泽东，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观。

红军甩掉了蒋介石尾随的部队，进入云南，迅速抢渡金沙江。至此，国民党数十万“追剿”部队被甩在金沙江以南，中央红军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毛泽东在5月3日傍晚过了江。他立即和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组织全部渡江工作，并研究渡江后的各项任务。

江边没有房屋，只有几个破石洞，警卫员把一个洞内的脏东西简单清扫了一下，并找了一块小木板。毛泽东亲自动手，和警卫员一起在闷热潮湿的洞里，把小木板架起来当桌子使用，摆上了办公用品和各种文件。

天黑了，毛泽东在潮湿的地面铺一块油布，盖一床毯子睡觉。他这样在江边住了好几天，一直等全军过江完毕，他才迅速赶到前面去。

渡江过程中，金沙江上三十六名船夫起了很大作用，毛泽东安排，每人每天发给五元工资，并且杀猪宰羊优待。红军渡江完毕，需要毁船，就跟船夫们做出解释，并给出现金三十元作为补偿。这些船夫有的也参加了红军。

在通安至会理一线，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举行了会餐和晚会，庆祝抢渡金沙江成功，并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红军战士们不断欢唱《渡江胜利歌》：“金沙江的流水哗哗响，常胜的红军胜利地渡过了江，蒋介石吓得大惊慌，帝国主义弄得没主张……”

过了金沙江之后，党中央在四川会理城郊的铁厂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批评了林彪。

林彪在井冈山时期就有“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动摇，在五次反“围剿”中，他赞同李德的“短促突击”的军事方案。遵义会议上他态度暧昧，遵义会议后，他又屡次质疑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他攻击四渡赤水，还煽动别人附和他，他要政委聂荣臻签名，聂荣臻严词拒绝。军委得知后，召开了“会理会议”。

毛泽东说：“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周恩来、

朱德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红军继续北上，经西昌、泸沽进入彝族聚居的地区。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强渡大渡河先遣队，派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罗瑞卿为政治委员。临行前，毛泽东要先遣队执行党规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沽基家族首领结盟修好。

毛泽东对刘伯承说：“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先渡过大渡河。”

先遣队打进越西县城，释放了关押在其中的几百名彝民。有的彝民来寻找自己的亲人，发现有的骨瘦如柴，有的已经死了，号啕大哭。红军战士也忍不住流下热泪。战士们高喊：“打倒万恶的国民党！”“为受难同胞复仇！”彝族人民则喊着：“红军卡沙沙（感谢红军）！”“红军瓦瓦苦（红军万岁）！”

红军进入大凉山了，他们持续做宣传工作。有一天，来了一个很高的彝民，后面跟着十几个背梭镖的年轻人，他听了红军的话后说：“我是沽基家的小叶丹，要见你们的司令员，我们大家讲和不打。”

经过一片森林，来到一个平地，有一片清水池塘。刘伯承骑马来了。

小叶丹问：“你是司令员？”

刘答：“我是司令员。”

小叶丹又问：“你姓什么？”

刘答：“我姓刘。”

小叶丹说：“我要同刘司令员结拜为兄弟。”

刘伯承马上答应了。小叶丹派人拿了一只鸡来，一个彝民用刘伯承的茶缸子从塘里取了一缸子清水，一手拿着鸡，一手拿着一把刀，嘴里念着：“某月某日，司令员，小叶丹在海子塘边结义为兄弟，以后如有改变，同鸡一样地死！”他用刀在鸡脖子上划了一下，鸡血淋在缸子中。这血水被分成两份，小叶丹要求刘伯承先喝，刘伯承拿起缸子，又说了一遍誓词，一饮而尽。小叶丹也说了一遍誓词，喝下了血水。

这就是“彝海结盟”。

小叶丹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民支队”，小叶丹给刘伯承指路，还把他骑的黑骡子送给了刘伯承。红军送了他一支手枪和几支步枪。

5月24日晚上，红军的先遣部队占领了石棉县安顺场，随即控制了安顺场渡口。

安顺场是一个河谷地带，两边几十里路都是高山，部队不好展开，很容易中埋伏。据说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就是在安顺场被清军联合彝民杀掉的。蒋介石得知红军要往大渡河前进，就派飞机撒传单，叫嚣着要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红军必须强渡大渡河。

5月25日，天刚亮，强渡的工作已经准备好了。火力准备：六挺重机枪、几十挺轻机枪、三门迫击炮。又找来了几名船工，展开合作，把船修好，船工们愿意亲自掌舵，把部队送过大渡河。最后，二连连长、一排长、两个班长、十三名会游水的红军战士，共十七名勇士乘小船强渡大渡河成功。

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到达安顺场，鉴于安顺场水深流急，大部队难以迅速过河，决定中央红军主力火速抢占距离安顺场一百六十公里的泸定桥。由林彪率红一军团第二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沿大渡河右岸前进；由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军团第一师为右纵队，沿大渡河左岸前进，互相策应，限期夺取泸定桥。

泸定桥，一座铁索桥，它是用十三根饭碗粗的铁环一个套一个连接而成，九根构成桥面，两边各两根形成扶手。泸定桥下，河面宽数十丈，流水湍急，像瀑布一般朝下冲，河中有许多怪石，水流打在上面，激起一丈多高的白浪，响声震耳。桥对面便是泸定县城的西门了。

红军到达泸定桥，国民党军已经把板子抽走，桥上只剩下光光的铁索，敌人约有两个团，不停地朝红军射击。

国民党军叫嚣：“你们飞过来啊！缴枪给你们！”

红军战士回答：“只要你的桥，不要你的烂枪。”红军一面搜集木板，一面组织一个营的火力，封锁河东岸敌人可能增援的道路。

下午4点，突击队开始攻桥，冲锋号一响，机关枪、迫击炮的声音轰轰作响，二连的二十二名战士冒着枪林弹雨，一手扶着铁栏，踏着铁索，朝前猛冲。国民党军慌了，他们烧着了桥头的亭子，火焰直往上冒。红军喊着激昂的口号，钻进火里，这是一种怎样坚强的信念与勇敢，大火吞没了他们，他们的衣服、帽子、眉毛、头发都烧着了，可他们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还是朝前猛冲，国民党部

队吓坏了。

神勇的红军战士在他们看来简直是天兵天将。他们只能朝城里退。突击队冲进城内，两军发生巷战。还未等国民党军集合兵力反攻，红军的后续部队已经赶来了。仗打了两个多小时，黄昏时，红军占领了泸定城。

半夜，刘伯承提着马灯来到了泸定桥，他扶着铁索，望着桥下滔滔河水，感慨道：“泸定桥！泸定桥！你真是多么险要的地方呀！现在我们过来了！我们胜利了！”

英雄主义是个旧观念，过去的英雄凌驾于群众之上，但红军是一个英雄的集体，他们是新英雄主义，他不自私自利，他们不为任何诱惑所动，他们决心为革命牺牲，一直战斗到革命胜利、人民解放为止。

这种新英雄主义精神，令国民党部队胆寒。

至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了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企图。

马克思说过一句名言：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以悲剧的形式出现，第二次以喜剧的形式出现。蒋介石在成都等了好几个月，可他没能等到历史重演。

爬雪山，过草地

毛泽东等人在泸定县城附近开了会，决定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

夹金山，山高四千米，终年积雪，当地人也叫它“仙姑山”，他们认为只有仙女能飞过去。红军到了山脚下，先找当地居民询问过雪山的知识。当地老者告诉他们，山上大雪纷飞，寒气逼人，要想过山，必须在上午9点到下午3点这段时间过去，最好多喝点白酒或者辣椒汤，这样可以保证身体暖和。上山最好拿根棍子，防止跌倒。另外，如果到了山顶把嘴巴张开，山神就会让你窒息——这是山神崇拜，但也不无道理，山上空气很稀薄，张开嘴有可能导致窒息。

已经是六月天了，可雪山依旧严酷，寒冷，无情。上山之前，负责物资供应的毛泽民可忙坏了，他目前的任务是：想尽一切办法帮战士们抵御寒冷。他和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一起，收购了许多羊皮和羊毛，他努力保证每个红军战士都能有一件羊皮或是羊毛背心，在雪山上，这能帮他们保命。毛泽民还去买酒、辣椒和生姜。一切都必须在短时间内准备好。他还要提醒战士们，用布条遮眼睛，这是为了防止雪盲。

6月12日清晨，红军集合，9点开始爬雪山。他们对准峰顶附近的缺口，笔直地往上爬，浓雾环绕，大风凛冽，刚到半山腰，又开始下起雨。红军继续往上爬，又撞上了令人惊惧的冰雹，空气稀薄，呼吸愈发困难。因为太冷，说话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出气成冰，手和嘴唇都冻得发紫，有些战士和牲口一步没走稳，就掉进冰河，从此诀别。还有些坐下来休息的人冻僵在原地。

政工人员不断鼓励大家向前，这是人与大自然的拔河，想要胜利，完全靠一种坚定的信念。毛泽东鼓励大家不能放弃，要坚持爬到山顶。从山脚到山顶有八十里地，可实际爬起来，却好像要走一个世纪那么久。

终于，红军到山顶了，放眼望去，一个洁白的世界。

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发现山下的村庄里有人来回走动，身上背着枪。他们很快发现，那是红四方面军，于是，先头部队在北进懋功的达维镇途中与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合了。

6月16日，毛泽东和朱德在瓢泼大雨中走到村外，等候四方面军政治委员张国焘。

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在达维召开联欢晚会，庆祝两军主力会师，毛泽东和朱德都讲了话，红军战士们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红军在懋功地区集中整顿，进行政治和军事教育，休息了四天。毛泽民又开始为军队的伙食发愁，这里的主要粮食是玉米，南方来的战士吃不习惯，他们把玉米煮着吃，吃了就腹泻。

继续朝北，进入藏民区之后，食物问题更加凸显了。国民党向藏民做了宣传，藏民都躲了起来，红军买不到粮食，每天能吃的，只有青稞、荞麦和玉米，一天能吃两顿饭已经是幸运，而且食盐也不足了。

到了藏区，红军停止了打土豪，偶尔有汉人做生意，一般也只卖皮毛，不能解决粮食问题。

毛泽东等人在两河口开了会，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去川陕建立革命根据地。从两河口到卓克基，红军翻过了梦笔山，这也是一座雪山，红军有了翻越夹金山的经验，已经可以应付了。但是，红军越深入藏区，就越觉得困难增加了，国民党沿路不断阻挠，他们胁迫藏民坚壁清野，对红军放冷枪，杀害掉队的战士。

7月1日，红军到达卓克基。中央红军连日在人烟稀少的藏民区行军，严重缺粮，影响接下来的作战计划的实行。

毛泽东看到部队吃饭十分困难，亲自过问给养问题。毛泽民则帮着大哥想办法。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在2日和8日发文，说为筹足过草地的食物，要求各部队每人带足十五斤粮食和足够吃一个月的食盐，并组织筹粮别动队，以解决粮食困难。

7月初，卓克基一带的青稞已呈淡黄色，勉强可以收割了。为了解决粮食问

题，红军只好割青稞煮着吃。他们和藏民研究，按照当地粮价，付给现款。于是，全体指战员，除了正在生病的，都参加了割麦。每天早晨8点集合，向能够收割的麦地出发。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红军闯过了蒋介石设下的重重封锁，现在又要面临大自然的挑战。粮食给养不足，很多红军腿打软。红军接着又翻过仓德这座大雪山，尽管这时天气还算良好，没有下雪，也没有大风，但空气太过稀薄，有些同志牺牲了。大家相互搀扶着，靠意志走过去。

仓德山之后是打鼓山。红军的给养依旧是最大的问题，这里地势较高，青稞还未成熟，但野菜却到处都是。在这里，红军主要靠吃豌豆尖和野菜过日子。各单位每天轮流派一些人去找野菜。离开打鼓，向沙窝方向移动，红军开始爬打鼓山了，指战员们对爬山已经驾轻就熟，一个个奋勇往前冲，爬到山顶，有的人还拿出糖精，配着雪吃。有人夸它比上海南京路冠生园的冰淇淋还美。

几天后，红军到达毛儿盖。8月下旬，红军离开毛儿盖，在茫茫草地中艰苦行军。

草地是个比雪山更加危险的敌人。那里阴雨多，很少有太阳，所以辨别方向只能依靠指南针。刚走入草地边缘，宿营地还能找到一些树木，被雨淋湿的上衣和在水草中行进时被溅湿的裤腿，还可以用柴火烤干。但走了两天，就发现眼前只有茫茫的青草地，且草多浸在水中。战士们捡有草的地方走，因为没有草的地方，多半是泥潭，那是无底洞。有些骡马只顾吃草，脱离了队伍，陷入泥潭里，一阵挣扎，结果越陷越深，终于丢掉了性命。

到处都是危险的沼泽。

草地里没有晴天，要么是雨天，要么是阴天。草地上有很多不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小河，红军战士们被河水冲倒了，爬起来，继续走。草地里一般没有合适的宿营地，通常是把油布朝地上一铺，就凑合着睡觉。

草地里吃饭通常是抓一把炒麦或者面粉就朝嘴里送，每个人都变成了白胡子。到了第四天，有些同志撑不住，牺牲了。这草地无边无际，大家默默走过牺牲了的同志的身边，又走向了那茫茫的青色。

自从进入草地之后，每天都有一些同志不能及时赶到宿营地，他们都是因为饥寒交迫，在某个地方倒下了。革命尚未成功，红军们都鼓起精神，继续朝前走。这是信仰的力量。

红军走到第七天，看到了岷山山脉。

同分裂主义作斗争

懋功会师，是胜利的大会师，但其中却潜藏着一股暗流。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对毛泽东并不服气。他把红四方面军看作是自己的实力，他们衣衫完整，人数众多，装备精良，他有些看不上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中央红军——这支部队在江西和一百万敌军打了好几个月，离开战场马上开始了长征，他们已经走了九个月，途经平原、高山、大川，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许多伤病员都留在了农民家里，一路上他们还留下了许多连队以发展游击战争，到达懋功的时候，中央红军的人数远远低于四方面军。

懋功会师，对中央红军来说，原本像是在沙漠行走的人遇见了绿洲，可张国焘的态度令大家震惊。

两河口会师，张国焘骑着马带着三十名骑兵卫队，活像话剧演员在舞台上亮相。毛泽东和朱德上前去迎他，他却停住脚步等他们走过去，连半路相迎都不肯。

朱德对集会部队发表讲话，盛赞张国焘多年革命的历史，可张国焘怎么回敬他呢？他说朱德“跟我们一起斗争了八年”。

张国焘觉得自己有实力取代毛泽东和朱德成为整个红军的最高领导人。

和毛泽东一样，张国焘也是参加中共一大的十三位党员中的一位，他在党内有一定的资历，但是，无论从觉悟还是个人能力，他都不适合做党的领导者。

在长征之前，他犯过不少毛病，中共三大，他反对国共联合以加强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大革命当中，他是右倾领导陈独秀的左右手；南昌起义时，他和

周恩来争论不休，导致起义延迟；中共六大，他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进行小组织活动，反对中央；去鄂豫皖苏区工作，则竭力贯彻王明“左”倾主张；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他采取单纯防御路线，强迫四方面军与敌人硬拼，受挫后仓皇逃跑。他在红安县河口镇召开干部会议，发誓不离开鄂豫皖苏区，要在周围打击敌人，保卫苏区，但他很快就带着主力跨过平汉路，向西行进，掉队的伤病员由平汉路西面东回时，才知道他已经离开苏区。

中央红军到达黔北，准备北渡长江、进入四川时，党中央曾经与在四川东北地区的张国焘联系，希望红四方面军能够牵制四川敌军，以便红一方面军可以从泸州北上渡江，进入川西。可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命令，反而掉头北上陕南，四川敌人无后顾之忧，全力进攻中央红军，中央红军才不得不采用迂回战略，转到金沙江渡江北上。

张国焘率部遭到敌人阻击，仓皇西渡嘉陵江，在夹金山下与中央红军会合。

红一、四方面军回合后，在两河口开会，会议通过了洛甫起草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这个计划是明智的。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总兵力达到十万人，挤在川西，连粮食都无法供应，而北上至富庶之地建立根据地，就能扭转局面。

两军会师后，张国焘有权力上的要求，为了团结张国焘，中央做了让步，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部委员职务，由张国焘担任，并为中革军委的总负责者。中革军委常委由四人增为五人，增补陈昌浩。

中共中央制订了“松潘战役计划”，消灭胡宗南部队，夺取松潘与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顺利地向甘南前进，但张国焘借口“组织问题”未圆满解决——他要提拔新干部，“有的可到军委”——而一再贻误战机，招致胡宗南在松潘集中兵力，使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中央只能立刻决定撤销“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草地北上。

毛泽东是有战略眼光的。他说：“敌人判断我们东出四川，不敢冒险横跨草地，走北出陕甘这一着棋，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路。”

毛泽东开始率领右路军过草地，到达班佑，可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却迟迟

不见动静。

9月1日，毛泽东和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张国焘，要求左路军北上向右路军靠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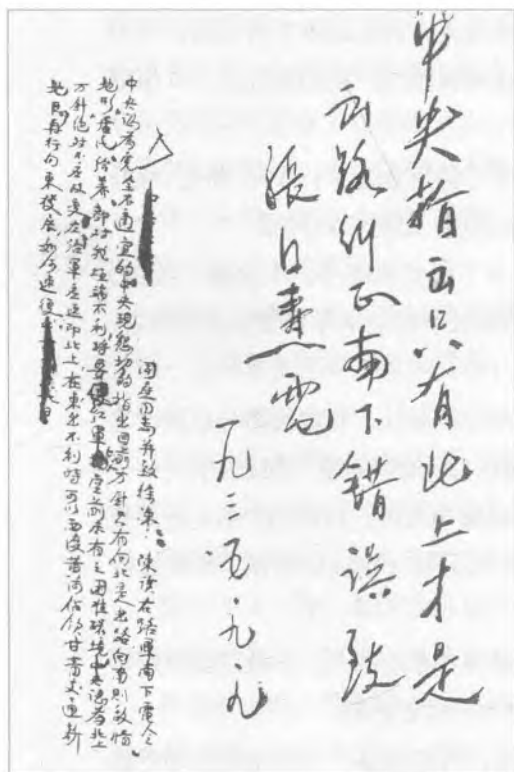
9月3日，张国焘回电，非但不北上，还要求右路军南下回击松潘，5日，他命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

9月8日，张国焘电令红四方面军驻阿坝、马尔康地区的部队“飞令”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至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

红军内部分歧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中央要求北上，张国焘却要求南下。

这晚10点，中央政治局开完会，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七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



★“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中共中央致张国焘电（1935年9月9日）

前途。即以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

电报强调：“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多么诚恳！多么切实！一切以大局为重！

可张国焘一方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党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另一方面却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这份电报被叶剑英看到，他知道这是大事，不能不报告党中央，便立刻赶往中共中央驻地巴西向毛泽东报告。

毛泽东抄下电令，告诉叶剑英处境危险，要赶快回去，务必提高警惕，以防意外。

毛泽东必须采取行动了。他跟洛甫、博古紧急磋商，一致认为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不仅没有可能，还会招致严重后果。一个短会之后，这天半夜，毛泽东从巴西出发，脱离险境，率领红一、三军团立即北上，并通知在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要一军在原地等待。

陈昌浩发现毛泽东等人跑了，有些惊诧，他问徐向前，还要不要追上去。

徐向前说：“你见过有红军打红军的吗？”

这是无比黑暗的一夜，然而光明就在眼前。对于北上，毛泽东一直义无反顾，张国焘的所作所为，也只能是加速了北上的步伐。

拉锯还在小范围持续着。

红军大学的部队在前进，陈昌浩的人追了上来，是几个骑兵通信员，他们一边跑，一边喊：“前面停止前进！没有陈昌浩的命令！不准前进！”

一时大家停了下来，感到莫名其妙。原干部团的学员怒不可遏，有的高声叫喊：“中央领导的队伍，你敢不准前进？”

红军大学的秘书长，原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黄超举臂高叫：“停止前进！”

大多数学员回敬他：“我们前进！”

还有人喊：“跟着毛主席没有错！”

红军大学又前进了。当天夜里，四方面军的学员被黄超叫出来，原路返回，

南下去了。

当时，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也骑马赶来了。毛泽东正同叶剑英、彭德怀、杨尚昆谈话。李特大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

毛泽东劝阻他，他就跟毛泽东吵架。毛泽东很冷静，他让李特去旁边的一座教堂里坐下谈谈。李特说：“你们这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毛泽东认真规劝，开导他，告诉他这是中央的决定。李特就是不听，强拉着四方面军的战士跟他走。

最后毛泽东说：“你们实在要南下也可以，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跟上来。”

说完，毛泽东又出去对部队说：“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愿意北上的跟党中央走，愿意跟张国焘的可以回去。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的！”

很多人对李特的行为很生气。

毛泽东劝解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



★ 漫漫长征路，一个将红军推向苦难，一个给革命带来光明。毛泽东与张国焘在陕北

回来的。”

潇洒，大气，有远见，这就是毛泽东。

就这样，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分道扬镳了。至此，左路军从阿坝向后转，又过草地，向雪山地区撤退。

有人痛骂张国焘：“张国焘，你等着瞧，看你往哪里去？”“张国焘，你分裂红军，绝没有好下场！”

两天后，毛泽东率红三军到了甘肃迭部县俄界，给张国焘发电，“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毛泽东始终在争取张国焘，俄界开政治局会议纠正张国焘错误的指示，也只传达到中央委员，未向全党公布。毛泽东是顾全大局的，为了团结红军，他给张国焘留了余地。

乱世出英豪。可成大事者，不能仅仅是拥兵自重，而应该有一种全局眼光，一种胸怀，一种气度。没过多久，北上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真的开拓了一片根据地，中国革命又有了新的希望。而张国焘却因为局促与狭隘，一错再错，没过多久，他竟然在四川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和洛甫的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

后来，张国焘还是来到了陕北，可惜依旧没能经得起考验——他最终叛党。

滚滚江河东流，任何人都不可能与时代的潮流抗衡。毛泽东顺应民心，一跃而起，而那些逆流而动者，最终只能跌落，一败涂地。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但毛泽东始终清楚地知道这纷争的分量。多少年后，《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重访毛泽东，那时候，毛泽东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斯诺问：“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毛泽东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长征胜利在望了

俄界会议，毛泽东分析了张国焘分裂之后红军该怎么走。毫无疑问，张国焘的南下，令中国革命受到了严重损失。他有军阀倾向，将来可能发展到叛变革命，这在党内是空前的。

原本制订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必须变更，但毛泽东不认为中国革命就此走向低落，而应该是经过游击战争，大规模地打过去。

毛泽东说：“一省数县胜利，是不能否认的，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不过不是在江西，而是在陕、甘。”

红军继续北上，关键一仗在腊子口，这是进入甘南的关键。

9月16日，毛泽东来到腊子口外，住在黑多寺。他和林彪、聂荣臻接连三次致电彭德怀，部署一、二纵队行动路线和夺取腊子口的战斗计划。电报说：“顷据二师报告，腊子口之敌约一营据守未退。该处是隘路，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

腊子口，极险极峻，小小的关口，不过三十米宽，两面是悬崖峭壁，形成一个长达百米的甬道，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湍急的腊子河从这条缝隙里挤下去，河上只有一座木桥，它是连接两山的唯一通道。桥头有碉堡，桥西是阵地，桥东山坡上都是碉堡。国民党军队在后面囤积着粮食，有长期死守的准备。

桥头有两个营，整个山上配了一个旅。岷州城内，还有大量援兵。

毛泽东说：“腊子口就是刀山，我们也要打上去；鲁大昌就是铁铸的，我们也要把他砸成粉末！……坚决拿下腊子口！”

红军开始正面攻击了，他们想用消耗战拖住敌人，再伺机夺桥。桥下的红

军悄然前进，他们抓住桥底的木条，像做体操动作一样，一手接一手朝对面移动。这样一来，桥上桥下珠联璧合，直朝桥对面冲过去。

为了确保攻下腊子口，红军还出了一个奇招。有一个红军战士绰号“云贵川”，苗族人，年纪也很小，但他却有“飞檐走壁”的本事，他带人攀爬到悬崖顶端，配合红四团正面攻桥。红军对桥头的国民党军队形成了三面进攻的态势。

关键时刻，毛泽东派人来前线，这对于红军的气势也是极大鼓舞。

红军攻过桥了，国民党部队落荒而逃。在红军强大的攻势和大无畏的气势的压力下，他们已经没有心力再守桥，守桥的团长丢了魂一般，朝渭源方向逃窜。

聂荣臻曾说：“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

可什么能挡得住红军呢？有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的正确领导，有这些年纪不足二十五岁、神勇无比、坚强万分的红军战士们，即便遭遇天险，依旧势如破竹。

那是一个多么单纯的年代，人心齐，泰山移，所有红军的坚定信念聚在一起，震惊了世界。

枪炮声响了三天。

这是一场鏖战。炮弹碎片和未爆炸的手榴弹铺满了桥头三十米内的悬崖道路。

红军缴获了大量物资，有大米、面粉还有食盐。

毛泽东与党中央领导商量，给参加战斗的全体指战员、工人每人发一块大洋。并下令：大家要吃得好！各单位会餐，还请了房东。

红军队伍里一片欢腾。

聚餐时，毛泽东还主动给当地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敬酒。老人十分激动，他说：“红军乃仁义之师，如此尊重百姓，自古至今实为不多，老汉今年八十开外，愿代表乡里向诸位一拜。”

毛泽东扶住他，说：“红军是人民的队伍，与乡亲是鱼水之情。”

中央红军还在腊子口休息的时候，先头部队已经攻下岷县的哈达铺，鲁大昌部队退守岷县城，沿路回汉军民欢迎红军。在荒芜的区域走了那么久，毛泽东非常迫切读一读报刊，他把一纵队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找来，要他们到哈达铺找些“精神食粮”。

马上要进入回民区了。政工干部开始给红军讲“回民区域的政治工作”。大意有四条：进入回民区域，应先派代表与阿訇接洽，说明红军北上的意义，得到同意后，才进入回民村庄宿营，否则露营；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得擅自进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不准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在回民区域不得吃猪肉、猪油；宣传红军民族平等的主张，反对汉官压迫回民。

红军开始向岷山前进了，这是岷山山脉向北延伸的最后一座大山。

这难不倒红军，尽管蒋介石的飞机在头顶盘旋，它们还扔炸弹。蒋介石并没打算放过红军，可到了这个时候，他的确无能为力了。

长征胜利在望了。

毛泽东后来说：“万里长征，千回百折……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红军登上了岷山山顶，朝下望，一大片田野，遍地牛羊，农民在田间劳动。这景象太美好，红军如潮涌一般下了山，在大草滩宿营。回族人民欢迎他们进村子。

千里雪山走到了尽头。

毛泽东写道：“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接下来，朝哪儿走是个问题。毛泽东曾想派谢觉哉和毛泽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设法打通国际关系。红军北上，原本有过和苏联接洽的想法。

哈达铺的国民党报纸帮了毛泽东大忙。他从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

毛泽东当即决定，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他给大家鼓劲：“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

在哈达铺，部队进行了整编。因为五军团和朱德、刘伯承留在四方面军了，中央红军就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即陕甘支队。司令员是彭德怀，毛泽东担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杨尚昆做政治部主任。

在哈达铺休息两天后，红军继续前进，9月23日，到达岷县闾井，又走了两天，红军全部渡过水流平缓的渭河，朝渭县榜罗镇进发。国民党军队除了投炸弹，已经没有别的法子。

司令部命令全军在榜罗镇附近休息了一天。毛泽东主持常委会，改变了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

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

28日，在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激情澎湃地说：“我们要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我们要会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的同志们去。……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上去！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我们已经过了两个关口，腊子口和渭河，现在还有一个关口，就是在固原、平凉的一条封锁线。这将是我们的长征的最后一个关口。……为着民族，为着使中国人不做亡国奴，奋勇向前！红军无坚不摧的力量，已经表示给全中国，全世界的人们看了，让我们再来表示一次吧！……要知道，固然，我们的人数比以前少了些，但是，我们是中国革命的精华所萃，我们担负着革命中心力量的任务。以前如此，现在亦如此！我们自己知道如此，我们的朋友知道如此，我们的敌人也知道如此……”

庄严的氛围笼罩着会场，所有人都在静听毛泽东的话。这个中国革命的领路人，好像摩西一样，领着一支队伍走出江西，走到陕甘，所有人对毛泽东，已经有一种信仰。

跟着毛泽东走是没错的，这是中国革命实践得出的经验。

红军进了通渭城，国民党军队几乎没怎么抵抗就落荒而逃。傍晚，部队带着饭菜来到城外的河滩，在戏台前合唱《国际歌》，叶剑英、邓发讲话，主要讲北上抗日的意义，讲完之后，红军指战员们吃了一顿美美的晚餐。

红军在青石咀打了一仗。毛泽东在一个山头直接指挥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的一、四、五大队，采取两侧迂回兜击、正面突击的战法，歼灭何柱国骑兵军两个连，缴获百余匹战马。

过了青石咀，就是六盘山了。

六盘山，红军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高山。

毛泽东攀上六盘山主峰，有了诗情，他写了《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缚住苍龙——打倒反动派，这是毛泽东的雄心壮志。

长征胜利，红军用脚走了二万五千里

进入陕西，长征已经彻底转变成胜利。

事实上，过了金沙江之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士们已经掌握了主动权，他们是一条灵巧的飞龙，蒋介石的部队则是一头移动缓慢的庞然大物。

10月14日，毛泽东率部到达环县洪德城。

经过甘肃、陕西两省分水岭，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

10月19日，毛泽东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到达保安县吴起镇，在这里，又看到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毛泽东和他的战士们都很兴奋，长征二万五千里，终于到“家”了。

可是，红军后面还有国民党两千余骑兵尾追。

毛泽东说：“打退敌人，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这是与陕北红军会师的见面礼。

21日，彭德怀指挥陕甘第一、第二纵队在吴起镇附近击溃尾追的马鸿逵、马鸿宾四个骑兵团。毛泽东本来在安全地点，但因为非常关心作战情况，下午四五点，他带着警卫员和通信班到指挥位置，毛泽东不断用望远镜观察情况，又倾听枪声的方向，当他听到枪声慢慢移向远方，并且稀疏，才放心回到营地。

这是红军进入陕甘苏区的最后一仗。

战斗结束，毛泽东作《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

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10月22日，中央在吴起镇开了会，作了报告，总结说：“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二千里，到达这一地区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敌人对于我们的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现在是敌人‘围剿’。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

这次会议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

红军战士们说着南腔北调，聚在一起，心情十分激动，有的人脸上甚至挂着泪水。

毛泽东叫来两个可靠的人，贾拓夫和李维汉，让他们作为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此前因为陕北肃反扩大化，刘志丹和战友被关在瓦窑堡。毛泽东得知后，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

天降大雪，陕北大地银装素裹。在象鼻湾，毛泽东激昂地对随行部队说：“从江西瑞金算起，我们走了一年多时间。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从来未有过的真正的长征。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今后，我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要做团结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11月21日，毛泽东发起了直罗镇战役。他在北山吴家台北端高地设指挥所，直接观察战场情况，指挥红一、红十五军团作战。

毛泽东说：“这一仗，要的是歼灭战。”

拂晓，红军对国民党第一〇九师发起进攻，激战至下午2点，歼灭了大部分敌人。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周恩来，要求红军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歼残敌，主力转为打援。24日，直罗镇之战国民党残敌在突围中被全歼。

直罗镇大捷让蒋介石第三次“围剿”陕甘苏区的幻梦彻底破灭。

12月13日，毛泽东到达瓦窑堡。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开了会，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圆满解决了。

毛泽东在瓦窑堡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报告，题名“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其中一段谈到长征，这算是毛泽东对长征的经典性总结：“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

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这是毛泽东的眼光和胸怀。



★ 到达陕北的红四方面军一部

长征，一部用热血和勇气铸就的史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都是从长征中走出来的。

十大元帅中有九位经历了长征。

毛泽东写《长征·七律》，举重若轻：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长征路上的几件事

长征是光荣而伟大的，但这一路到处都是牺牲。红一方面军从瑞金出发时红军有八万人，走到吴起镇，只剩不到八千。这一路，流血牺牲无数，但也收获一些温暖。

毛泽东是坚强的，但他并非无情。

长征早期，因为军事战略问题，红军遭受重大损失，血战湘江后，毛泽东指挥部队向贵州开进。1934年12月，中央红军进入贵州。那时候，贵州是中国十分贫困的地区，当地居民有些被称为“干人”——他们的血汗已经被地主和军阀剥削得一干二净，他们是一贫如洗的穷苦人民。

红军从黎平向黄平进军途中，在一座村庄旁，一位老婆婆因饥饿倒在路旁，她全身补丁，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红军指战员围了上去。毛泽东也来了，他从人群中走出来，走到这位老婆婆面前，他见老婆婆如此饥寒，立刻从身上脱下一件毛线衣，又从行李中取出一条布被单，还让警卫员拿了两条装满粮食的干粮袋，一并送给她。

毛泽东蹲下来，亲切跟老婆婆说：“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干人的队伍。”

老婆婆连连道谢，喃喃念着：“红军，红军……”

这是爱民如己的毛泽东。

1935年4月23日，红军休养连来到云贵交界的一个小山村。国民党的轰炸机又来了，在天空盘旋，休养连伤员紧急疏散，贺子珍不顾自己的安危，组织

伤员撤退。

炸弹落下来了，瞬间爆炸，贺子珍来不及躲避，随着轰然一声震天巨响，贺子珍倒在血泊中。

军医赶过来给贺子珍打了止血针，可是，她的头上、身上、胳膊上中弹多达十七处。

毛泽民和钱希均赶来了。

贺子珍苏醒后，挣扎着对毛泽民和钱希均说：“我负伤的事情，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

毛泽民说：“大嫂，请放心，有我们在，就一定把你带走。”

毛泽民给毛泽东发电报，告诉他贺子珍负伤的消息。毛泽东听后很着急，他表示，不能把贺子珍寄放在老乡家，一来这里缺医少药，没法医治；二来安全上也无法保证。他把自己担架让出来，又派傅连璋过去帮贺子珍治伤。

时而醒来、时而昏迷的贺子珍躺在担架上上路了。

第二天，毛泽东赶来了。他穿着大衣，风尘仆仆，他看到受重伤几乎不省人事的贺子珍，眼泪几乎掉下来。

贺子珍让毛泽东继续前进，她留下，不连累大家。

毛泽东坚决不允许，他不愿就这样抛下革命伴侣。他写了一张便条，是给担架班长丁良祥的：“老丁同志：我派你明天去抬贺子珍同志，昨天下午敌机轰炸，她受了重伤，带了十几处花，不能走路。毛泽东，即日。”

他又把自己的黄马让出来，留给贺子珍，让她等伤势好一些的时候骑。

后来，贺子珍回忆长征时说：“是毛泽东救了我的命。我当时昏迷着，不知道连里曾经决定把我留下，放在老乡的家里。当然，连里这样决定也是一片好心。但如果那时候毛泽东同意了，我就没命了。我的伤势那么重，农村又没有医疗条件，不要说碰到敌人了，就是光躺着也要死的。”

这是情深意重的毛泽东。

1935年，毛泽东率领红军过了天险大渡河。6月，他决定放弃进攻清溪、荣经，要求迅速夺取天全、芦山战略要点。

6月4日，毛泽东离开化林坪，至水子地宿营，在翻越一座山时，天上忽然轰轰作响，国民党的飞机又来了。毛泽东急忙让大家隐蔽，可已经来不及了。

炸弹在毛泽东不远处爆炸，千钧一发之际，警卫班长胡昌保大叫一声“主席”，飞扑过来，奋力将毛泽东推到一边。

轰然巨响，灰雾漫天，半山腰一片狼藉。

待大家从烟雾中站起，却看见胡昌保已经奄奄一息，毛泽东抱着胡昌保，轻轻叫着他的名字。胡昌保微笑着问：“主席好吗？受伤没有？”

毛泽东说：“没有，我很好。”卫生员赶来了。毛泽东说：“快给他上药！”胡昌保摇摇头，说自己已经快不行了，还是把药留给更需要的人。他请毛主席继续前进。

毛泽东眼泪纵横。这是保卫他的战士，是他的亲人啊！

胡昌保对毛泽东说，自己牺牲后，如果可能的话，请转告他的父亲，他们在江西吉安。说完，胡昌保渐渐没了气息。毛泽东和战士们呼喊着重昌保的名字，可有什么用呢。大家失声痛哭。

这就是战争，残酷无情的战争，可是，为了革命胜利，红军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一种怎样伟大的情怀。毛泽东抱着已经没了气息的胡昌保，沉浸在巨大的悲伤之中。

泪眼蒙眬的毛泽东将胡昌保放平躺下。他拿出自己的毛毯，慢慢地盖在胡昌保的遗体上。

胡昌保被葬在路边。毛泽东亲自培土，临走前，还用手轻轻地拍了两下土堆。这是化悲痛为力量的毛泽东。

1935年7月底，红军进入松潘毛儿盖。周恩来病倒了，且病得很急、很重，经医生诊断，他得的是阿米巴痢疾。到了8月初，他甚至连续几天高烧不退，昏迷不醒。据说，这种病死亡率极高，治疗的办法有一个，就是在化脓部位与肠子碰触的部位穿孔，让脓液顺着肠道流出。

毛泽东来了，他十分关心周恩来的病情，他告诉周恩来，好好休息，一切等身体养好再说。

当毛泽东得知，部队最好的医生之一——中央医院院长傅连璋已随红军总部去了卓克基，便立即派人去红一军请医生来为周恩来医治。

经过多日抢救治疗，周恩来脱离了危险，他得救了。

这是关爱战友的毛泽东。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率先到达吴起镇。中央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



★ 毛泽东和周恩来

东走上讲台，看着台下的红军各级干部，一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毛泽东的眼睛里情不自禁泛起了泪。红军长征胜利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这只是起点，未来的道路是光明的，革命事业是伟大的，毛泽东呼吁大家继续努力。

当众红了眼眶，这是至情至性的毛泽东。

留守红军被迫冒险转移

这是最后的阵地。

中央红军走了，瑞金梅坑的夜幕慢慢落下。

早在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之前，梅坑就已经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项英、陈毅、陈潭秋、贺昌、瞿秋白五人为核心，后来又加入邓子恢、谭震林、张鼎丞、毛泽覃、梁柏台、汪金祥、李才莲。

留在苏区的大约有三万人，多半是老弱病残。枪支弹药也不多了。

十万红军都无法抵抗国民党的“围剿”，何况这三万人呢，苏区弥漫着一种不祥的气氛。

很快，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顷刻之间沦陷，改天换地，街道上张贴着恐怖的标语，“人要换种，草要过烧，石头要过刀”！蒋介石开始了他的大屠杀，血迹遍布瑞金，尸体成山。

留在苏区的红军只能采取游击战争。对这一群人来说，能够在敌人的统治下活下去，并不失时机地在运动战中消灭一些敌人，就已经是胜利了。

毛泽覃是红军将领，他率领着独立师战斗，在敌人的压迫下，他和他的战士们过着极其艰苦的野兽一般的生活。他们藏身于山林，饿了，就挖竹笋、吃野果；渴了，就喝山泉水；冷了，就躲进山洞，靠着茅草过夜。毛泽覃是一个极具活力的红军将领，他执着，勇猛。若不是因为“左”倾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排挤，他完全应该参加长征，他的才能在那里更能得到发挥。这是历史的错误。

可既然留下来了，毛泽覃就坚持战斗。

1934年12月初，瑞金城边有群众有危险，毛泽覃带着他部下前去解救，敌人阻击他们，毛泽覃一方面让疏散群众，一方面诱敌深入——他想把他们引到山林里去，那里是他的世界。毛泽覃率领部队撤到谢坊小镇，敌人跟来了，他迅速在谢坊的山林间布置了一个埋伏圈，敌人不察，四百人全部入瓮。毛泽覃下令猛攻他们，一时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激荡山谷。

毛泽覃部大获全胜，他就是要在这片白色恐怖中炸出一小片红。

1934年12月，红军独立师师长毛泽覃和瑞金夏肖区区委书记贺怡同时接到命令，毛泽覃率游击队往闽赣边界转移，贺怡因怀有身孕，不能随毛泽覃一起随部队行动，党组织安排她偕父母去赣州，做地下工作。

白色恐怖笼罩着苏区，天又湿又冷。

贺怡和毛泽覃知道，这次行动十分危险。他们考虑再三，决定将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孩子毛岸红寄放在当地的一个老乡家。毛泽覃打算先送贺怡和父母及孩子到会昌县白鹅洲码头，贺怡和家人坐船北上赣州，他带部队南下闽赣边界。同行的还有中央执行委员、中央苦力运输工会委员长王贤选及刘老大。

王贤选了解白区工作，经验丰富。

要到白鹅洲码头，需要闯过国民党的两条封锁线。毛泽覃此前俘虏了一批国民党士兵，正好可以借他们的衣服用用——天亮之前，毛泽覃和他的部队全部换上国民党的服装，头上再绑条白毛巾，衣服不够，其余的人就扮成民工，一行人护送贺怡及其父母去码头。

紧靠公路的小镇板坪，驻扎着一个保安团，这是毛泽覃他们需要通过的第一个关口。

毛泽覃和王贤选假扮剿匪部队，敌人审查，他们就拿出名片，装出一副兵痞的架势，虚张声势。

这对保安团是最奏效的。他们很快就被毛泽覃和王贤选迷惑了，糊里糊涂放了行。

毛泽覃一行人迅速过关，板坪这道关口算过去了。他们加快脚步，一口气走了二十里，到了木店镇，二十多个国民党的民团拦住了他们。

毛泽覃和王贤选决定先发制人，他们摆出一副兵老爷的架势，说自己是国民一〇二师剿匪队的，要求民团排长立刻给他们带路，目的地，白鹅洲。民团排长不敢违逆，慌忙带路，在路上被“解决”掉了。

木店镇过去十五里地，就是白鹅洲了。

黄昏，一行人来到码头，毛泽覃和贺怡分别的时刻到了。

毛泽覃把岳父、岳母扶上船，又送贺怡和孩子。贺怡的父亲贺焕文化名陈焕文，坐在刘老大的船上；贺怡带着女儿小英子和王贤选假扮夫妻，坐在一条船上；还有一条船上坐着贺怡的母亲和刘伯坚之子刘豹，他们假扮成祖孙。

毛泽覃让贺怡保重，他从来都是个乐观、充满朝气的人，但这一次，愁闷的天气，离别的情绪，也让他整个人显得有些凝重。

贺怡告诉毛泽覃，让他别担心孩子和父母，她会照顾好一切。

毛泽覃说，有机会，他会派人来看她，让她一定要坚持住。

他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

船渐渐开远，毛泽覃站在岸上，贺怡看着毛泽覃的身影，觉得十分惆怅，但她怎么也料不到，白鹅洲一别，竟是她与毛泽覃的永诀！

毛泽覃牺牲时，身上搜出毛泽东照片

1935年是白区斗争最为艰难的一年。

毛泽覃和贺怡白鹅洲一别没再见面，战争让农历新年都变得没了喜气，寒冬迟迟不肯离开，春天还没有到来。毛泽覃在打游击，贺怡依旧做着地下工作，唯一一件喜事是贺怡在赣南山区生下了她和毛泽覃的儿子毛岸成。这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

1935年上半年，对很多留在苏区的共产党人来说都是噩梦。

瞿秋白，这个一度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老党员，在与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一起朝福建转移的时候被国民党发现。他们立刻分开行动，瞿秋白躲过了这场劫难，但不久之后他再次被捕，而何叔衡则在试图撤退时遭遇不测，终于“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这年4月，毛泽覃率独立师和福建军区部分部队退守山林。留守苏区的领导也受到一些“左”倾思想的影响，竭力主张把红军部队集中起来，同国民党硬打硬拼。毛泽覃反复劝阻无效，最终部队被打散，25日下午，毛泽覃带着几十个人穿山越谷，来到瑞金黄鳊口附近的“红林”。

毛泽覃和他的战士们已经没有给养了，冷、饿、累一同向他们袭来。毛泽覃带着部队下山。他们来到一个叫黄坑的小村子，村里只有几户人家，但房子大多数都是空的，国民党的反复清洗，已经让村子几乎荒废。毛泽覃意外看到一缕炊烟，他派人去询问，发现一座屋子里还住着一对父子，他们在做饭，但家里已经没有什么粮食，但他们听说红军来了，还是勉强凑了一顿饭，请毛泽

覃等人吃。晚上，毛泽覃就在这家儿子的带领下，带着几十名战士来到红林山区黄狗窝一个槽坊过夜。

这夜很冷，毛泽覃等人在屋子里笼起了一堆火。仅仅几十个人作战不可能长久，毛泽覃得为部队找一个出路，他想要冲出包围圈，和其他红军部队建立联系。

深夜，他让一个姓杨的战士去杉背坑找陶古游击队，他打算约他们在第二天黎明一起攻打国民党黎子岗炮楼。

清晨，姓杨的战士还没回来，毛泽覃另派了一个姓何的战士下山看看情况，谁知姓何的战士有些情绪，他下了山就钻进茅草丛里睡觉去了。

国民党毛炳文部二十四师汤团某连的敌军路过这里，刚好看到草丛里有一个人，他们活捉了姓何的战士。何某惊慌失措，既没有鸣枪报警，也没有任何反抗。他做了敌人的俘虏，成了叛徒，带着敌人包围了槽坊。

敌人调了一个排的兵力在陶古游击队没来之前把毛泽覃和几十个战士团团围在小房子里。毛泽覃冲到门边，命令其他人从后面朝山上撤退，端起机关枪，一阵扫射。他决定留下来掩护其他队员。

一个敌兵攻进来了，毛泽覃冷不防踢翻了他。敌人的火力越来越猛。毛泽



★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

覃的子弹全部打光了，他拿起一支步枪，上了刺刀，跟敌人血拼到底。

一阵枪弹飞过来，毛泽覃腿部中枪，血染红了草地。

毛泽覃知道自己这次凶多吉少，迅速从口袋里摸出自己珍藏的红星奖章，丢在小溪边的杂草中。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给予他的至高荣誉，他不想让它落入敌手。

他奋力反抗，他要拼到最后……

一颗子弹射中他的右腰，从前胸飞出来。

毛泽覃倒下了。一地鲜血。

凶残的国民党军不肯善罢甘休，仔仔细细搜了毛泽覃全身，却只搜出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另外还有一份党证。

毛泽覃就这样壮烈牺牲了。

这一年，他年仅二十九岁。



★ 毛泽覃牺牲的地方——江西瑞金红林区纸槽

亲者痛，仇者快。

毛泽覃牺牲后，国民党军并没有把他就地埋葬，而是抬到瑞金城拍照、领赏。在国民党军看来，毛泽覃是“共匪”头目毛泽东的亲弟弟，击毙他，可是升官发财的好机会。

伪《中央日报》大肆渲染毛泽覃牺牲的消息，一时间满城风雨。

5月的一个夜里，贺怡正在开会，她打算把一批药品送上山给游击队员。当初陪她一起从白鹅洲搭船的王贤选急匆匆赶来。他说有事情要跟贺怡说，还说这件事陈毅要求他当面汇报。

贺怡毕竟是老革命了，她立刻明白了几分，但她还不敢，也不愿意确信，她希望从王贤选嘴里说出来的，是革命任务或者别的什么都行。

王贤选欲言又止。

贺怡的心更沉了，她忍住心痛，终于问，是不是泽覃出事了？

王贤选点了点头，这才敢说出毛泽覃牺牲的整个经过。

贺怡当场就哭了。

他还没来得及看到他们的儿子毛岸成啊！

自白鹅洲一别，她再也没能见丈夫一面！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第七日。一向沉稳的毛泽民匆匆来到了大哥毛泽东的住处。

贺子珍请毛泽民喝水，他不喝，进了屋子，毛泽民甚至还没来得及坐下就开始叹气。毛泽东忙着要去开会，他问毛泽民有什么事，如果不是急事，就找时间再说。

毛泽民说是急事。

贺子珍急了，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毛泽民喃喃道：“小弟泽覃牺牲了。”

毛泽东听到这话愣住了，泽覃牺牲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又问了一遍，得到的却是同样的回答。

毛泽覃牺牲了？这可是毛泽东最喜爱、一手培养起来的弟弟啊！

毛泽东强忍悲痛，问消息是从哪里来的，可不可靠。

毛泽民说，是一个战士说的，他们缴获了一部敌军的电台，从电台里得到了这个消息。

这对毛泽东来说犹如晴天霹雳。

中央红军离开江西后，他知道苏区的日子很艰难，有一段时间没有毛泽覃的消息了，没想到消息一来，就是噩耗！毛泽东怨自己当初没有能力把他带出来。可是一年之前，他也是“左”倾风潮的受害者，在中央苏区他根本没有决定权。

毛泽东沉思良久，想起母亲在世时对他的嘱托——她请他一定要把小弟照顾好，一定要尽到做大哥的责任。

可如今，小弟泽覃牺牲了。他该如何向死去的父母亲交代！

毛泽东没说话。

贺子珍的眼眶红了。她在担心妹妹贺怡，她不知道妹妹在白区能否挺下去，还有她和毛泽东的儿子毛岸红，他在白区，又将有什么样的遭遇……

毛泽民问大哥，什么时候能打回白区去，为小弟报仇。

毛泽东望着窗外，喃喃说，会有那么一天的，会的。

·第七章·

转战：陕北道路

在黄土高原上生存

10月，陕北便开始下雪。

红军战士们穿得还是单衣单裤，保安的房子很少，只有窑洞。各种军用物资和器材也严重不足。

毛泽东找林伯渠商量供应被服、无线电器材、西药等物资的事情——林这个时候担任总供给部部长。林伯渠接到指示之后，立刻找到毛泽民，放眼苏区，能够想出办法解决问题的恐怕也只有他了。

他们的任务艰巨而紧迫。

林伯渠的小本子上密密麻麻记录着关于采购的信息，战士们要过冬，所以最着急的还是被服：羊毛衣五千套（最急）；羊毛短裤六千条（最急）；羊毛风衣六千件（一千最急）；羊毛帽子五千顶（三千最急）；绑带五千双（三千最急）；羊毛夹被两千床（一千最急）；布军鞋一万二千双（六千急，余次急）；夹袜一万二千双（六千急，余次急）。

十万火急，毛泽民是国民经济部部长兼贸易总局局长，他必须马上和林伯渠配合，解决过冬问题。

毛泽尿管钱，从苏区撤退时，金库里的资财能带的都带上了。但长征的花销不小。十五大队挑着的几十担银洋和金银在路上已经几乎花完了。黄土高原，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但在当时却十分贫瘠，群众生活困难，很多地方连饮水都成问题，打土豪筹款子的老办法行不通了。

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出手相救。他的军团有七千大洋家底，为了解中

央红军过冬之急，他毅然拿出五千大洋。毛泽民欣喜过望，有资金就有希望。

他给手下人开了动员会，组织人员去采购棉花和布匹。当地自产的棉花不足以应对红军几万大军的过冬需求，必须去关中韩城、澄城、蒲城采买。

这有很大的危险性。

毛泽民有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他给采购人员开会，告诉他们怎么跟国民党周旋，怎么做买卖，他说跟国民党打交道，要有智慧，要学会随机应变。

毛泽民把工作人员分成两组，一组化了装，南下关中，去采买棉花和布匹；另一组去找关系，打开秘密运输的渠道——国民党军队封锁了从关中北上的隘口，如要从关中运货出来，陕北清涧对面的黄河渡口可以考虑。打通渡口，事关重大，毛泽民亲自出马，他赶到清涧，亲自指挥布局——在中央苏区，毛泽民与军阀做过生意，他深知，国民党的部队对钱财看得比信仰重，他决定在“金钱”上下点功夫。



★ 毛泽东接受群众献旗

阎锡山部队的守营营长很快“上钩”，在红军同志们与他拉上关系之后，他开始在夜深人静时悄悄到对岸来打牌。他总是赢钱，天亮临走时，红军还会给他带上很多土特产。红军指战员开始给他做思想工作，告诉他抗战的道理——这都是毛泽民交给指战员的方法，叫做“收买与教育”。很快，守卫营长“松了口”，去采购的同志有了运输通道，布匹和棉花便源源不断地从关中运到了陕甘苏区。

有了布匹和棉花，毛泽民又安排人员赶工，迅速制作被服，他算好时间，冬天之前，全部能够到位。

任务完成了第一项。

冬天需要取暖，取暖需要原料，毛泽民还得立即解决取暖原料问题。

瓦窑堡附近有安定和永坪两个颇有名气的煤矿，挖出煤来，就能解决生活和部分取暖的当务之急。但眼下这两个煤矿的产量不尽如人意，毕竟毛泽民需要考虑的是几万红军的供暖问题呢。他即刻派出工矿科的工作人员，下煤矿参与管理和开发，没过多久，这两个煤矿产出的煤基本可以应付中央机关和当地群众的生活、取暖需求了。

毛泽民还给出优惠，每月放出一天的产煤量全部优待红军家属，红军家属买煤，一律九折。

有煤炭产出了，但这点产量供应全部人员取暖依旧有点紧张，毛泽民以身作则，冬天了，他就住在国民经济部窑洞里，为了节约资源，他不生火，白天他四处奔波，晚上他则坐在冷冰冰的窑洞里办公到深夜。有警卫员心疼首长，偷偷给毛泽民烧了热炕，毛泽民得知后，立刻要求他把火灭掉，他说这不符合规定。他掌握着过冬物资，但他愿意与同志们同甘共苦。他的外衣、帽子永远都是补了又补。冬天，他还穿着草鞋。

毛泽民总是冲到党需要他的第一线，为党的工作增添便利，是他工作的核心。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渡河东征。这是毛泽东为稳定苏区的重大军事举措，毛泽民十分支持。东征需要准备物资，上面的要求是四十天内准备好，毛泽民又忙开了。

任务很明确，二十天内，必须到位：十万斤粮食、五千副担架、两万双军鞋、六十只渡船。

毛泽民负责渡船监造工作。元旦，他随东征将领彭德怀一起进驻黄河西岸的马花坪村，考察东渡地形。河面已经开始解冻，从冰面过河已无可能性，想

要过河必须借助渡船。

黄河东岸，阎锡山知道红军有了渡河打算后，提前拖走了渡船，抓走了船工和水手。他打算用黄河天险挡住红军。彭德怀经过考察，发现如果只造六十条船的话，渡河时间会过于漫长，影响整个东征战略。他告诉毛泽民，“必须造他一百条船”！

毛泽民接到指示，立刻组织人员，砍树，打铁，在黄河的一条小支流上开始造船。他还开始征调水手，组织担架队。

毛泽民是一个开拓者，一切与经济相关的事情，似乎都难不倒他。

他的哥哥毛泽东，则和战友们一起，紧锣密鼓地布置着东征的相关事宜。2月8日，毛泽东来到清涧县袁家沟，侦察渡口情况，督促渡河准备工作。

毛泽民见到大哥，感到意气风发，他是一路跟随大哥走过来的人，他知道，大哥的决定不会错，他隐隐感觉到中国革命即将迎来新局面。

黄河岸边开始下雪了，春天即将到来，瑞雪兆丰年。毛泽东望着天上的雪和地上白茫茫的世界，又有了诗情。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好大的气魄！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兄弟，不正是风流人物吗？

1936年2月12日，毛泽东发布东征命令。20日黄昏，红军开始东渡黄河，晚8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发起东征战役，势如破竹。第二天，毛泽民和负责接收的工作人员随部过河，接收各种缴获的物资。他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地主、拆碉堡，穷苦群众收到了毛泽民安排接济的粮食。毛泽民积极宣传红军的政策，当地农民有不少参加了红军。

东征七十五天，毛泽民就这样在前线忙碌着，他接收的物资，是陕甘边区工作、生活所必需的物资保障。

开采石油与食盐

陕北的生活渐渐安定下来了。

在瓦窑堡，毛泽民和毛泽东住得很近，他们都住窑洞，一个在东，一个在西。

毛泽民住在国民经济部里，毛泽东只要有空就会到弟弟所在的这一排窑洞走一走，坐一会儿，抽根烟，然后背着手，微笑着走出窑洞。当年从韶山冲里走出来的毛家人，到此，也只有毛泽民还能够陪着胸怀广大的毛泽东并肩作战，而且他们之间的分工依旧没变，一个是前驱的，一呼百应的，光芒万丈的领袖；一个是在领袖的背后，踏踏实实、默默无闻做好保障工作的助推力量。

有毛泽民在，毛泽东对于苏区的生活就有了些底气。他知道，大弟毛泽民从小就会理家、理财，苏区的经济问题交给毛泽民可以放心。在江西中央苏区的工作经验已经让毛泽民迅速成长，搞经济，他已经摸出了一条路子。

陕甘宁苏区要发展，首先经济的底子得厚起来。根据苏区的经验，毛泽民首先想到了矿产开发。为了抵御寒冬，毛泽民已经牛刀小试，在安定和永坪两个老煤矿起出了一些煤，保证了陕北群众和中央机关的生活和过冬需求。接下来他打算大干一场。

陕北有石油。班固在《汉书·地理志》里写：“上郡高奴有洧水，可燃。”高奴指延安，延河就是洧水。宋代的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说得更明白：“鄜、延境内有石油，旧说‘高奴县出脂水’，即此也……其识文为‘延川石液’者是也。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自余始为之。”红军长征胜利之前，国民党在陕北已经开始开采石油，只不过规模和产量都不大，因为在国民党看来，陕北的石油存

储量有限,甘肃才是产油宝地。毛泽民并不这样认为,他觉得产量大小尚且不知,退一步讲,即便产量小,开采出来,也足够陕北中央机关和部队用的。

按照老法子,要办事,先选人才。毛泽民调来西北工作委员会技术处党支部书记高登榜,他是本地人,对于本地的情况比较了解,毛泽民就让他做工矿科的负责人,先去探路子。

高登榜速度很快,陕北几个小油矿分布的情况很快就摸清楚了。可毛泽民又得知,中央红军进驻瓦窑堡时,国民党矿产资源委员会的二十多个石油技术人员都被当作反革命关起来了。这可不行。开采石油是一项技术性很高的工作,临时培养人才根本行不通,还得想办法用这些“老人”。于是,毛泽民便提笔给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写信,说明缘由,请求他释放这些技术人员,博古很快做出批示,“同意释放”。

突然被释放,技术员们都觉得莫名其妙,当得知是国民经济部长毛泽民想办法救了他们出来时,技术员们都十分感动。

毛泽民安排这些技术人员洗澡、理发、吃饭,每人都发干净衣服,又调了窑洞让他们住,并给他们放假一周,调整状态,最后告诉他们,如果有愿意留在矿上继续工作的,他表示欢迎。技术人员们纷纷回到了工作岗位。做工作,没有合适的人领导可不行,毛泽民找到了延长油矿原勘探处事务所所长严爽,跟他长谈,让他做油矿技术矿长,领导勘探小组工作。

这便是毛泽民的领导艺术,他自己不懂石油,可只要找到了合适的人选,



★ 1935年,红军解放了有油矿资源的延长县。毛泽民带领大家成功实现油矿复产,不仅打出了原油,还生产出了汽油、煤油、油墨、石蜡、凡士林等产品。图为延长石油厂旧址

就能够让整个石油勘探工作动起来。

很快，延长油矿恢复生产，勘探继续。毛泽民要把油矿变成国营企业，同时还要增强党的领导，他派高登榜做油矿的行政首长和党支部书记。这样油矿在政治上也有了方向。毛泽民学习过大哥毛泽东的经验，毛泽东当初在三湾进行改编，要做到党指挥枪，现在毛泽民则是要做到党指挥矿。

油矿开工了，毛泽民亲自当场给工人们鼓劲、加餐。他没有架子，为人憨厚、实在，他有强大的凝聚力，能够做到凝聚人心。他告诉大家，多出油支援红军，就是打胜仗。

在江西中央苏区，毛泽民有过办钨矿的经验，当时遇到的许多难题在陕北同样会遇到，比如设备陈旧问题，比如技术水平落后问题，毛泽民给出的解决方法一般为四个字：自主创新。连当初印制纸币时造纸都可以土法上马，开采石油有什么不可以呢。没吊车用，就用手摇动辘轳，没有储油罐用，就现砌石



★ 延长石油厂旧址

板池存油。机器太旧，先修，然后改造，锅炉、蒸馏釜、油管，都可以自造，再进一步，还能有发明呢，比如空中套井，比如钢丝打结法。

毛泽民相信主观能动性，只要有革命激情，想尽办法也能把油采出来。

油矿出油了，延长这个小地方也吸引了毛泽东这位中央大首长前来。他率军东征路过此处，不忘来油矿看看——看看油怎么采，采出来怎么炼，他跟油矿工人谈天，了解他们的困难和渴盼，工人们非要请他吃一顿饭。盛情难却，毛泽东留下吃饭了。他们知道湖南人爱吃辣，这顿饭工人们特地放了不少辣椒，毛泽东吃完之后笑呵呵地对坐在他身边的弟弟毛泽民说，这是我来陕北之后吃得最好的一顿饭啰。

从1935年12月到1936年4月，半年未到，延长石油工作就已经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三个月产油约七万斤，每月平均炼油三锅，计共产挥发油约四百斤，汽油两千多斤，头等油两万五千多斤，二等油一万三千五百多斤，超过了国民党任何时代的平均生产额度。产油之外，工厂还附带生产了大批油墨、石蜡、凡士林，不但满足中央机关和军队的工作需要，还有富余能够实现出口，三个月盈余两千多元。

这是全中国仅有的石油矿。

筚路蓝缕，经济战线上，毛泽民始终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因为毛泽民和石油工人们的努力，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们再也不用忍受蓖麻油的小油灯，这种油灯烟灰大，一夜伏案，第二天脸都会被熏黑——毛泽东开始用弟弟毛泽民提供的“洋蜡烛”了。每天晚上，警卫员会在毛泽东的桌子上点上两支，习惯工作到凌晨的毛泽东，总是在这两支蜡烛的照耀下，度过长夜。

1936年5月，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决定西征，打击宁夏“二马”部队，扩大苏区的范围。两个月下来，苏区的边界扩大了四百多里。

边界扩大，财政收支就会更加吃紧，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这一问题更加凸显。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到来让毛泽民脑子里的弦又绷了起来，又该准备一批过冬的衣服了。

不过，边界扩大也有一个好处，新的经济机遇出现了，宁夏、陕北、内蒙古交界处，历来就有食盐、毛皮和甘草三宝，尤其是食盐，如果能开发好的话，将是苏区经济很重要的一个增长点。



★ 为解决根据地缺少生活必需品的
问题，毛泽民根据当
地盐业资源丰富的
特点，提出发展食
盐贸易的具体办
法，指导扶持根据
地的盐业贸易。图
为毛泽民在宁夏盐
池县住宿地的旧址

毛泽民又被派到了前线。他领导的经济工作团，主要工作就是去新区从事食盐生产和贸易，并组织食盐运输和其他农副产品出口。食盐是个好东西，从江西时期起，红军就饱受缺盐之苦，蒋介石搞经济封锁，禁止食盐贩送进苏区，毛泽民就组织大家熬硝，如今到了宁陕交界，这里盛产食盐，毛泽民如获至宝。

八月，正是采盐的好时候，毛泽民带着工作团来到盐场堡，一片洁白晶莹的盐地映入他眼帘，这是大自然的馈赠，陕甘边区，一黑一白，都是宝贝。

毛泽民先定政策。到盐池县之后，他立刻起草了《处理食盐、布匹，巩固苏区金融的具体办法》，并迅速颁布布告：取消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一切苛什盐税，只需缴纳一定的盐价，即可到处运售；各县、区苏维埃政府应帮助群众设立消费合作社或运盐合作社，除按群众需要的数量驮取外，必须多运食盐到白区换取大宗布匹和群众必需的工业品；凡在苏区内出卖食盐、布匹等，一律使用苏维埃币，严禁收取白票（即法币）或现洋，不得故意抬高市价。违者，除予以相当处罚外，立即停止在盐池购买食盐。

毛泽民颁布的不收税政策立刻得到了群众和商人的拥戴。毛泽民跟着接收了盐业公司，组织人员开采盐矿，一个月之内，二三十万驮就被运送到了苏区。

为了保证运输通畅，毛泽民还组织了运输队，启用新的运输工具——大骡子，这种牲口在陕甘宁纵横交错的道路上总是能够应对自如。随着打土豪的深入，边区运输队又缴获了一百多峰骆驼，运输能力更强了。

这个时候边区工作开展得十分高效，一有情况，毛泽民立刻打电报向毛泽东、周恩来等苏区领导人汇报、商讨，盐地开发、布匹购买、筹款、物资运送都是他们经常讨论的问题。

毛泽民在主抓一黑一白两大支柱产业的同时，也开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安源时期，他曾成功出任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到了陕北，他借用安源时期的成功经验，大力开办消费合作社。

望瑶市消费合作社，两个半月就做了七千块的生意，收获纯利润六百元。他优待红军家属，并从赢利中提取公积金、教育基金和酬劳金。

办消费合作社，毛泽民很快有了新进步，在安源经验的基础上，他又逐渐将办消费合作社的办法细化。在领导经济工作的过程中，他力求细致，每次发布告，他都将发布告的目的、措施、办法、要求落到实处，且奖罚分明。比如，收购羊毛时他要求将全区的黑羊和白羊存栏数调查清楚，收购土特产时，他会写明质量要求，药材要干的、绒毛要净的等。

办消费合作社，资金周转很重要。他要求各部门贸易工作进度加快，这样才能够多卖、多购，苏区的生活质量才能较快提高。

过了一些时候，陕甘宁苏区的一些消费合作社，比如谢觉哉领导的西北办事处机关消费合作社已经开始出售肉包子、肉丝面和一些荤菜了。

1936年10月，丁玲来到保安，毛泽东在合作社请她吃饭，主食是白馒头，菜品有猪肉炖土豆、红烧鱼、红烧鸡——苏区的生活水平在毛泽民等人的努力下，逐渐提高了。

斯诺到陕北

1936年6月，一个美国记者经宋庆龄介绍来到保安。

他叫埃德加·斯诺，他是来寻求真相的，九年当中，国民党宣传机器中的共产党形象一直都定格在“无知土匪”“强盗”“杀戮”这些字眼上，但在长征过后，他们强加的这些“定义”悄然瓦解。

还有毛泽东，他是斯诺最感兴趣的红军的领导者，他是那么神秘、传奇。

斯诺来了，走进了陕北，走进了窑洞。

当天晚上，毛泽东就接见了他们。他们的会面很短。斯诺十分激动，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他甚至还没来得及记清楚毛泽东的样子，不过不要紧，他们的见面机会还有很多。

在保安的街道上，他又看到了这个陕甘宁苏区的领导者，他开始仔细观察毛泽东，“他是一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于一般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

他们很快开始了深入的谈话。

7月15日，毛泽东谈了外交问题；隔天，谈日本帝国主义；7月18日，他们谈了内政问题；19日继续谈内政；9月23日谈联合阵线；9月底到10月初，毛泽东主要谈个人的生平和红军长征史……斯诺太兴奋了，这些宝贵的话语，一层又一层剥掉了蒋介石套在红军和毛泽东身上的谎言。斯诺相信毛泽东说的话，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当他第一次踏上苏区的土地，就立刻感觉到蒋介石的

谎言是多么荒谬。这里的民风如此淳朴，这里的领袖跟老百姓一样，穿着布衣布鞋，哪里有什么“吸毒”“卖淫”“私吞公款”和“高利贷”。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是那么诚实、质朴、富于理想。红军战士们多半是年轻人，他们充满活力，因为有信念，每天都生活得十分振奋。

斯诺这样写道：“我和红军相处的四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过那样的感受了。”

苏区也并不是像国民党描述的那样充满饥谨。秋天，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斯诺走过了安静的乡间田埂，穿过芝麻田、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这里没有鸦片烟，禁止贩卖妇女和儿童，这里的妇女可以分一份土地，这里普遍实行免费教育。

斯诺得出结论：“凡我在西北所见到没有什么可称之为‘恐怖’的，而且我怀疑当时根本就不存在‘恐怖’。”这与国民党的宣传截然相反。

国民党还在宣传“剿共”即将胜利，这令斯诺和毛泽东十分诧异。

毛泽东告诉斯诺，自己想要做的是抗日，联合国民党一起抗日，因为日本的力量十分强大，光以现有的力量抗日显然是不够的，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放下个人恩怨和阶级仇恨。他以极其广阔的胸怀，将国家利益摆在了首要位置。

毛泽东胸怀之广大令斯诺震惊。

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在中国西北部的红军，已经成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尽管斯诺是以个人身份来到苏区的，他只是一个美国记者，但几个月的采访后，他已经成为苏区和毛泽东与外面的世界沟通的通道。

10月底，斯诺回到北平，他保持着亢奋，他要写出毛泽东和他的谈话，他要写毛泽东的革命之路以及他对苏区将领、土地、人民生活的种种印象。他在美国驻北平大使馆举办记者招待会。

他的苏区之行，迅速在全世界引起轰动，美国及欧洲的各大报纸都向斯诺发来约稿信——他们太想知道神秘的陕北苏区、神秘的毛泽东的一切消息。

斯诺夜以继日地书写着，《毛泽东访问记》《中国为何要长征》《我去红色中国——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秘史》……毛泽东的形象逐渐从国民党的涂抹中浮现出来，渐渐清晰，这是一名革命者的形象啊！



★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斯诺 摄)

这几乎是一个为中国革命不懈奋斗的圣徒的形象！

斯诺开始写《红星照耀中国》，这是一部全面报道中国共产党、红军、苏区和毛泽东的专著。尽管国民党百般封锁，但斯诺有权利写出他所知道的真相。

《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一经出版，立即引发轰动，毛泽东和他领导的苏区的消息，被称为“被封锁了九年的世界性头号新闻”。《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让西方人认识到了毛泽东，认识到了远在中国西北一隅的共产党人和他们所创造的世界。

共产党哪里是“土匪”？他们分明生机勃勃，充满朝气，每一天都在为中国革命的前途而努力！毛泽东哪里是青面獠牙的魔鬼？他如此儒雅、大气，如此质朴、宽广，在他的映衬下，国民党是如此腐败、堕落、背信弃义。

毛泽东和红军、苏区的故事鼓舞了世界。

他们已经在旧中国打开了一扇红色的窗口，通过它，人们看到了中国的未来。

毛泽东代表着一种崭新的力量。

他已经在改变着中国。

斯诺在采访时给毛泽东拍过一张照片，它已经成为中国革命者的经典形象。照片中，毛泽东的头微微侧过来，剑眉微皱，两眼凝望远方，神态儒雅，整个人散发出一种沉静的力量，仿佛在他身边，根本就不曾发生过那些血腥、残酷的战争，不曾有过那些痛苦与饥馑。

镇静与大气，从他的神态中传达出来。岁月似乎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什么，然而看他的诗、他的文章，却又明显能感觉到他的踏实与厚重——他是一步走过来的。

他是一位诗人，他有巨大的人格力量，而这种力量，使得他能够在中国的大地上书写雄伟的诗篇。

没有任何一位诗人能像毛泽东那样影响了一个国家，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

长征最重要的目的是北上抗日。

长征刚结束不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就开始制定抗日政策。日本已占领东北四年，这一年，他们正积极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蒋介石依旧秉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愚见，奋力“围剿”红军，并跟日本签订了两份丧权辱国的协定。

抗日，刻不容缓！

要抗日，中国内部诸多军队不团结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顾全大局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各地要求一致抗日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1935年11月2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学生运动，这便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爱国学生们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毛泽东举起了“抗日反蒋”的大旗。瓦窑堡，这个中国西部不知名的小地方，一下成为全中国抗日力量关注的中心。

共产党扭转了被动的局面，开始将自己的命运与民族国家的命运融合起来了。

当时围攻陕北红军的是杨虎城的西北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为了争取这两支队伍，毛泽东做了一番布置，他说实话、讲实情，以诚意打动对方。

在瓦窑堡会议之前，毛泽东便和彭德怀一起给杨虎城写信，信中说：“盖日本帝国主义实我民族国家之世仇，而蒋介石则通国人民之公敌。”“是以抗日反蒋，

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屡俱奋，行程二万，所以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

他还给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写信，痛陈东北三省沦丧的历史教训，并愿意缔结长约；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也不打东北军；东北军中只要有愿意抗日反蒋的，不论过去是否打过红军，都可以和红军一起抗日打蒋介石；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而且还分别给予职务或者给回家的路费；负伤的官兵，均和红军伤员一样待遇治疗。

毛泽东是有意谈判的。

11月，毛泽东又和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人九人联名发表《告围攻陕甘苏区的



★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图为瓦窑堡会议旧址

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只要你们不打红军和陕甘苏区，我们愿意和你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并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联合起来，打日本救中国。不论哪一派的军队，不论一军一师或者一连一排，不论从前有没有打过红军和苏维埃区域，我们为着贯彻四年来的抗日救国主张，都一律欢迎同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至于对张学良的东北军，红军更是摆出了十足的诚意。某一天，瓦窑堡城上没有卫兵站岗，城门大开，东北军冲进城内，四下一片死寂，街道上一个人也没有，东北军以为是共产党摆空城计，连忙退出城去，却赫然发现城门的“瓦窑堡”三个字已经换成了“山海关”。

城门两侧贴着对联，上书：此是他乡非故乡，莫把友军当敌军。

东北军再次闯入城去，却看到《中国工农红军告东北军书》，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四下响起了《松花江上》的歌声。

这唤起了东北军的爱国情怀和思乡情绪，国难当头，这么中国人打中国人，有什么意思呢？很多东北军战士哭了。不知哪里用东北乡音喊话：“兄弟们到广场来，参加我们的欢迎会吧！”

这是红军的邀请。

“打回东北去”“联合抗日”，这些共同的目标把天南海北的年轻战士团结到了一起。

大势所趋，不容逆转。抗日，已经是全中国共同的呼声！

张学良对日本是有着家国仇恨的，而对毛泽东，他一方面觉得此人十分神秘，另一方面又十分敬佩。长征的传奇，早已经撒播到全世界，毛泽东像一个巨人般崛起在中国的西部。毛泽东代表着一种新生力量，代表着中国的希望，他与暮气沉沉的蒋介石不同，他是如此亲善和有诚意。

张学良后来谈过长征：“毛泽东这个人啊，天生能领导。都是带兵的，万里长征……我要领，会领没了，他（士兵）不跟你走，他跑了。他（毛泽东）能统御，他有这个力量。”

《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早在1930年去东北采访时，便与张学良一见如故。1935年，这个来自美国堪萨斯城的年轻人决定去陕甘苏区采访，张学良为他去陕北提供了方便。斯诺回来后，对张学良说：“毛泽东绝不像蒋介石

的中央社所宣传的那么狰狞可怕，他不是‘共匪’，而是一个可以给中国带来新希望的人！汉卿将军，你最好也去陕北见一见毛泽东，他会告诉你如何早日杀回东北去为你的老师报仇！”

1936年2月19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贵军与敝军之联合抗日号召全国，必为蒋介石等所深恨，制造谣言以中伤破坏两方团结，实意中事。希望贵方不为奸人谣言所动，威利所屈，坚持抗日联合之立场。特派李克农即日起赴洛川面谈一切。”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从西安秘密飞到洛川，和中共代表周恩来展开会谈，他们“坐谈竟夜，快慰平生”。

这次会谈，为八个月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打下了基础。张学良原本想要见毛泽东，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行，因为见到周恩来后不久，他就发动了“兵谏”。

西安事变：戏剧性的历史转折

张学良在与共产党秘密接触的同时，蒋介石也通过多种渠道与共产党联系。

但蒋介石并不打算联合抗日，他打算对红军进行“收编”。共产党是从大革命失败的旋涡中走出来的，历史给了他们教训，他们当然不会同意这种方案。谈判很快破裂。

蒋介石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剿匪”工作很不满意，他也隐隐觉察到了些什么，他飞到西安“督战”。他还打算把张学良的东北军调去福建，将杨虎城引去安徽，以方便钳制。

这一次，蒋介石打错了如意算盘，他怎么也想不到，一场“祸事”很快就要降临到他的头上。

张学良和杨虎城还在做最后的努力，他们苦苦劝导蒋介石，希望他能够做出让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他们制订了两步计划，第一步是：“苦谏”。

12月7日，张学良来到临潼县的华清池，想要用极大的苦心和诚意劝服蒋介石。东北沦陷，华北名存实亡，绥远告急，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抗日却一味“剿匪”，怎么会有出路。

张学良说得声泪俱下。

蒋介石却丝毫不为所动，他认为张学良是年轻无知，是非不明，缓急倒置。张学良劝完了杨虎城劝，还是没用。

12月10日，张学良又找到蒋介石，实行“净谏”，他说举国上下都要抗日，

蒋介石再不抗日，就要成为民族罪人。蒋介石呵斥了张学良一通。国民党右派坚持认为，“日本不过是皮肤病，而共产党乃是心脏病”。

抗日势在必行，可与蒋介石的对话又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张学良和杨虎城被逼无奈之下，决定冒险实行第二步——“兵谏”。

这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个极具戏剧性的事件。

蒋介石在骊山的半山腰被兵变的士兵捉到——他躲在一块石头后面的乱草丛中，穿着睡衣睡裤，光着脚，一脸苍白，狼狈不堪。

一同“被捕”的还有蒋介石的假牙、斗篷和日记。

张学良当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毛泽东接到电讯，笑道：“元凶被逮，四海同快！”他立刻给张学良复电，准备派周恩来前去商讨。

隔天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说：“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它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它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蒋介石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

保安，毛泽东的窑洞内，油灯一夜一夜亮着，周恩来后来告诉王炳南，“我们一个星期没有睡觉”。

12月19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保安的窑洞里，做了一周来“最困难的决定”——蒋介石因为这个决定保住了身家性命，中国革命柳暗花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提出：“主张南京与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12月24日，蒋介石针对西安方面的六项主张做了口头答复：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离开西北；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蒋先回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蒋意开国民大会；主张联俄联英美。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12月25日，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乘飞机，从

西安飞抵洛阳。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这一天，毛泽东刚满四十四岁。

他率领红军北上陕甘，就是想将红军和共产党放置到抗日的位置上来，他为民族危亡忧心不已。

西安事变，只是让这一切提前了、加速了，它结束了十年内战，使得抗日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主题。蒋介石的“剿匪”告一段落，毛泽东和他的陕甘苏区有了“合法身份”和发展的契机，日长夜大，成为抗日的重要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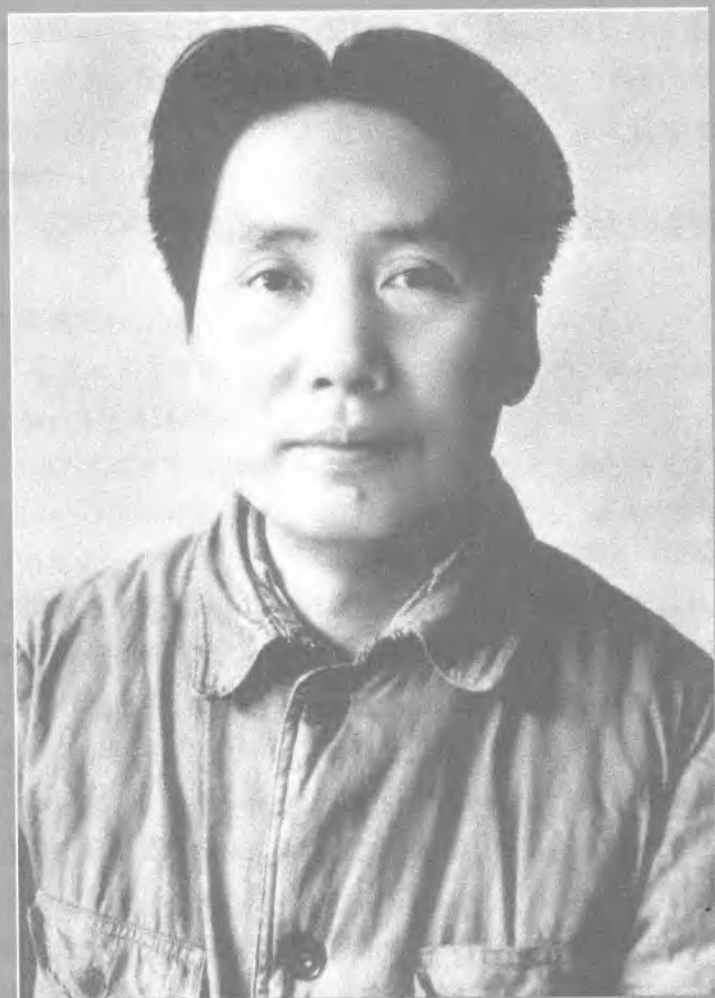
三天后，毛泽东又针对蒋介石的声明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并要求蒋介石“不折不扣”地实行自己的诺言，希望他“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派一致抗日的战线”。

毛泽东看透了蒋介石，他心狠手辣，反复无常，可面对这样的对手毛泽东并不感到头痛，他有一个深刻的比喻：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不愿意上山怎么办，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当然是不愿意抗战的，所以必须拉他、推他、打他。不过，分寸很重要，要拉得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上山了，蒋介石也就抗日了。但是，驴子会踢人，所以要提防它，既联合，又斗争。

面对大事纵横捭阖当机立断，且断得有理，断得得当，这是毛泽东的胆魄和智慧。

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统领下，红军并不介意在名称上“降格”。陕北苏区改称为“边区”，它暂时不再致力于取代南京政府，而是与其并肩战斗的联合力量。

不久之后，中共中央进驻延安。这个西北古城，一下成为全国抗日的中心，毛泽东则是这座城市的领导者。这里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它用其巨大的吸引力，召唤着工人、学生、教授、作家甚至演员，他们从中国的各个地方出发，避开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军队，义无反顾地向着延安前进。



★ 毛泽东 (1940年)

秘密接收巨额捐款

共产国际和国际友人一直关注着中国革命。

长征的胜利，让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在全球声名大震，红军和毛泽东赢得了广泛同情。1936年底，共产国际给陕北汇了一笔钱，经由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转交中共在上海的代表。这笔钱很快到了陕北。1937年3月，苏联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发电报，说已经提供了八十万美元的援助，并表示，随后还有一笔数目相同的美钞会从法国运送到上海。

共产国际的这笔援助，对刚抵达陕北不久财务状况十分吃紧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等于是雪中送炭。

可是，共产国际汇来的美元如果想要发挥实际的作用，还需要兑换成在白区通用的法币，再从上海汇到西安红军联络处，然后才可以分发下去，采办各种红军所需的物资。

上海可是国民党的大本营，一笔如此巨大的款项，又要兑换，又要转运，不引起国民党注意，谈何容易？这必须得派出有丰富的白区斗争经验、懂金融，且政治上过硬的同志，才有可能完成这一项艰巨的任务。

党中央又想到了毛泽民，三者兼具的，除了他，放眼苏区恐怕找不到第二个人。

毛泽东、洛甫、周恩来找毛泽民谈话，重任当前，毛泽民当然听从党的安排。解决“疑难杂症”，向来是他最擅长的，他要帮大哥分忧，而且这笔款子如果能顺利取回，对他领导苏区的财政工作也大有裨益。

中央给毛泽民配了一个班子，一个好汉三个帮，这项财政任务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团队：钱之光，国民经济部贸易总局局长，毛泽民的老搭档；任楚轩，西北银行绥德分行行长；钱希均，国民经济部会计科科长、毛泽民夫人；危拱之，西安红军联络处会计、叶剑英夫人。

4月6日，毛泽民在西安接到中央密电，是通过叶剑英和李克农转给他的：

叶李并转泽民同志：

（甲）你前后共可领款五万元，除一万五千购米外，望以三万元买汽车十辆，专运米送肤施，余款作工资及汽油费用。

（乙）你办完买车事后，即偕希均赴沪，先从小开处领款十万元（绝密），付汉口赵尔六衣账款，须在汉口付，不能由沪汇出，如无法带去，则改运至西安交。

（丙）季壮二十号后可来西安，尔六应先去汉口办米。

毛周林

鱼亥

红军抵达陕北后，吃饭穿衣问题一度严峻，为了解燃眉之急，有时甚至需要向张学良借钱买粮食，财政经济状况十分吃紧。在这种情况下，这笔巨额国际资助就显得更加重要。接到毛泽东、周恩来和林伯渠的指示，毛泽民立即千方百计争取把这笔款子尽快拿回来。

这年年初，毛泽民在延安首印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曾经到上海购买印刷设备，秘密运回延安。

上海的情况不是很好，国民党查得严，日本人的势力也在慢慢扩张。

从上海取钱回西安，毛泽民首先想到的办法是做一个“合法”途径：在西安开个钱庄，然后通过钱庄办业务，分批次将款子从上海打到西安。毛泽民与其他几人配合，迅速在西安找了房子，搭了班子，准备办钱庄。他们以《西京文化日报》发行科长寿松涛、编辑边寻峰的名义，向国民党有关部门提出申请，但因为种种原因，交涉多次无果，只好作罢。

车路不能走，就走马路。毛泽民几人决定，先去上海，再以秘密的方式把钱运回西安。

没多久，毛泽民、钱之光等人先后从延安、西安分别到了上海。他们先做了个合法身份，开纸行，毛泽民化名周彬，做老板，钱希均当老板娘，任楚轩是经理，钱之光做职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十里洋场的富人。徐汇区愚园路永昌里的一处独门独院的三层小楼，就是毛泽民和钱希均租下来的“家”，这么大的一个家只有两个人住有些奇怪，易引人注意，钱希均就把她的侄女钱宛正从浙江老家叫来，充当“用人”，实际做交通员。

“表面工作”做足了，毛泽民和他的战友们开始做款项接收工作。他们从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那儿，一笔一笔地接收款项，款子接收了之后，毛泽民就把它藏在愚园路的住处。具体藏款处，除了毛泽民夫妇外，谁也不知道。毛泽民在白区工作多年，又经历过中央苏区和长征，做保密工作，他十分老到，钱送到愚园路住处，都是钱希均和其他同志单线联系，他们都不能随便进愚园路住所。

钱希均和毛泽民过去曾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那个时候，党给他们每个月十五元做生活费。数年过去，他们重返上海，他们是来接收巨款的，他们表面上也都是老板、太太，但是他们的生活费，依旧是十五元，没有变化。他们没有怨言，省吃俭用。

兑换开始了。每天，毛泽民穿得西装革履出门，他有时兑换法币，有时去买西安银行的汇票，他还不停地用美元买公债和股票，几个来回，最终都变成法币。因为钱数巨大，全部通过银行汇兑会引起注意，所以他们决定一部分通过银行汇去西安银行，另一部分分给大家，采用人运的方式，直接带回西安。

钱之光也是做地下工作的老手，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提着名贵的皮箱，还带着随从，从上海到西安，来回回。

钱希均和危拱之，则扮成军官太太和阔太太，提着箱子，若无其事地接受国民党的出入检查——她们的皮箱大有玄机，上面放着衣服、化妆品和一些紧俏商品，看上去是跑单帮的，其实在箱子下面的暗层，满满地铺着钞票。他们通常坐高级包厢，且分开行动，基本不会引人注意。临行前，毛泽民都会事先通过密电安排好西安那边接站的人，人一到西安，立刻派小车来接，免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风险。

这项工作，他们足足做了四个多月。

“七七事变”后，全国的局势都很紧张，很快，上海爆发“八一三事变”，



★ 1937年，毛泽民完成解款特殊任务后在西安与战友合影。左起，前排：寿松涛、毛泽民，后排：曹根全、赖祖烈

★★ 1937年，毛泽民在西安

这个时候，毛泽民和他的战友们的的工作已经快到了尾声。8月底，钱希均搭李克农的车，从上海到南京，然后坐船去武汉，再转道西安。

上海的风声越来越紧了，毛泽民却迟迟没有离开，全面抗战爆发后，爱国群众给八路军捐了很多物资，他要把这些东西都抢出来。11月，上海沦陷，整个长江三角洲都陷入一片恐怖当中，大批难民逃往内地，毛泽民恨透了日本人，可他不能离开工作岗位，这些物资都是抗日的资本啊！

临危不惧，有条不紊，毛泽民忙碌着。这一年年底，毛泽民终于忙完了全部工作，准备搭火车返回西安，可车厢里全是逃难的人，门被挤实了，卫兵守卫着，如果不坐上这班车，接下来会有很多麻烦。

毛泽民很机灵，他谎称自己是记者，直接爬上车窗，进了车厢。

在1938年到来之前，毛泽民回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抗战的烽火已经点燃，毛泽民完成了取款任务，他知道，这笔巨款，很快就会变成打向日本侵略者的子弹。

·第八章·

涅槃：八年抗战

改编成八路军

自从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随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到达延安后，这个中国西北的古城，就注定成为下一个十年中国革命的圣地和大本营。

抗日，是时代的最强音。

成千上万的青年不断从全国各地拥向延安。去延安，逐渐成为一种时代潮流。这是信仰的力量。

为了安置这些年轻人，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开办了一些学校，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还有著名的“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纷纷在延安建立。

毛泽东经常会去这些学校讲课。

人多了，延安没有那么多房子，毛泽民这个国民经济部长，则号召大家在河谷的山崖上挖窑洞。很多从未做过体力劳动的学生也拿起了锄头、铁锹等劳动工具，和红军战士们一起，开始创建新家园。

这一年4月，一群上海的印刷工人带着印刷机，搭乘红军的汽车，从西安来到延安。4月20日，中共的机关报《解放日报》问世。

这个月，毛泽东出席了团中央召开的第一次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他号召青年团结起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毛泽东的思路也很清晰，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已经让他明白，一定要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到了延安之后，毛泽东有时间对自己一直以来的实践做理论思考，他写了



★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作报告



★ 毛泽东在抗大作报告

两部哲学著作，一部《实践论》，一部《矛盾论》。

毛泽东一如既往地关心着亲人。6月，他得知贺怡和她母亲尚在赣南的消息，立刻给江西党组发电报，希望能找到她们，并安排她们来延安。

两天后，他又与湖南省委联系，请他们在韶山、长沙打探毛泽覃的第二任妻子周文楠和孩子毛楚雄的下落。他还急需知道毛泽建以及杨开慧的保姆陈玉英的消息。他希望他们都能够来到延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这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全中国的侵略。

毛泽东在“七七事变”第二天即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实行抗战。毛泽东代表红军将士请缨杀敌。

抗战的呼声越来越高。

7月13日，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随时出动，到抗日的前线去。

北平失守，天津失守……华北告急！

宝塔山下，毛泽东在商会大会场，振臂呼吁：“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已到最后关头，要立即动员全国各阶层民众联合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斗争！准备出发到河北去！准备到抗日的最前线去！”

8月9日，延安方面派代表飞往南京，参加军事委员会会议。

很快，“八一三事变”爆发，日本人开始以上海作为切入口，攻打长江三角洲。

中共在洛川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洛川会议”。

毛泽东说：“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政策和两个前途，即我们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单纯政府抗战的政策，坚持抗战到胜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叛变的前途。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

毛泽东目光如炬，他总能够抓住时局的关键，抗战一爆发，他就认识到这是一场持久的战争，这是一场必须发动全中国人民共同参加的战争，是人民战争，这是一场可能最终会在统一战线中产生分裂与叛变的战争，这是一场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人民的战争。

洛川会议决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增为十一人，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

2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发出了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

命令指出：“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 中年毛泽东

无可挽回的出走

毛泽民和钱希均乘飞机抵达新疆迪化，时间是1938年2月1日。

他们原本是要去苏联的，但临时接到任务，要留在迪化做统战工作。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项任务——帮助处理家族里的私事。

不久之前，他们的大嫂贺子珍从延安出走到西安，又从西安到兰州、兰州到迪化，即将从迪化乘坐苏联的军用飞机前往莫斯科。毛泽民和钱希均来到迪化，就是受大哥的委托，劝劝大嫂贺子珍，希望她能够留在中国。

毛泽民找到了贺子珍，从情到理都分析了一番，他们谈到了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感情，谈到了去苏联会遇到的困难，谈到了贺子珍目前的身体状况。

可是，贺子珍哪里听得进去呢，她已经下定决心要走，她迫不及待想要去苏联，去治病，去学习，让自己能够“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新的人，然后再回来，继续为革命出力。

红军长征胜利后，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这对每一个人都是考验，贺子珍也不例外。

毛泽东成日奔忙，他要开会、写文章、作报告，一忙就忙到深夜。贺子珍和毛泽东交流的机会少了，他们不再能像井冈山时期那样，可以一起散散步，有时候家里来人，贺子珍又感觉插不上话。她在情感上感到不满足。更糟糕的是，长征中的一次负伤，给她留下了持久的伤痛，她体内还遗留着四块弹片，以当时当地医疗水平，还没有能力将其取出来。而且，她又有身孕了。

贺子珍感到十分痛苦。



★ 1937年春。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

没过多久，她产下一名女婴，因为生下来不到五斤，格外娇小，他们给她取名为娇娇。这个孩子是在长征中怀上，到保安生下来的，毛泽东格外喜爱。但生完孩子之后，贺子珍却有了新的打算。

贺子珍想到了去红军大学进修。毛泽东同意了。

因为身体状况，贺子珍刚入“抗大”不久便被迫辍学。这令她很受打击。

她想做手术，早日把弹片取出来，尽快恢复健康，这样才能够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去。毛泽东已经成为革命的领袖，整日繁忙，贺子珍也不想落后。

贺子珍想到了去上海，上海医疗条件好，有可能治好她的病，当时毛泽民和钱希均刚好在上海执行任务，她去上海治病，也算有人照看。

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劝她别走，他说：“这些年，你跟着我受了这么多的苦，现在情况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让你像过去那样。”

他还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



★ 1937年春，毛泽东、朱德在延安会见美联社记者厄尔利夫（左二）

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我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贺子珍也哭了，但她并没有听他的，她的回答是，“我一定要走”。她要先赴西安，再转道去上海。

1937年10月，贺子珍来到西安，但是，战争的局势已经不是她想的那样，“八一三”之后，上海告急。钱希均已经完成了运送捐款的任务，来到了西安，她劝嫂子贺子珍不要去上海，那里战火纷飞，根本没有条件给她治病。

很快，上海沦陷，贺子珍不得不打消去上海的念头。

贺子珍在西安停留着，十分惆怅。她遇到了张国焘的夫人杨子烈，杨子烈要去延安，她见贺子珍又有了身孕，便劝贺子珍一起走，回延安去。贺子珍拒绝了。没多久，贺子珍又遇到了洛甫的夫人刘英，刘英有肺病，正要去苏联治疗，而在当时，苏联和中共也有协议，一批身体不好的同志可以去苏联一边养病一边学习，和刘英一路去苏联的还有蔡树藩和钟赤兵，他们在战争中负重伤，一个断了一只胳膊，一个断了一条腿。

从他们身上，贺子珍又看到了治病的希望，她要去苏联。她写信给延安，提出了这个要求。毛泽东接到这封信十分担忧，他当然希望贺子珍能够留在延安，

可是，她的脾气他知道，如果现在立刻不同意她去苏联，她的情绪肯定会十分低落，搞不好还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于是，毛泽东跟张闻天商量，先让贺子珍进苏联治病的名单，然后再让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兰州办事处、迪化办事处的同志，劝说贺子珍，争取把她留在中国。

毛泽东还托人给贺子珍捎来一个小木箱，是他请警卫员制作的，里面放着一些贺子珍没有带走的东西，包括她在延安经常切食物用的小刀。这些东西，都是毛泽东亲手放入木箱的。

贺子珍看到这些东西就哭了。她用自己的钱去西安的街上买了一条棉被，托人给毛泽东带去。可是她依旧“一定要走”。

贺子珍在西安待了几个月，很多人劝她回延安，但她坚持自己的决定。从西安到兰州，又从兰州到新疆，她走了一路，同志们劝了一路，林伯渠、谢觉哉、王定国等人都加入到劝说贺子珍回延安的队伍中来，可是，全没用。

多么倔强的贺子珍啊！

那时候苏联和中共没有外交关系，贺子珍去苏联，过的将是寄人篱下的日子，毛泽东深知贺子珍的脾气，他为她担心，她身体不好，不懂俄语，性情急躁，去了苏联一定是困难重重。他还是希望她能够回延安。

可是，到了迪化，贺子珍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 1938年毛泽民（右一）和钱希均（右二）在兰州“八办”



★ 中年毛泽东



★ 195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
六届六中全会上讲话

就连毛泽民和钱希均都没有能力劝她回来。

毛泽民有些愧疚，他没能完成大哥交给他的任务。贺子珍坐飞机走了。这一走，叔嫂再相见，已是1939年6月毛泽民从新疆飞去莫斯科治病的时候了。

贺子珍抵达莫斯科，开始了艰苦的漂泊生活，她给毛泽东写信，说了自己在苏联的情况。见信后，毛泽东及时回了电报，他依旧想让贺子珍回来。

贺子珍婉拒了，她打算在苏联过几年再回去。

她没有料到，自己将为这次的“一定要走”付出一生的代价。

1937年8月下旬，一个从上海来的女演员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进入延安，她叫蓝苹。

贺子珍出走后，她和毛泽东相识了。

1938年11月，她和毛泽东结了婚。

这一年，她二十四岁，毛泽东四十五岁。

她在延安有了一个新名字，叫江青。

领导新疆的财政改革

没能劝服贺子珍出走的毛泽民夫妇留在了迪化。

他们原本是要去苏联的，但是早在毛泽民夫妇抵达迪化之前，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邓发就收到了毛泽东和洛甫发来的电报：

方林：

毛泽民等到否，到时毛即可留任建设厅长，但需改名。

毛洛 廿七日

方林是邓发的化名。2月1日，毛泽民和钱希均抵达迪化，他们住在盛世才的招待所里。邓发告诉毛泽民中央的指示，毛泽民接受了。他的留任，实际上是新疆军阀盛世才提出来的。

盛世才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但他缺乏治理能力，在新疆执政数年，不得其法，财政一片乱象，经济入不敷出，他只好靠滥发纸币维持新疆经济。

盛世才急需一个有理财能力的人来帮助他将新疆经济理上正轨。他看上了毛泽民。

到达陕北的红军，如果想要与苏联接通，必须经过新疆。1937年，红军西路军在祁连山兵败，一部分红军官兵被困甘肃西北，中央为保持通道畅通，接应这批红军入苏或入新，故派陈云去迪化与盛世才谈判。

盛世才有他的小算盘，他虽然通过政变控制了新疆，但其势力还不稳固，

★ 1937年11月底，陈云（前排左一）等从新疆回到延安时，在机场受到毛泽东（前排左三）等的欢迎



他觉得有必要借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力量来稳固地盘。他和陈云谈得比较顺利，西路军的一部分红军也得以进入新疆。1937年9月，共产党在迪化设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邓发接替陈云做代表。

毛泽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留任新疆，帮助盛世才整理财政的。

他化名周彬，在抵达迪化十天后，迅速就任新疆政府财政厅副厅长，10月，又转任代理厅长。

自此，毛泽民在新疆便有了双重身份：对外，他是盛世才政府的高级官员；对内，他是中共新疆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之一。

可是，这个财政厅官员并不好做。

盛世才留给他的的是一个烂摊子。

执政五年，盛世才竟然发行了三百万万两省票，还欠了两千万法币的外债。毛泽民接手时，新疆财政厅每个月月收入三十万万两，合大洋六十万元；田赋征收上来的一半以上的粮食和牛马羊只，平均月值数万元或十万元以上。这个收入已经算很不错了，供给四万人不到的机关部队，若在陕北，大有余裕，可在这里，却欠着大批债务，弄得天怒人怨，无法支持。

市面上同时流行着多种货币，省银票、清代铜板、洪宪银元、南疆喀什地区还发行了“喀票”，各种货币之间，没有明确的兑换比率。

货币贬值非常严重。五百两省银票，在迪化只够买一个饅。半袋子钞票，才能买到一袋大米。新疆政府发薪水，员工都必须赶着马车去省政府拉。

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合理，没有秩序，贪污、腐败、浪费大行其道。

毛泽民倒吸了一口凉气，面对这样的局面，他能想到的唯一的能够尽快解决“乱象”的办法便是大刀阔斧，推翻重来——他打算另起炉灶了——恢复三百万两省票的原来价格，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放眼全世界，没有这个先例，而维持现状，在毛泽民看来也没有可能。

所以，他只能不再发行旧省票，改发新大洋票，将现有的银子铸五十万现银币，做开始时兑现之用。利用三百余万元法币，作为省内与苏联汇兑之用，来改换与稳定新大洋票。并将省银行改组，成为中国银行一样的官商合办，发行钞票归银行。将现存六七千两黄金、三四十万两白银，以及珠宝、玉石等，



★ 新疆省财政厅代厅长毛泽民（1938年）

资本，发行一千万新币，以六百万收旧省票，余做半年补助财政收入之不足。半年后，就可完全求得收支平衡。

改天换地，摧枯拉朽，毛泽民的大手笔，充满破釜沉舟的大智慧。

可是，他的意见，居然没得到盛世才等人的同意。他们还是想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改良，而不是推翻重来。

改革还没开始就陷入了新旧势力的拉锯。

毛泽民找到盛世才，他告诉这个新疆的独裁者：“新疆的财政有两条道路：第一条是有求必应，日夜开动印钞机，无限制地开支，这是一条死路；第二条是紧缩开支，节约使用经费，根据量入为出、重点使用的原则，恰当地发挥财政的力量，这是一条活路。”

盛世才没办法，只好同意了毛泽民的建议。



★ 任新疆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时的毛泽民

毛泽民很快便呈交了《新疆金融工作计划》，确定了“发展经济，增加收入，开源节流，保证支出，量入为出，争取在半年内求得财政收支平衡”的财政计划。

盛世才一个字没改，就让毛泽民的报告通过。

一场金融改革势在必行。

可是，当毛泽民把这些工作计划推行下去的时候，他发现想在盛世才的政府搞改革并不容易。常年的腐败，已经让整个财政厅变成“铁板一块”，财政厅内公务人员积习难改，工作效率低下，用人上也有许多颇不合理之处，这些旧制度老员工却能联合起来，抵制毛泽民的改革。

几个月过去，毛泽民还是“光杆司令”。

他无人可用，邓发那边人员紧张，一时也派不来得力的人手，毛泽民只好给延安写信：“设法给我十个党的干部（赖祖烈、高登榜、郑亦胜三人必须调来，因银行、金矿、海关，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才能很快转变，起得作用）”。

毛泽民又写信给周恩来，周当时在长江局做领导工作，他希望周能派几个得力的会计和银行人员来。

他还向延安方面要了陕甘边区的各种法令和章程，新的旧的都要，财政、银行、金库、国民经济部的新旧章程尤其需要，这样他可以减少一些起草条例时的困难。

乱象丛生，一切都需要他亲力亲为。

1938年11月，延安派出的二十三名干部到迪化，毛泽民有了左膀右臂。隔年2月，党中央又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调来一批可靠学员，都是共产党员，他们进驻新疆财政机构之后，毛泽民的工作更好展开了。

毛泽民的金融改革是从财政机构开始的。

地区和县级单位，他都设了财政局和税务局，并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讲明纪律，他要实现全省财政收支统一。

他创办了新疆财经专修学校，并亲自登台讲课：“作为统计人员，不要只是把一些数字汇集起来就算了事，还要根据统计资料，发现和分析问题，最后解决问题。”

他按照原定计划，改组了新疆的省银行，发行了新省币，首先废除“两”，改“元”，让新疆的货币制度和内地保持统一，这样有利于新疆与内地的交流沟通，促进新疆经济发展。

为了让民众对新发行的货币有信心，毛泽民向盛世才提出，借全疆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开一个银行金银财宝储备展览会。盛世才一听是个好办法，立刻答应了。

1938年9月，金银展览会准时召开了，省政府掌握的金银财宝，包括民间的一些财宝，都被拿出来展览——这是为了让大家相信，新发行的货币，是有坚强的经济后盾的，完全可以放心。

展览会结束后，大家信心大增，成立了一个新疆商业银行筹备委员会，毛泽民被公推为第一任理事长兼发行委员会委员长。

他草拟了《新疆商业银行章程》，得到批示后，《新疆商业银行招收商股启事》在全疆公布。

新疆商业银行设立了三级机构，有总行、分行和办事处。银行还实行认股，发行了十万股股票，银行资本也因此增加了一倍，从原来的二百五十万股增加到了五百万股。

1939年2月1日，商业银行开始在新疆全省发行新省币，分为拾元、伍元、叁元、壹元、伍角、叁角、贰角、壹角、伍分、叁分，共十种面值，背面有毛泽民的签字，他当时化名为周彬，大家都以为签的是周彬，实际上，那是“毛泽民”三个汉字的反书。

这是毛泽民第三次在货币上签名，也是最后一次。

《新疆日报》上发了一篇《商界同胞维护新纸币宣言》，称这次纸币发行，“是新疆经济史上空前的统一币制的新纪元”。

币制统一了，可新货币需要维护。相对新省币，国民党发行的法币还是比较强势，毛泽民则开始让新疆财政厅和商业银行采取共同措施：准许用法币购买公债、向商业银行入股，准许在哈密缴纳税款，但不许法币在市面上流通。省政府再用这些法币去陕甘等省，采买商品进疆。

这样一来，法币便逐渐收归到省财政部，并最终在外省购买了商品。没过多久，法币在新疆市场上就几乎绝迹了。蒋介石得知，来电质问：法币是国币，为什么新疆不能流通？盛世才十分慌乱，他推诿给毛泽民。毛泽民可不怕蒋介石，他不卑不亢回答：“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维族人大多不认识汉字，也不会使用法币，同时假法币已来到新疆，维族人也分不清真假。如果要在新疆流通法币，那就必须在法币上加印维文。”蒋介石哭笑不得。

新币兑率合理，价值稳定，使用方便，广受欢迎，群众再也不用拿着大布袋去买东西了。迪化街头的维吾尔族同胞，每当收到新币，都十分高兴，他们会将新币攥在手心说：“周厅长亚克西！”

为了提高新疆财政收入，毛泽民还使用了他的老办法，开发矿藏。新疆阿尔泰山金矿资源丰富，毛泽民便成立了金矿总局，在伊犁、水西沟、阿山等地开设分局，积极组织金矿开发。如若个人挖到金沙，除缴纳课金外，可以卖给政府，这一政策刺激了民众的淘金积极性。与此同时，他还制定了《新疆省限制金银出境暂行办法》，限制出境人员随身携带的金银重量，金饰品不得超过二两，银饰品不得超过五两，这就保证了开采出来的金银不会大量外流。

到了1939年年初，新疆的财政状况已经有了很大好转，金融危机度过了，货币制度统一了，基本物价大跌了。黄金从1938年年初的一百二十万两跌至四十七八万两，小麦从十八万跌至五万两一石。

1939年5月，毛泽民还为新疆制订了第二期三年建设计划。他要求财政部门，“切实执行预算纪律，尽力节省，不超支，不浪费，使每分钱的收入必须用于经济生产事业”，“应集中一切力量，加速各项经济事业之建设，生产机关扩大生产，经济机关发展业务”。

毛泽民还提出削减军费开支。过去，盛世才部队的开支要占全新疆总支出的百分之三十。毛泽民提议，部队自身也开始展开生产，种植粮食，如果能调动起部队自己的力量，不出三年，部队就可以自给自足。

这个计划立刻遭到军政界人士的反反对，盛世才也觉得这么做不妥。毛泽民给他举延安大生产运动的例子，盛世才将信将疑，他派人去延安视察，见一切属实，才终于不得不接受毛泽民的意见。

毛泽民还缩减了盛世才的特务部门的预算，将这部分钱用于对群众有利的地方，他主持修路、建桥、修建居民住宅区等民生工程。

毛泽民硬是凭借出色的智慧和魄力挽救了新疆经济的败局。

可是，就在毛泽民的统战工作做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与钱希均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经过组织批准，他们离了婚。不久，钱希均回到延安。

1939年春，盛世才主持召开了新疆省政务委员会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省财政预拨款。

新疆的钞票不值钱，可新疆省政府的会议厅却很“洋气”，欧式的长形会议

桌，几十把高背椅上坐满了各种神态的政务委员。

盛世才来了，他说话很简练，但有点口吃：“先生们，现在开会。请财政厅代……代厅长周彬作报告。”

毛泽民就是周彬。他有一双圆圆的大眼睛，其中又有几分复杂，又含着悲悯。他说着一口湖南话：“今天我向大家汇报，为什么我省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崭新的预算决算制度。”

会场鸦雀无声。大家都听，听完之后，依旧冷场，一点动静都没有。因为既然是盛世才请这位周彬先生来作报告，这些政界的老手，在没听到风头之前，都不愿意贸然发表意见。

这个时候，桌子那头，一个年轻又端庄的女委员站了起来。

她落落大方地说：“我同意周厅长的意见。新疆省应该和其他省一样，有预算决算制度。当然建立很难，可我们新政府有六大政策，一定会得到新疆各族百姓的支持，也会得到督办和各位的支持。如果不建立预算决算制度，那和以前的新疆军阀有什么区别呢？”

她的话音一落，会场里立刻炸开了锅。各种声音都有，认可的、怀疑的，还有观望的。

盛世才摸着圆圆的下巴，站起来表态：“周厅长关于建立预决算的事，给我谈了不下七八次。周厅长的报告对我们来讲是个新东西，问题是按旧的一套做，不搞预决算，入不敷出一天天厉害，新政府早晚会垮台。”

盛世才一表态，大家就都顺水推舟，预决算方案就通过了。

这位女委员叫朱旦华，半年前刚来新疆工作，在迪化女子中学做教导主任，她和毛泽民并不认识。但她就是拥护他，因为他对，他的意见好，她坚决支持，即便他们不认识，也没有来往。

毛泽民欣赏这位女委员的勇气，也非常感谢她的支持。这次会议，他们算见过面了。

没过多久，朱旦华接到“八办”的通知，要她去一趟。到了地方，“八办”主任邓发刚好在。他拿出一封信给朱旦华看，又问：“小朱，你今年二十六七岁了吧，有爱人没有？”

朱旦华摇了摇头。她在上海、在延安听到这样的问话多得很，习惯了，心中自有主意。



★ 朱旦华（1935年于上海）

邓发说：“我想给你介绍一个同志，好不好？其实这个人你见过面。周厅长，你认识吧？”

朱旦华十分诧异，问：“新疆省财政厅代厅长周彬是我们的同志？”

邓发说：“今天我介绍你一个不认识的人，毛泽东的大弟弟，哦，不认识吧？你听说过长征有架印红军钞票的机器吧，管这架机器和整个红军金钱的人就是毛泽民同志。毛泽民是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到延安后又是边区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今年2月经迪化到苏联治病，他有很严重的胃病和腰椎病。2月1日从兰州过来，不巧中苏边境发生传染病，交通中断，盛世才邀请他留下来帮助整顿财政。经党中央同意，毛泽民同志留了下来，先担任省财政厅副厅长，10月被任命为财政厅代厅长，化名周彬。二十年代毛泽民在上海等地搞地下工作，曾化名叫建业，老布尔什维克了。”

朱旦华恍然大悟，原来周彬就是毛泽民！她想起不久前那次预算决算会议，周彬那胸有成竹、无所畏惧的样子，原来他是毛主席的胞弟啊！

两人正说着，毛泽民推门进来了。

毛泽民问邓发：“你找我？”

邓发笑道：“你们两个，该不用我介绍了吧？”又说，“今天我帮小朱洗碗，哪天小朱要请我吃酒。”

邓发掩上了门，做了一个不年轻仍那么顽皮的鬼脸。

毛泽民憨厚一笑，说：“听方林（邓发的化名）同志介绍，你读过不少书，能写会唱。我没有读什么书，人又笨，很怕配不上你。”

朱旦华没好意思说话，起身给毛泽民倒了一杯滚烫的热水。

时间是1938年初冬。

爱情来得很突然，但却无比真挚。1939年晚春的一天，朱旦华和毛泽民去红山嘴散步，毛泽民第一次向朱旦华讲述了自己的身世。他是那么艰苦、那么执着，那么坚忍，朱旦华被眼前这个饱经风霜又饱含魅力的中年男人打动了。

他们相爱了。

可是，毛泽民的身体状况却不容乐观，西北寒冷的气候加重了他多年的胃病、鼻炎、神经衰弱，出于对他健康的考虑，中央决定安排他去苏联学习治病。事实上，自从他入党以来，他曾有六次机会去莫斯科学习、治病，可因工作实在太忙，一再延后。

1939年5月，他终于暂时推掉冗务，开始了他期盼已久的苏联之行。

毛泽民的苏联之行

毛泽民到苏联之后，住在莫斯科柳克斯宾馆十号房间。这是共产国际用来接待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特殊机构。毛泽民在苏联休息了八个月，多半住在这里。

这是他一生中相对平静的时光，但他在这里并没有完完全全地休息。他1921年入党，随着中国共产党走过了几十年的奋斗历程，他是一名著名的中国革命家，他深知中国革命的来路、现状与前途，再加上他在共产党和苏联的交



★ 在苏联学习、治病时的毛泽民

Л. 855. Личное дело № 3448

1) Владелец паспорта Мао-Цзе-Тун 14

2) Прибыл в СССР 25.5.39 г.

3) ☒ дал разрешение на выезд

4) Где работает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5) Паспортная фамилия Тун-Фин

6) Кинг паспорт № 0424

7) Кем выдан

8) Когда выдан 11.5.39 г.

9) Действителен по

Приложение (ж, з, в, к)



★ 毛泽民进入苏联的护照

★★ 柳克斯饭店临时通行证上的毛泽民照片

通要道新疆做得如此出色，又是毛泽东的弟弟，因此，共产国际对他很感兴趣，他们希望通过毛泽民，能够更多地了解到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

毛泽民抵达莫斯科不久，周恩来也来了，他是为了治疗臂伤，另外一起来的还有李德，他是曾经控制了江西苏区军事领导权的国际军事顾问。

共产国际需要知道中国的情况。毛泽民很快写了一份报告提交上去，这份报告是刘亚楼、林彪和毛泽民三人联合署名的，主要谈了红军在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情况。

一份报告毛泽民觉得说不清楚，他觉得自己有义务把当时的艰难情形告诉共产国际的领导，他提笔给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写了一封信，谈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谈了国共两党战争的情况，尤其对党内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批评。

他戳破了王明曾经向共产国际的错误汇报。他质问王明：“1931年至1934年，由于李竹声的叛变，白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1934年，白区的党员怎么会有六万名呢？！”他看了共产国际前领导人米夫的著述和王明的报告，十分愤怒，因为其中充满了谎言和欺骗。

毛泽民在报告中写道：“我不知道王明同志从何处得到的这些材料。如果这些材料的依据是上海党组织的报告，那么，这些材料毫无疑问是虚假的，是不可信的，因为上海党组织当时被叛徒李竹声控制。如果是这样，王明同志是被叛徒欺骗了。如果王明同志被叛徒欺骗了，那么他也欺骗了马努伊尔斯基同志，因为马努伊尔斯基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说，他是根据王明同志提供的材料写的。总之，中国共产党代表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都被李竹声这个坏蛋欺骗了。”

革命风雨洗礼多年，毛泽民已然是个成熟的革命家，他的报告，中肯、务实、理性，他很冷静，共产国际一直以来算是中国共产党的上级，但因为沟通不畅和某些人的私心，上下的沟通一直不太通畅。这曾经给中国革命制造了很多困难，有好些次，几乎将中国共产党组织推向了悬崖边上。

来到苏联，毛泽民有了时间和空闲能够安静地反思中国革命的十年路。他深刻地感到，在这十多年间，中国共产党虽然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和挫折，但它依旧是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强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研究党的历史，他发现中国共产党原先并不是像联共（布）这样的党，有



★ 1939年6月，毛泽民赴苏联治病、学习。图为毛泽民在苏联留影

列宁等领袖的领导，长期以来，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是陈独秀、李立三、博古、李竹声、张国焘等机会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正因为如此，党内失去了民主原则，丧失了对党员的教育工作，压制了优秀干部的主动性，结果使破坏分子得以长期把持党的领导工作。

毛泽民这样写道：“每一个真诚的党员都不会，也不应当忘记这些！值得尊敬的是那些真诚、忠实的党员，过去，他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极大的精力完成了党赋予的工作，为了党的利益勇敢向前，在任何牺牲面前都没有停滞不前，但是，他们普遍患有一种病：极少关注对上级机关的监督、关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血的教训告诫我们，在关注局部实际的工作的同时，应提高每个党员的政治和阶级警惕性，这是在今后应努力加强的。”

毛泽民有很高的政治觉悟。虽然他是毛泽东的亲兄弟，很多党内的重要事件，毛泽东却从未告诉过他。为了避免嫌疑，毛泽东也从未跟毛泽民谈过党内的斗争。他所知道的，是他从多年观察和实践中得到的。他从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

毛泽民来到了共产国际的大本营，沟通的障碍少了，他觉得自己应该实实在在地说出一些真实的情况。

他仔细向共产国际汇报了陕甘宁边区的现状。他的分析无疑是详备的：

这片区域面积似乎不大，但实际上是广大的空间，多山地，地貌复杂。陕西西部和宁夏东部缺水，无法为部队建设营房。

从经济观点看，蒋介石并不想得到该地区，因为这个地区不会为他带来收入。

从政治上看，边区当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对于全中国具有很大的政治前途，大批学生和青年人从各地来到边区，他们在这里改变生活，组织新的生活，他们亲眼见到了共产党人的工作。共产党人在边区培养了成千上万的新干部，这里有学校，如抗日军政大学等。如果没有边区，就很难解决培养干部的问题。

边区在推行民主化方面做出了表率。许多访问边区的人，不管是调查委员会，还是其他军队代表，都承认边区的工作开展得很好，有些被作为范例。边区给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过去有人说中国共产党是土匪，只会搞破坏，但现在，事实胜于雄辩。

边区建立了坚强的群众组织和游击队，民众拥有老式武器，平时他们从事生产，战时组成武装支队。因此，边区是巩固的。边区在地理位置上得到了很好的防护，也储备了相当多的粮食。边区没有绅士，即旧的官员，没有各种非

法税收，流通的是法币。八路军依靠民众生活，民众支持八路军。

新疆盛世才的情况也是共产国际关心的。毛泽民谈到了他对新疆政局和盛世才的看法：“以布尔塞维克的眼光看，盛世才的为人，是很不好的。但是今天的统一战线，他在苏联帮助下保存了新疆没有入帝国主义手中，今天还想与苏联和中国弄好，就应该尽一切可能去弄好。”

他的分析无疑是客观的，与狼共舞，但绝不怕狼，而是要从狼那里得到一些好处与平衡，这就是共产党人的胆魄，而他的这一点特质，不是跟他的大哥毛泽东很像吗？毛泽东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多年，也是希望从平衡中找到新中国的未来。

在苏联，毛泽民写了不少材料，其中《个人简历》透露了他的身体状况的



★ 1939年，毛泽民（左）在苏联养病时留影

详细情况。

他到苏联治病，主要治疗三种病况：一是耳鼻喉炎，这起源于十年前，1939年春天特别加重，对说话都有影响，尤其不适应北方大陆性气候的冷空气，一遇到这种冷空气就容易得感冒；二是肠胃炎，他的胃部常不消化，有时会呕吐，大便三五天一次；三是神经衰弱，思维力衰退，记忆力变差，用脑多时，神经即胀痛。

他希望这些病症都能在苏联得到及时治疗。

在苏联，他还想要多学习。

首先是学习理论知识，他自认为自己的理论水平不够，渴望多学一点马列理论。

其次是学习金融知识。他自己是做金融工作的，他希望在苏联多取取经，抗战胜利后可以在建设祖国时发挥作用。

他给共产国际干部部部长马特维洛夫写信是这么说的：“中国是处在一面抗战，一面建设的特殊情况中。同时，必须加紧后方的建设，才能更有力的去战胜日本强盗。要建设，必须有建设的知识，并且在这种建设中，中国党负有特别重大的使命。那末，中国的共产党员必须从此开始建国的学习。”毛泽民的这些要求基本得到了满足。

因为治疗时间太短，他的病只能采取保守治疗的方法，但也稍微得到了缓解。至于学习方面，他则在库奇诺中国党校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他学习了联共（布）党史，听了专家的讲座，在明亮的自习室看书，写读书笔记。

库奇诺距离莫斯科市区不远。毛泽民拜谒了列宁墓，参观了博物馆，游览了风景区，精神得到了一定的放松，他看到苏联的种种蓬勃景致，也开始畅想中国的未来。

改变新疆的落后面貌

1939年冬天，党组织批准了钱希均去抗日前线和离婚的请求。这个时候毛泽民还在苏联。1940年2月5日，毛泽民从莫斯科返回迪化。动身离开莫斯科时，杨至成准备从苏联经东北回延安，那是一条安全交通线，他见毛泽民气色不太好，就劝毛泽民跟他一起从东北回延安休息一段时间。

毛泽民谢绝了。他十分关心新疆的情况。

在迪化，毛泽民的个人生活和周围大环境都有了很大变化。“八办”主任邓发已经回到延安，他的职务由中共元老陈潭秋接任。

邓发的离开，标志着中共与盛世才的关系开始恶化。盛世才加紧了对共产党人的监控，他在每个共产党员身边都安插眼线，随时向他汇报，他十分惧怕共产党在新疆有所发展。

二战爆发后，国际形势十分严峻，盛世才想要趁势而起，他的态度变得更强硬，陈潭秋到任后，几次约见盛世才，他都找借口推托不见。

但毛泽民的生活中也不是完全没有亮色，这一年5月，他和朱旦华结了婚。他们早在毛泽民去苏联前就已经订婚，现在是补办婚礼。

刚回新疆时，毛泽民依旧担任财政厅代厅长。他继续深入改革，开始整顿税收。

新疆税收中最主要的是田赋和牧税。可盛世才以往在征收田赋时，名头很多，且清丈土地不清，导致田赋成为一笔糊涂账，土地纠纷很多。毛泽民为了清理这一弊端，草拟了一系列文件，包括新的田赋章程，官产（房屋）收入条例，

并且进行验契、丈量土地、核实户数。

他电令全省税务局，开始查田，“从速商请各县县长进行，勿畏困难与艰辛，努力完成上列政府整理与体恤之意，下克本身征收之困难，希即遵照办理，报财政厅”。

为了及时清查土地，他制定出了三种办法：一是请群众自报数目；二是发动群众检举；三是被检举的，需要经委员会认可，然后登记。

至于牧税，毛泽民则一改过去按照户头计税、不按照牲畜多少计税的弊端，坚持执行新的税收制度，取消包税制度，牧税按饲养牲畜的头数计税。这样一来，就避免了牧主对穷苦牧民的横征暴敛。

在新疆，毛泽民还开始了印花税的改革。印花税，是指对因商事或产权等行为所书立或使用的凭证征收的税。在毛泽民开始整顿之前，财务人员对这种税收认识不明，且积极性不高，导致收上来的税微乎其微。为了扭转这种情况，毛泽民签发了通令，要求各地分局对印花税进行推销，并派人下去挨户检查，积极扩大财政收入。

当然，毛泽民制定税收政策是有分寸的，该收的收，不该收的，他会予以取消。他取消了不合理征收的样粮、民粮、鸽粮，核减了南、北疆因灾荒歉收的田赋额粮，免征储蓄冬草搭盖冬窝的牧税。他还严禁军政机关要求群众捐款。

毛泽民还整顿贪污，有政府人员贪赃枉法、侵吞公粮、吸食鸦片等，绝不姑息。

毛泽民取缔了特权机关的“小金库”，这是开源节流之必需。公安、司法和军事机关粮服处是新疆的“地头蛇”，他们有小金库，在省内是公开的秘密，毛泽民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也显示了他的决心。

在去苏联治病之前，毛泽民就帮助盛世才制订了新疆发展的三年计划，等他回到迪化后，正好赶上计划执行。他要求全疆各个机关地财税局支出的款项，由财政厅拨付，在预算内按照规定的数字领取。

军费也是一样。他主持起草了《各机关严格遵守预算纪律的办法》。他强调：“切实执行预算纪律，尽力节省，不超支，不浪费，要使每分钱的收入必须用于经济生产事业。应集中一切力量，加速各项经济事业之建设，生产机关扩大生产，经济机关发展业务。”军政各机关的费用较过去都有所减少。

为了将计划中的建设付诸实施，毛泽民还主持了建设公债的发行工作。省建设公债发行定额五百万元，有奖无息，按票面十足发行；以本省田赋收入为



★ 新疆省政府1941年发行的建设公债

偿还基金，每年初签还本给奖一次，期限十年还清，省财政还本和奖金数额拨交商业银行专款存储备付；建设公债准许自由买卖抵押；中签中奖的债券可以抵纳一切省税。这是新疆历史上第一次发行公债，对新疆的建设大有裨益。

为了扶持农牧民的生产，毛泽民还要求商业银行向农牧民发放贷款。为了确保贷款确实发放到农牧民手中，而不被官员从中渔利，他制定了一系列发放办法，官员只是做担保，贷款则直接发放给安分守己的农民。

毛泽民对农业生产也有很多好的建议。他建议垦荒、修水利、建牧场、修羊圈、培训兽医等，并以商业贷款做配合，这样贷款就方便到了更广阔的项目当中，造福新疆人民。

毛泽民任职期间，他积极发展工业，努力改善新疆的落后面貌。他在新疆组织建成了一批工厂，比如炼油厂、金矿、发电厂、面粉厂、汽车修理厂等，组织修建了公路和长途电话。与民生有关的工厂也修建不少，电灯厂、肥皂厂、火柴厂、造纸厂、印刷厂、毛纺厂、针织厂、食品厂、罐头厂等等。

过去新疆有很多私人当铺，对群众盘剥比较严重，在毛泽民的支持下，省商业银行创办了公济当，开展典当业务，实行微利、延长当期、期满后尚可续当的政策，便民、利民。

毛泽民的工作做得风生水起，可这却引起了盛世才的猜忌和怀疑，他担心毛泽民羽翼渐渐丰满，不好控制，1942年7月，他借口毛泽民身体不好，需要半休，把他从财政厅调去了民政厅，担任代理厅长。

对于这一人事调整，毛泽民安之若素，他太了解盛世才的为人了，他从未对这个新疆军阀有太多幻想，到民政厅之后，他立刻投入工作，他想要为新疆人民做点事。

毛泽民开始进行调查，当他发现，社会最底层的鳏寡孤独的生活状况之后，他决定先从整顿救济院入手。

8月上旬，烈日炎炎，毛泽民来到迪化市的一所救济院，这里房屋简陋，老人们衣衫褴褛，面容憔悴……毛泽民拉着老人们的手，感到万分痛心，他问老人有什么意见和要求，然后拿本子记录下来。

毛泽民调查了不少家救济院，将情况综合起来，经过分析，他拟定了一份《各区、县救济院整顿大纲》。这份大纲，对全新疆救济院的分布、收贫民的标准、经费给养保障，以及对救济院贫民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娱乐等，都做出了明确规定。随后，毛泽民又签发了《救济院贫民管理及办事细则》，帮助救济院修缮房屋，购置被褥和毛毡。他组织救济院里的贫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这样一来收入增加了，生活也能得到改善。

毛泽民无意中在迪化充当了穷人保护神的角色。他的精神力量，充满感召力。

在他的带动下，一些官办社会团体也开始兴办儿童福利事业，办孤儿学校，为流离失所的孤儿做一些事情。

毛泽民在新疆还做了一些防灾工作，他曾组织人扑灭蝗虫，保证农牧业的收成。他还积极备荒，用合适的方式方法向农民借粮。

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黑恶势力横行，很多区、村的行政组织，都被这些黑恶势力把持。毛泽民则决心“打黑”，他要让基层的权力重新回到穷苦的农牧民手中。他亲自修订并颁布了《新疆省区、村制组织章程》，推行民主政治改革。他在各地培训干部，编写《区、村长须知讲义》，他将陕甘宁苏区的民主政治经验，推广到新疆来。

主管民政之后，医疗卫生事业也是毛泽民关注的重点。1942年，新疆西部各县暴发大面积伤寒，这是一种传染病，必须及时采取防疫措施，毛泽民迅速组织了医疗队，亲自指挥工作。因为太过劳累，他病倒了，心慌，气喘，写字

都吃力，可他还是在枕头上写了《给全疆医务人员的信》，鼓励他们加强防疫措施，保护群众安全。

在苏联休养了几个月的身体，根本不足以支撑毛泽民如此高强度的工作，他的阑尾炎后遗症一再发作，一旦过度劳累，伤口就会红肿，他为了继续工作，就干脆在肚子上绑一条带子，勒紧，这样就可以暂时忘记疼痛。

他的呼吸道也越来越不好，经常咳嗽，鼻炎屡犯，说话总是瓮声瓮气，可这一切都挡不住毛泽民为新疆人民工作的热情。他总是说：“能为新疆各族人民多做一些工作，是我最大的快乐。”

新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热爱“周厅长”，都说“周厅长”好。

可越是如此，盛世才对毛泽民就越不放心。随着世界战争局势的变化，毛泽民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了。

毛泽民一家被软禁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德国实行“巴巴罗萨”计划，迅速占领苏联波罗的海沿岸加盟国，盛世才“审时度势”，他反共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了。蒋介石及时对盛世才进行了拉拢。

其实，对于盛世才的真面目，毛泽民和一些共产党员早都了然于胸。

邓发在跟陈潭秋交接班时说：“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有野心的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盛世才革命是不可靠的，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盛世才开始了反共的步伐，他先将矛头对准了毛泽民。

1941年秋天，经盛世才批准，毛泽民去迪化城东北部的风景区水磨沟养病，财政厅秘书郑亦胜来看他，拎着一些哈密红鳊鱼，他们一起欣赏风景，一起吃饭，很晚才散去。盛世才派来的特务发现了这一“情况”，立刻向盛世才汇报。盛世才得知后，说他们这是在举行“秘密会议”，要求毛泽民立刻离开水磨沟，回城另找地方休养。

1942年1月，盛世才突然决定组建一个三十人的审判会，宣称要审判“杜重远阴谋暴动案”。这一案件1940年就经盛世才炮制出炉，原因是，作为一名进步人士，杜重远宣传进步，推动民主，宣传抗战，这是独裁者盛世才不想看到的，随着他与苏联的关系恶化，他想要投靠蒋介石，而去除新疆的“红色”氛围，他首先要除掉这些“绊脚石”。他在新疆抓捕了近千名进步人士，无论谁求情都不肯把杜重远放出来，而现在，他却要重重审判，并请毛泽民参加审判



★ 1941年，毛泽民
在迪化风景区留影

委员会。

盛世才的目的很明确，他就是想让共产党员也加入到反苏活动中来，这样他就更加有理由反苏了。毛泽民等共产党员当然看得透盛世才的用心，经共同研究，他们决定在审判会上尽量少发言，同时审判要求证据，合适的时候可以用证据戳穿盛世才的阴谋；审判书上轻易别签字；若不得不签字，也要在旁边写明自己的立场。

盛世才的阴谋没能通过法律的检验，他只准受审人在口供上签字。毛泽民等人把自己要附加的意见写一份书面材料交给盛世才。盛世才恼羞成怒。

迪化的气氛愈发压抑了。

一个突然的事件令新疆的局势更加恶化。

1942年3月29日傍晚，盛世才的四弟盛世骥在家中被杀。盛世骥曾留学苏联，主张亲苏，他对哥哥盛世才与蒋介石过往甚密十分不满，他经常当面批评盛世才，提醒盛世才不要与蒋介石搞得火热。

渐渐地，盛世才怀疑自己弟弟也是共产党。他为了诬赖苏联和共产党，除掉异己，投靠蒋介石，组织暗杀了盛世骥，然后又逮捕了弟媳，逼迫她承认是自己刺杀了丈夫。紧接着，又将这宗案件和共产党联系起来。

盛世才的变脸，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已经有所觉察，他们向中共中央请示

驻疆共产党员的去留问题。

7月2日，已经无法开展工作的毛泽民向盛世才提出辞职。

7月5日，中央来电，同意除留下四人外，在疆一百三十六人准备撤回，因由兰州、西安回来无保障，中央正向远方交涉，向苏联撤退。新疆党组织拟定了分三批撤退的计划，谁知中途又出现差池。

那时王明的父亲和妹夫都在新疆任职，他们不愿意马上跟着撤退，“八办”负责人陈潭秋反复向中央请示，等候王明的意见。可是，王明的父亲却私下跑去找盛世才求情，说他不离开新疆。由此，盛世才掌握了共产党要撤出新疆的消息，加快了反共投蒋的步伐。

蒋介石积极拉拢盛世才。1942年8月29日，宋美龄抵达迪化，盛世才亲自到机场迎接，握手寒暄，合影留念。宋美龄的随从们在迪化疯狂抢购，苏联战前输入的呢绒、哔叽、花布、食品、化妆品、糖果、白兰地、玩具、照相机、手表等被他们一扫而光。一车一车地拉运，令市民侧目。

宋美龄走后，蒋介石派人与盛世才进行了谈判，很快勾结在一起。

蒋介石调军由兰州进驻安西、玉门，牵制在哈密的俄军；委派外交代表到迪化，将新疆的外交权收归中央；盛世才立刻请苏联老八团退出新疆，“肃清”新疆境内共产党。

这是一场见不得光的黑色交易。

盛世才逐渐收紧他那罪恶的网。

毛泽民早有心理准备，他对警卫员王发浩说：“小王啊，你要注意，我很可能遇到不测的风云。你比较年轻，你要注意自己，要和其他同志保持联络。”

宋美龄走后没几天，盛世才就跟“八办”的人“打招呼”，要将中共全体在新人员，共一百多人，分在两处“保护”。航空队的三十多人集中在小河沿一个旧兵营里，其他人全部集中在八户梁大院临时“招待所”。

毛泽民一家即被软禁在八户梁大院。

8月底9月初的一天，晚饭后，天已经黑了，方志纯——方志敏的弟弟，1925年参加革命，跟着方志敏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他和毛泽民早就认识，1933年，他们都在中央苏区工作，1940年毛泽民去苏联治病，和方志纯住一个房间，两人友情深厚——他在这一天邀请毛泽民出来走走。

毛泽民的性格原本活泼，但到新疆后，逐渐变得寡言了，方志纯问他怎么

回事。

毛泽民沉默良久，说：“我说什么呢？刚到新疆时，我觉得这样搞可能有问题，林基路同志也提出过，说我们这样给盛世才抬轿子、吹喇叭行不行？可是，人家说我们‘左’倾，破坏统一战线。后来形势严重，我提出，为保存有生力量对付盛世才的阴谋，是不是可以撤退一部分领导和干部，人家又说我怕死，是右倾。我还怎么说话呢？”

毛泽民和方志纯对新疆的局势深为担忧，他们静静地望着星空，远处，一颗流星飞过，在天空划过一道亮眼光芒。

方志纯开玩笑说：“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又一个人走了。”

毛泽民嘿嘿笑了起来，厚嘴唇张得大大的，“星星陨落，是自然现象。你这个共产党员还讲迷信呢！”他接着说，“如果一颗星真的就是一个人的话，我倒真愿意是这个黑暗社会里的一颗星，虽很快陨落，可总为党为人民群众贡献一点光亮。”

夜深沉，毛泽民和方志纯谈了很多。

最后，毛泽民握着方志纯的手说：“为革命，你家牺牲了志敏、兄弟好几个。我家牺牲了泽覃、嫂嫂和妹妹。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深仇大恨，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烈士。”停了一下，毛泽民含着泪水郑重对方志纯说了他最后的嘱托，“盛世才是不会放过我的，如果你今后有机会回延安，请转告毛泽东同志，我毛泽民要无愧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的哥哥……”

方志纯哭了，毛泽民——毛泽东的胞弟，在身处危险时，最记挂的不是才满周岁的唯一的儿子，不是他结婚不过两载的妻子，而是前仆后继的革命大业！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节操！

毛泽民曾不止一次说过：“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怕什么杀头？我决意和大家一起，战斗到最后！”

毛泽民牺牲了

毛泽民的判断十分准确。

1942年9月16日，蒋介石委任盛世才为新疆省政府主席，9月17日下午，盛世才派人来“请”陈潭秋、毛泽民、徐梦秋、潘同、刘希平谈话，说是“务必光临”。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讯号。新疆一直流传着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盛督办请谈话”，因为被盛世才“请”去，往往是“有去无回”了。

毛泽民、陈潭秋等人被软禁在满城邱公馆。

过了不到半年，国民党派人来了，1943年1月16日，盛世才正式就任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

2月7日，盛世才将软禁在邱公馆的毛泽民、陈潭秋等人投入迪化第二监狱。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被押到三角地，和林基路等人的妻子关在一起，后来又押到西河坝软禁。

3月11日，马明方、方志纯等三十五个男共产党员被押送进新疆第一监狱，他们分别被关在十个号子里，连放风都不让同一个时间。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则不知被盛世才关在哪里。

在狱中，毛泽民和陈潭秋等人遭受了酷刑。

站火盆、刺指甲、夹胳膊，每一项酷刑都会给人带来超乎想象的痛苦，可毛泽民始终坚贞不屈。

1943年4月，蒋介石派“审判团”来到迪化，他们开始对毛泽民进行秘密

审讯和逼供。他们对毛泽民实行“车轮战”，连续审讯了七天七夜，毛泽民奄奄一息了，可他还是牢牢守护着共产党员的气节。

在审讯中，国民党问得最多的，就是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矛盾的问题，他们想以此为突破口，动摇毛泽民的共产主义信仰，达到他们攻击共产主义、污蔑共产党的目的。可是，毛泽民怎么会让他们如愿呢，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可是坚如磐石的啊！

恼羞成怒的审讯员最后拿出一招，他们要模仿毛泽民的笔迹伪造供词，想趁毛泽民精神疲惫、奄奄一息的时候，诱使他签字，可任凭怎么拷打、折磨，毛泽民就是不签，他可是铮铮铁骨啊！

不过，也有真签了字的，一同被关押的徐梦秋、潘同、刘希平就当了叛徒，他们被敌人押着，去和毛泽民对质，可换来的却只有毛泽民的痛骂！

毛泽民大义凛然，说：“我是共产党员，我在新疆的所作所为，老百姓清清楚楚，我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你就是怎样地说怎样地打，我仍然是为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事业，为了抗日战争，我不怕流血牺牲的。”

盛世才彻底崩溃了，他只好写报告给蒋介石，“这些共产党人是顽固不化的，宁死不屈的。采取什么措施比较好呢？”

蒋介石随即答复道：“对毛泽民等人不可以声张，不要宣传，要秘密处理掉。”

1943年9月27日，深夜，迪化小南门，盛世才奉蒋介石之命，秘密绞杀了



★ 囚禁毛泽民的牢房

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人。这一年，毛泽民四十七岁。为了向蒋介石邀功，盛世才拍下了毛泽民遗体的照片。

10月7日，黄昏，毛泽民牺牲的消息传到了延安。毛泽东早知道盛世才的嘴脸，但大弟毛泽民牺牲，他一时还是无法接受，他手里捏着那份电报，走出了窑洞，来到枣园的一片树林。警卫员不敢跟过去，离得远远的。

毛泽东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们曾经相约，等革命胜利了，要一起回韶山看父老乡亲。

他自责、悔恨、内疚，自从三弟毛泽覃牺牲后，他就只有毛泽民一个弟弟了，可现在，三兄弟只剩下他一个！当初从韶山冲走出来的毛家人，只剩他一个！

要知道，这条革命路，是毛泽东带领他们走出来的啊！

杨开慧牺牲了，毛泽民牺牲了，毛泽覃牺牲了，毛泽建牺牲了！毛泽东甚至会想，如果当初他没有带他们出来，他们现在是不是还能平平安安地活着，过简单的生活？可是，毛泽东相信，他们每一个人都会后悔走过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为了穷人，为了中国的未来！

毛泽民被反动派杀掉了。

毛泽东的痛无以复加，他连续许多天都吃得很少。

革命是要死人的。毛泽东家族的人都深知这一点。

但要死得其所！毛泽民、毛泽覃做到了。他们都为革命，洒尽了最后一滴



★ 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烈士被杀害后埋在六道湾的荒坡上。图为移葬前的坟丘

移葬小組在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等烈士原埋葬地
(六道灣)進行啟坟、入殮時留影 1956.6.28.



★ 1956年6月，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烈士移葬到乌鲁木齐市烈士陵园。图为移葬小组在移葬入殮时留影

热血。

毛泽东可以预感到，革命胜利的曙光已经不远了。

可是，即便在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对弟弟毛泽民的怀念和愧疚始终没有停止。三十年后，已近迟暮之年的毛泽东仍然不忘对前往新疆的同志说：“你替我采一束野花，放在我弟弟墓前。”

这一年，毛泽东已是八十二岁高龄。如果毛泽民活着，也有七十九岁了。

重庆谈判，蒋介石没打算要和平

抗战胜利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中国欢欣鼓舞。八年抗战，中国人民付出巨大代价，终于迎来了曙光，各界人士纷纷呼吁和平建国，建立民主政府，结束国民党专政的局面。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在考虑着今后中国的走向。

蒋介石是一心“反共”的，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和蒋介石斗争了几十年，他太明白蒋介石的手腕。当时，蒋介石的军队都在后方，运送至前线尚需一段时间，所以蒋介石摆出一副“和平商讨”的姿态。他连续给毛泽东发了三次“万急”电报，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

这是一个一石二鸟的招数，他把难题踢给毛泽东。如果毛泽东不去，他就对外宣布共产党没有和平谈判的意向；如果毛泽东去了，他就有时间调兵遣将，为打内战做足准备。

毛泽东十分明白蒋介石的小把戏。这次谈判，一定要去，他要去戳穿蒋介石的真面目。

有人劝毛泽东不要去，毛泽东笑道：“谢谢好意，我注意点就是了。”

临行前，周恩来给毛泽东推荐了考克帽，这种帽子因拿破仑戴过，所以也被称为拿破仑帽，孙中山先生也曾戴过它。

毛泽东把考克帽拿在手里，笑着说：“你想得周到得体。我们到重庆，展示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形象，显示出解放区万众一心，无所畏惧的力量。挥

动考克帽，显示我们的力量。这顶帽子，我戴了。”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美国大使赫尔利等人的陪同下，飞往重庆，下午3点45分，飞机降落九龙坡机场。

全世界震惊了，外国记者纷纷发专电，盛赞毛泽东的气魄和胆略，重庆的报纸一时间也满是毛泽东到访的消息。

蒋介石在林园官邸设晚宴招待毛泽东，他们早在北伐前就认识，自从成为对手，已经二十年没见面。蒋介石的衣服上挂满了勋章，毛泽东却只是一身素朴的中山装，唯一不同的是他穿了一双新皮鞋。

毛泽东曾说过，不会吃辣椒的人，算不上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蒋介石则特地在几盘菜里掺了辣椒。

在重庆的日子里，毛泽东和蒋介石谈了多次，可蒋介石根本没有和谈的诉求和准备，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借助美国的压力，吞掉解放区。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共的态度和立场：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的民选政权；中共军队须改编为四十八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绥等地方之军队；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这些蒋介石当然是不愿意接受的。

既然来了，毛泽东安之若素，他在重庆拜访各路人士，做统战工作。他说：“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要作具体分析，也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作铁板一块。”

他拜访了戴季陶、陈立夫，这些都是国民党的右派，但毛泽东凛然前往。他和戴季陶吃饭，戴季陶“席终客散，亦无一言提及，似有不足言之隐”。

他跟陈立夫谈及国民党的“剿共”政策，“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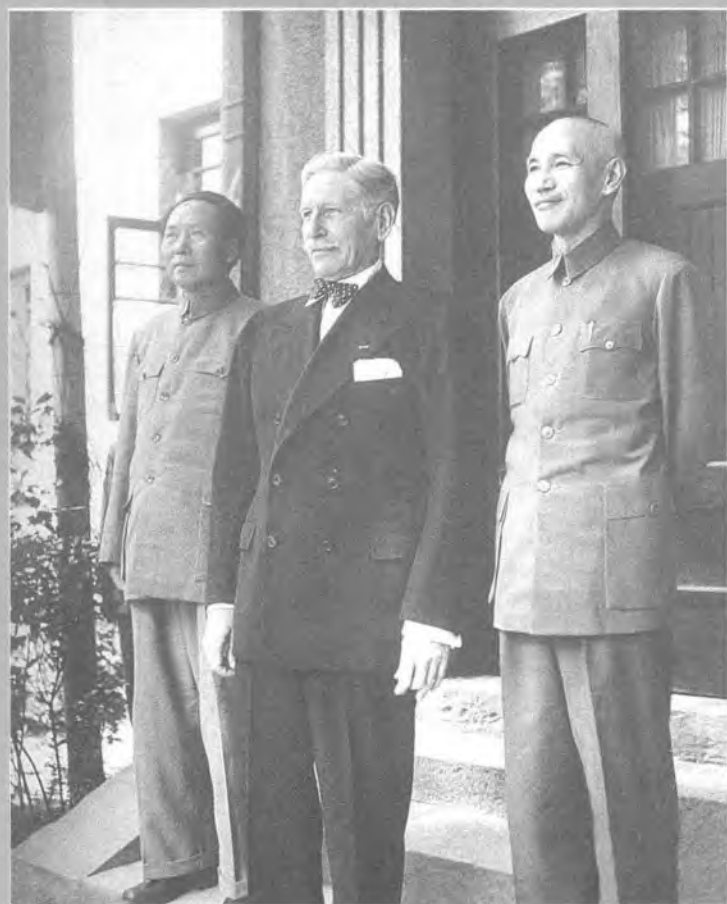
到重庆的第三天，国民党元老柳亚子来拜访毛泽东，他们是老朋友了。他们促膝长谈，而后，柳亚子送了一首诗给毛泽东，临别，他向毛泽东索要诗稿，毛泽东便将自己在1936年写的《沁园春·雪》录在书信上送给他。柳亚子诗兴



★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和平谈判时在机场留影



★



★ 1945年，重庆，毛泽东与蒋介石、
赫尔利（前排左一）、王世杰（二
排右一）、张群（二排中）、蒋经国
（二排左一）等人合影

★★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蒋介石和
美国大使赫尔利合影

★★



★



★ 1945年9月27日，蒋介石和毛泽东

★★ 蒋介石在林园官邸设晚宴招待毛泽东

★★

大发，和了一首，又将两首词拿给《新华日报》内部传阅。《新民报》编辑吴祖光看到这首词，想要发表，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这首著名的《沁园春·雪》便发在了《新民报》副刊《西方夜谭》上。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笔落惊风雨。

毛泽东的词在重庆引起了轰动。进步人士接连唱和，蒋介石的宣传头目大



★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



★ 1946年1月底，周恩来由重庆回延安
报告请示政协会议问题时，与毛泽东、
朱德在延安机场合影

为惊慌，责骂《新民报》负责人是向共产党投降。

蒋介石假装淡然，可在陈布雷给他读了之后，他顿时茫然——这首词胸怀广阔、气魄巨大、才思巧妙——他被毛泽东一身霸气震慑了。

他问：“这是毛泽东自己写的？”

陈布雷说：“就连党内一些能吟诗作词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上乘之作，对毛泽东的胸怀学识产生敬意。现在很多人在为毛泽东的词着迷，不管在朝在野，是敌是友，都在唱和着。我们的谈判才开始，毛泽东已在重庆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果实在令人堪虑。”

蒋介石说：“我们要在谈判桌上设置障碍，使他们无法接受，只要谈判一破裂，我就动手。”蒋介石还说，要发动国民党政协，把毛泽东的词比下去。

可哪里能比得下去呢？

一直到蒋介石退出大陆，他手下的人也没能拿出能与毛泽东词相比的作品，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10月10日，国共代表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第二天，毛泽东和蒋介石做了最后一次交谈。

毛泽东说：“这次双方会谈，全国乃至全世界人士都很关心，因为我们所谈的，不是一二个党派的问题，而是全国人民利害相关的问题。谈判情形良好，前途乐观，这在我们也有同感。世界是光明的，中国也是光明的，我们在这样的情势下来商谈团结、合作统一问题，当然是可乐观而且应该乐观的。在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大原则下，在蒋先生的领导下，我们中国人民是可以克服任何困难的。我们这次商谈，不是暂时的合作，而是长期的合作；不是一时的团结，而是永久的团结。我们互谅互信，共同一致，克服困难，一定可以建设新中国！”

可蒋介石并没有打算要和平，战争很快又要开始了。

毛岸英回国了

1946年1月，毛岸英回国了。

他在苏联经历了九年的学习和磨炼，已经是一个充满革命热情的有为青年了。

这对毛泽东来说，是个巨大的好消息。

因为革命，他与儿子毛岸英已经十九年没见面了。尽管他们早已恢复了通信，经常交流且相互寄出了照片，可是，父子俩还是非常渴盼重逢的一天。

毛岸英早就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是



★ 1946年1月，毛岸英回到延安，与阔别十九年的父亲毛泽东在延安王家坪合影

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从小，他就想成为像父亲那样崇高的人。毛泽东也日夜思念儿子——这可是他和杨开慧共同孕育的毛家长子啊！

毛泽东觉得自己亏欠亲人们太多。因为是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被何键杀害。因为是毛泽东的儿子，岸英、岸青、岸龙小小年纪流落上海街头，毛岸龙因病夭折，岸英和岸青则远在他乡。

毛氏家族当年举家革命，可在这坎坷又光荣的革命路上，毛泽建牺牲了，杨开慧牺牲了，两个弟弟也牺牲了，尽管毛泽东一向是个充满豪情的人，但他有时也会感到一种孤寂。

因此，大儿子毛岸英的回归，怎么能令他不备感欣慰呢。

五岁分别，再见面，毛岸英已经是二十四岁的小伙子，当毛岸英站在王家坪院子里的时候，毛泽东不得不感叹时光的神奇。

这一次重逢，父子俩都等了太久。

毛泽东吩咐多备了几个菜，庆祝他和岸英十九年后的团聚，多年积攒的话，父子俩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他问他在苏联的情况，又简单问了问他弟弟、妹妹的情况。毛岸英则仔细聆听着父亲的教诲。

一切都是那么温馨。

很快，毛岸英开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被安排在中宣部，在老同志的带领下学习理论和中文。他的俄文很好，还可以帮助其他同志做一点翻译工作。他一如既往地刻苦学习，进步飞速。他全身充满正义感，且十分质朴，他穿着



★ 毛泽东与毛岸英

一件旧的军大衣，看上去和普通干部职工没什么分别，他不说，别人根本看不出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拿着饭盆去食堂吃饭——他坚持吃大灶，拒绝吃那些给高级干部的爱人、子女准备的中灶。他总是积极参加劳动，挖粪坑这样的累活他也能胜任。

毛泽东十分喜爱这个朴实、正直、聪慧的大儿子，可是他并不是一个溺爱孩子的父亲，他始终是一个严父，他对儿子有要求，他希望回国之后的毛岸英，能够吃苦耐劳、独立坚强，并且迅速熟悉中国的土壤，积极加入到中国革命中来，做出自己的贡献。

毛岸英也确实是按照父亲的期望做的。

一天，毛泽东把毛岸英叫到王家坪院子的槐树下，父子俩坐着谈天。

毛泽东对毛岸英说：“莫斯科大学毕业了，但学的都是书本知识，你还需要进另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外国没有，它叫劳动大学。在这所大学毕业了，才算真有知识。到吴家枣园去！那里能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 延安枣园毛泽东旧居

毛泽东爱读书，但他从来不会将自己拘泥于书本，他更看重的是实践的经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希望毛岸英去“劳动大学”学习，就是希望他能够接触中国的现实，而中国现实中最广大的，就是农村。

枣园，延安西川的一个偏僻山村，毛泽东在这里居住时，修过渠道，灌溉了园中的果树。

毛岸英来到枣园学习农业技术，村长郝光华，村民吴满银、杨培中是他的老师。

他住在土窑的最西面一孔，大约十三个平方米，里面的陈设再朴实不过：一张木制的单人床，床头摆着书，一张旧桌子，上面放着俄文中文的书，桌子上还有一盏煤油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桌子上摆着一只玻璃杯，里面盛着水，水里面插着一根细枝条。

有人看到了，问这是什么。

毛岸英笑着说：“我从小是在外婆家长大的，湖南板仓到处都是粉红色的杜鹃花。延安没有，枝绿花红，也是一种印记。”

到枣园的第二天他就开始学着下地开荒。毛岸英有互帮互助精神，白天，他跟着弟兄们学开荒、运粪、施肥，到了晚上，他则变成了老师，给大哥们讲文化课。他精力充沛，充满热情。天色破晓，他就开始给房东挑水、扫地、劈柴；晚上收工归来，他不是给“五保户”送去一捆柴，就是给房东的牲口带来一捆草。他还时常去乡亲家做社会调查。

这个“劳动大学”，毛岸英一直上到蒋介石攻打延安前，他回到毛泽东身边，手上已经满是茧子，他脸色黝黑，头上扎条羊肚手巾。

毛泽东差点认不出来了，他打量着儿子黝黑结实的膀子，笑着说：“好啊！白胖子成了黑胖子！”

毛泽东感到很欣慰。他就是农民的儿子，毛岸英现在也得到了锻炼，他和农民兄弟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懂事，有干劲，他明白没有人民的支持，革命就不能成功。

革命本来就是为人民谋利益。

毛泽东始终保持着农民之子的本色。陕北大生产运动时，他曾在自己门前开了一亩荒地，自己播种、施肥。

毛岸英从“劳动大学”毕业后，依旧去中宣部工作，他开始系统地读书，



★ 1947年，毛泽东转战陕北



★ 1948 年。毛泽东东渡黄河赴晋绥军区途中



★ 1947年解放区通用毛泽东标准像

马列著作、中国历史、中共党史等都在他的阅读范围内。直到1946年11月，毛岸英才和中宣部一起，从延安撤退到瓦窑堡。

他给父亲毛泽东写信。

毛泽东给他回了，他鼓励毛岸英继续进步，坚持读书。

这一天，毛泽东刚好五十三岁。

毛岸英的回归与成长让毛泽东得到了亲情的滋养。革命十几年，损兵折将，他们都是为中国革命牺牲的啊！

1946年后，胜利的曙光越来越近，在各处转战中，毛泽东偶尔会想起当初那些和他一起走出来的亲人，尤其是最亲爱的两个弟弟，毛泽民、毛泽覃。

这些付出值得吗？毛泽东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从他们走出韶山冲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坚定信心，要为穷人的利益而革命，现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不正是在这条路上大踏步前进吗？

他们都是农民之子。

他们代表工农阶级。

抗战胜利了，蒋介石没打算要和平。毛泽东并不感到恐惧，相反，他却前

所未有地充满了信心，因为他和最广大的人民站在了一起，八年抗战，艰苦卓绝，可与蒋介石的较量，他相信很快就会结束。

1947年，蒋介石下令攻打延安。二三十万人从南、西、北三个方向朝陕甘宁边区发起总攻。胡宗南更是放言，不打垮共产党，他不结婚。

毛泽东对这种“围剿”并不感到意外，他掏出烟，气定神闲地抽了一口，说：“第五次反‘围剿’的教训我们不能忘记，战争往往是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蒋介石打仗争地盘，要延安，要开庆祝会。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缴获他的武装，消灭他的有生力量。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蒋介石占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等他背上了这个很重的包袱，我们再收拾他，他就要倒霉了，等蒋介石算清这笔账，后悔也迟了。我们现在不是怕胡宗南到延安，是怕他不来！我们的京戏就唱得不那么好听了！”

果真料事如神。

不过一年多后，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新年献词，题目很简单，这也是毛泽东常说的话，“将革命进行到底”。

神州大地，马上就要掀起一场摧枯拉朽的旋风。

·第九章·

深情：
革命与婚姻

毛泽东与罗一秀

在父母的主持下，十四岁那年毛泽东走入了第一段婚姻。

那时他还在读私塾，年纪尚小，根本没有对自己婚姻的选择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依旧是清朝末年婚姻缔结的主要渠道。

毛泽东是家中长子，父亲毛顺生对儿子的这桩婚姻十分慎重，他考虑再三，决定给毛泽东选择一户殷实的大户人家的女儿作为妻子。毛顺生常年做谷米生意，妻子文素勤身体情况欠佳，他希望儿子毛泽东早些娶媳妇，这对整个家庭的维持也有帮助。

在父亲毛顺生的主持下，毛泽东结婚了，一个叫做罗一秀的姑娘坐着花轿，吹吹打打，以明媒正娶的方式来到了毛家。

罗一秀比毛泽东大四岁，性格温柔，勤劳俭朴，体态丰满。他们在结婚之前没有见过面。

罗一秀的父亲罗鹤楼是一位农民，略通文墨，且有田产，在当地算是小富。这一桩婚事毛家长辈都十分满意，因为罗一秀刚嫁到毛家，就展现出了一个好媳妇该有的优点，她尊敬公婆，体贴丈夫，操持家务，任劳任怨，大家都叫她“一秀”“大秀”“大妹子”。

毛泽东对于这桩婚姻最开始是懵懂的，但他也给予罗一秀以尊重。可是，在那个尚显青涩的年纪，毛泽东的心思大多用在读书上。他和罗一秀没有感情基础，也谈不上有太多思想上的沟通，罗一秀是一个好媳妇，但对毛泽东来说，她未必是一个心目中理想的妻子。

他们终究是两个世界的人。不过，毛泽东对罗一秀或许没有很深的爱，但他始终尊重这段历史事实。1910年，罗一秀因患病去世，未满二十一岁，毛泽东此时十七岁，他的心情是悲伤又复杂的。一段短促的婚姻就此结束，他们没有孩子，她甚至没给他留下太多东西，就这样去世了。

对毛泽东来说，她更像是一个“家里人”，她和他父母、兄弟都相处得很好，她很喜爱他，对他没有恶意，她是一个好人、好姑娘，可突然之间，这个姑娘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1910年的毛泽东是彷徨的，他已经读过五个私塾，跟过七位先生，他的读书生涯已经走过了八个年头，他一度辍学在家，读了一些进步书籍，思想上有了变化，他迫切想要改变，他萌发了走出韶山冲的念头，他要外出求学。

毛泽东或许曾经和罗一秀商量过这件事情，略通文字的罗一秀或许对丈夫的决定是支持的，可是妻子去世之后，毛泽东只能孤军奋战。

毛顺生起先无法接受儿子毛泽东的提议，他希望毛泽东去做学徒，将来为家里的买卖出力。

聪明的毛泽东找来众位先生劝说毛顺生，他们几乎众口一词，称赞毛泽东是奇才，应该外出读书。毛顺生最终接受了这些先生的建议。毛顺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他知道或许毛泽东外出读书，将来对家里会有更大的帮助，而且现在媳妇罗一秀已经去世，硬留毛泽东在家也不实际。

这一年秋天，毛泽东走出了韶山冲，去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临行前，他给父亲留了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人走茶不凉。

罗一秀死后，毛泽东与罗家还有往来，他依旧算是罗家的亲戚。求学时返乡，他曾去罗家帮忙插秧；1925年，毛泽东三兄弟回家开展农民运动，毛泽东也拜访过罗家；1927年再回韶山，他在罗老先生家住过一夜，次日离开韶山。

罗一秀的堂兄罗石泉，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遭到迫害，举家远走洞庭湖边华容县湖口。1931年，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的妻子王淑兰因党组织被破坏，避走华容，曾将养子毛华初寄养在罗石泉家。

1940年，罗石泉得知毛泽东在延安，曾写信过去，要求参加革命。毛泽东给他回信，让他暂时留在当地展开秘密斗争。

1950年，毛泽东派毛岸英回湖南省亲，嘱咐他一定要去看望舅舅罗石泉。罗石泉接到消息，立刻从杨林赶往韶山，在毛鉴公祠见到了外甥毛岸英。毛岸英转达了父亲毛泽东的问候，并送给罗石泉一盒茶叶和二十万元人民币（折合新人民币二十元），并邀他去北京探访。

毛泽东和罗一秀的妹婿毛华村也有往来。毛华村是韶山冲韶源村人，和毛泽东是一个族里的。

1959年，毛泽东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韶山冲，与乡亲们见见面。毛华村身体不好，但他接到邀请之后，十分欣喜，见到毛泽东后，他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我是一双赤脚来见您，对不住啊。”

毛泽东说：“没关系，随便一点好。”毛泽东拿出自己的一双皮鞋给他。他们用韶山话聊天，饭后合了影。

一段短暂的婚姻，引发出两个家族几十年的缘分，即便世事多变，毛泽东却依旧坚守那份亲情。

毛泽东与杨开慧

杨开慧是大家闺秀。

其父杨昌济，世居板仓，人称“板仓先生”，他一生“操行纯洁，笃志好学”，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曾以公费留学日本、英国九年，专攻教育和哲学。

杨昌济立志在教育界做出一番事业，远在国外时，就改名“怀中”，归国后，他拒绝了湖南都督谭延闿给出的省教育厅厅长的任命，选择去师范学校当了一名教员。

杨昌济在湖南乃至全国教育界都颇有影响，他曾在北京大学任教，与李达、李大钊等中共早期革命家有来往。

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知书达理、忠厚和善、勤劳俭朴，她同情并支持革命。

杨开慧从小生长在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四岁就开始读《百家姓》，还能朗诵不少诗词名篇，五岁开始临帖，入格归真，颇见功力。她曾先后就读于杨公庙小学、隐储女子学校、衡粹女校、县立第一女子高小，打下了良好的文字基础。她喜欢读书，尤其喜爱《木兰辞》，向往那种少女戎马倥偬的征战生活，她还爱听民间传说中有关穷人造反的故事，她敬佩农民英雄。她热爱劳动，经常帮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她很早就学会了缝纫，能做女工活。1913年，杨昌济学成归国，杨开慧离开板仓，随父亲迁居长沙，住在妙高峰附近的“板仓杨寓”，坚持在家自学。

这一年，毛泽东怀着远大理想，来到一师求学。

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帮助很大，他十分赏识这位青年学生。求学五年，毛泽

东品学兼优，表现十分优异，更关键的是，毛泽东表现出来的那种彻底的革命精神、雄壮的气魄，更是令人折服。

杨昌济曾说：“我在一师有两个最好的学生，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蔡和森，特别是毛泽东，他将来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1918年，杨昌济北上北京，就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杨昌济鼓励他投考北京大学，并告诉他和蔡和森，有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机会。8月19日，毛泽东为领导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来到北京，由于母亲的身体和个人志向等原因，他最终没有赴法。毛泽东需要在北京生活下去。杨昌济伸出了援手，他介绍毛泽东去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在此期间，毛泽东开始与图书馆长李大钊接触，思想进步很快。

在一师期间，毛泽东就经常拜访杨昌济，在“板仓杨寓”，毛泽东和杨开慧相识了。

杨开慧对毛泽东十分敬仰，在她看来，这位充满豪气的年轻人的话语是那么吸引人，她总是仔细聆听。毛泽东则常常启发开慧思考问题，引导她发表意见，帮助她解决各种疑难。

开慧则会把自己的笔记拿给毛泽东批阅，她甚至学习了毛泽东锻炼身体的方法，坚持洗冷水浴，行深呼吸。

毛泽东到北京后，杨开慧开始参加毛泽东组织的各项活动，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报刊，初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感情加深了，他们是最真挚的朋友，他们在进步的道路上携手向前。他们之间的交往，一反封建婚姻中男女之间的交往模式，而完全在情投意合的基础上，在有共同信仰的基础上，慢慢靠近。

五四运动爆发，杨开慧和毛泽东欣然接受这场风暴的洗礼，他们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积极活跃，欢欣鼓舞。

1919年底，毛泽东率领“驱张运动”代表团来到北京，毛泽东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十八岁的杨开慧，也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对马克思主义有所接触，他们一起去故宫、北海，交流学习体会，研究改造国家和社会的方法，两颗心更加靠近了。

这一场恋爱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初恋。

1920年，杨开慧之父杨昌济因病去世，毛泽东、蔡和森、杨开慧一起扶柩南下，

回到板仓，杨开慧想在长沙继续求学，但因她剪短发，许多学校认为她是“过激党”而不肯让她入学，后在杨昌济生前朋友的帮助下，杨开慧进入福湘女中读书。

在长沙，杨开慧和毛泽东这一对进步青年，很快就掀起了一股革命热潮。杨开慧支持毛泽东的事业，毛泽东要创办文化书社，作为党的宣传联络地点，杨开慧立刻说服母亲拿出父亲的一部分“奠仪”费，捐作毛泽东的革命经费。

她参加毛泽东组织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做宣传工作。她在各个学校之间奔走，组织宣传队，深入工农群众，她突破外国传教士的阻挠，组织学生参加示威游行。

1920年10月，杨开慧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长沙，杨开慧在革命中表现出来的果敢，足以让她与毛泽东比肩。她反对三从四德，主张妇女解放；她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呈某世伯的一封信》等，篇篇笔触辛辣，反对封建礼教；她支持“开放女禁”的妇女解放运动，成为湖南第一批进入男校求学的女学生，对此行为，毛泽东十分赞赏。

风华正茂的毛泽东和杨开慧，俨然已经成为湖南革命界的一道风景，他们真挚的爱情公开了。

他们对彼此感情如此强烈，毛泽东写下《虞美人·枕上》：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无奈披衣起坐
薄寒中。晓来百念皆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
不抛眼泪也无由。

杨开慧后来记述这段感情：“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的许多的事，看到他的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上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同他结婚，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我想象着，假若有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假若他被人捉去杀了，我一定要同他共这命运……”

这是以灵魂和生命相许的爱恋啊！1920年冬天，两颗伟大的心终于结合在一起，杨开慧和毛泽东结婚了。

没有繁文缛节，他们的婚礼出奇的简朴。他们是心与心的结合，不要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他们的婚礼在船山学社举行，他们花了六元钱请至亲好友吃了一顿饭，杨开慧不坐花轿，自己夹着书包，搬进了毛泽东在一师附小主事室

不料我还有这样的奇遇，得到了一位贵人，那是十分的高兴，因此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许多的文章，我欢喜了他，不过我限有希望过曾同他结婚（因为那要全的校勘表，并翻印此表不表示，那定定的校勘表是杨开慧的手笔，我不妄求，那也知道那像我已提，李公新金埋后，一丁像我的性格，那好不折，我身已决这独身一世的。）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之良，我还不相信，我还有这样的奇遇，不是一位朋友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诉我，他为我那事烦恼——我相信我的独身生活是富有的。自從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從此我有一万新志，我竟得他为我而生，我情愿着，假如一天他死了，那一是万愿着他，假如他被别人投着有救，那是一是万愿着他，一千万愿着他，因为我的意志早已定下，决不离开他又下，准在这度中，早已又得了一万新志，到底天崩地塌一下绝解决，除非为我就和他而死，我

★ 杨开慧自述

简陋的宿舍，这在当时，实为惊世骇俗之举。

杨开慧是妇女界的先锋，是一名革命者，她和毛泽东的婚姻，是从一点一滴的感情培养中慢慢走过来的，顺其自然，水到渠成。他们的结合，实为当时湖南社会上流传的佳话。

婚后不久，毛泽东参加了中共一大，从上海回来之后，他便正式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在毛泽东早期革命中，杨开慧无疑是他坚强的后盾和助手。

在清水塘，杨开慧从事湘区党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她常和毛泽东一样，在油灯下工作到深夜。她会吧饭菜热在锅里，半夜拿出来给彻夜工作的毛泽东吃；冬天，她会帮毛泽东弄好取暖的“汤婆子”，深夜，也不忘给烘笼加炭。

在上海英租界甲秀里，她协助毛泽东办报，搜集整理材料，她还和向警予一起，组织和指导妇女运动；在韶山，她和毛泽东一起“走人家”，发动农民运动，她把革命思想编成通俗易懂的歌谣，传播给广大农民。

在广州东山路庙前西街38号，她协助毛泽东编辑《政治周报》和《农民问题丛刊》，她担任联络工作，与恽代英、林伯渠、李富春等人联系，积极支持北伐。

在望麓园1号，她参加湖南省农会的工作，积极筹备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武昌都府堤41号，她在油灯下帮毛泽东誊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失败后上井冈山，杨开慧就在板仓老家，继续坚持地下斗争。这是多么坚强的女性啊！她见丈夫毛泽东如此辛苦，总想通过自己拼命的工作，来替他分担。她要和他一起，为共同的理想奋斗。

然而，夫妻之间不是没有矛盾。毛泽东是一个职业革命家，这就注定他不能像一个普通的丈夫、父亲一样，长长久久地陪在妻儿身边。他亏欠杨开慧和孩子们太多。

1923年“二七惨案”后，湖南军阀赵恒锡下令通缉毛泽东。4月，毛泽东远走上海，毛岸英当时不到半岁，杨开慧怀着二胎，生活和工作不堪重负。杨开慧向毛泽东表示，希望他今后的生活能够稍微安定些，多一些时间留给家庭和孩子，可毛泽东还是毅然走了，他写信来，劝杨开慧自强，不可太依赖丈夫。

秋天，毛泽东回来了，可没过两个月又要去广州。这时候毛岸青刚刚出生，家里的生活更加困难，杨开慧爆发了，她和毛泽东争执，毛泽东独自离开。在南去的火车上，毛泽东开始反思自己。无意中，他从自己随身携带的布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包，里面是一小包饭，一些辣椒牛肉干和一个煎荷包蛋。毛泽东瞬间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多么好的妻子，多么细腻的女性啊！曾经的大家闺秀，



★ 1924年，毛泽东和杨开慧在上海的住址——慕尔鸣路甲秀里（今威海路583弄）



★ 1925年，杨开慧随毛泽东来到广州，寓住在东山路庙前西街38号，担任党内领导同志之间传递文件、书信工作。图为杨开慧1925年留影

跟了他之后，受尽苦楚。两个孩子出生，毛泽东都不在杨开慧身边，她都毫无怨言。毛泽东感到愧疚了。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贺新郎·别友》：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一句话讲透了杨开慧和毛泽东的关系，他们就是并肩战斗的一双知己、一对爱人！

放眼人间，如果杨开慧都不理解毛泽东，那他的一身抱负又能向谁诉说？接到毛泽东的信，杨开慧释然了，她决定坚强，因为自己的坚强，就是对毛泽

东——她的人间知己的成全。

杨开慧在广州时，又要带孩子，又要写字，家里也没有请人，她便一边用脚摇着摇篮，一边写字；在板仓，她和毛泽东彻夜长谈，她让毛泽东放心去革命，自己则在家带着孩子、照顾母亲；毛泽东闹革命去了，一走很久都没音讯，杨开慧就苦等。

秋收起义失败，她着急，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她稍觉安慰。她收到了毛泽东的信：“霞：我来此经商，开始生意不佳，蚀了本，如今渐有好转，兴旺起来了。甚堪告慰……润。”

可即便如此，杨开慧对毛泽东的思念却越来越深，她毕竟是一个妻子，一个年轻的妈妈，一个感情丰富的女性啊。

她写下五言长诗《偶感》：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是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心怀长郁郁，何日复重逢。

愁肠百转，有情有义。诗词唱和，这是属于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独特语言。这一份坚贞的情感，也是杨开慧在革命的道路上走下去的强大动力。

杨开慧被捕后，受到了各种酷刑，敌人问：“你丈夫毛泽东在哪里？”

杨开慧说：“这你们还不知道吗？他在井冈山，你们不是发动了几万人去‘会剿’他吗？你们奈何他不得，还来问我？真是可笑！”

敌人又说，只要杨开慧愿意和毛泽东脱离关系，就可以获得自由，杨开慧断然拒绝，她和毛泽东都是要革命的，他们是生死相许颠扑不破的关系，怎么能因为反动派的诱导就放弃呢。

何键恼羞成怒，说了一句，“毛泽东的堂客不杀，别的政治犯都可以不杀了。”堂客在湖南话里是妻子的意思。因为是共产党员，因为是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牺牲了。

这对毛泽东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杨开慧因爱他而死，他欠杨开慧的，再也没有机会偿还，他只有用余生的爱，

来追念这段感情。

从某种意义上说，杨开慧对毛泽东的爱是不朽的，他们有情有义有子有诗，他们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就遇到，谱写了一曲爱的史诗，杨开慧则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天鹅之歌式的爱情绝唱。

毛泽东曾对他的卫兵说：“她的牺牲很大一个原因是她是毛泽东的夫人。爱人和孩子为我做出了很大牺牲，我对他们是负疚的。”

毛泽东在接见杨开慧堂妹时说：“你霞姐是有小孩子在身边牺牲的，很难得！”“你霞姐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的！”

他还接见了和杨开慧一起坐牢的保姆陈玉英，在了解杨开慧的牺牲经过后他说：“开慧是个好人哩！岸英是个好伢子哩！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我家就牺牲了六个，有的全家牺牲了。”

毛泽东对杨开慧的爱，穿越了时空，而这种绵长恒久的爱的证明，就是毛泽东在1957年写的那首千古宏词《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1961年，章士钊向毛泽东请教词中“骄杨”二字作何解释，毛泽东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

1962年11月25日，毛泽东获悉杨老夫人去世后，致信杨开智，“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再次表达了他对杨开慧的爱意与怀念。

杨开慧死后，毛泽东对杨家人十分照顾。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给杨开慧的母亲寄生活费，如果秘书忘了寄，他会叮嘱补寄。

1949年10月，他曾指示湖南省委，“杨开智夫妇如有困难，可以给若干帮助。”土改开始后，毛泽东又对湖南领导说：“杨家是地主。但她家里为革命牺牲的人多，可以免于斗争。”

1950年，毛泽东派毛岸英回板仓探望杨家亲属。此后，毛岸青和邵华夫妇，也曾多次回湖南探望。

毛泽东对当年与杨开慧一起被捕的保姆陈玉英也十分照顾，他请毛岸英到



★ 左起：杨瑛、杨开智（杨开慧之兄）、
李崇德，中：向振熙（杨开慧之母）



★ 1962年，毛岸青在父亲毛泽东的嘱托下回湖南老家看望外婆向振熙（前排坐者）。后排左起：杨开智、李崇德、刘思齐、毛岸青、邵华、杨瑛

★ 杨开慧牺牲后，向家人帮着殓葬。图为杨开慧的舅舅向明卿



长沙“一定要找到孙嫂”，安排她家的生活，后来陈玉英到北京，毛泽东听她讲述杨开慧过去的事，流下了眼泪。

杨开慧的舅舅向理卿、向明卿，都曾得到过帮助，他们都是在过去帮助过毛泽东和杨开慧的人，杨开慧牺牲，是向家人帮助殓葬。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住在中南海，三十年前，他和杨开慧在北海定情，短短的距离，却已然沧海桑田。

1961年，毛泽东回长沙视察，深夜，他突然提出要参观烈士公园，在陈列厅，毛泽东悄然来到杨开慧遗像前，凝视良久。

毛泽东与贺子珍

和毛泽东相遇之前，贺子珍已经是一位革命女性了。

她1906年出生于江西永新，1926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北伐军开进永新县城的时候，她第一个剪辫子，轰动全城。

大革命失败后，十七岁的贺子珍和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一起参加永新暴动，和袁文才、王佐一起上井冈山。

贺家兄妹被称为“永新三贺”，贺子珍更因才貌出众，被誉为“永新一枝花”。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残部上井冈山，贺子珍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他们给彼此的第一印象都很好，贺子珍在井冈山算是能说得上话的人物，又是个漂亮的女性，而毛泽东则人高马大，气度不凡，与一般落草为寇的农民起义军首领大不相同。

王佐对毛泽东上山持怀疑态度，袁文才则给了一个建议，让贺子珍和毛泽东成婚，毛泽东成了井冈山的女婿，他们自然就可以放心了。但毛泽东刚开始并没有答应袁文才的提议，因为他还惦念着自己远在湖南的妻子杨开慧。

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一起，是在听闻杨开慧牺牲之后。

1927年9月到1928年，长沙到井冈山的秘密交通被国民党切断，毛泽东在1928年曾给杨开慧写信，用的是暗语，为了防止国民党追查，他没有留下地址，所以杨开慧是没法给毛泽东复信的。

毛泽东后来又派地下交通员吴福寿去长沙寻找杨开慧，探明消息，可等待的消息却是杨开慧已经遭到杀害。这个消息是不实的，但在当时的井冈山，大

家普遍认为杨开慧已经牺牲。

1928年6月，“塘边遇险”之后，贺子珍对毛泽东产生了爱意。在袁文才、朱德、陈毅等人的撮合下，毛泽东和贺子珍走到了一起。袁文才安排贺子珍照顾毛泽东起居，后来在象山庵，为他们办了简单的酒席，请了朱德、陈毅等人来热闹一下。

贺子珍和毛泽东在井冈山度过了一生中最浪漫的时光。

贺子珍晚年回忆时说：“物质生活虽然贫困，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富有的。毛泽东博览群书。夜深人静，他写累了，就给我讲他读过的故事，讲他的诗文。他的话，把我带入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常常是一个讲着，一个听着，不知不觉迎来新的一天。”

十年婚姻，贺子珍陪毛泽东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红四军七大，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贺子珍陪毛泽东来到牛牯扑，住在一座竹寮里，毛泽东在此读书、养病，终于东山再起；1932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遭到排挤，上瑞金旁边的东华山养病，贺子珍带着孩子陪伴丈夫，在古寺中读书养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内的领导岗位上，贺子珍依旧支持丈夫，在云贵边区，贺子珍负了伤，她主动要求留在当地老乡家，不给主席添麻烦，可毛泽东怎么舍得丢下她不管呢。

贺子珍和毛泽东在一起受了不少苦。

十年婚姻，十次怀胎，生了六个，但只存活四个，其中三个留在苏区不知音讯，留在身边的只有李敏一个。生孩子是女人的鬼门关，贺子珍不停生育，身体受到损害，而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哺育孩子，对她来说也十分艰难。

在长征途中，贺子珍为抢救伤员，被国民党投掷的炸弹炸伤，差点牺牲，后经抢救，保住一命，但一直到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她身上还有几块弹片取不出来。贺子珍经历了许多生离死别，她的弟弟在长征中惨失，而作为母亲，那些失落的孩子则是她心中最痛。

贺子珍性子刚。她十八岁挎枪闯天下，又经历过长征，是个标准的女战士，尽管她有着温柔的外表，但是她“说话快，走路也快，那个刚直、爽快劲在女同志中是很少有的”。毛泽东也是有脾气的，但一直以来，他对贺子珍都比较包容，比较谦让。贺子珍脾气来了，他让一让也就过去了。可正是贺子珍的这种刚烈的性格，导致了她和毛泽东的诀别。

1937年夏,有个外国女记者采访毛泽东,中央的几个同志一起请女记者喝酒。毛泽东和外国女记者碰杯,贺子珍赶来,一把夺下毛泽东的酒杯。毛泽东当即对女记者表示歉意,不安地告诉对方我妻子没有文化,不了解国外的一些习俗的,请谅解之类的话。

贺子珍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大闹了一场。毛泽东觉得贺子珍这样做不适合,请她做检讨,贺子珍接受不了,觉得毛泽东认为她没有文化,偏不检讨,斗气离开延安,准备先去上海治病,再找机会学习,不让毛泽东“小瞧”自己。

贺子珍要离开延安,毛泽东曾真诚挽留,他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风雨,受了那么多苦,毛泽东现在有了“发言权”,他觉得以后不会再让她像以前那样受苦。毛泽东告诉他,自己只有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听不得老百姓的哭声,看见他们受苦,他要掉泪;二是跟过他的通信员,他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信员牺牲了,他要掉泪;三是在贵州,他听说贺子珍负了伤,要不行了,他掉泪了。

毛泽东一番话说得非常深情,可以说他与贺子珍的感情,是在患难中培养出来的。可是,倔强的贺子珍还是要走,她想要证明自己、充实自己,想要在革命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赢得丈夫的尊重。

贺子珍要走,毛泽东还是想方设法挽留,他一共努力过三次:

一是贺子珍到西安后,他托人带口信、发电报挽留;二是贺到兰州后,他发电报挽留;三是贺到苏联后,毛泽东写信过去,说:“我们难道就此分手了?”贺子珍回信:“就此分手。”

这一年贺子珍还不到三十岁,她为自己鲁莽的决定付出了巨大代价。

贺子珍的出走,给毛泽东造成了巨大的情感伤害,那一年春节,毛泽东觉得很孤独。贺子珍的执意出走,也给毛泽东的领袖形象造成了一些损伤。

贺子珍在苏联生了一个男孩,但很快他就得病死了,这令贺子珍痛苦不已,可更大的痛苦还在后面,终于有一天,她知道了毛泽东已于1938年秋天再婚的消息。

这对贺子珍来说是个晴天霹雳。她根本想象不到,这一次任性的出走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她更不愿意相信,自己会永远地失去毛泽东——他们是在炮火中结成的患难夫妻,一直同甘共苦,她坚信毛泽东是爱她的!

可是,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她不止一次跟人说过:“我好悔。”



★ 毛泽东，1938年秋摄于延安，时年45岁。当时他住在窑洞里，写作他最有名的几部著作。他刚写完《论持久战》，正接着写《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她对毛泽东再婚这件事，始终有一个心结，有一次在江西看到毛泽东的塑像，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嘴里喃喃道：“杨开慧死了，你和我结婚；我没有死，你又和别人结婚。”贺子珍陷入巨大的痛苦中，她在苏联受了不少苦，回国后组织上不批准她进京，她生病了，因为漫长的思念而病，一直到1959年，她才终于有了和毛泽东相见的机会。

那是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和贺子珍见一面，他很可能是想当面做出解释，让贺子珍能够安度晚年。

贺子珍坐着车，沿着盘山公路来了，到了“美庐”，她见到了她二十二年前的丈夫毛泽东，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哭了，她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哭。

毛泽东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

因为历史原因，贺子珍和毛泽东分手了，可是，他们心底依旧保持着一种

暖意。

贺子珍一生都爱着毛泽东，毛泽东去世后，她曾经到北京来探望。她站在毛主席纪念堂里，泣不成声。

十年烽火十年情，一朝倔强误终身。

和杨开慧与毛泽东的爱情传奇一样，贺子珍与毛泽东的感情经历，同样撼人心魄，但却有着不同的滋味。

毛泽东与江青

去延安之前，江青在上海做过演员。

她比较有名气，且进步，在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文艺界领导同志“围攻”鲁迅时，江青是坚定地站在鲁迅一边的。

那时候她还叫江青，叫蓝苹，江青是去延安才取的名字，两个意思：一是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再一个是“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和过去说再见了。

江青与毛泽东在一起是在贺子珍离开延安后。

1937年8月，江青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来到延安，贺子珍还没有走，那时候江青还不认识毛泽东。后来江青出演“鲁艺”的新编京剧《松花江》，扮女主角桂英，毛泽东是去看过的。

毛泽东与江青是通过艺术结缘。

贺子珍走后，毛泽东十分伤心，连那一年的春节他都是一个人过的，他很孤独。贺子珍走时，他再三挽留，贺子珍到了苏联，他写信过去，得到的回音却是“就此分手”。

江青来得正是时候，她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为此，江青遭受了一些骂名，因为贺子珍是跟着长征走过来的三十名女红军之一，在延安的名望很高，江青的出现，很多女同志也无法接受，她们写信给毛泽东，建议他离开江青，认为江青影响不好。

可是，贺子珍与毛泽东情感破裂却并非因为江青。江青在这一点上是有些

委屈的。

客观说，江青是一名优秀的现代女性，她是革命的，大胆反叛，懂文艺，有思想，也有追求。她在上海是一名演员，身处浮华，却能够有觉悟在1937年毅然走到边区延安，这本身就体现了她这个人的觉悟。她的个性十分鲜明，她爱打扑克，会织毛线，也爱骑烈马，也比较会打扮。

毛泽东也是反叛的，他反对包办婚姻，支持自由恋爱，《西游记》里他最喜欢的人物是孙悟空，就因为他的叛逆精神。江青身上的这种反叛精神，吸引了毛泽东，他与江青恋爱了。而党内一些同志的不支持，反倒加速了这段恋爱走入婚姻。

江青来延安之前的历史比较复杂，她与毛泽东结合，引起了党内一些同志的议论，因为毛泽东是领袖，他的个人婚姻，不单单代表他个人，还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党的形象。出于这种考虑，一些同志对这段感情给出了不支持的意见。但这个时候，毛泽东和贺子珍的感情已经结束了，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正式结婚证，一次事实婚姻的结束，再开始另一次爱情与婚姻，都是合法的，也是合情的。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工作十分繁忙，他需要一个彼此爱慕的女性照顾，这可以理解，也值得尊重。

众人反对，以毛泽东这种叛逆豪杰的性格，他偏就“冲冠一怒为红颜”。毛泽东一直以来都是一位有个性、有思想、有魅力的领导人。



★ 李讷是江青和毛泽东的独生女。图为1945年8月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抱李讷留影

没有结婚仪式，只是在自己住的窑洞，他们请了厨师来做菜，分批请客。这一年，毛泽东四十五岁，江青二十四岁。

延安十年，江青照顾毛泽东的生活起居。结婚后的江青担任中央军委档案秘书，实际工作就是照顾毛泽东，他们在凤凰山杨家岭的窑洞有三间，一间是起居室，一间是毛泽东的书房兼卧室，一间是江青的卧室。

她给毛泽东织毛衣，也学会了做辣菜——湖南人喜欢吃辣。毛泽东喜欢听京剧，江青便留心在延安搜集京剧唱片。有时若来了朋友，她也热心待客。她还要求去南泥湾参加劳动，但人们没让她去开荒，她就发挥自己的专长——织毛衣，用陕北土法做的毛线织。

江青和毛泽东结婚一年后，有了身孕，她生下了李讷，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这给毛泽东的生活带来了一些欢笑。他们在陕北的窑洞里度过了一段温柔的岁月。

江青有她的缺点，这些毛泽东十分明白，但他对江青还是比较谦让的。他们的婚姻持续了近四十年。

毛泽民与王淑兰

王淑兰同毛泽民原本是“包办婚姻”却很美满的典型。

她与毛泽民同年，十七岁嫁入毛家，因毛泽民在家中排行老四，王淑兰被亲切地称为“四嫂”。

王淑兰是小脚，文化不高，但很能干，她每天总是第一个起床，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喂鸡喂猪这些活都是她做。婆婆文素勤生病了，她认真照顾，端茶倒水。她跟邻居的关系也比较和睦，尽管自己并不算富裕，但她依旧慷慨，邻居说她，“身上有两条裤子，都要脱一条送给别人”。

王淑兰性格泼辣、爽朗，快言快语，毛泽东外出读书之后，她作为毛泽民的媳妇，也是毛家唯一在老人身边伺候的媳妇，给毛家带来了生气。毛家二老去世后，王淑兰就成为上屋场唯一的女主人，她和毛泽民任劳任怨，辛苦支撑着毛家的祖业，供大哥毛泽东和三弟毛泽覃外出读书。

短短几年，王淑兰和毛泽民便生育了三男两女，但不幸的是，除了女儿毛远志长大成人外，其他几个孩子都夭折了。

王淑兰是“夫唱妇随”的，她和毛泽民相敬如宾，且十分支持丈夫毛泽民和大哥毛泽东的决定。毛泽东参加革命后，想要带着家里人也一起革命。他带着弟弟毛泽覃回到上屋场，在正月初八的晚上，他提出了弃家革命的想法。

毛泽民和王淑兰，刚开始想不通，但经过毛泽东的劝说，他们想通了。这很不容易，尤其是王淑兰，她是一个小脚的农村妇女，而上屋场的祖产又是她和丈夫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她能毅然放弃这些走上革命道路，说明王淑兰是有



★ 毛泽民的结发妻子王淑兰

革命觉悟的。她支持大哥，支持丈夫，是一位淳朴的有革命意愿的妇女。

走上革命道路的王淑兰，工作做得可以说是十分出色。

1925年，毛泽东三兄弟回韶山发动农民运动，王淑兰积极参加，她在当地有群众基础，加之又能说会道，展开工作比较方便，她向杨开慧学习革命道理，又随着大嫂杨开慧一起，去传播革命思想。

她上夜校，进宗祠，参加秘密农会，她打破封建桎梏，一下子成了妇女运动的先锋。她出身贫苦，没有什么思想包袱，所以进步也很快。她1926年就入了党，在湖南农民运动中，她堪称潮头人物。

大革命失败后，她曾被抓，经保释出狱后，带着五岁的女儿离开韶山，继续革命。1929年，因为叛徒告密，她再次被捕，关押在长沙国民党陆军监狱，1930年彭德怀打进长沙，她才得以出狱。

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的年月，她曾一度与党失去联系，带着女儿毛远志和养子毛华初（罗醒烈士的遗孤）艰难度日，但她非常顽强，带着孩子去上海找毛泽民，但因为毛泽民已经撤退，经党组织安排，她又回到长沙。

在黑暗的日子里，王淑兰一人苦苦坚持着，她靠给人洗衣、讨饭和做保姆过生活。她太难了。为了养育烈士遗孤，她只能将自己的女儿送到别人家做童养媳。但一切的苦难都没有压灭她革命的信念。

因为十分支持丈夫去革命，王淑兰又是隐忍而顾大局的。毛泽民参加革命后，见识了革命的残酷与血腥，他自己去革命了，为了未来不再连累王淑兰，他对王淑兰提出了离婚的要求。

这对王淑兰来说是个晴天霹雳。她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两人结婚以后，一直以来，她都把自己看作是毛家人，可丈夫现在突然要跟自己离婚，她一时想不通。毛泽民做出了解释，他深知革命残酷，为了王淑兰和毛远志的安全，离婚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王淑兰理解了，答应了，但她依旧表示，自己生是毛家人，死是毛家鬼。毛泽东听说大弟离婚，则对王淑兰说：“四嫂，你就住上屋场吧，你是我们毛家的人。”

事实证明，毛泽民是有远见的。白色恐怖中，王淑兰曾被捕，后来是韶山的乡亲写了一份毛泽民与王淑兰离婚的字据，王淑兰才被保释出来。

王淑兰为革命付出很多，她抚养革命后代，但如果有机会，她则会毅然放手，让革命后代参加革命，追求自己的一片天。

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在长沙设立了办事处，徐特立是负责人。她找到徐特立，说：“远志是毛家的根，华初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两个孩子都十几岁了，他们应该有自己的世界。”徐特立听后，把毛远志和毛华初送去了延安。

王淑兰对革命工作的热情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没有丝毫减少。革命胜利后她来到北京，但因为年纪不小了，又没有多少文化，组织上决定安排她到一个环境幽雅的地方休养，她坚决不同意，她的理由很简单，她是一个革命者，只有不停地工作，人生才有意义。她向组织请求：干不了大事，看大门也行。可是，这样一位历经苦难、对革命做过重大贡献的女性，怎么可能让她去看大门呢。

还是毛泽东了解王淑兰。一天，他把王淑兰接来，问她愿不愿意回韶山上屋场做接待工作，因为革命胜利以后，上屋场每天都有许多游客，而恰恰缺少一个女主人。

王淑兰听从大哥的话，立刻就回去了。她是从韶山走出来的，终于又回到了上屋场，不同的是，革命已经胜利，当年弃家革命，十分值得。而一番革命

之后，王淑兰也是当年从韶山南岸上屋场走出来的硕果仅存的革命女性了。

1959年，毛泽东重返韶山，一到韶山宾馆，就问：“四嫂呢，她在不在家？”听人说王淑兰去长沙了，正在派人接回来。毛泽东说：“对，应该请她回来。她回来了，就有人帮我待客了。”

毛泽民与钱希均

钱希均和毛泽民是因为革命事业走到一起的。

1926年，毛泽民受党中央指派，到上海做出版发行工作。这时候他已年过三十，对外的身份是老板，形单影只，在白区容易引人怀疑，于是党组织派了一位上海纱厂的女工、共产党员钱希均去协助他工作。在工作中，他们逐渐产生了感情，1926年底，毛泽民和钱希均结为革命伴侣。

钱希均是浙江诸暨人，贫苦家庭出身，刚过满月，就被送去别人家做童养媳，幸亏她的“小丈夫”也是革命的，同情钱希均，后来她跟着他一起来到上海，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平民女校”读书。

钱希均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杨树浦怡和纱厂做工会工作。她和毛泽民的结合，是党组织的工作需要，但其中也不乏真情。

这对革命夫妻一起度过了不少出生入死的日子。

在上海，他们的生活很困难。党组织一个月只提供十五元生活费，又要租房，又要吃饭，又要配置和自己表面身份相符合的衣物，毛泽民有时还需要给远在长沙的亲人寄钱，不够用，只能在吃上面省。毛泽民那时候是很消瘦的，他胃不好，但又喜欢吃辣椒，钱希均关心他的生活，尽量做一些可口的蔬菜。

白色恐怖时期，钱希均做地下联络员，走在街头，经常要甩掉一些“尾巴”。这是很危险的，有时她必须要走很多路。

她有这个警惕性，有一次，“包打听”闯进协新印刷所，要搜查，毛泽民处于很危险的境地，钱希均在外面觉察了，立刻向周恩来报告，组织营救。



★ 钱希均在西安

长征时期，钱希均是为数不多的红军女战士，她一开始在休养连做政治干事，后来在政治保卫局做检查员，有时也会遇到危险，她和毛泽民虽然在一个纵队，但却不在一起行军，经常见不到，见到了也不能说半句话，有苦，自己坚持着。

在革命工作中，钱希均是毛泽民的助手。

钱希均最初就是以助手身份来到毛泽民身边的，在上海、天津、瑞金，她都努力做好这份革命工作。她做过联络员，更多的时候假扮“老板娘”，这对毛泽民也是一种掩护。

红军长征，她做过《红色中华》的发行科科长。在毛泽民指导下，她进步很快，尤其在会计方面，她慢慢学会了阅读报表、记账，开始做会计工作。中央苏区组建国家银行之后，毛泽民担任行长，钱希均也是几个创始人之一，担任会计科科长。

钱希均和毛泽民对是否留在新疆有分歧。

他们那时候在新疆做统战工作，钱希均并不知道这份工作从一开始就是党交给毛泽民的。毛泽民在盛世才的政府里做财政厅代厅长，钱希均则在迪化东门外“新兵营”做图书馆主任。

可是，钱希均对滞留新疆工作是有意见的。后来她说：“当时，我很想不通，苏联派来许多飞机，运来大量的物资支援中国的抗日，我们不去抗日前线，却在这里与军阀搞统战。”她对中央和毛泽民的做法不能理解，加之他们因为工作原因并不常见面，缺乏沟通，两个人的婚姻逐渐走到了尽头。

对于这段婚姻的结束，毛泽民曾这样说：“我这个人不会体贴人，脾气也比较犟，脑筋里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到新疆后，她在新兵营工作，不久，就提出要上抗日前线，还提出和我分手。”

1939年冬天，党组织批准钱希均离开新疆，也批准了她与毛泽民分手。

1940年初，钱希均回到延安。

1943年，毛泽民牺牲。钱希均后来这样写：“泽民同志牺牲的消息我是在延安知道的。霎时，头晕目眩，痛苦不已，没想到1939年在新疆一别，竟成永诀！在这里，本来我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每当这时，悲痛欲绝，泪眼模糊……泽民同志安息吧！”

毛泽民与朱旦华

朱旦华和毛泽民可以说是患难情缘。

他们相识在迪化，那个时候毛泽民的工作十分繁忙，又与钱希均结束了长达十四年的夫妻关系，情感上是非常苦闷的。

朱旦华悄然走进了毛泽民的生命当中。

朱旦华和毛泽民第一次见面就对他十分支持。当时盛世才在主持召开一个会议，毛泽民发言，讲建立新疆财政的预决算制度，一讲完，鸦雀无声，因为这个制度触及各级官吏的利益，很多人是反对的，眼看就要冷场，朱旦华站起来了，她支持毛泽民。她觉得毛泽民做得好，做得对，所以应该支持。

这种支持令毛泽民很感动。他与钱希均从革命伴侣走到分手，多少也是因为钱希均不理解、不支持他在新疆的所作所为——孤军奋战的日子里，毛泽民最缺少的就是这种支持啊！相遇的方式很重要，朱旦华和毛泽民以这种方式相遇，互相都有好感，奠定了在一起的基础。

朱旦华原名姚秀霞，浙江宁波慈溪人，其父早年做土布生意，一直做到上海，后来家道中落。姚秀霞在上海务本女中读过书，成绩很好，但因为经济原因，最终上了本校高中师范科。毕业后留校，在教务处做办事员。

姚秀霞思想进步，抗战爆发后去了延安，进陕北公学，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她被派往迪化工作，在迪化女子中学做教导主任，化名朱旦华。

朱旦华和毛泽民经由当时的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邓发介绍正式相识。他们认识之后，彼此很有好感，毛泽民当时化名周彬，是“周厅长”，他在新疆



★ 朱旦华，毛泽民夫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延安派往新疆工作的首批人员。曾任迪化女中教务主任，新疆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在军阀盛世才的监狱里是女牢党的负责人，与敌进行坚决斗争。

做了很多好事，名气很大、很好。朱旦华很尊敬这个饱经风霜的共产党人。在毛泽民跟她讲了自己的革命经历之后，她知道了他是毛泽东的胞弟，也十分理解他，更加坚定了和这个饱经风霜的革命者走到一起的信心。

1940年5月，刚从苏联治病回来的毛泽民与朱旦华举行了婚礼。这是一场“文明婚礼”，地点在新疆省政府礼堂，他们坚决不收礼物，也没有办一桌酒席，只是把两个人的行李合在了一起。

主婚人是反帝会秘书长、中苏文化协会新疆分会会长王宝乾。迪化女中学生歌咏队自发前来贺喜，新疆妇女协会歌咏宣传队也去了，他们表演了很多节目，其中有一首叫做“五月的鲜花”。朱旦华认为，红五月结婚，象征着千千万万革命者红色的爱情，象征着一代人生死不渝的红色信念。

朱旦华和毛泽民结婚后度过了一段繁忙又温馨的日子。他们住在新疆省政府附近一处带天井的小院里。他们所有的财产就是毛泽民的一只旧皮箱、一个旧藤条包，里面有被子、衣服、书，还有一双穿了好几年的旧毡筒、从内地带来的旧皮帽。朱旦华的行李就是几件衣服和到新疆之后买的一双新皮鞋。

毛泽民起早贪黑，晚上到家后，一吃完饭，就又忙开了，一直工作到深夜。



★ 毛泽民在新疆工作期间和儿子毛远新合影

外面战火纷飞，新疆政经稳定，是个难得的乐土，这多亏了毛泽民对于新疆财政的领导和付出。

朱旦华怀孩子了，毛泽民忙进忙出，看到妻子肚子隆起，憨厚笑道：“你受罪了，我没有陪你。”皖南事变后，新疆的局势更加微妙，他哪里能停得下来呢。

1941年2月14日，朱旦华产下了一名男婴，按照辈分，他们给他取名为毛远新。新，指在新疆出生，也是为迎接新中国出生的。产后的病房里，毛泽民进屋，摘掉皮帽，头上热气腾腾，他看着妻子和儿子，笑得合不拢嘴。

盛世才逮捕毛泽民后，朱旦华和一岁的儿子毛远新也被软禁起来，他们被转移了几次，最后都被投进监狱。在监狱里，毛泽民和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朱旦华则被关在女牢，见不到丈夫，可她十分坚强，是女牢党组织的负责人，她带领同志们坚持斗争，她写下《狱中四时歌》《我们要胜利回延安》《缝衣》等歌曲，鼓舞大家。

1943年端午节，朱旦华按照监狱管理，将节日礼物——一双她亲手做的布

包嘗鐵窗風味的娃娃們一九四六 七月廿



★ 被关押在新疆盛世才监狱的娃娃们出狱后合影，后排中间个高者为少华，后排左二为毛远新

鞋——上面有她扶着毛远新的小手写下的“爸爸好”三个字，还有几片工友用衣服换来的炸馍片，包在一起，写上周彬的姓名，交了上去。

终于，毛泽民有回音了，他托人传回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高靱皮鞋及捆肚子的绑带。”他是要用高靱皮鞋护住被反动派打烂的皮肉，用绑带绑住肚子上的伤。朱旦华擦掉眼泪，开始找旧布给毛泽民做绑带。做好后，她又将毛远新写的“爸爸好”三个字的纸条，夹在一顶帽子的夹层里，连同高靱皮鞋，一起送给毛泽民。可是，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回音。

毛泽民牺牲后，朱旦华一直不能确定丈夫是否还活着，她仍在监狱中，有的同志为了安慰她，告诉她在新疆医院看到了毛泽民的背影。

朱旦华、毛远新母子和同志们一起，在监狱里煎熬着、斗争着。从1942年9月开始被软禁，到1946年6月10日无罪释放，在新疆监狱里的同志们经历了无比艰难的时光。

这是一场考验，有的人叛变了，有的人则牺牲了——被捕时一百五十人，

中共由新释放回延安全体同志摄影

一九四六年
七月廿日



★ 中共由新释放回延安全体同志合影
(1946年7月20日)

被捕后生小孩十四人，狱中有两名孩子死去，共一百六十二人。被捕后牺牲和病故五人，叛变和动摇出去十九人，带走小孩七人，所以最终出来的共产党员和孩子有一百三十一人。

曙光来了，毛泽民却早已经被反动派杀害。朱旦华写过一首长诗，是为毛泽民写的，叫做“新春之歌——为死难的丈夫而作”，其中说道：“……你，再没有什么遗恨，只是早走了一步，听不到人民解放的欢声。但是，你将永远得到满足，在你所走过的路上。千千万万的后继者，正在追循着你的血迹前进！而我呢，我是千千万万中的一个，也正在追循着你的血迹前进！”

1946年的7月11日，朱旦华带着儿子毛远新回到了解放区，回到了延安。

毛泽覃与赵先桂

毛泽覃和赵先桂的姻缘，始于指腹为婚，当属包办婚姻。

毛赵两家带点拐弯亲。赵先桂的父亲叫赵蕊香，他有个姐姐赵氏，嫁给了文家，算毛泽东三兄弟的七舅母。赵氏还是毛泽东的干娘。因为这层亲戚关系，赵蕊香和毛顺生认识了，他们都是做小生意的——赵蕊香在大坪镇开了一家商店叫“吉春堂”，经营药材、肉食和杂货。同样的背景使得他与毛顺生颇能谈得来，关系走得比较近。毛顺生做贩运谷米、生猪生意时纸票周转不开，曾借用“吉春堂”的纸票渡过难关。一来二去，两家便有了结亲的意愿。

毛泽覃和赵先桂还没出生时，就被两家父亲指腹为婚，他们相约，若两位妻子生出一男一女，两个孩子长大后就做夫妻。

赵先桂和毛泽覃同年同月出生，她比毛泽覃大十七天，是1905年农历八月初十生的。

尽管是指腹为婚，毛泽覃和赵先桂结婚前是有接触的，他们有感情基础。1923年到1925年间，毛泽覃大部分时间在长沙读书、开展革命工作，这时候赵先桂也在长沙求学。她是由毛泽东带出来读书的，1923年，赵先桂就读长沙古稻田女子师范，同年入党。

从小就认识，又是亲戚，加之接触比较频繁，赵先桂和毛泽覃渐渐有了恋爱关系。尽管此时毛顺生已经去世，但两人如果能够成婚，也算遂了大人们的心愿。

毛泽东认可弟弟毛泽覃与赵先桂的这段关系。1922年，他给八舅、七舅母、

八舅母等亲戚写信，提到：“……甥今年住家读书，没有在外边做事，幸喜身体还好，每天也还快活。泽民、泽覃、淑兰、先桂、泽建、开慧都好，不劳挂念。”言语中已将赵先桂纳入毛家，承认她是毛家的一员。

1924年，毛泽覃和赵先桂在韶山东茅塘毛麓钟家结婚。结婚后两人共住时间不长，赵先桂便由党组织指派，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5年，毛泽覃南下广州参加革命，两个人天各一方，音讯隔绝，渐渐走散。

赵先桂1927年回到中国，听闻毛泽覃已经再婚，没有去找他，而是继续在湖南从事革命工作。毛泽东亲自培养她从事农运宣传组织工作，她在凤音乡崇仙观成立农运第二区分部，她做妇女主任。

国民党痛恨搞农运的赵先桂，他们派人去抓赵先桂，到她家反复搜查，捉拿不到，恼羞成怒，便抓走了赵先桂的弟弟赵渭瑛，并放话，只有赵先桂自己来“自首”，才能换回弟弟。赵先桂得知后说：“共产党人干革命光明磊落，不能涉及家人。”她回乡安排好农运工作，独自前往湘乡县城，换了弟弟出狱。

在狱中，赵先桂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经受住了考验，不肯吐露一个字。1928年，军阀混战，狱内大乱，赵先桂组织在监同志越狱，先后在益阳、沅江等地从事秘密革命活动。

她后来跟毛泽建一起回过长沙，还在武昌大学担任过抗日指导员。

1930年，她来到山东，隔年开始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在这里她结识了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长裴光，因为革命工作需要，组织批准两人结为夫妇开展活动。1932年，裴光在去一个党支部开会时，遭流氓告密，被捕，关押在济南第一监狱。

赵先桂得知后十分伤心，她偷偷哭泣，却引发邻居怀疑。

邻居告发了她。

1932年6月，赵先桂被捕，不久在济南被害，年仅二十七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表兄文润泉和赵先桂的养子赵迎时说：“先桂和泽覃在长沙搞革命，都是1923年入党的，又都是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我们党牺牲了两个好同志。”

毛泽覃与周文楠

周文楠是大家闺秀。她 1910 年出生在广西桂林，小名三妹，其父周模彬在清末做过广西候补知县、直隶知州，后来举家定居长沙。

周文楠的母亲周陈轩为人善良，思想进步，支持革命。周文楠先后就读于长沙崇实小学和周南女校，1926 年毕业后，就读长沙含光女中。

周文楠和毛泽覃是在革命活动中相识、相知的。大革命时期，在长沙有一定社会名望和地位的周家，曾经是地下党的活动机关，周文楠和她的母亲周陈轩都是革命活动的积极分子。

湖南的革命家，如毛泽东、郭亮、夏明翰、萧三等人经常在周家聚会，毛泽覃也跟着毛泽东一起去，久而久之便与周文楠认识了。周文楠当时年纪虽小，但也帮着做一些收藏、保管和传递文件的工作，思想进步。她和毛泽覃很能谈得来，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谈论社会、教育、哲学、人生等话题，渐渐有了感情。

1926 年，毛泽覃南下广州，这个时候他与赵先桂已经断了联系，这年秋天，他写信给周文楠，邀请她南下广州。不久，周文楠母女一起来到广州，进入妇女运动讲习所学习，也听过毛泽东在“农讲所”的报告。周文楠和毛泽覃结为了夫妇。她还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 年入党。

周文楠和毛泽覃在一起并没有度过多少平静日子。1927 年，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事变，广州很快陷入一片白色恐怖，毛泽覃和周文楠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化装，乘船经上海到武汉，毛泽覃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工作，他们和毛泽东、杨开慧夫妇住在一起。周文楠已经有了身孕。



★ 周文楠（左一）与儿子毛楚雄、母亲
周陈轩合影

在武汉，毛泽覃三兄弟有过短暂的相聚，但很快各自奔赴革命。毛泽覃依旧在第四军工作，周文楠无人照顾，她和杨开慧一起，随毛泽民回长沙待产。1927年9月8日，周文楠在长沙松桂园小巷的一座小楼里，生下了她和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

1928年，因叛徒出卖，周文楠被捕入狱，一同入狱的还有她刚出生半年的儿子。在狱中，周文楠和毛楚雄遭遇了非人对待，母子双双患重病，后经周母周陈轩多方营救担保，毛楚雄才得以出狱，保住了一条命。

1930年夏天，彭德怀率军攻克长沙，周文楠才得以获救出狱。

1936年，周文楠随游击队在江西伏击白军，部队被打散，她被当地民团抓获，幸亏有族内的侄子周邦杰帮忙，才得以释放回到长沙。

在没有毛泽覃在身边的日子里，周文楠始终坚持斗争，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她曾随部队去湘赣苏区，在《红军日报》做校对，还曾在红三军随营政治学校学习，结业后去红十六军军部做秘书和妇女工作。1933年，她在红军大学协助教员翻印教材。

为革命，周文楠尝尽人间苦楚。1935年4月，毛泽覃牺牲。这年冬天，她从一片被敌人包围的游击区潜回长沙家中，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儿子毛楚雄。

毛楚雄由外婆周陈轩抚养长大，已经认不出妈妈，周陈轩连忙对小楚雄说：“她是你妈妈！快叫妈妈啊！”毛楚雄连声叫妈妈，扑在周文楠怀里痛哭。毛楚雄早先已经从外婆那里得知了自己的爸爸毛泽覃牺牲的事，他立志要为爸爸报仇。1937年，党组织指示，周陈轩、毛楚雄和周文楠回到韶山生活，住在上屋场旧居。

1940年，周文楠北上延安，在延安保育小学当教员，1942年再婚。

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和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在1946年北上延安时，竟被国民党胡宗南部杀害！年仅十九岁。这是一个巨大的人间悲剧！

抚养毛楚雄多年的外婆周陈轩一时还不知道这个消息。

新中国成立后，周文楠想要接周陈轩去东北生活，但她只是一名普通干部，没有那么多经费，于是，她写信给毛泽东，诉说自己的想法和难处。

毛泽东亲自给周文楠回了信，他说：“文楠同志：来信收到，甚慰。接你母亲去东北和你一道生活一事，我认为好的。我可以写信给湖南方面发给旅费，惟你母年高，一人在路上无人招扶是否安全，是否需要你自己去湖南接她同去

东北方为妥当，请你考虑告我……”

周文楠带着毛泽东的信，南下湖南，路过北京时，她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她谈了毛楚雄牺牲的情况后说：“你告诉外婆，就说我说了，楚雄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是韶山人民的好儿子，送他到国外很远的地方学习去了，也不能通信。免得老人家受刺激。时间长了，慢慢也就好了。楚雄年龄不大，为国捐躯，虽死犹荣。”

此后，毛泽东对周陈轩老人的生活始终十分惦念，几次问询。老人去世后，安葬韶山。

周文楠 1973 年回韶山时写过一首诗：“泽覃头颅抛瑞金，楚雄热血洒秦岭。父子牺牲各东西，为国捐躯育后人。”

毛泽覃与贺怡

贺怡和毛泽覃是在战火中产生感情的。

1929年2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来到江西东固，贺子珍也来了。贺怡和姐姐团聚，也第一次见到了姐夫毛泽东。部队离开时，交给贺怡一个任务，照顾受伤的毛泽覃——在一次战斗中，毛泽覃负伤，大腿被炮弹撕掉一大块肉，他不能立刻跟随部队离开，需要留下来养伤。贺子珍向妹妹贺怡介绍了一些基本情况：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弟弟，是红四军三十一团党代表，此前光荣负伤。她希望妹妹能够配合毛泽覃工作，帮助他把伤养好。贺怡答应了。

在东固，贺怡对毛泽覃的照顾很用心，缺医少药，她就上山采草药，没有营养品，她就抽空去树林里采蘑菇，去小河里捉虾。毛泽覃对贺怡说了自己的革命经历，贺怡也谈了谈自己，他们很聊得来，彼此有好感。1931年6月，贺怡在江西永吉泰特委做特委委员和保卫局长，毛泽覃则是永吉泰的特委书记，两人在工作上有一些接触，了解更深了。

他们开诚布公，并没有隐瞒自己的过去。在与贺怡结合之前，毛泽覃有过两段婚姻，一段是指腹为婚，已经结束，第二任妻子周文楠，则在革命中走散，长期联系不上。贺怡也有过一段婚姻，尽管不属于“包办”，但因为历史原因最终分开——1930年8月之后，贺怡的第一任丈夫刘士奇离开赣西南，再也没有回过江西，贺怡与他的婚姻关系算是解除了。当时的白区和苏区都没有明确的婚姻法，一段事实婚姻结束后，开始另外一段爱情和婚姻，都是合情合理的。

经组织批准，1931年7月20日，贺怡和毛泽覃结为夫妇。他们的结合，完



★ 贺子珍（左）、贺怡姐妹

全可以说是亲上加亲——贺怡的姐姐和毛泽东是夫妻，毛泽覃又是毛泽东的胞弟，贺毛结合，是两姐妹嫁给了两兄弟，姐妹成了妯娌，兄弟成了连襟，两家彻底变一家。

贺怡和毛泽覃在一起之后，无论与敌斗争，还是党内错误批判，她总是站在正确的一边，支持毛泽覃。

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时期，毛泽覃受到冲击，贺怡也遭受巨大压力，“左”倾领导人为搜集毛泽覃的材料，从贺怡下手，把她送进党校，隔离，谈话，并要求她与毛泽覃划清界限，但贺怡始终坚持，“毛泽覃是个好同志”，他不会反党，更没有搞小集团。

在党校隔离期间，她不能跟毛泽覃见面，饱受摧残，差点被开除党籍。她

当时已经怀孕七八个月，最终在党校的简陋环境中分娩，落了一生病痛。

红军长征后，毛泽覃被留下来搞游击斗争，贺怡也留在中央苏区。毛泽覃要打游击，贺怡已经有了革命后代，经组织同意，两人分开，一个去闽赣边界打游击，一个去赣南做地下斗争，两人在会昌白鹅洲码头离别，就再也没见过。1935年，毛泽覃牺牲，贺怡顶住巨大悲痛，照顾革命后代，继续坚持斗争。

她后来在韶关被捕，但在狱中严守秘密，还吞食金戒指，以死抗拒敌人逼供，身体受到了很大损害。后经周恩来斡旋，获释。皖南事变后去新四军军部做过工作，抗日胜利后才去的陕北。

1949年11月，贺怡乘坐吉普车，去江西赣南寻找姐姐贺子珍长征前夕留下的孩子毛毛，并寻找自己留在赣南的孩子，自己的孩子找到了，毛毛却不知所踪。

贺怡有些愧疚，毕竟姐姐贺子珍长征前是把毛毛托付给她和毛泽覃的，但她没有放弃，仍四处打听毛毛的下落，奔走于粤赣之间。

1949年11月21日，贺怡坐车连夜赶回吉安，汽车在凤凰圩翻车，贺怡遇难。贺怡的孩子后来由贺子珍抚养成人。

· 第十章 ·

血脉：毛家后人

英雄之子：毛岸英

毛泽东和杨开慧有三个儿子，毛岸英是长子。

1922年10月24日，他出生于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按照毛氏族谱，属“远”字辈，毛泽东为他取名远仁。

毛岸英的一生辉煌又坎坷。自童年起，他就饱经苦难，幼时跟随父母颠沛流离，在上海、广州、武汉、长沙辗转。

1930年，杨开慧被捕后，毛岸英跟着母亲一起坐牢，亲身体会了革命斗争的残酷、反动派的残忍。毛岸英很小明白了爱恨。在狱中，他对母亲杨开慧说：“妈妈，现在他们打你，将来我长大了要狠狠地打他们！”杨开慧牺牲时，毛岸英八岁，后经党组织营救，他和两个弟弟去了上海，在大同幼稚园度过了一段平安的时光。但就是在这里，毛岸英失去了弟弟毛岸龙——一个夏天，毛岸龙得急病夭折了。

毛岸英是顽强不屈的。在上海，毛岸英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倔强的他甚至一度带着弟弟毛岸青出走，流落上海街头，做过很多脏活、累活，住在破庙里，冬天就用报纸和茅草做铺盖。

在苏联，战事吃紧，儿童院的经费受到影响，每个孩子只能领到半斤黑面包，毛岸英不怕，他会领着孩子们“自给自足”，在儿童院里种菜，收获后，还会把大部分蔬菜上交，作为对前线的支援。苏联的冬天十分寒冷，儿童院燃料不足，毛岸英就领着孩子们在零下二十度的森林里搭起帐篷，伐木、劈柴、做木匠活、打弹药箱子。

希特勒打到莫斯科郊外，毛岸英还曾和小战友们一起，帮助抢修战壕。德

军进攻苏联，十九岁的他十分关心战事的发展，每次听完广播，他都会用小白旗和小红旗在地图上，将战争情况标出来。他渴望着战场。

毛岸英是毛泽东最为看重的长子，他有才华、有思想、肯努力，他曾经是毛家第二代中最有希望的一个。

他热爱学校，从小就有很强的求知欲。在上海时，他和弟弟毛岸青流落街头，为了买一本《小学生词典》，他们可以勒紧裤带，三个月不吃早饭。在苏联，毛泽东曾经给岸英写信，叮嘱他，“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

毛岸英进步很快，他不仅懂俄文，还能讲一些日常的法语、英语、德语，他各门成绩都很优秀，人也直爽，有魄力，与同学相处得很好，他在苏联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毛泽东也曾给毛岸英开过书单，包括一些古典小说、武侠传记、哲学、历史等方面的书。

毛岸英不但学习书本知识，还在父亲毛泽东的指导下，在陕北进过“劳动大学”——在吴家枣园跟农民兄弟们学习种地，做农活，了解中国的农村，了解中国这片土地。毛岸英按照父亲的安排去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尽管他在苏联长大，但他一直眷恋着中国这片土地。

1947年，毛岸英深入农村做土地改革工作，这是他从劳动大学出来之后，又一次对中国农村现状的深入研究，他明白，“没有下面的实际接触，在上面会上就是听一百个最好的报告，也是没有多大益处，接受不了，这好比地不耕而



★ 毛岸英(二排左一)
和苏联卫国战争时
期的中国孩子们

撒上哪怕是最好的种子，亦是徒劳无功，一阵风就吹走了”。

毛岸英深爱着中国。1941年，联共（布）中央建议，十六岁以上的外国公民，可以加入苏联国籍，这是一种光荣。可是，十九岁的毛岸英却说：“我是中国人，我爱祖国。只要祖国一声令下，我就要回到祖国去。如果加入了苏联国籍就不方便了。”

可这并不代表他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有国际胸怀，这是一种大爱，爱和平，憎恨战争，可他并不惧怕战争，如果和平的代价是战争，哪怕流血牺牲，他也勇敢向前。

苏联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毛岸英给斯大林写信，他说：“敬爱的斯大林同志：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青年，我在您领导下的苏联学习了五年，我爱苏联就像爱中国一样。我不能眼看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您的领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苏联人民报仇。我坚决要求上战场，请您一定批准我的请求。”

信发出去后，没有动静，毛岸英就写了第二封、第三封，他在一位将军的



★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毛岸英坚决要求参战，1942年5月，他被批准进入苏雅士官学校学习，1943年毕业时获中尉军衔，不久他又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图为毛岸英（左一）在士官学校的留影



★



★★

★ 苏联卫国战争中的毛岸英（右四）

★★ 苏联卫国战争中的毛岸英（二排右一）



★



★★

★ 毛岸英（左一）在苏联

★★ 毛岸英（中）在苏联



★

„60 ЛЕТ ПОБЕДЫ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941 – 1945 гг.“



А № 8455348

Мао
(фамилия)
Англин
(имя)

(отчество)

Указ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28 февраля 2004 г.
награжден(а) юбилейной медалью
„60 ЛЕТ ПОБЕДЫ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941-1945 гг.“

От имен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едаль вручена
30 апреля 2005 г.
Лидея Россия в Т.НР
М.П. (подпись)

★★

★ 毛岸英 (右) 在苏联

★★ 毛岸英获得的苏联卫国战争勋章

允许下，进入苏雅士官学校、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并最终上了战场。在部队，他做坦克连指导员，跟随苏军反攻东欧，一路凯歌，1945年，苏军攻克柏林之前，毛岸英回到了莫斯科。为表彰其战功，斯大林赠送了他一支手枪。

毛岸英深爱着父亲毛泽东。1946年，毛岸英与父亲重逢，他们已经分别了十九年。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毛岸英的进步很快，他始终记得父亲在信上说的话，“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

1949年3月，毛岸英接到通知，父亲毛泽东将要和其他同志一起进驻北平，上级指示他们去颐和园，排查各种危险因素。毛岸英是愿意为父亲舍身的，为了排除国民党军队留下的不安全因素，他和同志们用脚丈量颐和园，半天走完十八公里，要知道，如果有地雷，他们很可能就会牺牲。毛岸英却说：“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安全。”

因为对父亲的爱，毛岸英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他没有半点优越感，反倒将父亲毛泽东的信任转作为人民服务的动力。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刚正不阿，新中国成立后，不断有亲戚来北京找他，让他帮忙安排工作，毛岸英对这种违背党的原则的行为进行了抵制。他并非不近人情，事实上，在他心中，血统亲情非常重要，但面对原则性的问题，他却不会让步。



★ 毛泽东与毛岸英在北平双清别墅



★ 毛泽东与长子毛岸英

毛岸英有一段美满的婚姻，他所爱的是革命者刘谦初和张文秋的女儿刘思齐，他们在延安相遇，是毛泽东为他们的相识和相知提供了机会。

经过了解和接触，1948年，他们在西柏坡定情。

他们打算结婚。

岸英和思齐去征求父亲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对思齐说：“你正在学习，还没毕业，现在结婚，不怕影响学习吗？”

思齐回答说：“婚后好好安排，不会影响我的学习的。”

毛泽东说：“你还小，不要着急，反正我们同意你们结婚，等一等，好不好？”

岸英说：“好，听爸爸的。”

两人离开了毛泽东的住处，可是，没多久，毛岸英又回来了，毛泽东不解，说你怎么又回来了。

岸英说：“爸爸，我今年已经二十六岁了，我想结婚，好专心致志学习和工作……”

“你的意思，是不是让我立刻同意你们结婚？”毛泽东问。

“是的。”毛岸英说。

毛泽东有些生气，他不同意岸英和思齐立即结婚，一来思齐年纪的确小，二来战事未定，也不是好时机。毛岸英没想到自己的要求遭到父亲如此强烈的反对，他转身走了，刚走到院子里，一下子晕倒在地。几天后，毛岸英向父亲做了检讨。

1949年秋，岸英跟着部队进了北平城，不久之后，刘思齐也来到北平。9月，岸英和思齐商量着，过一些时候结婚，他们征求了妈妈张文秋的意见，她表示同意。

毛岸英又去征求父亲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说：“我同意。”又问，“你们准备怎么办婚事？”

毛岸英主张婚事从简，都有随身被褥，都有随身衣物，合在一处，就算结婚了。

毛泽东非常高兴，但作为父亲，他还是想要帮心爱的儿子好好办一办婚礼。毛岸英和刘思齐经过商量，列出了一个参加婚宴的名单，名单上有邓颖超、康克清、谢觉哉、蔡畅等。

毛泽东看了之后，笑呵呵地说：“你们只请了邓妈妈，请了邓妈妈，还应该



★ 张文秋（三排左三）和女儿刘思齐（二排中）、张少华（一排右三）、张少林（一排左二怀抱者）与战友们合影



★ 1949年10月，毛岸英与刘思齐结为夫妇

请恩来；请了蔡妈妈，还应该请富春；请了康妈妈，还应该请总司令；请了谢老，还应该请王定国；还有少奇和光美同志也要请。弼时同志有病住在玉泉山休息，就不要麻烦他了。婚事简办，我完全赞同，就是要改一下旧习嘛。”

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切朝气蓬勃。

1949年10月15日，毛岸英和刘思齐的婚礼在中南海举办，晚上七八点，伯伯、叔叔、阿姨们带着小礼物，陆续来到菊香书屋。

岸英穿工作服，思齐穿灯芯绒上衣，裤子是半新的，鞋是新买的。

毛泽东举着酒杯，走到亲家张文秋面前，笑着说：“谢谢你教育了思齐这个好孩子，为岸英和思齐的幸福，为你的健康干杯！”

张文秋说：“谢谢主席在百忙之中为孩子们婚事操心，思齐年幼不懂事，希望主席多批评指教。”

一顿饭吃得宾主尽欢，酒席上有些湖南风味的腊鱼、腊肉、红辣椒，毛泽东一边往徐特立、谢觉哉这些革命老人碗里夹，一边说：“孩子的婚事没让我操心，什么东西也没买，待会吃了饭，请你们到他们的新屋里去看看。”

婚礼结束了，岸英和思齐向父亲告别，毛泽东拿出一件黑色的皮大衣，是他1945年去重庆谈判时穿的，毛泽东笑着说：“我没有什么贵重礼物送给你们，就这么一件大衣，白天让岸英穿，晚上盖在被子上，你们俩都有份。”



★ 毛岸英与朱德（左一）、刘少奇（左二）在天安门城楼上

在场者忍不住哈哈大笑。

岸英和思齐的新屋，是机关宿舍的一个普通房间，门上贴红喜字，房内放着一张木板床，床上有两条被子，其中一条，还是思齐带来的嫁妆。房内只有一些必备的生活用品。

建国后，毛岸英在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总支副书记。1950年，美国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毛主席号召青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岸英不顾多人阻拦，毅然报名参加志愿军。毛泽东得知后，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

毛泽东把毛岸英交给了彭德怀，让他带这个年轻人去朝鲜经受战火的考验。

战事吃紧，毛岸英走得也十分匆促，他先行北上，出国前夕，他又随彭德怀回北京，向父亲毛泽东汇报战事。1950年10月14日，汇报结束，天已经黑了，毛岸英匆忙找了一辆自行车，骑行到工厂去和领导和工友们道别，然后，他去了医院——他的爱人刘思齐因阑尾炎正住院手术。

早在10月1日，刘思齐就因为阑尾炎住院了，这天傍晚毛岸英来过医院，但他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一去就是半个月，中途没有一个电话，现在他又回来了。医院里静悄悄的，毛岸英敲了敲房门，推门而入，他走到刘思齐的病床前，关切地询问妻子的病情。

刘思齐不高兴，她无法理解丈夫为什么忙成这样，自己生病他却消失半个月。

毛岸英没有说什么，他只是一个劲地道歉，可是，道歉过后，又说自己第二天要去出差。

刘思齐问他：“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

毛岸英答不出来。刘思齐大为震动，他居然连他们的结婚纪念日都忘记了！

自结婚过后，毛岸英去长沙，苏联出了两次长差，刘思齐和毛岸英朝夕相处的日子，算来算去也只有1950年的寒假那二十多天，毛岸英总是忙碌，苏联专家来了，他就让刘思齐去院子里走走，或者去李克农办公室、会客室坐坐。刘思齐当时有些不理解，公事为什么不去办公室谈，一定要搬到家里来谈？

毛岸英告诉刘思齐：“我这次要去的地方很远，很不方便，接不到信，你不要着急。”

刘思齐不便多问。

毛岸英接着说：“将来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都要完成自己的学业，不要着急工作。”

刘思齐点了点头。

毛岸英又说：“每周六，你都要去看看爸爸，不要因为我不在，你就不去了。还有，你要帮助岸青，他在生活方面自理差，江青没有精力照顾他，你和妈妈（张



★ 1950年5月，毛岸英代表父亲回韶山看望乡亲。图为毛岸英（中）与乡亲们在一起

文秋)说,帮助照顾岸青。”

刘思齐也答应了。毛岸英还对思齐说:“你要小心江青,跟她接触时要多多个心眼,我就得罪过她。”

晚上11点,医院大门口,刘思齐目送毛岸英离开,她隐约觉得有些不寻常,但在当时却又说不出什么。毛岸英也有些反常,他走走又回来,走走又回来。骑车之前,他深深地向思齐鞠了一躬。

就这样,毛岸英告别亲人,走上了朝鲜战场。

1950年11月25日,志愿军打响第二战役的第一天。上午11点左右,美军飞机实行轰炸,毛岸英是作战值班员,他和战友一起,正在一间木板房中收拾作战地图和文件,燃烧弹落下,木板房瞬间变成一片火海……

毛岸英牺牲了。

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彭德怀当天就告诉了周恩来,但毛泽东当时身体情况不好,周恩来和刘少奇商量后,暂时压下了消息,直到1951年1月2日,毛泽东才得知爱子毛岸英牺牲的噩耗。

毛泽东听后怔怔的,一声不响,所有人不敢说话,低下了头。这可是毛泽东最喜爱、最看重的长子啊!

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但他忍住没有掉泪,只是一声长叹:“谁让他是毛泽



★ 1950年10月,毛岸英(后排左二)赴朝作战前夕与战友在辽宁省安东(今丹东)合影



★ 毛岸英用过的箱子

东的儿子呢！”

大家顿时都哭了。

毛岸英的牺牲，对他新婚的妻子刘思齐也是个巨大打击。

毛岸英牺牲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刘思齐并不知道，因为怕她受不了这个打击，所有人都隐瞒着这个消息，三年了，刘思齐感到有些奇怪，她知道了毛岸英去了朝鲜战场，可是，这么长时间她却没有收到毛岸英寄来的只字片语，抗美援朝结束了，美国签了停战协议，可毛岸英还是没有回来。一切都无法继续隐瞒下去。

1953年，毛泽东把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了刘思齐。

为了不让思齐受到太大刺激，毛泽东是一点一点地说，他先说起毛家牺牲的人，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楚雄、毛福轩……刘思齐感到疑惑，最终，毛泽东还是痛下决心，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了刘思齐。这是一个晴天霹雳。刘思齐几乎快要被伤痛击倒，她以泪洗面，不思茶饭。

毛泽东说：“战争嘛，总是要死人的。不能因为岸英是我的孩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人民而牺牲。”

他又对思齐说：“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刘思齐投入到了新的学习和工作中，但她一直都没有从阴影中走出来，形单影只，1959年还生了一场大病，她根本没有重新组织家



★ 人民英雄毛岸英

庭的打算。

毛泽东多次劝说她，刘思齐只是哭，不肯表态。刘思齐对妹妹邵华说：“我怎么能忘记岸英呢？他去朝鲜参战，为了怕我担心，就说去外地出差。我最后连他的尸骨都没见到，你说，我怎么能接受这个现实呢？”

见姐姐太过悲痛，邵华忍不住，就跑去找毛主席说：“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姐姐连岸英哥哥埋在何处都不知道，她怎么忍心再嫁别人！”

毛泽东哭了，对邵华说：“孩子，都怪我想得不周到，这样吧，你就陪你姐姐去一趟朝鲜，为岸英扫墓。”

1959年初春，在邵华的陪同下，刘思齐来到朝鲜，她伏在毛岸英的墓碑上，泣不成声，她喃喃说道：“岸英啊，我看你来了，代表爸爸看你来了，这么多年才来看你，来晚了。”直到这个时候，刘思齐才真的相信，毛岸英离开了她。

从朝鲜回来后，刘思齐还是没有重新组织家庭的打算，她忘不了毛岸英。毛泽东知道后，给她写信，希望她“争气”，从伤痛中走出来。刘思齐也的确争气，她克服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完成了学业。1961年秋天，她被分配到解放军工程兵科研部门做翻译。这一年，毛岸英已经去世十一个年头了。毛泽东为刘思齐的未来考虑，他希望她能够找个男友，成个家，过上安稳的生活。



★ 朝鲜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毛岸英同志之墓

他再次给思齐写信，说：“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毛泽东为刘思齐的婚事操心不已，终于有一天，刘震向毛主席介绍，空军学院强击机教研室，有一位年轻人叫杨茂之，苏联留学回来的，为人老实正派，可以介绍一下。

毛泽东还不放心，他安排两个年轻人接触了一段时间，看看是否合得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个人情投意合，1962年2月，在毛泽东的操持下，刘思齐再婚，收获了幸福。毛泽东将自己的《卜算子·咏梅》，抄录了一份，并附上三百元，作为新婚礼物送给思齐，祝她日后幸福。

晚年时，毛泽东曾向自己在长沙一师的老学友周世钊谈起往事，他语气沉重地说：“当然，如果说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会上提出，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



★ 中南海合影。左起：刘思齐、杨茂之、毛泽东、张少林、毛岸青、邵华

做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作战，就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前线打仗，这还算什么领导人呢？”

毛泽东高风亮节，处处以大局为重。

抗美援朝胜利了，毛岸英牺牲了，他永远留在了朝鲜战场，静静地躺在朝鲜平安道桧仓郡的烈士陵园里。刘思齐等亲人多次去为他扫墓。

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毛岸青

毛岸青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次子。

1923年11月23日，毛岸青出生在长沙板仓杨家。和哥哥毛岸英一样，毛岸青的童年是颠沛流离的，毛泽东忙于干革命，东奔西跑，毛岸青跟着母亲杨开慧，四处流浪，接触到毛泽东的机会并不是特别多。岸青四岁时，毛泽东领



★ 青年毛岸青



★ 毛岸青在苏联

导秋收起义，失败后上井冈山，父子一直不得见。

1930年，毛岸青七岁，杨开慧被湖南军阀何键杀害，他和哥哥岸英、弟弟岸龙，在舅母和外婆的帮助下，东躲西藏，最后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去了上海，住进大同幼稚园。幼稚园关闭后，毛岸青一度流离失所，被国民党特务毒打，饱尝人间疾苦。

作为父亲，毛泽东曾说：“我很同情岸青，他很小就和岸英流落在上海街头，受尽了苦难，几次被警察打过，对他的刺激很大。”

1937年，毛岸青和哥哥岸英一起抵达苏联，结束了长达十四年的流浪生活。1947年得以回国。

可这并不代表毛泽东在毛岸青年幼时对他毫无教育，他爱孩子的方式是特殊的。小时候，他对毛岸青的教育，落在一个“严”字上。

毛泽东从不纵容孩子。毛岸青小时候曾不小心打碎了一件瓷器，毛泽东没有责怪小岸青，他耐心地跟孩子讲述泥土变成瓷器的全过程，让孩子体会劳动的不容易，毛岸青明白了这个道理，从此以后便爱惜瓷器了。

还有一回，在武汉，毛岸青蹲在地上玩一块玻璃，保姆看到了，觉得玻璃

有些危险，便要把它从小岸青手里拿回来，毛泽东见状，说：“随他玩去吧，没关系。”保姆说：“会划破手的。”毛泽东说：“流血了，他就记住了，下次就不敢玩了。”实践出真知，这也是毛泽东独特的教育方法。

在学习、工作方面，毛岸青经常能够得到父亲毛泽东的鼓励。毛泽东告诉他：“我不要你成为什么政治家、文学家、科学家，你只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就满足了。”毛泽东还曾鼓励岸青好好练字，毛岸青听了父亲的话，很快有了长进，毛泽东知道后很欣慰。

毛岸青从苏联回国之后，毛泽东鼓励他走出去，到农村去，“你现在书本知识丰富了，但实践经验还有所欠缺，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必须把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

毛岸青去了黑龙江省克山县参加土改，在那里，他没有告诉别人自己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愿搞特殊，而是跟当地农民一起吃住，一起劳动。土改结束后，毛岸青回到北京，在机关里做一名普通翻译。

毛泽东对毛岸青说：“你有多大的本事，就做多大的事。如果你凭自己的本事脱颖而出了，爸爸为你感到骄傲。”在父亲的鼓励下，毛岸青发愤图强，他翻译了十几本马列著作，真的凭自己的本事做出了一些成绩。

毛泽东总是乐于把更多的爱，奉献给儿子岸青。自童年开始，毛岸青就和哥哥岸英一起，尝尽人间苦楚，去了苏联之后，多少年也没能与父亲毛泽东见面。毛泽东觉得自己愧对儿子。他爱儿子岸青，恢复通信之后，他会在写信的开头，深情呼唤，“岸青，我亲爱的儿……”

毛泽东十分关心次子毛岸青的婚事，他告诉岸青：“你找对象，不要说你是毛泽东的儿子……”他希望儿子能找到一个两情相悦的对象，而不是带着毛泽东儿子的光环，结果有可能找得不合适。

其实，毛岸青早就有暗恋的人了，他喜欢嫂嫂刘思齐的妹妹邵华。邵华有两条漆黑油亮的大辫子，清纯美丽的鹅蛋脸，还有一双聪慧的大眼睛，她活泼可爱，为人善良，吸引了毛岸青的注意。但毛岸青是内向的，再加上从小在苏联长大，中文表达没有那么流利，他一直没向邵华表明爱意。

毛岸英和刘思齐结婚后，毛岸青曾跟邵华开玩笑：“你姐嫁给了我哥，你干脆将来嫁给我吧。”邵华瞪了岸青哥哥一眼，脸却泛起了一层红晕。

毛岸青对邵华的感情，在毛岸英去朝鲜战场之后，逐渐升温。从小到大，



★



★★

★ 毛岸青和哥哥毛岸英（左）

★★ 1960年，毛岸青（中）与妹妹李敏在一起



★



★★

★ 年轻时的少华

★★ 少华与母亲张文秋



★



★ 张文秋和她的三个女儿。
左起：少华、思齐、少林、
张文秋

★★ 1956年，访问欧洲苏联社
会主义国家回来的张文秋
和三个女儿在北海公园合
影。左起：少华、张文秋、
少林、思齐

★★

哥哥毛岸英都是他的一个好榜样、好伙伴，他和哥哥相依为命，沟通起来最没障碍，毛岸英走后，毛岸青没了倾诉的对象，他便经常开始去张文秋家玩，这段时间，他和邵华有了深入的接触。

毛岸英牺牲后，岸青曾一度重新回到苏联治病，再回来时，他便开始频繁地给邵华写信了。鸿雁传书，字里行间，邵华终于明白了岸青对自己的情谊，原来，岸青对她的爱慕都是真的。

两个人的通信不小心被毛泽东得知，他十分高兴。一次，岸青去看望父亲，毛泽东便点了他一下，问：“你嫂嫂的妹妹你觉得怎么样？”1960年，他又给爱儿岸青写信，提到，“听说你同邵华通了许多信，是不是？你们是否有做朋友的意思？邵华是个好孩子，你可以同她好好谈一谈。”没过多久，岸青和邵华恋爱了。

这件事情被邵华的母亲张文秋知道了。张文秋一向崇尚自由恋爱，她想：为了全国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主席毅然决然地把长子送到了战场，岸英为国捐躯，现在只有岸青这根独苗，如果说能够让女儿一辈子照顾岸青，能够为老亲家承担些人生心愿，也算不枉此生……

为了让两个孩子有更多的接触机会，毛泽东想把邵华从北大转到大连师范



★ 张文秋（左二）1946年从新疆回来和孩子、战友合影。前排左起：少林、少华、思齐

学院，一边上学，一边照顾岸青。但张文秋是否同意，还是个未知数。

一天，毛泽东将张文秋请到了怀仁堂，像当年在西柏坡一样，当面诚恳地征求亲家的意见：“老亲家，不知道你清楚不清楚，岸青、邵华两个孩子谈得来，现在到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地步，你这个当长辈的有什么看法？”

张文秋说：“说实话，我自打第一次见到岸青这孩子的面，就在思谋着让孩子早日成亲，十多年过去了，我也没有为孩子说成一门亲事，对不住主席和孩子。”

毛泽东说：“这不能怪亲家操不上心，你这当妈妈的做了不少工作，孩子对你还是说心里话的。岸青和岸英一母所生，心地善良，对你这个妈妈是很尊重的。”

张文秋说：“邵华比当年的思齐读书多，但还是年龄小，整天疯疯张张、嘻嘻哈哈的，我担心给主席当不好儿媳妇。”

毛泽东说：“好啊，女孩儿性格开朗，心直口快，说干就干，不是什么坏事，我毛家顶门立户还真的需要像邵华这样的直心眼儿，不怕困难，不计较得失，不在意别人说三道四。我说过，邵华是个好孩子，爱学习，求上进，有她帮扶岸青，也是我毛泽东的福气啊！”



★ 毛岸青和邵华两情相悦

张文秋说：“主席太看重她了。只要主席满意，我没得说，还请主席多多管教。”

毛泽东说：“文秋啊，我们是老朋友了，平时见面不多，但心是相通的。你不同意，我们仍然是老亲家。你同意了，我们就是新亲家，老亲家加新亲家，亲上加亲，我们是双重亲家啊！”

千面锣鼓，一锤定音。

邵华转到大连师范学院后，每个星期天都去陪伴岸青。岸青开始读书看报了，有时也翻译一点东西，又拿起了他心爱的小提琴，冬不拉，沉浸于爱情和音乐的天堂，两颗纯洁而燃烧的心连在了一起。

1960年五一前夕，三十七岁的岸青和二十二岁的邵华在大连宾馆会客厅举行婚礼，大连市委书记郭述申主持，摆了一桌宴席。

1961年，岸青和邵华从大连回到北京，毛泽东风趣地对邵华说：“我前年回



★ 20世纪70年代末，毛岸青（二排左四）、邵华（二排右四）夫妇偕儿子新宇（前排左一）与杨开智夫妇（二排左三、左二）等在板仓杨开慧旧居前合影

了老家，了却了一个三十二年的梦，那里有咱们的山神祖坟，新媳妇总该去认认家门，让外婆和亲友们看看嘛！去给你们的妈妈上个坟，也替我们看看韶山的乡亲们！”

岸青和邵华很高兴。自1931年乔装打扮逃往上海，岸青已经三十年没见到外婆了，他很想回去看一看。

他们首先回到长沙。外婆已九十高龄，她一手拉着外孙，一手拉着外孙媳妇，端详来端详去，高兴极了，她经历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眼见沧海桑田，亲历翻天覆地，自照顾女婿毛泽东在长沙上学到抚育她的三个外孙，关爱了两代毛家人。如今老人到了耄耋之年，女婿开天辟地，万民敬仰，外孙久别归来，外孙媳妇翩翩而至，人生在世，福禄寿禧，四喜登门，还有什么不称心的呢。

在板仓，岸青和邵华仔细查看了母亲杨开慧的遗物，并询问其牺牲经过，他们一起去棉花坡祭奠亲爱的妈妈，在坟前烧纸，给坟添土，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岸青和邵华回韶山的消息一传开，十里八乡的乡亲都赶来了。岸英牺牲之后，岸青便是毛泽东唯一的儿子啊！

毛氏家族的后裔来了，毛泽东亲自建立的韶山党支部的老党员来了，跟随爷爷打天下的烈士亲属来了，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来了。人们并不在意岸青和邵华说不了家乡话、搞不清辈分高低、吃不惯烈辣的饭菜。浓郁淳朴的亲情乡情，难忘的烽火岁月，让人们围拢在一起，说毛家的故事，说家乡的收成——他们为韶山出了个毛泽东而骄傲，为毛泽东重古崇礼、派儿子媳妇回家认门而啧啧称道，更为毛家人丁兴旺、后继有人而衷心祝福。

1970年1月17日，毛岸青和邵华迎来了一个小生命。邵华手术成功，在301医院产下了一名男婴。毛泽东在七十七岁上喜添孙子，后继有人，脸上露出了少见的笑容。他沉思了一阵，为这个孩子起了一个响亮而又寓意深远的名字，他在宣纸上重重地写下了两个潇洒刚劲的大字：新宇！

这便是毛家第三代中唯一的男孩，毛新宇。



★



★★

★ 毛岸青、邵华、毛新宇一家三口

★★ 毛岸青和儿子毛新宇合影

亲情的纽带：李敏

李敏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

贺子珍在长征路上有了身孕，到保安后，生下了一个女儿，毛泽东从《论语·里仁篇》得到启发，“子敏于行而讷于言”，取了个名字。李敏的乳名，则来源于《西京杂记》中“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净如芙蓉”，后来多写成娇娇。



★ 贺子珍（前排左一）、李敏（前排中）、
杨之华（前排右一）等在莫斯科

至于姓李，则大抵因为转战陕北时，毛泽东为自己取了一个化名，叫“李得胜”，他很喜欢这个名字，李敏的李源自于此。

李敏的童年生活因父母婚姻的破裂受到很大影响。1937年，贺子珍离开延安去苏联，这直接导致她和毛泽东的婚姻走到尽头。在苏联，贺子珍过着非常艰难的生活，毛泽东得知后，于心不忍，就想办法把四岁的娇娇送去苏联，陪伴在贺子珍身边，以做安慰。

贺子珍和毛泽东生下六个子女，李敏是唯一幸存的女儿，也是他们情感的纽带。所以，自小开始，李敏在家庭中就担负着一种特殊的责任。一方面，她必须陪伴好感情上受伤很重的妈妈，另一方面，尽管因为历史原因，父母长时间不能见面，小娇娇则是父母之间情感牵系的唯一通道。

李敏陪伴贺子珍在苏联度过了许多艰难的日子。苏德战争爆发，五岁的李敏和妈妈、哥哥一起搬到莫斯科郊外，天寒地冻，没有暖气，没有柴火，每天只有黑面包可吃。战争期间李敏得了重病，被推到国际儿童医院太平间的副室，



★ 贺子珍与女儿李敏摄于莫斯科

几乎走到了死亡的边缘，幸运的是，在妈妈贺子珍细心的照料下，她又活了过来。

前前后后，李敏在苏联生活了七年，回国之前，她的俄语比中文好，她对父亲毛泽东的印象也淡忘了，在国际儿童医院的礼堂里，毛泽东的画像被挂在墙上，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有一次，李敏的哥哥毛岸青指着墙上的照片说：“你知道他是谁吗？”

李敏答：“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

毛岸青说：“他是我们的爸爸。”

李敏忙说：“你瞎说，我没有爸爸。”

岸青耐心地说：“我没瞎说，他是我们的爸爸，是他把我们送到苏联学习的。”

见哥哥如此笃定，李敏半信半疑，她去问妈妈贺子珍，贺子珍这才开始告诉她一些关于爸爸的事。

1948年，李敏回到了中国，暂居哈尔滨。

1949年，她要到北平去，她给父亲毛泽东写信：“毛主席：大家都说您是我的亲生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有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生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生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这样，我才好回到您的身边。娇娇。”



★ 毛泽东和女儿李敏
(1951年)

毛泽东接到这封俄文信件，忙请人翻译，明白意思后，哈哈大笑。不久之后，岸青和娇娇被接到了北平香山别墅，见到了他们亲爱的爸爸。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史原因，贺子珍迟迟不能进京，毛泽东怕贺子珍太过悲伤，每当假期，他总是派李敏去上海看望贺子珍，陪她一段时间。

贺子珍的情况，李敏会及时向毛泽东汇报，比如，贺子珍病了却不肯就医，不肯服药，毛泽东就写信过去，劝她一定要遵医嘱，按时服药。

毛泽东的话，贺子珍愿意听。毛泽东曾对李敏说：“我知道，你妈妈生病都是因我而起，只有我才能治好她的病。”

贺子珍也会从李敏这里得到一些毛泽东的最新消息，她最关心毛泽东的健康，但她很少谈及过去。李敏会将自己知道的情况，一一告诉妈妈，贺子珍听后，露出了微笑。

毛泽东也向李敏打听贺子珍的情况。有一次，他说：“你妈妈过去可苗条了，腰细细的，现在你妈是什么样子，还那么苗条吗？”

李敏故意说：“我妈妈现在可胖了，像个大水桶。”



★ 贺子珍与女儿李敏

毛泽东说：“不会，你妈妈的身子骨绝不会变成大胖子，更何况她有病，心事重重呢。”说着说着，父女俩都觉得有些惆怅。

像所有父亲一样，毛泽东也为女儿的婚事操心。

李敏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大学期间，她和孔令华恋爱了。孔令华是北京航空学院的高材生，和李敏是高中同学。

李敏向父亲公开了这个“秘密”。

毛泽东笑着说：“我一向主张儿女婚事自己做主，大人不要干涉。我觉得小孔好，我没有意见。”

李敏又征求贺子珍的意见，贺子珍说：“你同小孔相爱，打算结婚，我赞成，但是我希望你们的婚期能拖后一年。我是这样考虑的，结婚以前多读一点书，对你今后有好处。结婚后，生儿育女，杂事很多，你想再读书就难了。”李敏听从了妈妈的话，延后了一些才结婚。

1959年8月29日，李敏和孔令华的婚事在中南海丰泽园内的颐年堂举行，婚宴简单而热闹，毛泽东喝了喜酒，祝愿女儿女婿互相学习，互相进步，生活幸福。

婚后，李敏和孔令华住在中南海丰泽园，后来搬了出去，住在一间平房里，过着独立而艰苦的生活。“文革”期间，李敏遭到批斗，被关押长达五个月，她的爱人孔令华在北航也遭到了打击。

因为种种原因，搬出中南海后，李敏只见过毛泽东三次。

1972年，陈毅元帅去世，毛泽东出席追悼会后生病，李敏知道后前往探望，毛泽东拉住女儿的手说：“姣姣，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你要常来看我啊！”

1975年左右，身在外地的李敏接到毛远新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毛泽东病重，李敏立刻赶回去看父亲。

1976年，李敏在看到中央某文件中谈及毛泽东的病情后，立刻赶往中南海，见到了面容憔悴的父亲毛泽东，两个人说了会话，这是她见毛泽东的最后一面。

得爱最多的女儿：李讷

李讷是毛泽东和江青的独生女。

她1940年出生于延安，当时岸英、岸青、李敏都去了苏联，毛泽东身边只有她这么一个孩子，所以李讷没有被送去保育院，而是在毛泽东身边长大。在毛泽东所有子女当中，她的童年是最幸福的。

李讷，这个名字跟李敏一样，也是从《论语·里仁篇》得到启发，“子敏于行而讷于言”，取“讷”字。

毛泽东近五十岁得女，十分欣喜，他对李讷很是宠爱，在延安，李讷也带给毛泽东别人无法给予的天伦之乐。

李讷曾说过，“我记得我最早学说话，有一句话就是‘爸爸，散步去’，我父亲后来进城还说了，说你小时候，就会说‘爸爸，散步去’。我很小啊，只有两三岁，只能拽住他一个手指头，拉着他去散步，以后我逐渐长大，拉着他两个手指头，然后再拉着他三个手指头，然后拉着他整个的手，就是这样慢慢长大的。”

李讷和毛泽东之间有一个秘密，毛泽东称李讷“我的大娃娃”，李讷则叫毛泽东，“我的小爸爸”。在散步的时候，毛泽东还会教李讷念诗，“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毛泽东在对李讷的教育中，也有严格的一面，他强调意志力的重要性。毛泽东喜欢游泳，有时候，李讷也会跟着他一起去，可是，无论是在大江里还是去大海里，李讷跟着父亲游泳必须答应一个条件：不准用游泳圈。

李讷说：“他这样做，不让你用救生圈，也是有道理的，一个是他对自己孩子的水性还是了解的，再一个他也是有意识锻炼你，比如说来了台风，白浪滔天，他让我们都跳下去，首先他自己第一个跳下去，那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的。”

李讷生病了，毛泽东给她写信说：“害病严重时，心旌摇摇，悲观袭来，信心动荡。这是意志不坚决，我也常常如此。病情好转，心情也好转，世界观又改观了，豁然开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

毛泽东教李讷怎样读书，说“要读浅近书，由浅入深，慢慢积累。大部头书少读一点，十年八年渐渐多读，学问就一定会搞通了”。

在日常生活中，毛泽东往往严格要求李讷。

转战陕北时，李讷年纪还小，她每天就和工作人员一起吃大灶，开饭了，她就拿着小碗和叔叔、阿姨们一样，一份菜一份饭，然后，找个地方蹲着吃。

久而久之，李讷问毛泽东：“爸爸，我天天吃黑豆，您看我的牙齿都要吃黑了。”毛泽东笑呵呵说：“傻孩子，黑豆怎么能把牙齿吃黑呢，黑豆营养价值高，吃了不会得浮肿病。行军打仗就有力气了。”



★ 1946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教女儿李讷识字



★ 毛泽东和毛岸英、刘思齐（左一）、李讷在一起

李讷在北大读书时，常常要走夜路回家，几十里的路程，一是辛苦，二也不安全。这件事被家里工作人员知道了，就瞒着毛泽东派人开车去接。

毛泽东得知后，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不然我也不接，天太黑了，一个女孩子……”

毛泽东说：“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能回家？”

工作人员说：“别人的孩子敌特不感兴趣，您的孩子敌特就感兴趣。”

毛泽东道：“感兴趣又怎么样？过去不是感兴趣吗？中国革命照样胜利。”他大手一挥，“不许接，说过就要照办，让她自己骑车或搭汽车回来。”自此以后，李讷就骑着一辆自行车穿梭于中南海和北大。

1965年夏天，李讷从北京大学毕业了，被分配到《解放军报》做一名普通



★ 毛泽东和女儿李讷
在北戴河

编辑。

毛泽东一贯希望自己的子女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李讷曾说：“父亲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他对我们希望也是比较大的。他不喜欢我们做什么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他只要求我们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就很满意了。他自己就是很俭朴，很严格的。20世纪50年代，我记得他卫生间里的洗涤用品，就是一块肥皂。衣服上的补丁也特别多，由于受到父亲的影响，我们更加严格要求自己，靠自己的能力学习知识，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他对我那样严格的要求，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很想念他，他是我的好爸爸。”

1976年是李讷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父亲毛泽东去世，母亲江青被抓，她顶着巨大的压力，依靠顽强的意志挺了过来。

她搬到了北京西郊一个小胡同的平房里，过起了用板车拉白菜和煤的日子。最困难的时候，她把自己的藏书卖给了旧书店。

她听从爸爸毛泽东的话，过着一份自食其力的普通人的生活。她有一个儿子，叫王效芝。她有一个老伴叫王景清。她现在过得很幸福。

毛泽东失落的子女

毛泽东一生有十个孩子，但长大成人留在身边的却只有毛岸英、毛岸青、李敏和李讷四个。其余六个子女，要么夭折，要么遗失，这令毛泽东十分痛苦。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拥有广阔的胸怀，但失落的子女却让他在内心存贮着深深的痛。毛泽东曾说：“我们干革命是造福下一代，而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

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寄居上海大同幼稚园时，突然得了急病。那是一个夏天的夜里，小岸龙腹泻、发高烧，保育员陈凤仙将他抱去广慈医院就诊，诊断出是噤口痢，经救治无效当夜死亡。

毛岸龙的夭折，给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打击很大，母亲去世，跟着三弟夭折，父亲也不在身边。革命后代就在上海过着艰难的生活。

毛泽东和贺子珍有过六个孩子，但却只有李敏一人幸存。1929年，红军第二次攻打福建龙岩县城，还不满二十岁的贺子珍，生下了一个女孩，这是毛泽东的长女。可是，战时非常吃紧，孩子二十多天，就不得不找了一个老乡家寄养。贺子珍忍着巨大的伤痛，用被子将婴儿包好，亲自交给了一位可以信赖的大嫂。

贺子珍抱着一线希望，或许有一天，这个孩子会回到自己身边，可是，时隔三年，当她再回到龙岩找到寄养孩子的大嫂时，却被告知孩子已经离开了人世。

1932年，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乳名毛毛，毛泽东给他取名毛岸红。孩子长得端端正正，眼睛很大，有点像毛泽东。毛毛长到两岁，毛泽东十分喜爱他。

可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却突然令毛岸红的命运变得扑朔迷离，按照规定，长征时是不能带孩子一起走的，贺子珍和毛泽东只好再次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了苏区，交给毛泽覃和贺怡夫妇照管。可是，红军一走，苏区很快被白色恐怖笼罩，1935年，毛泽覃牺牲，贺怡也曾被捕，毛岸红被送到老家家寄养。

新中国成立后，贺怡深知姐姐贺子珍和毛主席深爱着这个儿子，不辞劳苦，四处奔波，誓要千里寻亲，把小毛毛找回来。有一次，她可能打听到岸红的下落，便从广东赶到泰和，为了早一点找到孩子，贺怡连夜驱车赶路，结果，不幸出车祸去世。

1933年，贺子珍又生下了一个男孩，但因为早产，先天不足，孩子没活下来。

1935年2月26日，贺子珍再次分娩，她一脚踏着生，一脚踏着死，呼唤着毛泽东的名字，可因为战事，毛泽东并不在她身边。她生了一个女孩，可是，根据规定，任何人都不能带孩子行军，因为孩子的哭声会暴露部队的行踪。

中央红军正在长征，这个孩子来得不是时候，她被留下了，天与地容不下这个小生命，这是贺子珍第四次骨肉分离，她从身上掏出仅有的四块银元，叫人拿出她从长征以来舍不得用的四条白色新毛巾，脱下穿在身上的茄色外套，让人把孩子包好，然后把她抱过来，在小脸蛋上亲了一下。

孩子被送走了。毛泽东终于赶来了，可是，迟了。他望着奄奄一息的妻子，想说什么，可是什么也没有说出来。收养女婴的张二婆是善良的，她细心照顾这个女孩，可是，这个孩子在父母离开几个月后，突然周身生起又红又大的疮来，白天不吃不喝，晚上又哭又闹，张二婆四处求医问药，无济于事，孩子还是夭折了。

1938年，贺子珍到达苏联不久，又生下了一个男孩，这是毛泽东生命中第九个孩子。可是，因为苏联的天气过于寒冷，孩子得了感冒，后来转为肺炎，没来得及抢救，不幸夭折。

毛泽东为中国革命付出了许多，他是强者，是英雄，可是，当面对这些夭折的精灵时，他又怎么能不心痛呢。

毛家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六位至亲，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岸英和毛楚雄，而这六个还没来得及体会人间温暖的孩子，不也是毛家人所做的牺牲吗？

断了线的思念：毛远志

毛泽民和王淑兰有三子二女，可长大成人的，只有毛远志一个人。

毛远志，1922年5月5日生于长沙。这年冬天，毛泽民随毛泽东去安源路矿，直到1925年，毛泽东三兄弟回韶山发动农民运动，王淑兰带着远志回乡，她才又见到了爸爸、伯伯和叔叔。

因为年纪小，那段时光在毛远志印象里是模糊的，她记得有一天，家里摆了两三桌饭菜招待亲友，她被母亲安排在一张小凳子上吃饭，她抬头看着爸爸和伯伯，他们都是大大的眼睛，高高的个子，她爸爸毛泽民穿着白色粗布衣服，伯伯毛泽东穿蓝大褂，他们有说有笑，从天亮到天黑，总有说不完的话。

1925年，毛泽民之妻王淑兰投身农民运动。1929年由于叛徒出卖被捕，毛远志被寄养在乡下亲友家。1930年，王淑兰为了在监狱对内对外秘密联络的需要，让人把毛远志送到她身边，一起来的，还有同牢房罗醒同志的小儿子，叫华初，比毛远志大一岁，他们一起承担着秘密交通员的工作。

7月，彭德怀带领红军攻进长沙，王淑兰带着毛远志和毛华初出狱（罗醒牺牲，王淑兰认华初做养子），开始了流浪生活。

他们的日子非常艰难。为了革命工作，王淑兰不得不让毛华初去给人家放牛，毛远志则在一个富农家做小工，每天喂猪、种菜、烧饭，后来，毛远志又被送到沅江县一户姓傅的人家做童养媳。这是一段充斥着恐怖、流浪、饥饿和种种虐待的生活，毛远志渴盼着自己也能有个温暖的家。

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这时毛泽民来信，希望把远志送到延安去读书，

王淑兰十分支持，她找到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的负责人徐特立，安排毛远志北上延安。

1938年3月底，毛远志终于到了延安。

狂风暴雨过去，小船驶进了温暖的港湾。

毛远志在窑洞里见到了伯伯毛泽东，王淑兰让孩子给伯伯带了家乡的云片糕。毛泽东吃着，连声说：“好吃！好吃！多少年没有吃家乡的东西了。”

毛远志问她爸爸毛泽民的情况。

毛泽东说：“你父亲已经到新疆工作去了。”

毛远志晚来了一个月，没能见到爸爸。但伯伯毛泽东给予了她很多关心和爱，到延安的第三天，她就进了鲁迅小学读书。

毛远志自尊心强，认为自己读书少，文化程度低，便拼命努力学习和工作，有时甚至一连两三个晚上不睡觉，时间久了，便生病了。毛泽东关心她的病情，叮嘱她好好休养一段再说。



★ 毛泽民的女儿毛远志在延安城留影

1943年，毛远志被调到西北局工作。一次，她向毛泽东说，想要去前方工作。毛泽东笑笑拍着她说：“你还想远走高飞呀？我看你还是先把病治好吧。”没多久，毛远志的头痛病又复发了，组织送她去西北局的农场养病。

农场就在枣园，离毛泽东住的地方很近，毛泽东工作很忙，但还是惦记着远志，他关照警卫员给远志送过旧报纸，糊墙用的，还拿来两只风干鸡，是他舍不得吃的。

1943年，毛泽民在新疆牺牲。毛泽东为了不让侄女受到刺激，隐瞒了这个消息。抗战胜利后，毛远志和余建新、曹全夫一起去看望毛泽东。余建新是毛泽民的战友。曹全夫是毛远志的爱人。

见到侄女有了爱人，毛泽东挺高兴，他留他们吃饭，做了一大碗扣肉，几个人边吃边说。

谈笑之间，余建新突然拿出毛泽民的照片问：“这人现在哪里？”

欢乐的气氛骤然沉闷下来，毛泽东脸色沉落，眉头紧锁，嘴角抽动了几下，半晌，才轻声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掉了。”

毛远志愣住了，多少年来，她一直在盼望父亲归来呀！毛远志哭了，捂着脸离开饭桌，躲到里屋去。

江青走过来对她说：“这件事我们早就知道了，怕你受不住，一直没有对你讲，现在你要离开延安去东北，应该让你知道了。”毛泽东也没有吃好饭，沉重



★ 1950年，毛远志和
毛岸青

地坐在一边。

毛远志擦干眼泪走到伯父毛泽东面前，斩钉截铁地说：“伯伯请你放心，我会坚强起来的。”

毛泽东扶着远志的双肩鼓励她说：“你的工作、学习我都是放心的，今后要像你爸爸一样，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

回到驻地，毛远志又给毛泽东写信，表示一定按照伯伯的教导去做。毛泽东回信了，同意远志和曹全夫结婚，并说：“你们就要到东北去了，祝你们一路平安。”

“自家孩子”：毛远新

毛远新是毛泽民和朱旦华的儿子，1941年2月14日出生在新疆乌鲁木齐。这一年，毛泽民已经四十五岁了。

中年得子，毛泽民对毛远新十分疼爱。远新从小也很乖，不爱哭闹，可是，反共的盛世才很快逮捕了毛泽民，让小远新的童年也蒙上了阴影。他跟着母亲朱旦华在牢里度过了十分艰难的幼年时光。1943年，毛泽民牺牲了。1946年7月上旬，毛远新才终于和母亲朱旦华以及众多狱友一起，回到了延安。

这是他所不熟悉的革命圣地。到了延安，毛远新问母亲朱旦华：“妈妈，叔叔们说毛主席是我的大伯，大伯是什么样子？和爸爸长得一样吗？”1946年7月12日，毛泽东请大家吃饭，大家都没带孩子去，朱旦华就把远新留在了党校。远新问妈妈，“大伯和爸爸长得一样吗？”

朱旦华忍住心痛，说：“你爸爸和毛主席是亲兄弟，毛主席当然是你大伯，他们两人长得很像很像，都是高高的额头，大大的眼睛。”

没多久，一位年轻的战士来找朱旦华，他说：“毛主席派我来请问，您晚饭后有没有时间去他那里做客？”

毛远新听懂了战士的话，大声地喊起来：“我也要去大伯那里做客。”

八路军战士笑了，补充说：“毛主席和江青同志欢迎您和孩子一起去。”

陕北的伏天，吃过晚饭太阳还挂在西边的山头，远新和妈妈一起去了毛泽东家。毛泽东见远新来了，俯身一把抱住他，大声说：“这是泽民的儿子！我抱抱，我抱抱。”

远新一点都不认生，叫了一句：“大伯好！”又问，“大伯，你怎么有毛主席和毛泽东两个名字呢？”

毛泽东哈哈大笑。

1951年底，朱旦华到北京参加全国妇联会议，带毛远新到了北京。毛远新住在朱总司令家。会议结束后，朱旦华去中南海，先去总司令家接了远新，再带他去看望毛主席，准备将远新带回南昌。

主席见到他们母子来了很高兴，问了一些南昌的情况。当谈到学校教育时，朱旦华谈了远新读书的法院前小学的状况，比北京育英小学条件差多了，还说孩子想回育英小学读书。

毛泽东望着远新说：“住在我这里会成为温室的花朵，还是跟妈妈回南昌，可以经风雨见世面。”



★ 朱旦华、毛远新与王淑兰（右）合影

远新急了，大声抢白道：“我又不住在你这里，我住在学校，怎么会是温室的花朵呢？”

毛泽东故作严肃地问：“嗨，你知道什么叫温室的花朵吗？”

远新摇摇头，说：“不知道的。”又说，“听你的意思，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一句话，引得毛泽东哈哈大笑。

江青把朱旦华拉到一边，轻声说：“自从岸英牺牲后，几乎没见主席笑过，今天是头一次看见他笑得这么开心。主席很喜欢这个孩子，就把他留在这儿吧，可以常和主席说说话，主席的心情会好得多。”

朱旦华说：“由主席定吧。”

江青回过头对毛泽东说：“既然孩子想回育英小学，就让他留在北京吧。”

毛主席在毛远新的肩膀上拍了一下，说：“那就留下吧。”

毛远新搬到了育英小学住下，周末回到毛泽东身边。1955年干部实行工资制后，朱旦华想要给远新寄学费和生活费。毛泽东不同意，他说，泽民牺牲了，远新就是自家的孩子。

韶山人民的儿子：毛楚雄

毛楚雄是毛泽覃和周文楠之子，毛泽东的侄子。他 1927 年出生，毛泽覃牺牲时，毛楚雄八岁。

毛楚雄十岁回到韶山，在外婆周陈轩抚养下长大。他从小就有大志愿，刻苦学习，且十分懂事，经常上山砍柴，帮家人做农活。

毛楚雄自小在毛氏兴华初小和思三高级小学读书，学校教员有些是中共党



★ 1937 年 11 月，毛楚雄随外婆，舅舅离开长沙，到韶山上屋场居住，先后就读于毛氏兴华初小和湘潭县私立思三高级小学。图为思三高级小学旧址



★ 毛泽覃之子毛楚雄

员和雪耻会的成员，思想比较进步，毛楚雄受其影响，小小年纪就已经很有思想觉悟。他在作文中写道：“现在国家已被侵略，危急万分，就像刀架在头上，火烧在眉尖一样，我们小朋友也该团结起来……我们不能背起枪，到前方去和鬼子血战，可是也能在后方做救国工作啊。”

在一篇叫做“抗日救国”的文章中，毛楚雄写道：“我们现在抗战是为什么呢？一是因为暴日之侵略，忍无可忍而战；二是为全人类的公义而战；三是为了要夺回全世界人类的公理而战……我们虽然失去了一些地方，将士们，我们不要抱着悲观，应该为国家努力，应该为祖国争光，把鬼子赶出中国去，收复失地，最后胜利总是我们的。”他还说，“前程的路，不是平坦的，崎岖艰难，多鬼多魔，所以要在青年时代，努力向前猛进，千万不要做事虎头蛇尾，青年要想达成成功的目标，非要吃苦不行！”

毛泽东关心着远在韶山的周文楠和毛楚雄。毛泽覃去世了，他这个做大哥做大伯的，想要给予这对母子一些照顾，1938年，毛泽东曾给周文楠和毛楚雄母子寄过二十块大洋。1940年，周文楠北上延安，毛楚雄和外婆周陈轩仍留在韶山，住在上屋场毛家老宅。

1945年8月，王震率领八路军南下支队返回陕北，途经湘潭时，毛楚雄找到了王震，他说明了自己的身份，要求跟王震一起去陕北。王震不敢大意，他致电毛泽东，说明了情况，毛泽东回电，表明楚雄确实是他三弟毛泽覃的儿子，他请王震把毛楚雄带回延安。

9月，毛楚雄告别了外婆和舅舅，跟随着王震的部队北上，他被编在教导团第四连。他不怕苦不怕累，和大家关系相处得很好，总是抢着挑水，打扫卫生。

两个月后，南下支队进入鄂豫皖边区，和李先念的新四军第五师会合，组成中原军区，毛楚雄被安排在军区政治部宣传队做宣传员，学习收发电报。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进攻中原，中原军区必须突围。

毛楚雄跟着部队从湖北宣化店出发，7月到达河南淅川县。

王震很注意毛楚雄的安全，几次楚雄要求下战斗连打仗，王震都没答应。

为了尽快把毛楚雄送去延安，王震决定让毛楚雄以警卫员的身份，随张文津、吴祖贻和肖善义去西安，再从西安转道延安。

四个人从镇安县杨泗庙出发，走到宁陕县东江口镇，被胡宗南部队第一八一团第四连连长李清润扣留。四个人被送去了团部，后经蒋介石授意，团



★ 毛楚雄牺牲地
东江口镇河谷

长韩清雅便开始执行“行刑”的密令。1946年8月10日晚，韩清雅叫了几个人在宁陕县东江口镇城隍庙石坎下甸河旁的河滩上挖了几个大坑，当夜，毛楚雄四人被推入沙坑活埋。

这一年，毛楚雄才十九岁，他怀着远大的革命愿望北上，却遭反动派毒手，永远到不了延安。

到此，毛家已经为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

革命是要流血的，革命是要死人的，这一点，毛泽东家族的亲人们从走出韶山的第一天起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可是，人心都是肉长的，面对亲人的罹难，毛家人怎么能不心痛呢。

毛泽东后来说：“毛楚雄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是韶山人民的儿子……楚雄年龄不大，为国捐躯，虽死犹荣。”

后记

一转眼，我的爷爷毛泽东已经逝世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里，他领导人民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了更大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下，在中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下，中国和平崛起于世界的东方。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正因为我们有着这样的幸福生活，饮水思源，我们更不能够，也不应该忘记历史。过去的一百年，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一步一步进步为世界瞩目的东方大国，敬爱的爷爷，您领导的革命，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写这部书，不仅仅是歌颂毛泽东家族的英烈们的事迹，而是想要通过我们家族的奋起与遭遇，来书写一个革命的家庭，是怎样弃小家、为大家、舍己忘我，投身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的。中国人向来有家国之思，有国才有家，我们毛家，便是中国革命道路上千千万万爱国家庭的缩影。中国革命胜利了，毛泽东带领的毛家人，却牺牲了六位至亲，他们每一位都很具有代表性，杨开慧是忠贞的革命女性——“忠贞骄杨”，毛泽民是红色财经工作的开拓者，毛泽覃是红军独立师师长，毛泽建是女游击队长，毛岸英是国际主义战士，毛楚雄是少年英杰——除此之外，与毛泽东家族有关的文家、向家、杨家、贺家等，也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当然还有无数为中国革命胜利前仆后继的家庭……无数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才终于铸成我们新的长城。和平年代出生、长大的孩子们，理应记住这段历史。

爷爷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曾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当下

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爷爷的这句话更值得深思，这个精神到底是什么？它是一种信念，一种境界，一种坚守，一种超越。一个人要有点精神，一个家族要有点精神，一个民族要有点精神，一个国家要有点精神！我们要守住这点精神，发扬这点精神。正如爷爷所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也是我们立家、立党、立国之根本。

毛新宇

2016年5月

附 毛祖人（毛泽东曾祖父）后裔简表

